华/中/师/范/大/学/出/版/基/金/丛/书

# 地缘政治学：

## 历史、方法与世界格局

DIYUAN ZHENGZHIXUE LISHI
FANGFA YU SHIJIE GEJU

刘从德 著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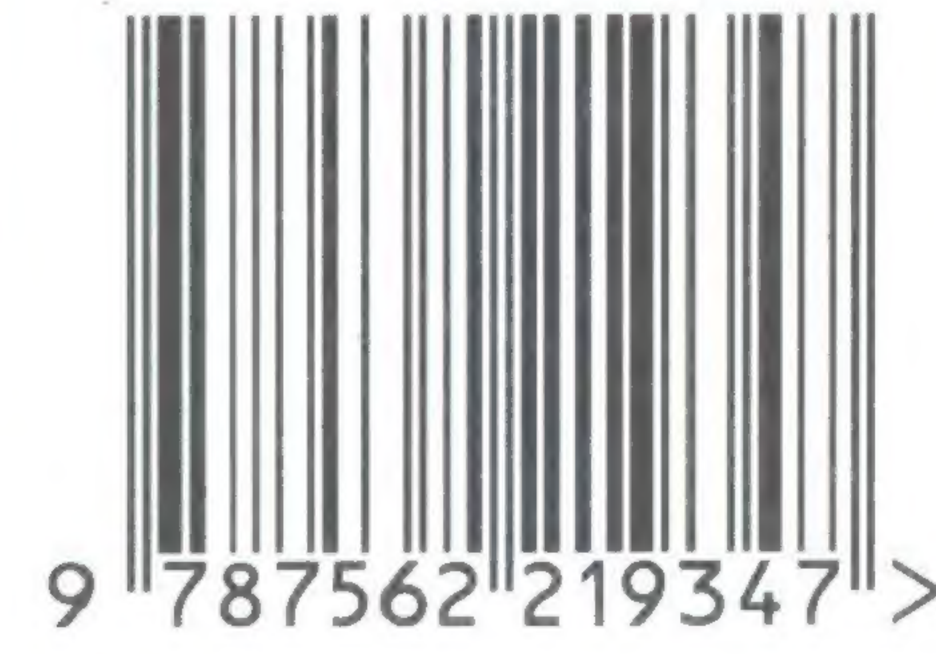
华中师范大学出版社



责任编辑 段　维
封面设计 甘　英
责任校对 马　强




定价：12.60元


ISBN 7-5622-1934-6
9 787562 219347 >

# 地缘政治学：历史、方法与世界格局

刘从德　　著

华中师范大学出版社
1998年·武汉

华中师范大学出版



# 地缘政治学：

## 历史、方法与世界格局

DIYUAN ZHENGZHIXUE LISHI
FANGFA YU SHIJIE GEJU

刘从德 著

华中师范大学出版社

（鄂）新登字 11 号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地缘政治学：历史、方法与世界格局/刘从德著. —武汉：华中师范大学出版社，1998. 9

ISBN 7-5622-1934-6/K·115

Ⅰ. 地… Ⅱ. 刘… Ⅲ. 政治地理学 Ⅳ. K901. 4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97）第 21472 号

**地缘政治学：历史、方法与世界格局**

©刘从德 著

华中师范大学出版社出版发行
（武昌桂子山 邮编：430079）

新华书店湖北发行所经销　　黄冈日报印刷厂印刷

责任编辑：段 维　　封面设计：甘 英
责任校对：马 强　　督 印：朱 虹

开本：850×1168 1/32　　印张：8.　　字数：208 千字
版次：1998 年 9 月第 1 版　　1998 年 9 月第 1 次印刷
印数：1－1 000　　定价：12. 60 元

本书系 1993 年度国家社科基金资助课题的最终成果

责任编辑 段　维
封面设计 甘　英
责任校对 马　强

# 目　　录

# 引　言

在政治地理学（political geography）研究的所有问题中，没有一个像地缘政治学（geopolitics）那样引起如此之多的争论。在很大程度上，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德国的地理学家和纳粹军事战略家利用这一概念为其对外扩张政策服务，不仅玷污了这一词汇，而且还损害了政治地理学本身在以后的几十年里作为学术研究合法领域的地位，因此，地缘政治知识的运用，无论是与资源、权力和外交相关的，还是与军事战略有关的，都遭到人们的鄙视和冷遇，地缘政治学方面的论著也一度灰封尘锁，倍受冷落。

显然，地缘政治学的伪科学性在于其法西斯主义的特殊内涵，而人们在概念上的简单混淆最终导致了普遍的误解。通常，普遍意义上的政治地理和特殊意义上的国际政治地理与地缘政治学混为一谈，这一词的英文又是 Geopolitik 的不确切翻译。Geopolitik 出现于 1919 年—1939 年战争期间，确切来讲，它是指地理知识为国家的利益服务，简言之，是指地理政策（Geo—policy）；地缘政治学与卡尔·豪斯霍费尔在慕尼黑创办的地缘政治学研究所（Institut für Geopolitik）联系在一起。后来的研究者们关于他与第三帝国的征服战略间的关系问题存在诸多的争论，作者也在本书中对此问题的探讨尽了最大努力。

正是因为希特勒德国利用了"生存空间"（Lebensraum）概念和豪斯霍费尔的德国地缘政治学流派的思想为其扩张政策服务，所以，美国及其他西方国家的许多人都武断地下结论认为，"地理学与政治学的任何结合都将导致战争和征服"[1]。前苏联及我国的学者在较长

---

① *International Encyclopedia of the Social Sciences*(5—6),P. 121.

一段时间里则将地缘政治学斥为"资产阶级的伪科学"，在学术研究领域根本没有它的立足之地，即便是目前，学术界也仍然心有余悸，在翻译和研究工作中措词谨慎，不愿使用地缘政治学一词。

我们在这项研究工作中不难发现，二战后的一段时间里（主要是反战情绪极浓的五六十年代）各国虽在学术研究和官方文件中冷落了地缘政治学，但这并不意味着关于军事/战略或其他领域中地缘政治学观点的终结：一方面，它仍然是政治地理学家们研究的一个极为有用的领域，政治学者和地理学者互踢皮球的现象只不过是一时的情势；另一方面，各国的外交家、政治家和政府官员从来都没有因为地缘政治学的声名狼藉而放弃使用地缘政治学的分析方法。战后以来有哪个大国的全球政治分析、国家政治战略的制定、外交政策的调整没有考虑到地缘政治因素呢？可以说，否认地理因素与人文因素之间恒久的联系是不可能的。我们虽然对地理环境决定论的极端认识并不赞成，但谁都不会否认地理因素对国际关系的潜在影响力，从一定意义上说，有史以来的国际关系史实际就是海权与陆权的对抗史，我们从全球范围和各个区域来看，国家争霸史无不体现这一关系格局。海权与陆权是一对天敌。

需要注意的是，地缘政治学本身不存在所谓要"正名"的问题，我们在权威的辞书上可见，对这一词的解释包括两个方面：(1) 地理学对国际政治的特征、历史、结构，尤其是与他国关系的影响，以及这种影响的研究本身；(2) 在民主社会主义德国发展起来的一门伪科学[1]。因此，我们应当力求从它的产生、发展及现实的格局进行全方位论述。首先，本书的第1部分探讨了始于古代世界的研究模式、方法和主题，从古代和近代中外思想家的研究来看，我们可以用一个时髦的词来谈论他们的主题：人——境关系。这一时期各学

---

[1] *The Oxford English Dictionary*, Second Edition, Vol. VI, Clarendon Press, oxford, 1989, P. 463.

科的分类还只是一个动态的过程，致力于这一领域研究的大多是哲学家、史学家和军事学家，他们的研究一方面促进了地理学的发展，同时也导致了一门交叉学科胚胎的形成，而且这一胚胎一开始就包含了分裂的因子。

达尔文的生物进化论是划时代的学说，它的兴起震撼了学术研究和思想领域中一切陈旧的观点和概念，加上殖民体系在国际关系体系中的逐步确立，地缘政治学说迅速发展。本书的第2部分论述了拉策尔、契伦、马汉、麦金德和杜黑几位学者的理论，这是我们了解和认识地缘政治学说的核心内容。

上述学者的论述对国际政治格局产生了极其深远的影响力。一方面，他们从地理因素分析了国家权力的结构与内涵；另一方面又直接参与了主要国家的决策，并对他国产生了重大影响。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世界法西斯盗用地缘政治学为其征服活动进行粉饰，在地缘政治学的发展史上写下了极不光彩的一页（本书第3部分着力进行了研究）。同时，第二次世界大战后，美国和苏联在制定对外战略时也深受马汉、麦金德等人论述的影响，这一点我们通过对它们全球战略的演变进行分析来加以说明（第4、5部分）。

必须指出，随着世界政治、经济及国际关系的发展变化，人们越来越难以“对人类自身的政治事件孤立地进行考虑，并把它归结为纯属国内事务或对外事务，纯属政治学、社会学或经济学的问题”[①]，同样，作为研究“地理学、经济学和人口统计学等物质因素对一个国家的政治，尤其是对外政策有何影响”[②]的学科，地缘政治学面临新的问题、新的抉择，特别是80年代以来，这一研究领域呈现出了新的特点，即研究层次越来越丰富和深人，其主要集中于这样

① 况光贤主编:《人文地理学导论》,西南师范大学出版社,1987年,第298～299页。

② 王同亿主编译：《英汉词海》，国防工业出版社，1987年，第2191页。

一些问题的探讨上：

第一，关于权力的含义。这本身是一个古老的课题，80 年代以来涉及的疑问有：核时代如何定义权力？传统的衡量范围、军事力量和资源的方法仍然适用吗？多极世界中的权力如何界定？等等。无疑，权力将是 90 年代后地缘政治学分析的一个最基本概念，但的确又给政治学家和政治地理学家们提出了新的难题，特别是关于权力的地理范围、衡量标准需要进一步探讨。

第二，关于收缩的地缘政治世界和全球相互依赖。传统的独立的地理位置还有多少重要性？传统概念诸如"心脏地带"、"边缘地带"、"核心"、"外围"、"遏制"、"多米诺骨牌效应"等在通讯直接、联系紧密的世界中还有何种意义？在新的格局中，我们能证明距离作为一种障碍已崩溃了吗？科技进步及其获得是否就是一种新的障碍？有学者认为，更快的运输和通讯使国家之间的空间相对缩小了；同样，它们交往和相互影响的类型、规模、形式都发生了极大的变化，这就要求进行更完善的整体分析（尽管麦金德、豪斯霍费尔、马汉、斯皮克曼、科恩等人也将世界作为一个整体来分析）。

第三，意识形态因素与地缘政治学。一般而言，大多数学者的研究避开了政治哲学和意识形态，所以，当前一项较为有价值的工作就是，分析意识形态因素色彩极浓的国家关系中是如何运用地缘政治的，尤其是那些意识形态迥异的国家间。

第四，战争和防御战略。不言而喻，地缘政治学和军事地理学是不能等同的，前者分析权力、资源、信息和政治战略，而后者则致力于战争、战斗的后勤学。对战争、战略研究的地理因素进行分析是必不可少的。

第五，地缘政治学与现实外交政策。这包含一些极敏感的论题：地缘政治学运用于解释国家的外交政策可达到何种程度？岁月果真已冲淡了地缘政治学那可恶的政策含义吗？新兴工业国家的崛起有何重要意义？地区大国的出现和传统大国的衰落说明了什么？高新

技术武器的获得在多大程度上影响了外交决策？各国决策者必须看到世界所显现的新特征，并及时调整对外政策，从格局态势分析来看，海权与陆权一分为二的传统分水岭遭到破坏了吗？集团化和区域化必然导致多极化吗？

第六，国家的未来地位。在现实的国际舞台上，国家的定义已发生了很大的变化，令地缘政治学者们困惑的是，民族国家是否正为国家体系所替代？或是被跨国合作、区域主义和区域同盟所取代？当今是谁和谁进行谈判？在敌对民族和国际势力的意志背道而驰的世界中，国家充当什么角色？经历一场有限或全球核战争后，将会出现何种局面？未来国家如何操纵？

# 1 地缘与政治：古人与近人的视野

## 1.1 西方早期学者的论述

尽管政治地理学科诞生于19世纪下半叶的德国，“地缘政治学”一词的出现也只是本世纪初的事情，但是地理学原始概念却对人类生活的各个方面产生了普遍的影响，人们也并不是最近才对地理及范围更大的环境要素对政治的影响发生兴趣的，这种研究始于古代世界。恩格斯曾经指出：“在希腊哲学的多种多样的形式中，差不多可以找到以后各种观点的胚胎、萌芽。”[1] 不少对地理学思想的发展作出过重大贡献的古希腊及其他国家的学者就曾论述了气候条件、地理环境对人类自身的影响，以及与民族差异性之间的联系。被誉为“历史学之父”的古希腊伟大学者希罗多德[2]（Herodotus，约公元前484—前430/420）在《历史》一书中用了第2卷的全部篇幅叙述了他到埃及旅行的地理考察经历，并“第一个系统地论述了历史时期中存在的人与地理环境的关系”[3]。“他被推崇为一个极古老的思想的创始人，即全部历史都必须用地理观点来研究。把地理概念看作是‘历史的仆从’，确实就是希罗多德首创的想法。地理提供

---

① 恩格斯：《自然辩证法》，人民出版社，1971年，第30页。

② 希罗多德之所以被称为历史学者，主要是因为历史学者比地理学者多，其实他的著作中极大部分显然是属于地理方面的。

③ 《简明不列颠百科全书》（中文版），第8卷，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社，1985年，第465页，“希罗多德”条。

了自然背景和舞台场景，历史事实只有和它联系在一起才具有意义”①。

古希腊医生希波克拉底（Hippocrates，约公元前460—前377）被后世称为医学之父。他的理论对亚里士多德创立自然地理学产生了重大影响。他在《大气、水和环境的影响》中指出：气候对人种和民族的差异产生了决定性的影响②。“人们（居住在酷热气候里）比较北方人活泼些和健壮些，他们的声音较清明，性格较温和，智慧较敏锐；同时，热带所有的物产比寒冷的地方要好一些……在这样温度里居住的人们，他们心灵未受过生气蓬勃的刺激，身体也不遭受急剧的变化，自然而然地使人更为野蛮，性格更为激烈和不易驯服。因为从一种状态到另一种状态的迅速转变能焕发人们的精神，把他们从无所作为的状态中拯救出来”③。“人类的人相学可以分为树木茂密和水源充分的山岳型、土地贫瘠的缺水型、草地沼泽型、开阔的排水良好的低地型。……在多山多石而雨量充足的高山区，气候季节的变化很大，这里的居民易于有巨大的身躯，生来适于勇敢和坚忍。……在布满潮湿草原的闷热的洼地区，居民习惯于热风而不习惯于寒风，习惯于饮温水，因此他们的身体既不巨大又不瘦长，而是很结实，多肉而且黑发，面容黧黑而不白，在生理组织上多胆汁质而少粘液质。在他们天赋的性格里勇敢和坚忍的成分不一，但由于其组织特征，也可以产生出来。……在起伏多风而雨量充分的高原区的居民，一定是身材粗大而彼此都很类似，在性格上有些懦弱而驯良。……你会发现人的身体和性格大部分都随着自然环境的

① ［美］普雷斯顿·詹姆斯著，李旭旦译：《地理学思想史》，商务印书馆，1982年，第25～26页。

② ［法］保罗·佩迪什：《古希腊人的地理学——古希腊地理学史》，商务印书馆，1983年，第54页。

③ 戴波德纳尔斯基：《古代的地理学》，商务印书馆，1986年，第60页。

不同而有所不同。"[1]

两个伟大的希腊哲学家柏拉图（Plato，公元前 428—348）和亚里士多德（Aristotle，公元前 384—322）对地理思想的发展作出了重要贡献。柏拉图是一位"用演绎法来进行推理的大师"，他提出了海洋决定论，认为海洋使"国民的思想中充满了商人的气质，以及不可靠的、虚伪的性格。这就使得不仅在他们的市民之间，而且在他们与别人交往时变得不可信和敌对"[2]。而亚里士多德则从特殊到一般来进行推理，用以创立理论，他坚信："建立理论的最好方法是观察事实，而证实一个理论的最好方法则是用观察到的事实去作对证。"[3] 他在地理学方面所取得的成就"代表了希腊人地理思想的一个时代"[4]。他提出了气候决定论，指出地球的各种可居住性和不同的纬度的气候有关，并推测靠近赤道的那部分地区即热带，靠近两极的那部分地区即寒带，是不适合于居住的，只有处于这两带之间的温带地区才能成为地球上的居住区。在这片居住带中，"居住在寒冷地带和欧洲的民族虽然具有大无畏的精神，但是缺乏智慧和技术，因此他们虽然保持着相对的独立，但没有政治组织能力，不能统治其他民族。亚洲民族虽然十分聪明，但缺乏勇敢的精神，因此他们永远处于从属和被奴役的地位。但是居住在他们之间的希腊民族，性格具有两者的共同优点，具有勇敢的精神，也有智慧。至今它是独立的，并且最能够统治其他民族。如果它能够形成一个国家，就能

---

① 希波克拉底：《大气、水和环境的影响》（Hippocrates：*Influences of Atmosphere, Water and Situation*）第 13、24 章。转引自［英］汤因比著，曹未风等译：《历史研究》（上），上海人民出版社，1986 年，第 69 页。

② Plato：*The Laws*，Penguin Books Ltd，1970，704D～705A.

③ ［美］普雷斯顿·詹姆斯著，李旭旦译：《地理学思想史》，第 32 页。

④ ［法］保罗·佩迪什：《古希腊人的地理学——古希腊地理学史》，第 60 页。

够统治世界"①。

在古代，希腊人和埃及人是以水源、气候、陆地为基础来划分政治区域的，只不过当初的"地缘政治观点在地理环境的范围和性质上都是极具局限性的"②。亚伯兰和罗特同意瓜分迦南地区的划分基础是水源，罗特选择了水源充足的约旦河谷，其自然条件与尼罗河谷极相似。亚伯兰选择了多草的迦南丘陵地区。这种划分在当初很有代表性。尼罗河谷、约旦河谷绿洲和美索不达米亚河谷都属天然的地理单位，"对它进行统一控制是地缘政治的主要目的"。而其邻近的沙漠和丘陵地带既是抵御侵略的屏障也是好战的侵略者的发源地。

公元前6世纪的赫卡泰（Hecataeus，约公元前550—前475）基于气候因素在他的地图上将世界分为两个部分：北方寒冷地区的欧洲部分（含西伯利亚）和南方温暖地区的亚非部分，亚非地区因更适合于居住而成为世界的主要实力地区。一个世纪以后，帕米尼德则建议将世界分为五个温度区：一个热带、两个温带、两个寒带。不过，在他之后的亚里士多德声称居于温带的希腊人在实力上居于优势的看法似乎"超出了陆地联合的范畴"③。

以陆地为着眼点，对世界进行地缘政治划分的看法也很有代表性。柏拉图提出了"被遗忘的大陆"这个新概念，他在《共和国》一书中设想了一个理想的国度，这个国家是真正的实力中心，位于一个新的巨岛——阿特兰蒂斯，它强大得足以击退任何国家的侵略。他还向人们讲述了阿特兰蒂斯城的故事："在公元前9000年时，希腊世界几乎被一个居住在西方某地的一个高度文明的民族所征服。希腊军队只是经过了一场激烈的战争以后才取得胜利；但正当入侵者

① *Aristotle's Politics*, New York, 1943, P. 291.

② [美]《军事战略》，军事科学出版社，1986年，第139页。

③ [美]《军事战略》，第140页。

被打败的同时，他们的国家遭到了一次毁灭性的地震而沉到海底去了。"[1] 罗马地理学家斯特拉波（strabo，约公元前64—20）对世界的看法是以大陆为着眼点，以欧洲为中心的。他在其所著的共计17卷之巨的《地理》(*Geography*) 一书中，用大量的篇幅捍卫了荷马的地理学识，但抛弃了希罗多德，赞同埃拉托色尼说明的亚里士多德的居住地带，并断言，在赤道附近人类可能生活的限界止于北纬12°30′。他在描述政治区域的人文现象时，将全球分成以欧洲为中心的几个四边形地区，将其中有人居住的地面放到其中一个四边形中去。"这块地面看起来像是士兵的一件斗篷，位于一个平行四边形内，周围有水围绕。这种有人居住的地面由三部分组成，即欧洲、利比亚和亚洲，其形状依海湾形状的不同而不同"[2]。他认为欧洲大陆是"最能提高人类智力和社会地位的地区"。这或许是西方最早划分全球战略地理区的思想。下面这段话充分反映了斯特拉波的地缘政治视野："现在的地理学家除自己居住的陆地外不应再注意其他的什么地面，这块地面有一定边界［由赫尔克里士的圆柱大殿到东大洋的孟加拉湾，由伊尔纳（爱尔兰）到西纳蒙（锡兰）的原野］。""那些以无人居住的区域为界的国家……不能引起地理学家的兴趣"。"熟悉这些边远地区和居住在这里的民族，对实现任何政治目的都没有用处；尤其是一些岛国，它的居民不能妨碍我们，也不能以通商使我们得益。"[3] 显然，斯特拉波和大多数早期学者一样忽视了世界存在多个实力中心的事实，因为有人居住和文明程度极高的地区不止一个。

在托勒密（Ptolemy，90—168）之后，古代地理学真正宣告结束，无论在体力上和智力上由希腊人所开拓的地理知识又重新闭塞

① ［美］普雷斯顿·詹姆斯著，李旭旦译，《地理学思想史》，第31页。
② ［美］《军事战略》，第141页。
③ ［美］《军事战略》，第141页。

起来。"对作为人类之家的地球表面进行描述和解释的工作，要到许多世纪以后才重新引起学者们的注意。"虽然公元5世纪时，随着罗马帝国及其中央行政系统的分崩瓦解，希腊人的地理眼界极大扩展，"但是到了中世纪，地理眼界又重新闭塞起来……住在基督教的欧洲的人们，很多人仅仅熟悉他们邻近的环境：……只是在寺院的庇护下保留下了智力生活的一些闪烁的光焰"[①]（当然这也不是中世纪完全的图景）。在占星术和天文学方面，托勒密是中世纪基督教世界的权威。他的一部探讨天体位置对人类事务影响的著作——《四分法》（*Quadripartitum*）是普拉托在1138年从阿拉伯文译成拉丁文的。在基督教欧洲流传的亚里士多德的地理思想是在12世纪从阿拉伯文翻译介绍过来的。此时把可居住性和纬度等同起来的理论在中世纪的著作中已深深地扎下了根。学者大艾伯塔斯（Albertus Magnus）第一个援引了亚里士多德的理论，他在《地区的性质》（*De Nature Locorum*）一书中把占星术和环境决定论结合起来了，他比希腊人走得更远：认为居住在太靠近可居住的地球的边限地区的人，皮肤被晒成黑色；他还坚持认为，如果黑色人移居到温带纬度来，他们会慢慢变白。

这一时期的地图变成了纯粹的幻想，所谓T—O形地图盛行。"居住世界用一个四周环绕着海洋的圆来表示。图形侧面向着东方。在陆地的中间安排了一个T形的水体。T字的柄代表地中海。T字上顶的一端代表爱琴海和黑海，另一端代表尼罗河和红海。T字的水体所分隔的三部分——欧洲、亚洲和非洲，被公认是标准的分法。恰好位于T字中心的上方，是居住世界的中心耶路撒冷。远向东去，在居住世界边限以外是天堂。"[②]

临近基督教欧洲的中世纪末期，有少数学者开始主张需要以理

① ［美］普雷斯顿·詹姆斯著，李旭旦译：《地理学思想史》，第49～50页。

② ［美］普雷斯顿·詹姆斯著，李旭旦译：《地理学思想史》，第54页。

性来面对权威，这被称为"中世纪学术界内较为光辉的一面"。林肯郡的主教罗伯特·格罗塞特斯（Robert Grosseteste）用阿拉伯人的报道中关于非洲东岸有人居住的地方一直延伸到远达南纬 20°这一事实，来反对存在着不可居住的灼热地带的说法。红衣主教皮埃尔·戴利（Pierre d'Ailly）引证了许多报道，说明在非洲南端环绕着一个开阔的海洋，这"对葡萄牙的地理学者和航海者产生了重大影响，他们此后不久就开始去寻找一条避开阿拉伯领土以到达印度的道路"①。

早期穆斯林地理学家的观点来源于古希腊和罗马的地缘政治思想。但是，由于穆斯林的地理学著作不仅取材于从希腊文翻译过来的东西，而且还能取材于他们自己的旅行者的报道。因此，他们的世界知识比同时期的基督教学者们的世界知识要更为正确。伟大的阿拉伯旅行者伊本·胡卡勒（ibn－Haukal）从 943 年—973 年的 30 年间访问了非洲及亚洲的一些最僻远的地方。他在沿非洲东海岸到达赤道以南纬度 20°左右的一次航行中看到，希腊人认为不可居住的这些纬度上有很多人居住。不过这并未改变希腊人论点的地位。公元 985 年，马克迪西（al－Maqdisi）指出，气候不仅按纬度变化，也有东西方向的不同，因此应把世界分成 14 个气候区。同时，他还认为南半球大部分是海洋，而大部分的陆地位于北半球。第一个把注意力特别转向人与环境关系的学者伊本·卡尔敦（ibn－khaldun）在其《世界史》（*Muqaddimah*）的长篇导言的开头讨论了人与自然环境及其影响。他认为，人的特征和他的文化与生活方式有关，不是和环境有关。令人奇怪的是，他接受了平行于赤道的七个气候带的传统说法，并重复了关于在赤道上和极地有一个不可居住地带的想法。看来，在伊本·卡尔敦那里，这种朴素的环境决定论只是因为承认不同的文化传统而有些改进而已。

---

① ［美］普雷斯顿·詹姆斯著，李旭旦译：《地理学思想史》，第 59 页。

14 至 15 世纪葡萄牙人绕非洲的航行，是打破基督教欧洲——穆斯林亚洲的大陆地缘政治观点的最早尝试。阿拉伯人阻断了欧洲人和亚洲人之间的直接往来，他们在欧洲和亚洲之间、欧洲和非洲之间撤下了屏幕，控制着北非及亚洲西南的大片干燥地区。这种格局严重阻碍了欧洲人需要贵重金属和香料以及探险者们想发财的愿望。于是，欧洲探险者们尝试摆脱大陆思想的束缚，试图利用海洋获取非洲及印度的财富。1415 年，亨利王子统帅的一支葡萄牙部队攻占了直布罗陀海峡南边的穆斯林据点——休达。这是欧洲民族国家首次在欧洲以外占领土地。从一定意义上讲，这种夺取海外关键领地的做法，不仅开创了欧洲海外殖民的新时代，而且预示着人类全球地缘政治观点的形成。

海外征服和探险为地理学提供了空前丰富的大量新资料，人们的地理视野随之迅速扩展，这不仅使地理学本身得到了极大发展，而且“还在自然环境对人类行为的影响方面产生了不少见解。当时的学术界虽然并没有明确地分出不同的学科，可是，研究地球起源及其表面特征的学者，显然是和那些研究自然环境对人类影响的学者是不一样的。后者大都是历史学家或研究政治的”①。譬如，16 世纪法国政治哲学家琼·博丁(Jean Bodin)，在他 1566 年的著作中接受了希腊气候带的概念，探索了行星对地球上居民的影响，认为受土星影响的人群过着宗教修心的生活，他们主要居于南方；而受火星影响的人好战，善于运用机械装置，他们主要居于北方；受木星影响的人则能在法律的统治下过着文明的生活方式，他们居于地球的中部。纳撒内尔·卡彭特在 1625 年发表的一本英文地理学著作中吸收了博丁的观点。自博丁和卡彭特之后的几个世纪里，学者们不断

① Preston E. James and Geoffrey J. Martin: *All Possible world, A History of Geographical Ideas*, Second Edition, John Wiley and Son, New York, 1981, P. 103.

寻找气候影响人类特征与行为的例证，法国神父德·博斯（De Bos）在1719年的著作中指出：天气对巴黎和罗马的自杀及犯罪率有明显影响，文艺作品仅产生于纬度25°—52°之间的地带。

18世纪内最有影响的作者之一是法国政治哲学家孟德斯鸠（Montesquieu，1689—1755），他在《论法的精神》（*De l'Esprit des Lois*）一书中有一个极其重要的论题，即有关气候对政治的影响。一位英国作者在一本小册子中写道："在浏览了格劳休斯、布尔拉马吉、普芬道夫的著述而一无所获之后，我读了孟德斯鸠的《论法的精神》一书的前13章，也没有任何发现。但是，终于，第14章报偿了我的全部劳顿。"英国著名历史学家罗伯特·夏克尔顿（Robert Shackleton）在《孟德斯鸠评传》（*Montesquieu A Critical Biography*）一书中指出："《论法的精神》中所包含的任何学说，都不如第14章提出的关于气候对人类的影响的学说那样引人注目，那样令人称奇。""比较严肃的作家和孟德斯鸠的一些学生，也把气候理论视为孟德斯鸠的精髓。"[1]

孟德斯鸠视万物为气候所致，气候是支配人类社会的一个主要因素。不过，这种观点在孟德斯鸠的早期著作中并无所见。到了他访问意大利时，才对气候的影响问题表现出真正的兴趣。他在旅途中极为注意空气及其对人类的影响，回到法国后，他把沿途的观察记录整理出来，同时又满腔热情地进行实验。大约在1734年，孟德斯鸠借助显微镜着手进行在《论法的精神》中所描述的关于羊舌头的实验，其目的是为了发现羊的舌头对温度变化的反应。他的这一著名实验及所引出的结论，充分表明了他在不同气候影响人类行为的讨论中极具说服力的思维方法。他写道：

"我观察过羊舌头的外表组织，用肉眼去看，有一个地方就像是

① ［英］罗伯特·夏克尔顿著，刘明臣等译：《孟德斯鸠评传》，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1年，第371～372页。

被乳头状的细粒所覆盖。我用显微镜，就在这些乳头状的细粒的上面，辨识到一些细毛，或是一些毛茸；在乳头状的细粒之间有金字塔形的东西，顶端就像毛笔。这些金字塔很可能就是味觉的主要器官。

"我让人把这些舌头的一半加以冰冻，并用肉眼观察，我发现乳头状的细粒大量减少；它们中有几行甚至缩入它们的细膜内。我又用显微镜检查它们的组织，却看不见那些金字塔形的东西了。当冰冻消退，乳头状的细粒，从肉眼去看，也逐渐随着隆起；用显微镜去看，小粟粒腺也开始出现了。

"这个观察证实了我所说的话。我说在寒冷的国家，神经腺比较不扩张，较深地缩进它们的细膜内，感受不到外界东西的动作，所以它们的感觉就不那样灵敏。

"在寒冷的国家，人们对快乐的感受性是很低的。在温暖的国家，人们对快乐的感受性就多些；在炎热的国家，人们对快乐的感受是极端敏锐的。气候是用纬度加以区别的，所以我们多少也可以用人们感受性的程度加以区别。我曾经在英国和意大利观看一些歌剧，剧本相同，演员也相同，但是同样的音乐在两个国家却产生了极不同的效果：一个国家的观众是冷冷淡淡的，一个国家的观众则非常激动，令人不可思议。"①

显然，孟德斯鸠有关气候的思想，其发展过程是归纳性的，首先研究罗马的空气这一具体问题，继而通过阅读、实验来扩充其观点，最终才形成关于气候影响的总体理论。

孟德斯鸠在《论法的精神》的第14章和第17章从观察气温对人体的效应着手，说明气候的影响：寒冷的空气把人体外部纤维的末端紧缩起来，纤维末端的弹力较大；反之，炎热的空气使纤维末

① [法]孟德斯鸠著，张雁深译：《论法的精神》(上册)，商务印书馆，1982年，第228页～229页。

端松弛，其弹力较小。因此，“人们在寒冷的气候下，便有较充沛的精力……心脏有了更大的力量。心脏力量的加强自然会产生许多效果，例如，有较强的信心，也就是说，有较大的勇气；对自己的优越性有较多的认识，也就是说，有较少复仇的愿望；对自己的安全较有信心，也就是说，较为直率，较少猜疑、策略与诡计。结果，当然产生很不同的性格”[①]。

孟德斯鸠通过这些论述引申出的直接结论构成了其气候理论的几点要素：

第一，“在北方国家，人们的体格健康魁伟，但是迟笨，他们对一切可以使精神焕发的东西都感到快乐……你将在北方气候之下看到邪恶少、品德多、极诚恳而坦白的人民”。但是，“当你走近南方国家的时候，你便将感到自己已完全离开了道德的边界；在那里，最强烈的情欲产生各种犯罪，每个人都企图占别人的一切便宜来放纵这些情欲”。同时，勇气是北方民族的特点，甚至在同一国家内，也可见到显著差别：“朝鲜南方的人民则不如朝鲜北方的人勇敢”[②]，“随之而来的，北方种族比较经常地能够享受自由，而南方种族则往往遭受奴役”[③]。

第二，“器官的纤弱使东方的人民从外界接受最为强烈的印象。身体的懒惰自然地产生了精神上的懒惰。身体的懒惰使精神不能有任何行动，任何努力，任何斗争”[④]。因此，像印度民族这样懒惰的民族长久以来极难改变他们的生活方式，在他们的国土上，今天的法律、风俗、习惯，如衣服的样式，和1000年前相同。他们比别的民族更需要由一个好的立法者执政。但是在英国，气候对人的影响

① ［法］孟德斯鸠著，张雁深译：《论法的精神》（上册），第227页。
② ［法］孟德斯鸠著，张雁深译：《论法的精神》，第230、273页。
③ ［英］罗伯特·夏克尔顿著，刘明臣等译：《孟德斯鸠评传》，第383页。
④ ［法］孟德斯鸠著，张雁深译：《论法的精神》，第231页。

所要求的最适宜的政府是："它使这些人不可能把他们对于政府的不满，发泄于任何人；这个政府与其说是受人支配，毋宁说是受法律支配。"[①] 同时，孟德斯鸠接受了旅行家们关于亚洲的记述，这些记述认为，亚洲几乎没有温带，而欧洲的温带则极其广阔。因此："在亚洲，气质大不相同的种族互相毗连。好战的种族和软弱的种族相互为邻；这种情况使亚洲大陆作为一个整体，力量大为削弱，而战争和奴役则大为增加。在欧洲，种族之间较为平衡，这是欧洲能够强大的因素之一，也是自由受到鼓励的原因之一。在亚洲，由征服形成的地域辽阔的帝国，只能实行专制。而在欧洲的小国里，自由得以充分发展。"[②]

当然，孟德斯鸠也认为，尽管居民在寒冷的气候下比在炎热的气候下，具有更为不同的特征[③]，但只要运用合理的法律，就可把气候的影响减至最小。"克里塞尔（Kriesel）指出，细读孟德斯鸠的书，可知除气候一端外，他还认识到了其他因素的重要性。例如宗教、政府的准则，判例和习惯法等。在任何一个国家里，当这些因素具有强烈势力时，其他因素就相对减弱。因此，克里塞尔说孟德斯鸠是一个或然论者，而不是一个环境决定论者。"[④]

普雷斯顿·詹姆斯还写道："就今天来看，孟德斯鸠犯了很多错误。他不懂得用观察或有控制的实验来核实理论的方法……他还是跟古代希腊人那样，把世界分为欧、亚、非三洲（但补充了古代人所不知道的美洲）……他是以各大洲而不是用纬度带来归纳气候条

① ［英］罗伯特·夏克尔顿著，刘明臣等译：《孟德斯鸠评传》，第 383 页。

② ［法］孟德斯鸠著，张雁深译：《论法的精神》（上册），第 275、277 页。

③ 在最炎热的国度里，人们几乎不知勇气为何物，必须以别的刺激取而代之，即对惩罚的恐怖，因而，气候是造成奴役的原因之一，也很容易导致多妻制。

④ ［美］普雷斯顿·詹姆斯著，李旭旦译：《地理学思想史》，第 128～129 页。

件的。”[1]

研究孟德斯鸠的专家罗伯特·夏克尔顿同样评介孟德斯鸠的气候学说：“这一理论还不是严谨而系统的学说……这是一个温和的、有限的学说……人们得到的第一个印象，应该是它的局限性很大……但是，如果要想正确恰当地理解孟德斯鸠，就必须按当时的标准进行判断。17、18世纪流行的气候理论，往往显得怪异……他力图通过实验方法揭示温度高低的效应，态度严肃认真。”[2]

18世纪中叶另一个对地理思想有重大贡献的学者——德国哲学家伊尔努埃尔·康德（Kant，1724—1804）同样也在他的思想中提到了人类及其活动与地球表面的关系。不过，他和安东·佛里德里希·布申（Anto Friedrich Büsching，德国著名哲学家和地理学学者）一样仅仅按政治单元组织材料。“康德看到了人及其活动与自然环境间的密切关系，并认识到了人类活动是地球表面一切变化的主要作用之一，但他在人文过程与自然过程之间没有加以区别”[3]。

随着地理学的进步，康德成为了一个“欧洲中心论者”。他认为，就事物的本质而言，可以建立一个所谓“大一统的国际性国家”，而在世界格局中，由于欧洲各国相互征服的愿望太强，在这块土地上无法实现实力的均衡。同时他又认为，由自由国家组成的和睦的欧洲联邦可以促成全球的和平。康德的这种地缘政治观点明显具有全球性，他所涉及的世界统一，也是其哲学中唯一承认的统一形式[4]。

到18世纪末期，更多的学者力求寻找人与世界这一老问题的答案，托马斯·罗伯特·马尔萨斯即其中之一。他坚持认为，一个真

---

① ［美］普雷斯顿·詹姆斯著，李旭旦译：《地理学思想史》，第128～129页。

② ［英］罗伯特·夏克尔顿著，刘明臣等译：《孟德斯鸠评传》，第384页。

③ ［美］普雷斯顿·詹姆斯著，李旭旦译：《地理学思想史》，第138页。

④ 参见《军事战略》，第143页。

正社会的建立，将永远受到人口的增长超过食物的增长这一趋向的阻挠。他在其著作《人口论》中指出，人口以几何级数增加，而食物则以数学级数增加，而人口总是增加到其生存的极限，至此就被战争、灾荒和瘟疫所控制[1]。最为重要的是，马尔萨斯提出了“生存竞争”这一概念，“数十年后，查理·达尔文和阿尔弗勒德·拉塞尔·华莱士（Alfred Russel Wallace）都独立地认识到，这是有机界自然选择过程的要旨”。

到19世纪，地理学发生了深刻革命，而这场变革首先产生于德国。德国地理学的两位大师——亚历山大·冯·洪堡（Alexander von Humboldt，1769—1859）和卡尔·李特尔（Karl Ritter，1779—1859）被称为古典地理学的掘墓人和近代地理学的创始人，他们及其追随者的工作，“给予地理科学一个比从前人承袭下来时更为哲理的、同时又是更富于想象力的性质”。在他们之后，“摆在这门引人注目的学科的新的耕耘者面前的最为重要的理论，可能是这样一个问题，即外部自然条件，特别是地球表面形状、陆地和海洋的分布、轮廓及其相互位置，对人类的社会生活与社会进步的影响有多大多深的问题”[2]。

黑格尔（Georg Wilhelm Friedrich Hegel，1770—1831）被称为是宏扬孟德斯鸠思想的最伟大的代表。他在他的《历史哲学》中也极为重视“历史的地理基础”的研究。在黑格尔那里，地理环境对人类历史造成的作用不是终极决定因素，但它却是“助成民族精神产生的那种自然的联系。是一种主要的、而且必要的基础”。他肯定

---

① 意大利学者焦万尼·博塔罗（Giovanni Botero）于1588年曾说过：“一个城市或整个世界的人口，将增加到食物供应所能允许的数目。”

② 引自乔治·珀金斯·马什：《人与自然》或《人类活动所改变了的自然地理》(George Perkins Marsh：*Man and Nature or Physical Geography as Modified by Human action*)。

气候与世界历史有关，“有好些自然的环境，必须永远排斥在世界历史的运动之外”。“在寒带和热带上，找不到世界历史民族的地盘”。“历史的真正舞台所以便是温带，当然是北温带，因为地球在那儿形成了一个大陆”[①]。“美洲乃是明日的国土”，是未来时代世界历史的基础。非洲则“不属于世界历史的部分”。太阳从亚洲升起，所以世界历史也就从亚洲开始[②]。

首先，黑格尔分析了对历史影响的三种类型的地理状况：(1) 干燥的高地及广阔的草原和平原，它“闭关自守，不易到达”；(2) 巨川大河流过的地方，是“文明的中心，而且还没有开发的独立性”；(3) 和海相连的海岸地区，它“表现和维持世界的联系”。由于各地居民所处环境不一样，他们分别从事不同的职业：畜牧业、农业和工商业。

其次，黑格尔认为，在具有不同地理条件的国家里，社会关系和政治制度也各不相同。历史的文明是从长江、黄河、印度河、恒河、幼发拉底河、尼罗河等大河流域开始的，这里农业居统治地位。

第三，黑格尔认为，居民的性格因地理条件各异。他说：“平凡的土地、平凡的平原流域把人类束缚在土壤上，把他卷入无穷的依赖性里边，但是大海却挟着人类超越了那些思想和行动的有限的圈子。”[③]

就黑格尔的环境理论而言，其中不乏深刻合理的因素，然而，有人又认为：“我们决不能把他看作是一位地理环境决定论者……而是一位‘绝对精神’决定论者……对黑格尔来说，自然条件只不过是‘精神发展的基地’罢了。”[④] 而且，这位辩证法的大师的论述中“不

① [德] 黑格尔：《历史哲学》，三联书店，1956年，第124页。

② [德] 黑格尔：《历史哲学》，第143～144页。

③ [德] 黑格尔：《历史哲学》，第134页。

④ 侯鸿勋：《论黑格尔的历史哲学》，上海人民出版社，1982年，第69页。

乏唯心主义的胡说"[1]，例如他说："假如日尔曼森林那时还存在的话，法国大革命或许就不会发生了。"[2]

19世纪的学者同许多古典学者一样，坚信气候制约政治行为的重要性。与黑格尔同时稍晚的英国历史学家亨利·托马斯·巴克尔（Henry Thomas Barkle，1821—1862）在《英国文明史》（*History of Civilization In England*）中，从气候、粮食和土壤的紧密关系入手来解释气候对农作物的种植种类以及土壤对粮食产量的影响，从而揭示了气候对人类事务的影响。他指出，北方劳动者之所以干劲十足，是寒冷地区的粮食供应状况造成的。在地处寒冷的国度里，"人们几乎处处表现出果敢的性格和冒险精神，甚至在社会刚刚形成时也不例外。而在其他国度里，每日食粮信手拈来，全靠大自然慷慨恩赐，不必进行艰苦奋斗，则这种性格较为少见"。同时，巴克尔还写道："在寒冷的国家，维持生命必不可少的粮食比炎热国家奇缺；不仅稀缺，而且需求量更大。由于这两条理由，促进作为劳动力后备的人口的增长就放慢了。简而言之，我们可以说，炎热国家总是强烈地倾向于低工资，而寒冷国家则倾向于高工资。"[3]

阿诺德·盖约特（Arnold Guyot，1807—1884）是李特尔最虔诚的门生之一。1848年，他被聘到美国哈佛大学讲授一系列概述"新地理学"的课程，他提出了两种地球划分方法：（1）陆地半球的旧大陆——新大陆划分法；（2）水域半球的大西洋——太平洋洋域划分法。旧世界是山地、高原和潜力有限的平原，而新世界则是富饶的平原地带。在谈到大洋区域时，他认为大西洋最具有海的特点，它的内陆海占支配地位，洋岸长而平缓；而太平洋则最具有洋的特点，

---

① 周义澄：《自然理论与现时代》，上海人民出版社，1988年，第180页。

② ［德］黑格尔：《历史哲学》，第130页。

③ ［美］詹姆斯·多尔蒂、小罗伯特·普法尔茨格拉夫著，邵文光译：《争论中的国际关系理论》，世界知识出版社，1987年，第65页。

在那里占支配地位的是陆环海，洋岸短而陡峭。

盖约特是“欧洲处于‘实际上是世界交通大道的大洋’的中心位置的第一批现代地理学家之一。虽然他经常强调全球海洋的统一性，但他的两个重要的地缘政治概念却来源于李特尔把大陆看作是‘自然整体’的观点。第一个概念认为，领导世界的权威正在从欧洲转到北美。第二个概念描述各大洲集合成三个双重世界，领导权属于北方各洲。北方的每个洲都对‘自然的普遍的文明’秩序作出了贡献。在这一过程中，亚洲是摇篮，欧洲是促进成熟的地区，北美则是使事物得以最后完善的场所。盖约特用模糊而神秘的词句描述说，基督教、种族以及位置接近等因素是北方各洲实现全球统一的基础”[①]。

19 世纪末 20 世纪初，研究人——境关系的学者出现了明显的差别：一部分学者在前人研究成果的基础上继续深入探讨气候等环境因素对人类自身及文明的影响；而还有一部分学者则不单是描述自然的地球对人类事务的影响，而是集中注意于人类本身。他们在研究和自然现象有关的人类社会时，把注意力放在人类社会的文化方面，在对国家的比较研究中系统地研究空间和位置的作用。这种研究是从德国地理学家弗里德里希·拉采尔(Friedrich Ratzel，1844—1904）开始的。本书将在第二章中详述这条支流的发展。

这一时期最为引人入胜的作者之一就是美国地理学家及探险家埃尔斯沃思·亨丁顿(Ellsworth Huntington，1876—1947)，他认为冰期以来有一个世界范围的干旱期，并以此为前提创立了这样一个假说：认为中亚游牧民族的外流所招致的蒙古人对中国和印度的征服，以及 13 世纪中对东欧的侵略，是可以用他们依以为生的牧草地

① ［美］《军事战略》，第 145 页。

的干枯来说明的[①]。在他看来，"气候不仅决定健康水平、活动、粮食生产水平以及其他资源可能获得的程度，还决定各国人民的迁徙及种族通婚，只有最强健、聪明和敢于冒险的人才能经历迁徙而生存下来，而只有因歉收和缺粮造成经济困苦的人才企图迁移到气候较好的地方去"[②]。亨丁顿在1915年出版的《文明与气候》(*Civilization and Climate*)一书中创立了另外一个假说：人类文化只能在具有刺激性气候的地区才能有所发展。世界主要文明国家都是在年平均气温接近人的最高生产率所需要的最佳水平的气候中发展起来的（65°F—70°F)。热带地区的伟大文明国家仅在温带高原或凉爽的沿海发展起来，那里的温度一年四季都不会超出最佳水平线太多。

但是，由于亨丁顿是在资料十分缺少、收集资料的方法还没完善的时期之前进行研究的，加之他的多数通讯者住在美国东北部、西欧和东亚，因此他在绘制文明等级图时就自然带有了这些人将本区域列为最高文明区的偏见。他只是到了后来才认识到事情的复杂性。

阿诺德·汤因比（Arnold Toynbee，1889—1975）在他的《历史研究》中提出了一种以分析各种文明的循环发展和衰落为基础的历史哲学。他认为，古代希腊人用于解说周围的文化差别的地理环境、土壤和气候的差异论（即环境论）和站不住脚的种族论相比，虽不是颠倒黑白，可是也好不了多少。他通过对与欧亚草原和尼罗河流域的地理环境和气候相似的地方的研究后得出的结论是，"环境的因素并不能成为创造'冲积'文明的积极因素"。"无论种族或是环

① ［美］普雷斯顿·詹姆斯著，李旭旦译：《地理学思想史》，第346页。这一假说见之于他的《亚洲脉动》(*The Pulse of Asia*) 一书，这部书使他在研究气候对人类社会的影响方面走上了成名之路。

② ［美］詹姆斯·多尔蒂、小罗伯特·普法尔茨格拉夫著，邵文光译：《争论中的国际关系理论》，第65页。

境，如果孤立地看，都不足以成为积极因素；在过去6000年中，它们都未足以刺激人类，使其脱离原始社会水平的静止状态，进而使其追求高深莫测的文明生活。无论如何，根据我们研究的结果，迄今为止，种族论或环境论都没有也不可能提供任何关于在人类历史上（不仅在某些特定地点，而且还在某些特定时间）发生的这一度伟大变革的线索"[1]。

如果说文明的起源不是生物因素或地理环境单独发生作用的结果，那么一定是它们两者之间某种交互作用的结果，这些因素不是个统一体而是一种关系。在汤因比看来，文明诞生于提出艰难挑战的环境之中，社会文明的发展是因为经历了一系列不断袭击的挑战。"受到挑战的文明激起生命的活力，使它达到平衡，并迎向新的挑战，促使它作出新的反应。挑战——反应的循环往复可能是永无止境的"[2]。有些文明和那些没有亲属关系的文明遇到的挑战一样遇到了自然环境的挑战[3]。

汤因比在《历史研究》的第7章中研究了五种挑战性的激励因素，其中自然环境的有两种：

第一，困难地方的刺激，亦即气候、地势及土壤条件恶劣的地区的刺激。中国的文明出现在一年四季无法通航、浊流、洪水成灾、多次改道的黄河地区，"古代希腊文明的故乡在实际上比北方没有创造过自己文明的地区，要艰苦、硗薄和荒凉得多。在整个爱琴地区也可以看见同样的对照情况"[4]。他在研究古代叙利亚史时指出，"在

① ［英］汤因比著，曹未风等译：《历史研究》（上），第72～73页。

② ［美］詹姆斯·多尔蒂、小罗伯特·普法尔茨格拉夫著，邵文光译：《争论中的国际关系理论》，第66页。

③ 汤因比解释说，没有亲属关系的文明是否也在它们从原始社会生长出来的时候遇到过人为的挑战，关于这一点还缺乏证据，这是自然的，同时也不必过多追究。

④ ［英］汤因比著，曹未风等译：《历史研究》（上），第110页。

米诺斯后期的民族大迁移里进入叙利亚或在那里居留下来的各种民族，到后来由于他们居住的地方的自然环境难易不同而跟着也有不同的成就。在发展古代叙利亚文明里居领导地位的并不是亚罢拿和法珥法等‘大马士革河’上的阿拉米人；也不是定居在欧朗提斯河上的那些阿拉米人……也不是在约旦河东岸止步不前，留在基列的丰美草原上饲肥他们的‘巴珊公牛’的那些以色列民族”[1]。荷兰、法国和英国三者之间在北美洲的殖民争夺战中，他们都遇到了极其严重的自然环境方面的挑战。北美洲的历史证明了这样一种说法：“困难愈大，刺激就越大。”[2]

第二，新地方的刺激，亦即未开发之地，要通过勘探、开辟和发展把荒野变成良田的地区的刺激。就印度文明而言，其社会生活中的中心及最高级活动宗教的发源地是在南方，印度教的所有的显著特点都是在这里形成的。而南方一带一直到古代印度社会的最后一个时期，到它已经成为“统一国家”的孔雀王朝时期（约公元前323—185）才属于印度社会的范围，这里是新地方。古代叙利亚社会产生了两个子体社会——阿拉伯社会和伊朗社会，其中伊朗社会取得的成就更大，其军事、政治、建筑和文学上的伟大成就“差不多全是出现在伊朗社会的两端地区，不是在印度斯坦就是在安那托利亚，先后在莫卧儿帝国和奥托曼帝国达到高峰。这些成就出现的地方都是新地方……同这些成就相比，伊朗文明在它的中央地区，譬如说在伊朗本土，在叙利亚文明的老地方，就显得黯淡无光了”[3]。东正教影响特别大的三个地方全是新地方。特别应该注意的是，希腊本是前一个时期的文明传播基地，但它对于东正教社会竟“毫无作用”，直到18世纪，它才成为西方势力扩充的“水路孔道”。远东社

① ［英］汤因比著，曹未风等译：《历史研究》（上），第122页。
② ［英］汤因比著，曹未风等译：《历史研究》（上），第122页。
③ ［英］汤因比著，曹未风等译：《历史研究》（上），第124页。

会的突出代表“无疑是日本人和广东人”，这些人从远东历史的观点来看，都是出现于新地方——中国东南沿海一带（直至古代中国历史的后期才并人其版图），那里的居民被称为“蛮族”。日本列岛作为远东文明的分支是经由朝鲜半岛传人的，在此之前，它没有任何文化迹痕。然而其后来的增长是惊人的。

汤因比同时又指出，“凡是在新旧两地之间隔了一段海洋的，刺激力就更大”。这一点在公元前1000年至公元500年的地中海历史上表现得极为明显。跨海的迁移表现出了两个显著的特点：一是不同种族体系的大混合，二是原始社会制度的萎缩。艰难的跨海迁移所产生的成就不是在文学方面，而是在政治方面，“这种新的政治不是以血族为基础；而是以契约为基础的”[①]。

汤因比还提出了三种非自然环境的激励因素：

第一，就地理环境而言的外部打击所引起的刺激。军事失败的反应最容易说明打击的刺激作用，最典型的例子莫过于雅典在公元前480年一公元479年对波斯帝国——叙利亚统一国家——的进攻的反应。

第二，外部不断施加压力的刺激。“从政治地理方面说，受到这种压力的人民、国家或城市大部分是处于‘边区’或边疆省份”[②]。古代埃及的政治历史始终处于两极政治力量的拉锯状态之中，这种两极力量的政治格局或在南部边区或在北部边区。但是在两极力量中心的地带从未发生过什么重大政治事件。政治疆界的刺激作用在古代伊朗世界也表现得相当显著，紧挨着东罗马帝国边境的奥斯曼人，就比位于他们东方的卡拉曼人有更大的成就；奥地利之所以取得了比巴伐利亚大的成就，就是因为它经常不断地遭受到来自奥斯曼土耳其人的攻击。在西方文明的发展史上，最大的外部压力来自欧洲

① ［英］汤因比著，曹未风等译：《历史研究》（上），第132页。
② ［英］汤因比著，曹未风等译：《历史研究》（上），第138页。

大陆中部的蛮族，同时它还在西部边疆遇到三处压力刺激："一处是不列颠群岛和布列塔尼的所谓'凯尔特边区'的压力；一处是不列颠群岛和欧洲大陆的大西洋海岸一带的斯堪的纳维亚的北欧海盗的压力；一处是伊比利亚半岛上以早期穆斯林征服者为代表的古代叙利亚文明的压力。"[1]

第三，遭遇不幸的刺激。长期以来，某些阶层、某些种族遇到了各种形式的不幸，这对于他们的生存和发展来讲就是一种挑战，那么他们作出的反应是什么呢？汤因比认为，他们在一种条件机会被剥夺后，便在允许的范围——新地区、新领域里表现出了突出的精力和突出的才能——这正如跛足工匠和盲诗人一样，意大利奴隶社会时期，处于奴隶阶层中的一些人就取得了某些重大成就。种族歧视也表现出了遭遇不幸的刺激力，例如印度的种姓制度、北美的黑人奴隶制都是如此。犹太人的历史境遇及其所取得的惊人的成就也可从这种观点加以思考。

汤因比在分析文明的诞生、生长和瓦解过程时指出，除了"发展的文明"和"流产的文明"外，还有第三类文明——称之为"停滞的文明"，波利尼西亚人的文明、爱斯基摩人的文明和游牧民族的文明以及奥斯曼人和斯巴达人的文明都属此类，这些文明之所以发展受阻，丧失活力，是由于它们在应付自然的挑战时"用力过猛"的缘故，如波利尼西亚人过于大胆地在海上航行；爱斯基摩人在冬天居留在冰雪上依靠捕捉海豹为生等。"它们对于挑战的应战所花的力量的严重程度达到了刺激发展和引起失败的边缘……它们的地位是处于一种高度紧张的无法活动的危险境界"[2]。

至于文明崩溃的特点，在汤因比看来，具有天生创造特权的"少数创造者"变成了没有创造性和没有魅力的"少数统治者"后，

---

① ［英］汤因比著，曹未风等译：《历史研究》（上），第149页。

② ［英］汤因比著，曹未风等译：《历史研究》（上），第206页。

他们想要凭借武力来维持其特权地位，其结果是使无产者分裂出来，整个社会随之便分裂了。首先，内部无产者在退出后，地理上仍与少数统治者混居，只是道德上产生了鸿沟；其次，外部无产者不但道德上分离，“甚至在自然环境上也同少数统治者分开了，在地图上可以划一条线”①。显然，汤因比的分析模式已涉及到了现代更为复杂的社会变革理论。

## 1．2 中国古代及近代的地缘政治观点

我们在研究地缘政治观点的起源时发现，东西方两大文明古国——希腊和中国的一批思想家们的论述有惊人的相似性，那就是，他们都论述了地理环境对人类自身及其事务的影响，提出了“地理环境决定论”。而恰恰也是因为东西方地理环境的差异性导致了东西方“地理环境决定论”的内容不一样，地缘的差异产生的是两种不同的文化，西方是一种“海洋商业文化”，东方则是一种“大陆农业文化”，因此，古希腊学者所提出的是气候决定论、海洋决定论；古代中国的学者则“偏重于土地（地形、土壤）决定论和水文决定论”②。

中国传统文化形成的一大特点就是强调天人感应学说，而这种学说的思想渊源又可以追溯到“天地相通”的远古概念。所谓“天地相通”，观射文（春秋时期楚昭王之大臣）说是指：“民神杂糅，不可方物，夫人作享，家为巫史。”③还有人解释为：“人之初，天下通。人上通，旦上天，夕上天，天与人，旦有语，夕有语。”④这些解释

① ［英］汤因比著，曹未风等译：《历史研究》（中），第204页。

② 见《自然辩证法研究》1991年第9期，宋正海文，第2页。

③ 《国语·楚语下》。

④ 《定庵续集》卷二，见《四部备要》（集部），上海中华书局。

说明，在中国早期的思想家们看来，人类原本是自然的一部分，只是到后来才逐渐脱离，日益远隔。同时也反映了统治者一开始就是利用人们对自然的畏惧和无能为力来为其巩固权力服务的。

春秋战国时期，中国的各种学说，百家争鸣，除法家极少言及人与自然的关系外，其他学说大都论述了这一点。也正是从这一时期开始，东西方截然不同的人地观逐步形成。“中国哲学家们对自然界的态度，和希腊人所持有的态度基本上不同。对中国人来说，个人和自然是分不开的——他是自然的一部分。不存在一个制定法则的神，不存在按照事先想好的方案创造了为人类利用的宇宙的神。在中国，人死了以后不是进入一个新的天堂去生活，或是在地狱里受罪，而是一个人希望被同化到他自身是其不可分割的一部分的茫茫宇宙中去。”[①]被希腊地理学者推崇为地理学祖师的荷马（Homer，生卒年份不明）的史诗与中国西周时期史诗的主要不同点在于，它所表现出的是人与自然的对立，人向命运的抗争。他在第二部史诗《奥德赛》(*Odyssey*)中记述了当时已知的世界边远地区的地理概况，叙述了奥德赛在特洛伊城陷落以后回到家乡伊塔卡的艰辛历程，他历经千辛万苦，最终战胜了自然界和神妖。而中国《诗经》之中的诗歌，“往往歌颂上天‘诞降嘉种，维秬维秠，维穈维芑’，表现出对自然环境的欢愉之情，从而表现了人与自然的相安和对命运的满足”[②]。产生这种心态的主要原因在于，中国的地理位置一开始所滋生的便是一种自给自足的农业经济模式，这相对于西方和游牧民族而言表现出了明显的原始地缘优势，人们在风调雨顺的环境中生存，他们不需要对周围的民族和地区产生太多的兴趣或惧怕，更谈不上为生存去进行艰苦的迁徙。因此，他们的地理眼界也是十分有限的，

① ［美］普雷斯顿·詹姆斯著，李旭旦译：《地理学思想史》，第69页。

② 赵世瑜、周尚意：《中国文化地理概说》，山西教育出版社，1991年，第24页。

地缘政治观点也显得比西方狭隘。乃至于到了近代，中国的大多数公民仍闭锁于中央之国的狭隘空间中，认为世界仍是“普天之下莫非王土，率土之滨莫非王臣”的时代。当然，也有人认为晚周时期中国就已出现了世界性的视野。他们认为，战国时期邹衍著名的“大九州说”中所言的“儒者所谓中国者，于天下乃八十一分居其一分耳”，就是认为，在中国这个赤县神州之外，还有像这样的九洲：“于是有裨海环之，人民禽兽莫能相通者，如一区中者，乃为一州，如此者九，乃有大瀛海环其外，天地之际焉。”[1]

同西方的地缘政治观点不同的另一个方面是，春秋战国时期的割剧分裂局面，使中国早期的学者们在分析地理环境对国家事务的影响时一开始就与国家纷争的军事战略紧紧联系在一起，这一点和我们在上一部分中所讲到的西方地缘政治观点的分野相比，虽然古代中国的兵学家和外交家还谈不上已形成系统、完整的关于国家关系的空间和位置影响的地理分析模式，"但在其丰富的战略决策和实践活动中，已初步地具有了从战略角度进行方向选择、位置确定和地域分析等战略地理的思想和实践活动”[2]。就这一点而言，中国要比西方早得多。

春秋末期孙武所著《孙子兵法》被誉为是一部研究战争的最早的军事名著。利德尔·哈特在《孙子兵法》英译本前言中提到：“这本著作堪称兵法之精华。在过去的所有军事思想家中，唯有克劳塞维茨可以与孙子相提并论。然而，克劳塞维茨著书立说的时间虽比孙子晚二千余年，但他在观点上却比孙子落后，而且有些观点已经过时。相比之下，孙子看问题更加敏锐、更加深刻，他的学说具有不朽的生命力。”[3] 同时，它也是世界上最早涉及战略地理问题的理

---

(1) 《史记·孟子荀卿列传》。

(2) 陈力：《战略地理论》，解放军出版社，1990年，第59页。

(3) 转引自《军事战略》，第15页。

论著作，书中的《九变》、《行军》、《地形》和《九地》四篇专门阐述了地理环境与战争的关系，而且还提出了国家基于此的某些战略分析。

孙子在其著作中的地理分析方法在于，他根据“地区在战略上因位置和条件不同，对作战将发生不同的影响”提出了九种地理位置：“散地”、“轻地”、“争地”、“交地”、“衢地”、“重地”、“圮地”、“围地”、“死地”；六种地域形状：“通”、“挂”、“支”、“隘”、“险”、“远”。在此基础上，他论述了关于战争的基本原理和原则：

1. 在“散地”上不宜作战；在进入敌方境内不远的“轻地”上不宜停留；遇对双方都有利的“争地”应先夺取要点，不要等待敌人占领后再去进攻；逢敌军可来、我军可往的“交地”应部署相连，勿失联络；到了“衢地”则应加强与周边势力的外交活动，结交他们，取得多助；深入敌境，到达背后有众多敌人堡垒的“重地”后就应掠取粮秣；遇到山岭、森林、险要、阻塞、水网、湖沼等难于通行的“圮地”，就要迅速采取措施通过；陷入“围地”后要运谋设计，摆脱逆境；到了生死攸关的“死地”一定要迅速奋勇作战，争取死里逃生。

2. 在我可以去，敌人可以来的“通”形地域上，应率先占领视界开阔的高地，沟通并保护粮道；在可以前进、难于后退的“挂”形地域上，应视敌方有无防备来选择攻守，如果敌方无防备则突然袭击从而战胜它，如果敌方有防备，就不可轻举妄动，否则自投罗网；在敌我双方前出均将不利的“支形”地域上，不要听信敌方的诱骗，而我方可引兵退去，诱敌前出，并在敌方前出一半时回击它；在“隘”、“险”形地域上，应争取抢先夺取隘口和视野开阔的高地，对敌方所据守的隘口和高地，不宜强行进攻；在“远”形地域上，由于双方势均力敌，处于相持状态，不宜挑战。

3. 军队在各种地形上判断敌情时，应注意四种原则：在山地上，必须靠近山谷，驻扎于高处，使视野开阔；对驻守高处的敌方不要

仰攻；在江河水流上，军队横渡江河，应远离水流，敌人渡水而来，不要迎击它于水内，不要紧靠水边抗击敌人，沿河驻军也应驻在高处，使前面视野开阔；在盐碱沼泽地带上，要立即远离这种地区，如果在这里遭遇敌军，应靠近水草，背靠树木；在平原地带，应占据开阔地域，主要侧翼和后方应倚托高地[1]。

孙子所提出的这些普遍原则不仅适用于局部的战争和冲突，同时也为权力争夺者们制订全局的战略提供了依据。这种地理分析方法相对于西方19世纪末至20世纪初的地缘政治学者所提出的“海权”论、“陆权”论和“空权”论而言，充分体现了中国早期思想家的远见卓识。

一般说来，先秦时期是我国系统的人地关系思想的产生时期，我国的早期地理学著作也创立于这一时期，“后世各种人地关系思想的胚胎大都可以上溯到该时期”。

这些思想主要反映在这一时期的《禹贡》、《管子》、《五藏山经》等著作中。

《禹贡》是中国及世界最早的区域人文地理著作，它假托“大禹治水”的传说。概括起来，《禹贡》所包含的地缘政治观点主要有下列几个方面：

1. 积极的人地相关论。“大禹治水”的故事体现出的三种理论依据之一便是人地相关论。它承认自然环境对人类的生存有极大的影响力，“大禹治水”就是要战胜人们赖以生存的险恶环境，这是一种积极的人地相关理论。我们在前面就已经讨论过关于东西方文化之间的差异所导致的东西方人境理论的差别，从《禹贡》所反映出的这些观点来看，东方对其传统文化赖以形成的地理环境的适应和克服过程要比西方短得多，因此，在《禹贡》中反映出的另一个理

① 参见《孙子今译》的《九变》、《行军》、《地形》和《九地》篇，该书由上海人民出版社1977年出版。

论依据便自然是“人定胜天”的观点。

2. 九州区域研究模式。关于九州的区划，国内学术界存在一些争论，有学者认为：“最早的九州不是行政的区划，沿革地理学家历来的最大错误恰恰是没有认识到这一点……九州的区域研究模式是一种分区整治国土、开发国土的系统研究模式。”[1] 从国家繁荣强盛的地理基础看，《禹贡》的作者已经认识到了主要河流的巨大潜力和必然趋势，表现出了他的政治抱负。最为重要的是，“《禹贡》里面提出了一些系统的地理观念，构成了中国区域地理最古老的一个典型。在国际间它也是一篇极古老的区域地理作品的先驱”[2]。实质上，“‘九州学说’在理论上，甚至可以看到19世纪地理学大师李特尔所揭示的地理单元是有机统一体学说的朦胧思想”[3]。

3. 提出了圈层地域结构模式——“五服”说。“五服”中有两种方形圈层地域结构模式，“其一是500里为等距的五服方形圈层国土开发推进模式；其二是甸服以100里为等距的方形圈层农业区位模式”[4]。甸、侯、绥、要、荒五服模式是中国早期最优化的国家政治体制地域结构模式，实质上就是一种以都城为中心的圈层农业经济区位发展模式，并以此为基础，建立一个以华夏民族为主导和核心，包括周边各少数民族的多民族统一体。中国政治发展的一种自然基础就是占据地理条件优越的有利于农业生产的平原地区，这是它政治安定、军事强大、经济繁荣、文化发达的必要前提。因此，中国早期的作家们也自然而然地循着这个方向设计自己的政治抱负，统治者们也多次进行规模宏大的迁都活动，先是东迁，长安——洛

---

① 《地理学报》1990年第4期，刘盛佳文。

② 王成祖：《中国地理学史》（先秦至明代），商务印书馆，1988年，第6页。

③ 参见《地理学报》1990年第4期，刘盛佳文。

④ 参见《地理学报》1990年第4期，刘盛佳文。

阳——开封；以后南迁，开封——南京——杭州；最后北上，南京——北京。就这一点而言，东西方文化差异所导致的截然不同的地缘政治观点的内容昭然若揭。西方学者认为：海洋、偏远的无人居住的沙漠、原始森林、沼泽等才是国家权力的关键，也是国家间争夺的地理枢纽。当然，这种比较也许有些牵强附会，因为不同时代的人们的地理眼界迥然不同，地理学科本身的发展也大不一样。我们这里所言是撇开这一点来讨论的，实际上，以后即使是地理眼界大大扩展了，地理学的发展也取得了长足进步后，中国的学者们在一定程度上仍未跳出这种文化背景的窠臼。

中国古代偏重土地决定论和水文决定论的特点在管仲（？—公元前645）及其弟子所著的《管子》一书中较系统地反映了出来。这部内容庞杂的管子学派著作比较注重实际运用，也谈到了天、地、人的作用。它记载："天以时为权，地以财为权，人以力为权，君以令为权"[1]，这较之孟轲的"天时不如地利，地利不如人和"来要具体得多。它还说："地者，万物之本原，诸生之根菀也，美恶、贤不肖、愚俊之所生也。……是故具者何也？水是也。万物莫不以生，唯知其托者能为之正。具者，水是也。故曰：水者何也？万物之本原也，诸生之宗室也，美恶、贤不肖、愚俊之所产也。"

"何以知其然也？夫齐之水道躁而復，故其民贪粗而好勇。楚之水淖弱而清，故其民轻果而贼。越之水浊重而洎，故其民愚疾而垢。秦之水泔最而稽，淤滞而杂，故其民贪戾罔而好事齐。晋之水枯旱而运，淤滞而杂，故其民谄谀葆诈，巧佞而好利。燕之水萃下而弱，沈滞而杂，故其民愚戆而好贞，轻疾而易死。宋之水轻劲而清，故其民简易而好正。是以圣人之化世也，其解在水……是以圣人之治于世也，不人告也，不户说也，其枢在水。"[2]

---

(1) 《管子·山权数》。
(2) 《管子·水地》。

除此之外，先秦古籍中的这类论述还很多，如《礼记》中记载："广谷大川异制，民生其间异俗。"①《大戴礼》中记载："坚土之人肥、虚土之人大、沙土之人细、息土之人美、耗土之人丑。"②《周礼》中谈到，山林地区"其民毛而方"；川泽地区"其民黑而津"；丘陵地区"其民专而长"；坟衍地区"其民皙而瘠"；原湿地区"其民丰肉而庳"③。其中水文决定论、土壤决定论和地形决定论的色彩相当明显。

随着人们对自然过程的理解和认识的加深，这一时期我国的自然保护观念逐步形成，"先秦时代，保护生态环境的思想是建立在对人在天、地生态系统中的地位与作用及对生态环境结构的认识的基础上，也是在接受了大自然的惩罚教训后产生的"④。我国各类古籍及上述记载有地理环境决定论的各类著作中"都有保护山林川泽，以时禁发，保护生物资源的记载和论述"⑤。《国语·鲁语》中记载，里革曾对鲁宣公说："古者大寒降，土蛰发，水虞于是乎讲罛罶，取名鱼，登川禽，而尝之寝庙，行诸国人，助宣气也。鸟兽孕，水虫成，兽虞于是乎禁罝罗，猎鱼鳖，以为夏犒，助生阜也。鸟兽成，水虫孕，水虞于是乎禁罝罜䍡，设阱鄂，以实庙庖，畜功用也。且夫山不槎蘖，泽不伐夭，渔禁鲲鲕，兽长麑䴠，鸟翼鷇卵，虫舍蚳蝝，蕃庶物也。古之训也。"《礼记·曲礼》中曰："国君春田不围泽，大夫不掩群，士不取麛卵。"《易传》的《象传》中提出了"裁成天地之道，辅相天地之宜"的原则。"出生在孔子二百年以后的中国哲学家孟轲就指出，山坡上的森林一旦被清除，只要山坡上放牧

① 《礼记·王制》。
② 《大戴礼·易本命第八十一》。
③ 《周礼·地官·大司徒》。
④ 《自然科学史研究》1990年第2期，鞠继武文。
⑤ 《中国科技史料》1985年第1期，袁清林文。

牛羊，森林就不能恢复。"[①] 传说中的"禹禁"有所谓"春三月，山林不登斧斤，以成草木之长；夏三月，川泽不入网略，以成鱼鳖之长"。《管子》中也有记载："山林虽广，草木虽美，禁发必有时；……江海虽广，池泽虽博，鱼鳖虽多，网罟必有正，船网不可一财而成也。非私草木爱鱼鳖也，恶废民于生谷也。"[②] 可见，我国早期的哲学家、政治家们在论述富国强兵之道时十分注重地理的经济和政治意义，表现出了一定的生态学思想基础。尤其重要的是，产生于中国的传统哲学观点认为，国家的政治、经济文化中心应建立在稳定可靠的地方，这里应是土地肥沃、靠着山地、左右有湖泊河流，这样普天下的人们才都可以受到它的德惠，这个国家才能强大。同时应对本国的资源进行保护和合理开发。

秦帝国的建立开创了中国两千多年封建专制一统天下的局面。"在这个时期，欧洲、亚洲其他地方的文明中心和政治版图都几经变化，唯中国文明一如既往地稳步向前，在相当长的时间内向世界各地四射光芒"[③]。作为中国传统文化之一部分的人地观也相应得到了发展。两汉时期的思想界天人感应观的色彩十分浓厚，然而以王充为代表的朴素唯物论者却积极主张破除天人感应观，他的反天人感应理论几乎处处都反对董仲舒的天人感应理论。其中焦点之一在于王充反对天有意志，指出"天道自然、吉凶偶会"；焦点之二是王充对"天人同形"予以批驳，主张"天人异体"。他的结论是："人不能以行感天，天亦不随行而应人。"在王充那里已经彻底否定了天人感应。"但是，王充并没有能够正确地理解天与人的关系，在卓越地

---

① ［美］普雷斯顿·詹姆斯著，李旭旦译：《地理学思想史》，第70页。

② 《管子·八观》。

③ 赵世瑜、周尚意：《中国文化地理概说》，第28页。

批判天人感应的同时，他又深深地陷入了天命决定论"[①]。

从魏晋南北朝到隋唐，由于玄学佛道流行，唯心主义的天人观居多，"唯有刘禹锡既反对视天为主宰，又反对忽视贬低自然的作用"。"只可惜，刘禹锡这样既唯物又辩证的天人观在五百年里还是凤毛麟角"[②]。刘禹锡提出了"理"、"数"、"势"三个范畴，认为它们是任何事物的作用基础，根本不存在所谓"天命"。

宋代是道学或理学的一统天下，由于天人感应说已确立为不可动摇的统治哲学，我国古代的哲学研究方向和重点发生了转移现象。程、朱理学对天命和人力的关系问题所作的进一步的探讨包括这样几层含义：一是富贵、贫贱乃由命运所致，而最初根源又在于人初生时禀受了不同的"气"所致；二是虽承认天命却又"罕言命"，不主张宿命论，万不得已时所言的"命"也多半在"性"的意义上讲。

到了明清时期，由于当时中国的社会及历史背景变化，有越来越多的学者倾向于唯物辩证的天人观，这一点集中反映在深入探讨天命与人力的关系过程中的一种新理论——"造命"说的出现。明代泰州学派的代表人物王艮（1483—1541）在儒家学说的基础上提出了"大人造命"说，突出强调了圣人君子通过奋斗改变命运的论点。明末清初的伟大思想家王夫之则更进一步，提出了更为系统的"造命"说，实质上，王夫之已涉及到了人力与自然规律之间的关系，认为命是靠每一个人自身去创造的，人的活动是前提。此后，实学派思想家颜元、近代思想家魏源等都主张"造命"。

总的看来，在中国几千年的封建社会中，由于思辩哲学的不发达、地理眼界的相对狭隘和自然科学的落后状况，其传统文化中的人地观发展缓慢。加之统治阶级把"天人合一"的思想加以利用，改

① 冯禹：《天与人——中国历史上的天人关系》，重庆出版社，1990年，第93页。

② 赵世瑜、周尚意：《中国文化地理概说》，第29～30页。

造成了一种具有神秘色彩的统治术，因此，从一定意义上讲，人地观的发展处于某种停滞状态。

19 世纪末 20 世纪初，对于中国思想界来讲，可谓正是西学东渐之时，在涌人中国的西方新学中，孟德斯鸠的地理环境决定论虽稍逊于达尔文的进化论，却也在中国不断传播，得到了梁启超等人的大力倡导和响应。孟德斯鸠的地理环境决定论思想是随着严复的《孟德斯鸠法意》（即《论法的精神》）一书的译成而传播开来的。严复在他的译著中对孟德斯鸠的论述作了详细评论，特别是对孟德斯鸠夸大地理环境作用的文字几乎是逐条加以批评和驳斥。如：孟德斯鸠认为地理环境决定国民自由程度，严复则认为"于古代治浅之世有然，至于今日大异"；孟德斯鸠认为地理环境决定国家强弱，严复则认为国家和种族强弱取决于"天时"、"地利"和"人和"三个因素，研究者"不宜置而漏之"；孟德斯鸠认为地理环境决定民质优劣，严复认为这是一概而论，未可尽信，"于欧洲诚然，亚不如是"；至于孟德斯鸠言及地理环境决定文艺和宗教，严复则严历驳斥他对宗教的论述纯属无知妄言，"以此攻佛，可谓不知而作者矣。佛道修行之辛苦，其所以期其徒之强立者，他教殆无与比伦也"[1]。显然，严复译介孟德斯鸠的著作的本意并不是在中国传播地理环境决定论，更多的是倾心于英国式的君主立宪制度，借以表达他对中国封建专制的强烈不满。因此，孟德斯鸠阐扬英国立宪政治的关键文字屡为严复所赞叹。

"将孟德斯鸠有关地理环境的论述系统而全面地接引到中国来的则是梁启超。"[2] 梁启超从 1902 年开始在《新民丛报》上连续发表系列论文：《地理与文明之关系》、《亚洲地理大势论》、《中国地理大势论》、《欧洲地理大势论》等，集中运用孟德斯鸠的环境理论解释

① 严复译：《孟德斯鸠法意》，商务印书馆，1981 年，第 313 页。

② 《东西方文化交流》（创刊号），河南人民出版社，1986 年，第 156 页。

中外古今有关社会历史现象。在《新民说》(1902 年)、《论中国学术思想变迁之大势》(1902 年)、《近代学风之地理的分布》(1920 年)、《地理及年代》(1922 年)等论文中也宣传了这些观点，并始终把这种学说作为剖解社会历史的主要工具。概括起来，梁启超对地理环境决定论的移植包括下列几个方面：

1. 文明的产生与发展取决于地势和地气[1]。他认为："高原之特质，最适于畜牧，牧民逐水草而居"，"故文明无可言"；"平原之地多河流，有河流则土地丰饶，宜于农业发展"，所以"文明灿然"。他进行了两组对比来说明这个问题，一组为北半球亚、欧、北美三洲与南半球澳、非、南美洲三洲相比，在这一组中，北半球三洲之文明远胜于南半球各洲，究其原因主要在于地势，北半球"多港湾、多内海、多半岛、多附属之岛屿，其地面之复杂，亦与相应，有山脉，有高原，有平地，有河流"，而"南三陆则不然。其地势甚单纯，湾港内海半岛岛屿极少，且位置各远隔，交通不便"。"又北陆皆位于温带，南陆皆位于热带"。第二组为欧亚两洲相比，亚洲为"高原、平原交错之地"，而欧洲为"高原、平原、海滨三者调和适均之地"。他认为亚洲面积将近有欧洲的五倍，而欧洲海岸线为"五洲之冠"。他认为："此其于文明程度，有大关系焉。"同时，梁启超还认为："文明之初发生，必在得天独厚之地。……埃及、印度、中国、巴比伦诸地，其所以能为文明古国者，非徒地势使然，亦地气使然也。""古代初民，天有资本，必其地之天然力极丰饶，常足偿其劳力而有余者，然后文明生焉。"[2]

2. 地理环境决定政俗。同样，梁启超也进行了两个方面的比较。

---

① 梁启超所理解的"地势"包括高原、平原、海滨等地形及位置和地质条件，"地气"包括寒带、温带和热带等不同的气候条件。

② 参见梁启超：(分类精校)《饮冰室文集・地理》(下)，见《地理与文明之关系》，宣统元年第 10 版。

首先将欧亚两洲相比，亚洲虽与欧洲地理相似，但由于幅员太大，“东西南北各自成一小天地”，“文明之竞争不起焉”。亚洲“地理不便，故无交通，无交通故无竞争，无竞争故无进步。亚洲所以弱于欧洲，其大原在是”。而欧洲“各地之联络交通易……诸种国民，角起相争”，它虽不能创造文明，却善于发扬光大其他文明；其次，梁启超将中国历代南北政权相比，由于南北地理环境相异，建立在黄河流域的政权规模宏大，气魄磅礴，相反，建立在长江流域的政权则规模绮丽，气魄文弱[1]。

3. 地理环境决定民质。他认为：“夫酷热之时，使人精神昏沉，欲与天然力相争而不可得；严寒之时，使人精神憔悴，与天然力相抵太剧……热带之人得衣食太易，而不思进取；寒带之人得衣食太难，而不能进取。惟居温带者，有四时之变迁，有寒暑之代谢，苟非劳力，则不足以自给，苟能劳力，亦必得其报酬。此文明之国民，所以起于北半球之大原也。”依地理环境而言，人类可分为海洋民族和大陆民族，梁启超认为这一点与民质相关极深，“海也者，能发人进取之雄心者也。陆居者以怀土之故，而种种之系累生焉……彼航海者。其所求固在利也。然求之之始，却不可不先置利害于度外，以性命财产为孤注，冒万险之一掷之。故久居海上者，能使其精神日以勇猛，日以高尚。此古来濒海之民，所以比于陆居者活气较胜，进取较锐”[2]。

4. 地理环境决定风俗习惯、学术思想、宗教信仰和文学艺术。他指出：民俗因地势各异，古希腊因地势分山谷之民、平原之民和海滨之民“三俗”，印度因河流分印度河之民、布拉马河之民、恒河之民“三俗”。在中国则可见，黄河以北之民“矜慓技，好气任侠”，江汉之民“俗习于巧黠，好小乱而无远志”、江浙之民则“其俗文而

① 参见梁启超：《地理与文明之关系》、《中国地理大势论》，见《饮冰室文集·地理》（下）。

② 参见梁启超：《地理与文明之关系》，见《饮冰室文集·地理》（下）。

少气，知者多而行者寡”。在梁启超看来，中国先秦诸子学说之所以不同，与他们相处的地域有关，在他们的学说中所反映出的“或重实行，或毗理想，或主峻刻，或崇虚无”的现象“与地理一一相应”。宋明理学各家有别，也与地理有关。历代经学也有南北之流别。至于宗教信仰，他认为：由于地理环境差异，世界各地所信奉的宗教不一样。欧洲南北及中部各民族因居住地寒暖相异，分别信奉天主教、希腊正教和耶稣新教；亚洲的西伯利亚人信奉沙玛尼教、中国人信奉佛教、印度人信奉婆罗门教、阿拉伯人信奉伊斯兰教，都因地理环境而定。同时，梁启超还指出：诗赋文章，南北各为家数，北人优为长江大河一泻千里之散文，南人擅长镂日刻月善移我情之骈文；北以碑著，南以帖名；北画擅工笔，南画擅写意；北乐悲壮，南乐靡曼①。

总之，凡孟德斯鸠所论之处，梁启超都极力宣传，他成为孟德斯鸠学说在中国的主要代表。同时，在梁启超的倡导下，又有不少文人墨客站出来响应，章太炎、李步青、刘师培、李大钊等是其中的代表。如李大钊在他的研究工作中将世界文化区分为东洋的与西洋的，“东洋文明主静，西洋文明主动”。继而他又将人类文明区分为“南道文明”——主要指中国、日本、印度、埃及、波斯等和“北道文明”——主要指欧洲各国以及蒙古、中国东北。南道文明得太阳的恩惠多、受自然的恩赐厚，因此，“其文明为与自然和解、与同类和解之文明”，反之，北道文明因得自然恩赐薄，“其文明为与自然奋斗、与同类奋斗之文明”。很明显，李大钊是用地理环境的差异来解释东西方文化的差异的②。

---

① 参见梁启超：《中国地理大势论》、《欧洲地理大势论》、《亚洲地理大势论》，见《饮冰室文集·地理》（下）。

② 参见冯天瑜、周积明：《中国古文化的奥秘》，湖北人民出版社，1986年，第50页。

# 2 地缘政治学的滥觞

## 2.1 弗里德里希·拉策尔的贡献

弗里德里希·拉策尔(Friedrich Ratzel)于1844年8月30日诞生在德意志巴登州首府卡尔斯鲁厄(Baden, karsruhe),其父为巴登大公侍从。拉策尔幼年时对自然界各种现象兴趣浓厚。其父本希望他将来能成为一名工业制造者,但他执意不从,曾师从一药剂师学习药物之道,在此过程中,他从药物学的调剂学中得到启示,转而对化学、植物学、商品学等产生极高的兴趣。1866年,他获得父亲同意后进入卡尔斯鲁厄工艺学校学习,同年改入海德尔堡大学,系统学习动物学、古生物学、地质学和比较解剖学。1868年,他以一篇关于寡毛纲动物的专题论文获海德尔堡哲学博士学位。此后,他并未热衷于实验室工作,而是对在野外观察动物和植物更有兴趣。1868年—1869年间,他在法国南部旅行考察,并为《科隆日报》(*Kolni-sche Zeitung*)撰写了一组"来自地中海地区的动物学信函",因此,他被聘为该报的流动记者,继续在东欧和南欧进行考察。1870年普法战争爆发后,他应征入伍,战时曾两次负伤。"1871年德国的统一,对拉策尔来说是一件振奋人心的大事,他的强烈民族自豪感,把他的注意力从学院式的研究吸引到德国人如何生活和如何利用资源等问题上去"[①]。从1872年开始,他应《科隆日报》之约,历访南

---

① [美]普雷斯顿·詹姆斯著,李旭旦译:《地理学思想史》,第208页。

欧、美国、墨西哥和古巴等地。1874年—1875年间，他访问了美国和墨西哥，此次行动成了他一生的转折点，通过对日尔曼人、印第安人、非洲人以及中国人和美洲少数民族的生活及所取得的成就的研究，他“开始对在进取性与扩张性的人类集团和退缩性的人类集团之间的接触所形成的地理类型，创立某些一般概念”①。对这一地区的研究使他明确地转到了地理研究方向上来。1875年他被聘为慕尼黑工业学校的讲师，1876年提升为教授。1886年—1904年他接受了莱比锡大学的聘请，担任该校地理教授。

拉策尔的研究生涯大致可分为两个时期，1876年以前为第一个时期，这一时期他是个新闻记者，通过野外考察完善了生物学和地理学知识；1876年以后为第二个时期，他在这一时期的工作具有明显的学术和理论色彩。拉策尔的一生著述繁多，共计25部著作和518篇论文，而最重要的成就反映在三部著作中：两卷本的《人类地理学》(*Anthropogeographie*，1882年—1891年)、《政治地理学》(*Politische Geographie*，1897年)和三卷本的《人类史》(*History of Mankind*，1885年—1888年)。这三部著作都是人文地理学方面极重要的论著，前两部使他一直成为争论的中心，而后一部则被称为人种论的历史里程碑。

拉策尔写作之时，正是达尔文的划时代学说——进化论把陈旧的观念和概念一扫而空的令人兴奋的时期。达尔文所阐述的生物学法则对地理学产生了极深的影响，归结起来，大致包括这样几方面：

1. 进化思想最深刻最直接的影响在于对地形的研究。达尔文通过对岸礁变化为堡礁再转化为环礁的过程的研究，形成了随时间而

---

① Preston E. James and Geoffrey J. Martin: *All Possible World*, *A History of Geographical Ideas*, *second edition*, *John wiley and son*, New york, 1977, P. 169.

变化的思想。

2. 达尔文对地理学的第二个主要贡献是一切生物与其环境间相互关系和联系的思想，即有机组织的思想。

3. 竞争与选择的思想。

4. 自然界变化的无规则或偶然性特点[①]。

人类既然是动物，那么他的活动从根本上而言与别的动物没有什么不同的地方，适用于生物的一般法则，同样也适用于人类。因此，达尔文的著作被许多社会运动和哲学派别当作"科学证据"而加以引用，其中甚至包括各种相互对立的意识形态。

社会达尔文主义是"进化规律"应用于人类社会的学说，对于社会达尔文主义的蔓延，达尔文采取了听之任之，既不加以鼓励，又不加以阻止的做法。我们在涉及到这个问题时必须提到英国思想家赫伯特·斯宾塞（Herbert spencer，1820—1903）。斯宾塞是个铁路工程师和发明家，后来成为了新闻工作者，他的著作涉及广泛，包括哲学、社会学、教育学和科学等方面。他在其著作中指出，人类社会和动物有机体间存在极大的相似性，"社会有机体的变化也必须用进化过程的尺度来加以衡量"[②]。在斯宾塞看来，人类社会与生物有机体间的相似性表现在三个方面：一是两者都有调节的系统，生物是中央神经系统，人类社会是政府系统；二是两者都有产生能量的系统，生物是消化系统，人类社会是经济系统；三是两者都有分布系统，生物有血管和动脉，人类社会是道路和电讯。在此基础上他首创了"适者生存"这一概念。实质上，在斯宾塞那里，"他作为出发点的个人权利的先验概念，并不能也不可能与他通过运用自然

① 参见 D. R. Stoddart，*On Geography* 之第八章 Darwin's Impact on Geogrophy，Basil Blackwell ltd，New york，1986，PP. 158～179.

② ［美］洛伊斯·N·玛格纳著，李难等译：《生命科学史》，华中理工大学出版社，1985年，第522页。

科学得出的有机的、进化的国家概念协调一致”①。

和其他许多同时期的学者一样，拉策尔也深受斯宾塞关于人类社会与动物有机体有相似性这一思想的影响，他的光辉立论之一就是把达尔文的生物概念应用到人类社会中去。他转到地理研究方向上来后，在慕尼黑开始发表他关于人类地理学的系统研究思想，1882年，《人类地理学》第1卷问世。拉策尔与其他地理学者不同的是，他不是集中探索人类本身，而是描述自然的地球对人类事务的影响，这一点在他的《人类地理学》第2卷中有明显表现。他指出：“人类的分布与其在地表的活动，要皆具备着可动的生物个体的所有特征”，“在生物地理学的立场看来，国家这个东西，也不过是地表上生物分布的一种形式，是和一切生物立于同一的影响下的。地球人类的分布的特殊的诸法则，同样地，也规定了人类国家的分布”②。根本上而言，拉策尔认为人类的一切活动、发展及愿望都是受环境制约的。他把环境对人类的制约性分为四大类：一是直接给予生理上的影响；二是心理的影响；三是物产的丰歉或一般物质的盈缺，决定了一个民族的经济和社会的发展或停滞、进步或退化；四是决定人类移动和分布的动因。而且，在拉策尔那里，人类的存在是融于自然之中、统一于自然之中的。仅此而论，拉策尔上承赫尔德、李特尔之基业，所不同的是，他并未落到机械唯物论的覆辙之中，他将其学说置于生物科学的方法论上，生物是有机的，所以，拉策尔最终求救于有机体说和生物的运动论完成了其学说体系。他也正是基于这一立场确立了其地理环境决定论的学说。不过，和有些地理环境决定论者不同的是，他在此基础上第一次系统研究了政治区域，

① ［英］欧内斯特·巴克著，黄维新等译：《英国政治思想——从赫伯特·斯宾塞到现代》，商务印书馆，1987年，第58页。

② 转引自盛叙功：《西洋地理学史》，西南师范大学出版社，1992年，第332页。

是第一个在对国家的比较研究中系统研究了空间和位置的影响的人，正是因为这一点，他被认为是现代政治地理学的创建人[①]。

既然拉策尔将其学说体系建立在进化论和自然科学的法则基础之上，那么，他自然就把政治地理学当作是自然科学的一个分支，因为政治地理学是人文地理学的延伸，而人文地理学又是可以当做生物地理学的一部分来思考的。所以，他在运用“地理法则”系统分析空间和位置对国家的影响时，提出的是有机体的国家理论，其《政治地理学》一书中关于国家有机增长的理论在一定程度上就是基于19世纪末期的生物进化论和环境宿命论[②]。拉策尔在这部分为九个部分的著作中基于特定的观点、思想，全面阐述了其国家理论和体系：土地和国家的相互依存；国家的迁移和成长；固着于土地上的有机体国家；国家的空间增大；国家分类上的地理位置概念；区域（空间）概念界限；国家空间发展中的海陆间的过渡；水在国家空间发展中的作用；山地和平原在国家空间发展中的作用。概括起来，拉策尔的有机国家论包括下列内容：

1. 一个特定社会的人群集团或民族在特定的土地上所形成的组织——国家是一种单纯细胞的国家有机体。“所以拉策尔的国家观，实在就是他的世界观，即有机体的世界观”[③]。

2. 拉策尔的国家观和一般的政治学者、法律学者的法制的国家观又是不同的。前者把国家当做人类在法制上的共同体，土地只不过被视为对于国土支配权的媒介，而拉策尔的国家概念是置于土地的基础上的，他认为，国家是由特定的人群通过一定的语言结合在同一政府组织之下所居住的地球表面的一部分，“国家是属于土地的

① 参见本书第1章和《军事战略》，第145页。

② Michael Pacione (ed): *Progress In Political Geography*, *Lroom*, Helm Ltd. London, 1985, P. 42.

③ 盛叙功：《西洋地理学史》，第340页。

有机体”，“国家就是一群人和一群土地”的有机体。在他那里，土地和国家分割开来是不可想象的，国家离开土地即失却了国家生命的存在，国家是土地上人类的最大劳动成果，要想建立统一的、真正意义的国家概念，只能是基于地域的前提。

3. 拉策尔的有机体的国家观也和其他有机体的国家观不同。他本着国家是指以人类集团为基础所区划的一块地域组成的、领土与人民紧密相联结的生活体的观点，从生物学的立场去观察和分析，既然人类和土地是一个统一体，那么在一定范围内的土地上由人群所组成的一定类型的国家，必然是受制于土地的有机体的统一体。因此，他把国家比作人体，认为其边缅部分属于末端器官；生长中的地域为其四肢；公路、铁路、水道为其循环系统；国家首都则为头脑、心脏与肺腹。同时，由于国家是人类不完善的结合产生的精神和道德的有机体，是一个由于共同生活、共同劳动和抵御外敌的需求而产生的对土地的精神寄托，因而，国家又属于一个空间性的有机体，它是生命的物体，不断增长，国家生活力的向上发展，就是土地与人民结合关系的增长，“所谓生存竞争即是争夺空间的竞争”[①]。国家的发展也就是国土地域的发展，至于发展的形态、性质及程度如何，又取决于土地本身的制约性。

4. 尽管拉策尔在把国家比作有机体时小心翼翼，指出这种类比不可望文生义，因为在很多方面人类集群的活动和有机体迥然不同，这种比较“无意于视为一种假说，而仅仅是一个启示性的论说（拉策尔，1897 年）”[②]。但无论如何，在此之后，他便将此论说应用到国家的发生论上去了。有机体是生长的，是由单个细胞进化为多细胞

① 这句话是拉策尔最得意的门生之一美国的人文地理学者爱伦·邱吉尔·森普尔（Ellen Churchill Semple，1863－1932）的名言，足以代表拉策尔的思想。

② ［美］普雷斯顿·詹姆斯著，李旭旦译：《地理学思想史》，第 210 页。

的，因此，国家同样也是不断生长的，"一个国家必然和一些简单的有机体一样地生长或老死，而不可能停止不前，当一个国家向别国侵占领土时，就是他内部生长力的反映，强大的国家为了生存必须要有生长的空间"①。同时，空间有机体的国家存在自然的增长趋势，如果没有强大的邻国给予有效的反对，它就会超越这些界限，为此，他指出："地理的扩张，更加如此的是政治扩张，是运动中物体的所有特性，交替地前进扩张和倒退收缩。这种运动的目的是为了建立国家而征服空间……"② 有人把拉策尔的国家有机体的运动论归结为"生存空间"、"国家有机体"和"边疆动态论"的统一体。

5. 国家的发展或生长表现在土地形态上有三种。第一种为"国家的境界"，国家的现存疆界及其变化是人类历史运动的表现，亦即国家政治势力竞争的表现。随着国家的发展，现代的国家境界就是多方在相互竞争中所逐步形成的一种线状，甚至于成为几何学上的或经纬线式的境界线。第二种为"国家领土的定着"，根据土地的定着性的强弱来观察历史的运动，低文化阶段的国家，土地的定着性弱；反之亦然③。第三种为"地域扩大原则"，这一点上面已经谈到。

从拉策尔的有机体的国家论中，我们不难看出，他的"法则"中最重要的是"空间"(Raum) 和"位置"(Lage)。就其对于环境的认识和分析方法而言，他就是基于这两个概念建立其运动论的方法论的。在拉策尔的字典里，"位置"包含多重意义，其一是指固着于土地上的由特定气候、植物等条件所构成的一定大小和形态的地域；

---

① Preston E. Janies and Geoffrey J. Martin: *All Possible world*, *A History of Geographical Ideas*, *Second Edition*, *John wiley and son*, New York, 1977, P. 170.

② 引自罗·迪金森著，葛以德等译:《近代地理学创建人》，商务印书馆，1980 年，第 82 页。

③ 参见盛叙功:《西洋地理学史》，第 341~342 页。

其二是指所谓"四邻关系"。拉策尔在分析人类历史的运动规律时所言的"位置"概念主要是基于第二种意义，尤其是指交通和运动的可能性的意义。由于世界各地在生产条件、经济条件和交通条件等方面存在差异，因此，人类在相互接触过程中便产生了持久的补充和扩张规律，补充和扩张受地理因素的影响交互产生作用，不同的地域间所产生的运动形态是不一样的，如山岳地带与平原地带间、内陆地区与沿海地区间、大陆与海洋间等。补充或扩张在形态及程度上的差异导致了历史运动的多种形态和不同程度。同时拉策尔又认为，人类历史运动中有两种位置存在明显差异，一是完全孤立的位置，如大海中的小岛、深山中的谷地、低洼的沼泽地、沙漠中的绿洲等，处于这类位置的人类长期处于原始状态，发展缓慢；二是四通八达的位置，如广袤平原的中心、大陆边缘的较大的岛屿等，由于交通便利，处于这类位置的国家或民族必然相对于四邻而居于支配地位。

拉策尔指出，"空间"变化受制于地球本身的极限性及人口的变化程度，加上各个民族或国家所占据的地域大小不一，国家或民族之间便出现了不同的关系格局。在有限的地球上，空间变化产生了两种运动倾向，一种是向外扩张谋求新的生活空间；一种是导致内部的分化。在历史上所出现的差异是，地域狭小的国家或民族内部斗争激烈，向上的发展力强，对外扩张欲望强，而且极力抵抗外界渗透；相反，地域广大的国家或民族个性弱，极易受外部势力侵扰。

拉策尔的政治地理学理论对后世产生了久远的影响，特别是对地缘政治学的发展及其境遇所产生的作用尤为突出。尽管他并未提出"地缘政治学"这一概念，但后人还是根据拉策尔的国家理论确立了其地缘政治学说的鼻祖地位。他的论述成了后来的各种地缘政治学理论的基石，就一般意义上而言，地缘政治的滥觞从他开始。豪斯霍费尔指出："创始的地缘政治学者不是契伦，而是拉策尔。"契

伦本人也承认“拉策尔是最大的创业者”。不过，不少持批评观点的学者虽然不反对地缘政治学说是拉策尔创立的，但又不主张“把拉策尔本人和地缘政治学硬扯在一起”。在笔者看来，评价拉策尔的思想及其影响应注意这样几方面的问题：

第一，拉策尔仅仅把人文地理学当作是生物地理学的一部分，他所开创的理论研究模式区别于两种与之相关的学者的理论，一是不同于他之前的环境论者的环境决定论；二是不同于政治学者、法律学者的国家论。

第二，拉策尔至死都未曾听说过“地缘政治学”一词，他本意上也不是要创立这一学说，普遍把他当作地缘政治学的鼻祖，是后来的学者在研究中加在他头上的。

第三，拉策尔的研究是利用生物学的理论来分析人类社会及国家关系，但我们决不可把他的研究与第三帝国的命运联系起来，有学者认为他的有机体的国家论中不少论述“离‘生存空间’的概念，即优等民族可以侵犯劣等民族来扩展它的生存空间的概念只是一步之遥了”[①]。而且第三帝国时期以豪斯霍费尔为代表的德国地缘政治学派正是利用了拉策尔的一些论述，把它变成了第三帝国的政治意识形态，生存空间（Lebensraum）学说同时也变成了为国家侵略扩张进行辩护的伪科学。实质上，拉策尔的研究从未涉及到国家政策，“对于一个最初被训练为生物学者的地理学者而言，他不过是试图运用生态学及进化论的概念研究政治及经济发展而已”[②]。他从未赞成过划分优等民族与劣等民族的思想，“生存空间”概念也并不是直接从拉策尔那里抄来的，更确切地说应该是从瑞典政治学者契伦（kjellén）的著作中搬来的。关于这一点我们在下面一部分中论述。

① ［美］普雷斯顿·詹姆斯著，李旭旦译：《地理学思想史》，第210页。

② *International Encyclopedia of The Social Sciences* (11－12), The Macmillan Company, New York, 1986, P. 328.

## 2. 2 鲁道夫·契伦的新创

当拉策尔分析国家增长的几种“法则”时，他并没有新创“地缘政治学”一词，他也没有将这种思想归于政治地理学，这一词的出现还得归功于瑞典政治科学家鲁道夫·契伦（Rudolf kjellén，1864—1922）。早在阿普萨拉（Uppsala）大学学习时，他就深受瑞典参议院保守党领袖之一的政治科学教授奥斯卡·爱林（Oscar Alin）的影响。他在获得阿普萨拉大学的政治科学教授头衔后，从1891年—1916年间一直执教于哥德堡（Gothenberg）大学。契伦思想的形成受到多方面的影响，其中既包括19世纪80年代的欧洲现实主义文学，又有19世纪90年代瑞典的浪漫诗歌。尤为重要的是，瑞典文化中强烈的林奈*（Linnaean）传统和他本人对禽鸟学的爱好，使他很容易接受现代生物学的思想模式，而这种思想大多又是从拉策尔的著作中得来的。这一词最先出现在《科学的政治学》(1901年）中，但当时他并没有对它进行解释和讨论。1916年，他在《作为有机体的国家》一书中正式把地缘政治学作为一门学科提出来，同时讨论了它的基本理论问题。总的来看，他在提出这一学科时是利用拉策尔关于有机体的国家论发展了地缘政治科学。

契伦认为，研究国家是历史学家和政治学家共同的使命，19世纪的帝国主义理论以及世纪之交帝国主义国家间的争斗改变了他以前的国家概念，他不再仅仅把它看成是法律上的抽象概念，而是一个实体，一个有机体。契伦的雄心在于，他想要成为未来政治学中的林奈。他认为政治学的任务就是系统地研究国家及影响其发展的法则。在这一点上，他完全追随拉策尔，不过并没有H. T. 巴克尔

* 林奈，瑞典植物学家、昆虫学家、动物学家、医生和矿物学家，也是现代分类学的创始人。

走得远。

契伦 1914 年将地缘政治学定义为："国家作为空间的一个地理有机体或现象，即陆地、领土、地域、或者最为特别的，作为一个政府的理论。"[①] 在他看来，国家的行为类似于一个生物体，它应更多地被看成是一种竞争力量，而不是所谓合法的组成部分，所以，必然的结果就是少数强大的部分吞并弱小的部分，这是竞争中的永恒规律。因此，他还指出，边界的扩张就成了一个国家的合法目标（源于拉策尔的生长空间理论），这样，力量因素就成了国家决定的因素，国家的力量比法律更重要，国家的权力决定一切，只有大国强国才能影响大陆及全球的政治。契伦在 1916 年写道："一个在有限边疆地区内的强大国家受制于无上的命令，要求它通过殖民、联盟其他国家或者其他类型的征服来扩充自身的范围……它并不是攫取原材料，而是作为自我保护的一种手段，这是自然和必须的扩张趋向。"[②] 正是由于这种思想使地缘政治学与一个国家的边界扩张联系起来了，这种思想后来还影响了一大批德国人及欧洲其他地理学家、历史学家和政治学家。卡斯伯森（kasperson）和明黑（Minghi）在论及其思想时指出："他（契伦）将这一过程看成是'国家、人民和政府'间永恒的一种交替过程，就因果关系而言，人类占领一个地区的这一过程使之具有连续性、稳固性、互扰性、虔诚性和民族性，也就是说，一个民族的产生带有契伦所称谓的'地缘政治天性'。"[③]

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契伦专心研究了俄国扩张和欧洲列强衰落的危险性，他预言，传统的自由、平等、博爱观将被义务、秩序和公正所代替。战后，他转而更加系统地从事写作，发展其政治学

① Michael Pacione (ed): *Progress In Political* Geography, P. 48.
② Michael Pacione (ed): *Progress In Political* Geography, P. 42.
③ Michael Pacione (ed): *Progress In Political* Geography, P. 49.

的有机体原则，主要著作包括：《作为有机体的国家》（1906 年）、《政治学体系与基本问题》（1920 年）。综合来看，他关于政治有机体（国家）的研究包括下列几方面：

1. 地缘政治学（Geopolitik）。这一术语出现在契伦的著作中完全是得到了拉策尔《政治地理学》一书的启迪，契伦基于这一概念描述了国家源于其地理特征的条件和问题。国家是超人的生活体，受生物的根本法则支配。国家的构成要素包括领土、生活、国民、统治与权力五项，地缘政治学研究国家构成的主要因素之一的领土。

2. 生态政治学（Oecopolitik）。分析了影响国家地位和权力的经济因素。

3. 人口政治学（Demopolitik）。探讨了国家的种族、结构以及由此而导致的问题。

4. 社会政治学（Sociopolitik）。分析了国家的社会集团和阶级以及他们对统一体发挥作用的方式。

5. 权力政治学（kratopolitik）。描述和分析了国家的宪法和法律生活，讨论了诸如政党和压力集团等机构和组织[①]。

契伦在瑞典政治科学中的重要性从瑞典文学由强调法律观点转向政治观点中可见一斑，然而，他在德国的影响远胜于他在瑞典的地位，“地缘政治学”以后成了德国的意识形态口号。契伦本人在提出这一术语后，继而利用它为德国的侵略扩张摇旗呐喊，他在《现代的诸列强》（1914 年）中明确指出德国向外侵略是“人类的使命的责任”，认为德国海陆兼备，这是争夺世界强国地位最有利的条件[②]。地缘政治学在契伦这里之所以产生这种变化，其背景在于：

第一，他所作出的结论使他对中欧不断增加的不利的世界地位

① 参见 *International Encyclopedia of The Social Sciences*（11－12），P. 414.

② 参见张文奎等：《政治地理学》，江苏教育出版社，1991 年，第 66 页。

忧心忡忡，尤其是由于俄国向外扩张的趋势而对他的祖国瑞典所产生的危险令他十分震惊。而在他看来，瑞典所在的斯堪的纳维亚集团根本无力挽救这种局势。作为德国的崇拜者，他的解决方法是祈求德意志帝国能够成为未来德国——北欧集团的中心，从而维护欧洲中心的稳定。

第二，契伦发现，一个大国所必备的广博、内聚力和易于对外联盟的特点，德国一无所具，为此，他强调指出，如果德国要想作为一个大国而生存就必须向外征服。他认为，必须建立一个以敦克尔克、里加、汉堡和巴格达为基石的广泛的中欧帝国，这一帝国将包括奥匈帝国和奥斯曼帝国，甚至于中东的大部分地区。这一帝国将置于德国的领导之下，柏林——巴格达铁路是其中枢。

第三，契伦认识到，英国决不可能容忍这样一个基于中欧与斯堪的纳维亚结盟的帝国的出现，因此，他认为与英国的冲突是不可避免的。他在 1914 年写道："英国是迄今最后也是最大的古老观念的化身，它认为世界的海洋只有一个而不是几个主宰"[①]，契伦号召德国人反对这种观念，创造全球秩序的新的权力中心。

他的这种思想与以后德国的侵略扩张意图不谋而合。与拉策尔截然不同的是，契伦在提出地缘政治学的概念后，便与一个国家的具体政策直接结合起来，也许正是从此时开始，地缘政治学的历史境遇便注定了。

## 2. 3 阿尔弗莱德·马汉的"海权论"

"海权 (Sea Power) 论"最先是由美国海军史学家 A. T. 马汉 (Alfred Thayer Mahan, 1840—1914) 提出的。当拉策尔和契伦进行

① 转引自 Geoffrey Parker: *Western Geopolitical Thought in the Twentieth Century*, Croom Helm, 1985, P. 56.

地缘政治学说的理论新创时，马汉则在进行基于地理因素的军事战略的研究，他实际上是地缘战略（Geostrategy）研究的先导，他比契伦更进一步。在他提出“海权论”后，又出现了“陆权（Land Power）论”、“空权（Air Power）论”等，我们将在下面章节中逐一述及。

马汉出生于纽约的西点，其父亲丹尼斯·哈特·马汉*是美国军事学院的工兵学教授。家庭对马汉未来的发展无疑是巨大的，父亲所从事的职业使马汉从小就受到一种特别的熏陶，“在这种环境中日趋成熟的孩子没有什么比忠于信仰、服从职责、荣誉和效忠于国家更加至高无上。马汉的童年正是在军校嘹亮的军号声和有节奏的队伍操练的伴随中度过的”①。1856年，16岁的马汉满怀献身于海军事业的童年梦想，在哥伦比亚学校校长查理斯·金的亲自推荐下，进入安纳波利斯海军军官学校学习。尽管19世纪的美国海军远非一块萌生战略理论家的沃土——致力于理论研究者往往被视为自不量力而遭冷遇，但此时的马汉已充分显露出了才华过人的天资，他被公认为是比旁人更善于探索和思考问题的具有超人的远见卓识的年轻海军军官。他曾向他的挚友吐露自己的远大抱负：“产生诸如斯蒂芬·德凯特式的海上英雄豪杰的时代已一去不复返。如今，如果没有客观现实的条件和一定的环境，想单凭勇敢而成为流芳百世的英雄是极困难的。因此，我已经下决心通过理论研究这一途径，在海

* 丹尼斯·哈特·马汉，1824年以优异成绩毕业于西点军校，并被任命为美国陆军工兵部队少尉，同年，在西尔范诺斯·塞耶上校的格外赏识下，他很快被调回军校任数学助理教授，1830年，他被聘为西点军校教授。一生的主要著作有：《战地防御》（1836年）和《论战术的起源与发展》（1847年）等。

① [美]罗伯特·西格著，刘学成等编译：《马汉》，解放军出版社，1989年，第5页。

军赢得声誉。"[1] 然而，在马汉毕业后的很长一段时间里，马汉的远大抱负根本无法实现。他于 1859 年毕业后便进入了海军服役，从 1859 年—1884 年的 25 年的军人生涯中，马汉"无论是航海技术还是战略思想，都是平淡无奇、无丝毫惊人之举的"[2]。他不得不为他的晋升绞尽脑汁。改变马汉命运的转折点是 1884 年，当时在美国罗得岛新港刚刚创办不久的海战学院（Naval War College）任院长的卢斯将军邀请已 44 岁的马汉少校担任讲师，负责讲授海军战略、战术及历史，这里为他进行理论研究提供了良好的条件，他着重研究了 17 世纪和 18 世纪的海战史，并在此基础上首先提出了"海权"理论。在海战学院的职责迫使他将其"海权"历史思想具体化，当然这也是他实现远大抱负的极好机会。1890 年，反映其"海权"思想的著作《海权对历史的影响：1660 年—1783 年》（*The Influence of Sea Power Upon History*：1660—1783）问世了，紧接着出版的著作有：1892 年的《海权对法国革命和帝国的影响：1793 年—1812 年》（*The Influence of Sea Power Upon The French Revolution and Empire*：1793—1812）、1897 年的《美国的海权利益，现在和未来》（*The Interest of America in Seo Power、Present and Future*）、1900 年的《亚洲问题及其对国际政治的作用》（*The Problem of Asia and Its Effect Upon International Politics*）和 1905 年的《海权与 1812 年战争的关系》（*Sea Power In Its Relations to The War of* 1812）等。

马汉在分析英国称霸世界的原因时，这个老牌殖民主义国家为提供本国工业发展所需资源与市场而大肆推行殖民政策、攫取海外殖民地并长期称雄于海上的历史给他留下了极为深刻的印象，为此他认为：争霸世界的关键在于夺取制海权。所谓制海权，马汉的定义是：一个国家控制航海活动的能力。他将这种能力与一个国家的

① ［美］罗伯特·西格著，刘学成等编译：《马汉》，第 15 页。

② 陈力：《战略地理论》，解放军出版社，1990 年，第 36 页。

繁荣和历史进程最有效地联系在一起[①]。而英帝国正是拥有了海上霸权，控制了除巴拿马运河以外的、几乎世界上所有重要的通道和海峡，所以它才能成为一个世界强国，并拥有了扩张的基础。

马汉所提出的“海权”思想集中反映在1890年出版的《海权对历史的影响：1660年—1783年》中。海上力量的理论就根本上而言，实际也就是出自马汉对人类及社会的整体看法。马汉曾经指出：“力量和武力是国民生活中的一种本领，是献身于国家的天才们的本领……同其他事物一样，谁放弃它，谁就要承担责任。”

国家力量在解决国际争端中理所当然地是一种合理的因素，因为它是国家效能的结果，而效能可以在世界事务中维护其地位。“力量不是临时的象征，而是国家地位的体现，这种地位一定会、也应该在国家关系中跻身于前列和上层。”[②]在现实世界中，“如果把天下看作是地球，中原就不外乎是世界的七个海洋”[③]。因此，分析国家的力量时首先应重视海洋，它是人类利用来通向四面八方的重要公共地域，是自然界赋予人类的天然交通媒体。然而，在马汉的《海权对历史的影响：1660年—1783年》一书出版之前，军事战略思想一直都是集中于陆地作战方面，远洋战略还没有产生的技术条件和社会条件，几乎无人注意到这一点。到马汉著书之时，木制帆船时代逐渐结束，钢制轮船时代正在开始，以英、法为代表的西方列强在海外的势力范围已瓜分完毕，它们已面临后起的帝国主义国家的威胁，尤其是美国，它已正式宣告“消减边境”，完全征服了内陆，马上就要由内陆国变成海洋国，马汉的著作成了这种发展的理论基石。

---

① *International Encyclopediae of The Social Sciences*，(9—10)，P. 529.

② 转引自：[美]《军事战略》，第199页。

③ [日]伊藤宪一著，军事科学院外国军事研究部译：《国家与战略》，军事科学出版社，1989年，第62页。

此时，科技进步已使仅仅装备大炮的无畏舰成为可能。然而，我们必须指出，马汉强调的研究基础集中于木材、布帆和前膛枪时期，而不是钢铁、蒸汽和后膛枪时期，他认为，军事理论以及作为它的基础的基本原则都是永恒的。随着武器的发展，尽管战争的许多条件在不同时代各不相同，但是历史界的诸多教义是不会改变的，可以上升为一般原理的高度，虽然由于科技进步导致蒸汽机的使用已经使海军武器发生了深刻变化，但是，“帆船时代海战的历史和经验仍然可以作为当今使用时有价值的教训”，因此，“成功之战是以体现‘事物本质’的那些战略和战术原则为基础的。尽管武器技术迅速变化，这些原则都保持不变”[①]。所以，马汉力求在一般的意义上来阐述他的观点。他在研究上的这种特点使他的推崇者和后来的研究者们陷入了种种困境。其一，他的研究选材于17世纪—18世纪的海战史，这种单一的历史背景使其理论不可避免地具有一定的局限性，以致于有人认为他的思想只是来自一时的灵感，后来才进行详细研究、证实和整理；其二，马汉通常不说明他在什么特定时间和特定范围来发展和运用他的基本思想——海上力量在和平时期、在外交斗争中、在商业竞争中、在帝国的扩张中和武装冲突中的运用。“他把他的基本概括不加区别地应用到特定的国际危机、美国的作用和政策以及一般的世界性问题中去。他从现在讲到过去，再从过去讲到现在，不顾时间造成的重大变化而随意类推。”[②]

马汉认为，组成海权的部分是多方面的。他在附加到手稿中的1/6的部分——《海上力量的诸因素》中从舒费尔特、卢斯、惠特霍恩、戴维、西利等人先后论述的不同领域，全面分析了海上力量的自然背景，以及美国过去和现在海上力量与商业扩张的关系，其核心在于，他列举了6项影响各国海上力量的基本条件：

① ［美］罗伯特・西格著、刘学成等编译：《马汉》，第194～195页。

② ［美］《军事战略》，第198～199页。

第一，地理位置。一个国家要想发展海权，首先它必须在地理上便于进入世界的海洋，它们不必凭借陆地来保卫自身的利益，也不必通过陆地扩张来扩充自己的利益范围，这些国家大都以海洋为目标，拥有比内陆国家更优越的条件。这类国家主要有两类：海洋沿岸国家和岛国，美国和英国等国就具有比西班牙和法国更有利的条件，而英国这个岛国在发展海权方面最幸运，它不必维持强大的陆军力量。从历史上来看，差不多所有沿海国家和岛国都渴求或被迫发展海权体系，但只有少数几个能充分做到这一点，因为构成海权的条件是多方面的。

第二，自然结构。发展海权的动力来源于一个国家内陆的生产力水平，如果一个沿海国或岛国内陆的生产力落后，或者它从根本上而言就是一个完全改变不了的自给自足的农业国，那么它要么对海外商业竞争不感兴趣，要么被其他海权国家所殖民。只要一个国家具有了无数得到保护的优良港湾和深入腹地富庶地区的大河，这个国家发展海权的动力在一定时期就会爆发。马汉特别强调指出，美国享有这些自然结构，它所需要的只是在它的人民中间重新激发起美国早期的对海洋的这种爱和信赖。

第三，领土范围。一个国家领土范围的大小对发展海权至关重要，因为领土范围在一定程度上影响人口的分布，如果拥有同海岸线长度成正比的人口分布，那么这个国家的海权发展的主要内部阻碍就不存在了。一方面，人口分布影响边界驻防；另一方面，海岸线长的国家为了充分保护和利用优良港湾，必须在沿海地区均匀分布人口，以优秀水手充实海军。马汉列举了美国南北战争时期的例证，南部邦联拥有优越的自然结构，但由于人口分布不均，海上力量是空白，人民又不是以海业为生，所以还是在战争中败北了。相反，北部合众国人口在沿海岸地区均匀分布，水手优秀。合众国正是占据了海上优势，所以战争的胜利属于它们。

第四，人口数量。要想建设一支持久有效的海上力量，一个国

家必须拥有充足的人口。“必须要有大批人充当水手，或至少随时准备受雇于舰船，以及从事制造海军设备”①。显然，1890年时的美国还不具备这一条件。

第五，民族素质。人口众多只是其中的一个方面，更重要的还在于人口的活力和素质。建立一支海上强大力量不单靠一些人的意愿，关键在于全体公民对海上商业利益的渴望和需求，他们必须“爱财”，追求海外有利可图的商业贸易。马汉非常遗憾地指出，美国人是具有这种品质的，然而，它的政府却制定“法律障碍”，不乐意资助海洋经济，这极大地妨碍了人民素质的充分发挥，那么也就必然阻碍了海上力量的建设。同时，一个国家通过海上力量夺取了海外殖民地后，本国的人民应乐意到那里去定居并开发其资源，如果没有这样的人民，殖民体系必然瓦解，海权的发挥也受到限制，葡萄牙和西班牙殖民帝国的崩溃充分说明了这一点。

第六，政府性质。当一个国家具备了上述各项条件后，还必须具有这样一个保障，即政府有发展海上力量的决心，在这方面，专制君主（例如法国）政府，同其他（例如英国）政府相比，前者往往显得摇摆不定、变化无常。从历史上来看，海上大国通常有一种提供参政机会的政治结构，海权的建立，取决于人民的精神和充分认识到了人民真正意图的政府的明智指导。美国同英国一样，其政治制度可以极大程度地反映人民的意志并使之在组成政府方面发挥巨大作用。

只要具备了上述条件，一个真正的海权国家就诞生了。然而，马汉又指出，仅仅获取了海权并不意味着国家海外利益的完全获得，在不同的时间、环境以及相应的政策条件下，海权会不断增长或受到损害，海权显示了一种严密的反映国计民生的国家体系。马汉在分析了英国称霸世界的原因之后，认为它是一个典型的例子，整个18



① ［美］罗伯特·西格著，刘学成等编译：《马汉》，第197页。

世纪，英国的海权不断增长，它不仅在和平时期运用海上力量夺取了世界上主要的财富，而且在战争时期借助海上力量维持了其对世界海洋的统治地位。根据马汉的分析来看，海权的增长或损害受制于下列几方面的因素：

第一，一国国内生产力的水平，它必须要不断扩大生产可供对外贸易的产品。实质上，人类对海洋的兴趣和某些国家对海洋的兴趣，主要是因为海上贸易在历史上给他们带来了财富，随着科技的进步，人类战胜海洋自然威胁的能力不断增强，这样，海洋便不可避免地会成为那些具有一定的海上实力而又渴望获得世界财富的国家间进行竞争和冲突的主要领域。如果一个国家在这种不断升级的海洋商业竞争中缺少了国内的动力，其海权不是得到增长而是受到损害。

第二，必须要拥有进行海外贸易的大规模的运输船只。对交换剩余产品的需求促进了海上贸易的发展，而保障海上贸易进行的专门行业——运输也相应得到了推进，在这一过程中，作为运输工具的商船起了决定性的作用。根本上来讲，商船（货船）是国家海上力量的主要构成部分，其他部分只不过是其附属因素而已。因此，国家海权的增长一个极其重要的方面就是以扩大运输能力为核心发展其他辅助设施，只有把这几方面有机地联系起来，其海上运动能力的主动权就会不断增长，国家的财富和影响也就相当稳定，最终控制海洋便有望了。

第三，殖民地和基地应能保障扩大和保护船只的运输。海上运动是一种暴露的体系，它受到来自各方面的威胁，包括自然的和人为的。当一个国家派遣商船驶往外国时，它的船只需要停泊、补给、交易或避风，这样，控制基地就成了国家谋求商业利益的不可缺少的方面，它不仅仅只要控制某几个基地，而是全球各个角落或者说其商业利益延伸到的所有部分的基地。而且，海上商业的发展也不仅仅是剩余产品的交换，还包括夺取本国急需的原料和能源以及保

障本国产品长期而固定的销售点，因此，控制海外殖民地也成为必然。

第四，必须要有一支海上武装力量——海军来保护海外基地和殖民地与本国基地间的交通线。总体上而言，如果一个国家的生产力足以建立海上武力并保障它们的活动，海权体系就形成了。商业本身的竞争性必然导致国家及民族的野心，进而导致武装冲突，因而，海权的经常运用并不等于海洋的和平，相反，国家海权的增长客观上并不可能在完全平静的海洋中形成，它需要在竞争中发展。这样，适应和平运输的需要，海军应运而生了。马汉指出，我们之所以把海上武力加到海权中去，是从整个海权体系而言的，武力是其中极为重要的一环。海上武力与一国的海权之间的关系可谓一目了然，其主要表现出这样几方面的作用：

其一，海上武力因竞争而生，反过来，它又导致更加激烈的竞争（因野心剧增）。在和平时期，海上武力只不过是远洋运输、商业贸易的威慑手段，阻止不可避免的分歧发展为直接的武装冲突。

其二，海军的存在就是为了参加海上战斗，保卫国家海权体系的完整和正常运转，同时，又能在战斗中使对方失去海上运动的能力，它不只是简单的商业破坏或介人，而是具有某些战略上的意义，即从战略上控制海上的各种运动，夺取绝对优势。

其三，海军创立后便脱离了其最初的基本任务，它不仅要将国家的海权推广到地球上的各个角落，而且它逐步演变成了国家推行其外交政策的有力工具，它凭借海权将国家利益扩展到海外并将之转化为一种极强的政治影响。

马汉的思想对本世纪初日本、英国、德国和美国的外交政策产生了广泛的影响，现代世界各国海军第一主义的兴起差不多都是以其《海权对历史的影响：1660年—1783年》一书的出版而开始的，他创建的完整的思想新学派——海权学派导致了全球“新海军”的崛起。尽管德国人是过了好长时间才接受马汉原则的政治含义的，但

在海军建设中运用马汉关于制海权的设想方面步伐很快，和其他西方列强的海军建设一样，德国也毫不例外地以当时的海上强国英国为主要竞争对手。德皇在1894年5月指出："我现在不是在阅读，而是在吞噬马汉的书，在努力把它牢记心中。这是第一流的著作，所有的观点都是经典性的。我们所有的舰船上都要有这本书，我们的舰长们和军官们经常引用它。"[①] 以后，德帝国海军命令，把马汉的《海权对历史的影响：1660年—1783年》一书的德译本提供给国内所有公共图书馆、学校和政府机构。同时，1897年，马汉的这本书也被译成了日文，分发到天皇、皇太子手中以及政府领导人、三军军官团和学校之中。

马汉学说最直接的影响在美国，这一半是出于其思想本身，而另一半则是有赖于他与一些领导人间的亲密关系，如西奥多·罗斯福。罗斯福总统称马汉是"美国生活中最伟大、最有影响的人物之一"。《马汉》一书的作者罗伯特·西格指出："在19世纪的美国，没有一个美国人所写的书对国家的进程和方向产生过如此大的直接影响。"他"使美国海军从内战后的毁灭中振兴，为其提供专业基础和理论方向，从而有助于引导它在1898、1918和1945年走向胜利，这一切同马汉紧密联系在一起"[②]。美国史学界也称他为"带领美国海军进入20世纪的有先见之明的天才"。

马汉担任过美国海军学院的院长、"芝加哥"号巡洋舰舰长、美国历史学会会长等职务，他的一生，不仅对美国乃至全球的海权理论作出了卓越贡献，而且还亲自为现实的美国海防战略部署、海军建设及战争出谋划策。1890年12月，他在《大西洋月刊》上发表的题为《美国向外看》* 的文章标志着他已成为一个帝国主义分子，他

① ［美］罗伯特·西格著，刘学成等编译：《马汉》，第205页。

② ［美］罗伯特·西格著，刘学成等编译：《马汉》，第209页、第1页。

* 这篇文章是对《海权的诸因素》一章的几个论点的发挥。

在文章中极力主张美国应大力开展国际贸易竞争和渗入国际市场，为此，美国必须全力保卫它在萨摩亚群岛、夏威夷和巴拿马地峡的现有战略利益和商业利益。同时，马汉对日益激烈的欧洲国家间的竞争忧心忡忡，认为这种竞争必将威胁到美国的安全，因此，马汉极力要求建立一支具有机动作战能力的庞大海军，并在国外拥有足够多的停泊基地，同时为美国的安全与生存建立一个坚固的海岸防御体系。实质上，此时的马汉完全是适应了美国统治集团上层的要求而对他以前的思想加以发挥和阐述的。美国的资本主义发展到19世纪末，剩余产品急需向海外销售，而马汉则不失时机地指出，美国应放弃其内向的资本主义，放弃军事上的脆弱和对待国际事务的孤立主义倾向，应具备国际竞争精神．只有这样，美国才能在国际舞台上确立其商业、工业、军事和外交的大国地位，否则，美国将在欧洲国家的包围中被摧毁。

值得注意的是，马汉在设想美国的海上战略时并不赞同德国等国在海军建设中公开以英国为竞争对手的做法，他建议美国在“互利”的基础上同英国达成所谓“谅解”，但不是“结盟”。然而，与之同时，马汉又在悄悄地拟定同那些类似英国的国家进行海战的应急计划，他在这些计划中假设了海战中美国的作战步骤。

对于马汉来说，共和党人执政还是民主党人执政，他的命运是不一样的，当马汉在1890年极力鼓吹帝国主义观点时，共和党人的政府和官员们容忍了（甚至谨慎地鼓励）。然而，到1893年时这种情况就大不一样了。这一年的3月1日，马汉的一篇题为《夏威夷与我们未来的海权》的文章发表在纽约《论坛》杂志上，他在文章中指出，美国占领夏威夷同美国西海岸的防御能力密切相关，同美国必需控制的贸易通道密切相关，同美国控制太平洋、特别是北太平洋的商业和军事密切相关，这些地区是美国在地理上最应该得到的利益所在。而所有这些目标的实现必须依靠建立一支同目前世界上最强大的海军相匹敌的海军。这些帝国主义观点对民主党人克利

夫兰来说是无法容忍的，这也许就是1893年后马汉被派到"芝加哥"号巡洋舰上去的主要原因之一，幸好这段经历并不长，这段经历也并未使他的观点发生任何改变。1895年—1898年间，日本的海军力量不断发展，这使他对美国当局不迅速兼并夏威夷的政策十分担心，他十分敏锐地注意到日、美之间在太平洋地区发生冲突的可能性，为此，他恳求当时麦金莱政府的海军部长助理罗斯福加强太平洋舰队，在他看来，即使美国与西班牙之间发生战争，美国也可凭借强大的太平洋舰队袭击西班牙控制的菲律宾。至于古巴的价值，他认为，它作为西班牙的殖民地继续存在下去不会导致美西之间的冲突。但是，当美西战争真的爆发后，马汉又有些不知所从了。在罗斯福的一再要求下，他不得不答应考虑某些战略问题，并为美西海上作战提供了一系列的建议和具体做法，如取消海军战争委员会，组建一个以一名军官为首的海军总参谋部等。

马汉尤其鼓吹利用一支强大的海军来遏制俄国的扩张主义政策[①]。实质上，马汉和哈尔福德·丁·麦金德一样都看到了俄国所控制的欧亚大陆腹地是未来世界和平与安全的关键。在我们看来，他们所不同的是，马汉是从俄国需要而且决心要在东亚获得不冻港的观点来分析控制这一地区的国家（俄国）将对世界海权的影响，他只是附带地用他那地缘政治学的巨笔勾画了一大块政治不稳定地带，他把这块地带称为"有争议的和未确定的中间地带"。而麦金德爵士则更多地是在批判"海权论"的基础上来发展和完善"陆权论"的这一点我们在后面就要谈到。

尽管马汉压根儿不喜欢东方人，在他眼中东方的文明停滞、种族劣次、文化落后，他一生都是反"黄祸"运动的正式成员。他在19世纪末的帝国主义瓜分中国的狂潮中，极力把自己装扮成一名中国问题专家对美国的远东政策出谋划策。他在《亚洲形势对世界政

① Michael Pacione (ed): *Progress In Political Geography*. P. 45.

治的影响》一文中指出，为了稳定“有争议的中间地带”的富饶的长江流域，美国等海上强国要防止任何一个或几个外国对中国实行绝对统治。马汉认为，美国在中国所实施的门户开放政策不仅只是贸易，他对让基督教传入中国比发展对华商业贸易更感兴趣，而做到这一点，美国需要在远东维持一支强大的海军。

使中国强大到足以成为西方海上强国抗击俄国企图在发达的太平洋地带获得一个不冻港的缓冲地带，这是马汉的心愿。他对俄国人的厌恶感远胜于对中国人的鄙视，在他那里，俄国是整个亚洲乃至太平洋地区海权的主要症结之所在。俄国的扩张性以及它所占据的中间地带的中心位置，证明它是一个蕴藏有无穷能量的民族，必然缓慢地、稳固地向波斯湾、日本海和黄海推进，占据南方的温水区是它的既定目标。为此，他建议英国把满洲让给俄国人，这一方面可以使俄国远离英国的侧翼，波斯湾的危险消除，从而也稳定了美国；另一方面，俄国势力集中于满洲后，它将面临更多的敌人，包括美国、德国、日本等，那么，限制其势力的进一步扩张就成为可能。

日本在日俄战争中的表现令马汉十分震惊，这正如罗伯特·西格所指出的：“日本在战争中的胜利打消了马汉对俄国蒸汽压路机无情冲击中国和整个‘有争议的和未确定的中间地带’的担忧。相反，在马汉脑海里，日本突然成了美国在远东和太平洋的主要敌人。”[①]于是，他又设想了一整套美对日海上作战的具体步骤、目标和策略。马汉十分清楚，日本的崛起比起俄国来要危险得多，日本是个岛国，它完全依赖于海洋，而且对海外势力范围急需。而日本要夺取的首先应是太平洋地区的现实利益，这将和美国的富国强兵之路发生最直接的对抗，日本对太平洋海岸的侵略是完全可能的，这又取决于两方面的因素：一是日本对美国目前的政策（门户开放政策）必然

① ［美］罗伯特·西格著，刘学成等编译：《马汉》，第457页。

持怀疑态度——当时的美国决策者应充分估计到这一点，以及日本对太平洋沿岸地区对日本移民的不友好的偏见；二是太平洋地区的利益关键当时处于极脆弱的地位。为此，马汉认为美国在太平洋地区应注重三个要点——夏威夷、菲律宾、关岛，而关岛是关键之关键，他建议关岛应成为与日作战的所有海军计划的核心。

马汉对于鼓动在巴拿马地峡修凿一条完全由美国人自己控制的运河特别卖力，不过，马汉并不是从美国的商业或经济利益方面来考虑这一举措的重要性的，而是着重于运河对美国的战略及海权的发展的重要性方面，在他看来，开凿这条运河有这样几方面的必要性：

第一，加速美国居民向人烟稀少的西部海岸迁移，为美国夺取太平洋地区海权创造条件，这是马汉的夺取制海权的重要内容之一。

第二，有利于美国舰队在战术上迅速集中。美国东西海岸的舰队在地理位置上是彼此分离的，一旦海战爆发，相互之间的声援完全不可能，因此，在离美国最近的地区开凿这样一条运河是美国发展海权的必须之举。

第三，有利于美国对加勒比地区的战略控制。从发展海权来讲，加勒比地区是美国的战略基点。马汉认为，当时美国在对外政策方面显得力不从心，运用门罗主义的范围应缩小，即限制在加勒比海湾至亚马逊河谷这一地区。

第四，对太平洋地区海权的控制是美国的海上战略重点，要使美国在中国的门户开放政策更有成效，阻止俄国、日本在这一地区势力的扩大，必须加强美国海军在太平洋地区的作用。

至于美国同不稳定的欧洲之间的关系，马汉是门罗主义的主要鼓吹者。在马汉看来，德国是欧洲国家中最有可能向门罗主义挑战的国家，他们甚至极有可能从美国手中夺取巴拿马运河。他相信德意志帝国的内部人口压力极重，其经济结构和社会结构又特别适用于实施一项庞大的海军建设计划，这就决定了它必然向外扩张，而

这一扩张的主要障碍来自美国的门罗主义。基于这一点，马汉最为担忧的是英国对大陆德国的崛起听之任之或力不从心。同时，他特别期望有朝一日美国和不列颠合众国这个英语帝国重建非正式的、配合默契的伙伴关系。英语世界在种族、文化等方面居世界文明之领先地位，它们应该以某种方式联合起来反对潜伏在盎格鲁一撒克逊文明身边的野蛮人的侵略。显然，马汉在这个问题上是在主张所谓的“力量均衡”之术，美国与英国的联合导致一种必然的结果，英国在地理位置上恰好控制了德国与全世界的贸易航线，这是英语国家“插入德国下颚的最厉害的钩子”。当然，马汉十分清楚，欧洲的均衡只不过是一种“不稳定的、变化的均衡”，民族主义这种感情的力量比起英语世界的这种纽带来要强大得多，欧洲大陆的和平只是暂时的。

马汉煞费苦心提出的与此相关的另一种均衡是，未来英国和德国都将从远东地区撤出他们的海上力量，剩下美国同日本在太平洋地区的海上对峙。他认为，门户开放政策是力量均衡的再一种表现。

通过对海战的研究，马汉的思想极大地影响了20世纪前半叶海军势力的发展及其运用的战略原则。马汉自己的说法是，他的那个海上力量左右历史发展的伟大概念来自于上帝，因为是上帝使他成为了历史学家。极为有趣的是，马汉却又十分本能地倾向于用宇宙论的观点来看待海权与历史的关系。为了证明海上力量对历史的影响，马汉发展了一种他称之为“类举法”的研究方法论，通过精心搜集和筛选历史事实后，应用所选择的这些事实来说明另外一些事实。但是，这种纯粹的推理演绎的研究技术使马汉遇到了不少麻烦。我们姑且不管别人是怎样评价他的这种研究方法的，就马汉本人而言，他在1913年5月8日致查尔斯·斯克里布纳的信中不得不承认：“现在我最感兴趣的是国际问题。在过去的几年里，我详细研究后发现，许多问题，至少是纯粹的海军问题，应用类举法是很困难

的。"[①]

作为一名历史哲学家，马汉自然而然地会受到当时在美国历史学界流行的关于历史宿命论的某些主张的影响。然而，迄今为止，还没有人能证明马汉的哲学观点究竟源出何处。马汉的生活环境和教育环境使他能够用哲学和历史的语言来解释战争和冲突的必然性，籍此他进而提出需要建立一支强大的海军。我们在分析马汉的地缘政治思想时不应忽视的事实是，他的思想和这三个人是分不开的：爱德华·梅里克·古尔本（教师，马汉第一次遇到他是在"易洛魁"号舰上服役）、米洛·马汉（他的亲叔叔）和达尔文。前面两位对马汉的影响最直接，起初，马汉所接受的对国家兴衰作为有机的生物学的解释就是源出于他们。不过，马汉能成为一个无懈可击的帝国主义者——认为一个国家不是积极地向外扩张它的领土和威力，就必然走向衰亡，还得加上达尔文的观点。到 1900 年，马汉在米洛的关于"国家的生命如同一个人的生命"的思想和古尔本关于"身体处于不断地运动之中"的观点的基础之上又加进了达尔文关于"所有有生命的机体都遵循自然选择"的法则。因此，他的观点是：国家的第一法则是自我保存，而自我保存的最佳途径就是积极参与斗争，发展壮大才是健康生命的特征。毫无疑问，在马汉的内心深处，相信国际冲突是不可避免的，人类天性好战。武力在历史上具有决定性的作用，武力不仅是国家发展壮大的必需手段，而且，武力的运用是保护文明和纠正道德错误的不可避免的途径。直至 20 世纪中叶，他所发展的这种武力概念扮演主要角色的历史哲学及其所揭示的中心主题——海上力量对历史的影响的海权理论，在海洋战略上仍具有极强的说服力。

第二次世界大战后，马汉的概念已经过时，需要重新修正，但是，他所研究的海上竞争及舰只行为在两个或更多的势力争夺海上

① 〔美〕罗伯特·西格著，刘学成等编译：《马汉》，第 473 页。

控制权时仍然适用。同时，他所创立的原则在很大程度上与战后的形势（控制海洋的美国对抗控制大片陆地的苏联）偏离，但是，其原则在军事分析中仍有价值，至少，海上霸权将永远是任何一个强国全球战略中不可缺少的一部分。

## 2.4 哈尔福德·丁·麦金德的“陆权论”

19世纪末马汉在海上力量对历史的影响方面的论述是海权学派最经典的思想，然而就在他生活的最后20年中，英国之外权力因素中工业的迅速增长和陆地机械运输革命的发生，使海权逐步让位于陆权，最早阐述这一观点的是英国地理学家哈尔福德·丁·麦金德爵士（Sir Halfard John Mackinder，1861—1947），第一次世界大战证实了他的论断。

麦金德于1861年2月15日出生在林肯郡的盖恩斯巴勒，其父是一位乡村医生。1874年，他被送到埃普索姆学院学习，他父亲想要他学成毕业后继承他的事业，但是，1880年10月有幸进入牛津大学后，他的命运就完全改变了。在牛津大学期间，他攻读了两门对他后来的思想产生巨大影响的学科——自然科学和近代史。1885年—1886年间，他和朋友一道周游了全国，大力宣讲他们所言的“新地理学”，这一活动引起了皇家地理学会一些著名成员的极大兴趣。1887年1月，他被邀请在皇家地理学会宣读了《地理学的范围和方法》的报告。此后仅三个星期，牛津大学就决定在地理学方面设立了一个为期五年、薪水300英镑的讲师席位。同年7月，麦金德被委任为这一讲师职位。在他多方面的努力及皇家地理学会大力的财政支持下，牛津大学于1899年创立了地理系，由麦金德担任英国当时第一个地理系的系主任。

麦金德在地理学方面的成就并未妨碍他对政治的兴趣，以后还成了著名的政治活动家，当然，这一点与他在政治理论方面的突出

成就是分不开的。我们今天在分析麦金德的理论及影响时，更多的是把他作为一名地缘政治学者，然而，严格来讲，他首先应是一位著名的地理学家。“他自己从不承认他是一个地缘政治学者，对这一词的厌恶正如他讨厌地缘政治学一词一样。他所感兴趣的是帝国和民主的维护以及教育和地理学的进步。其（对）地缘政治学的陈述也只不过是偶尔涉足更广的领域去说明历史学和地理学相互作用的解释的假设和预见的运用价值，这些是他工作的极小部分”①。他之所以被誉为现代“最有影响的思想家之一”②，根本上在于他所描述的“世界岛”（World Island）中的“心脏地带”（Heartland）概念及其地缘战略含义对20世纪德国和美国等国外交政策的影响和他的预言与两次世界大战前后国际格局的巧合。关于这一点我们将在后面详细论述。

在地理学方面的极深造诣和对政治的浓厚兴趣，使他得以将这两者有机地结合起来，即运用地理学的理论以全球战略观点来进行政治分析。麦金德在《地理学的范围和方法》中力陈应“把自然地理和政治地理结合起来”③。他建议将地理学解释为这样一门科学：“它的主要职能是探索人类在社会中的相互作用，以及在局部发生变化的环境中的相互作用。”④ 实质上，他的主张就是要使地理学的研究跨越自然科学研究和人类研究之间的鸿沟，“地理学家的责任是建立一座桥梁”。他坚信这是完全可能的，因为，“十个探索地理学的学者中必然有九个是从人类的立场来进行的”，“他们希望把世界作

① W. H. Parker: *Mackinder, Geography as an aid to Statecraft*, Clarendon Press, Oxford, 1982, P. 147.

② W. H. Parker: *Mackinder, Geography as an aid to statecraft*, P. 147.

③ [英]麦金德著，林尔蔚译：《历史的地理枢纽》，商务印书馆，1985年，第20页。他在这里所使用的“政治地理学”是在当时流行的广义上所使用的，相当于现代所言的“人类地理学”。

④ [英] 麦金德著，林尔蔚译：《历史的地理枢纽》，第20页。

为人类环境来研究”。所以政治地理学的职能就是在自然地理学研究变化着的环境的前提条件下，“发现和说明在社会中人类之间和他们在局部发生变化的环境之间存在的关系”[①]。基于这些认识，他得出的必然结论是：“任何地方的政治问题，都将以对自然特征考察的结果而定……研究人对自然的反作用，将是地理学中最迷人的篇章之一。”[②]

麦金德最先感兴趣的是陆权——海权两者的关系，他成为这种思想的主要倡导者最先表现在1887年在皇家地理学会所宣读的地理学论文中（25岁时）：“现代的征服者包括两类：‘陆狼’（Land－Wolf）和‘海狼’（Sea－Wolf）。”他以后的主要地缘政治观点都是由此而生的。实际上，他主要是基于对“海权论”的某些批判（但不是否定）而阐述他的“陆权论”的。归结起来，其主要观点是：

第一，如果没有领土根基，海上力量的机动性和扩张将不复存在。富饶而安全的生产基地是根本，生产基地不仅是船只装备，而且也是与航海相关的一切陆地服务的支柱，对海洋的控制基于强大的陆地资源。

第二，历史上，海上力量由于基地被陆上力量所控制而不断被征服。麦金德学说之核心就在于他认为陆上力量控制海洋较之海上力量控制陆地要容易得多。

第三，欧洲依靠海上力量为主要手段向外扩张的“哥伦布时代”已经终结。在哥伦布以后的时代，“我们不得不再一次与封闭的政治制度打交道，而且这将仍然是一个世界范围内的问题。每一种社会力量的爆发，不会在周围的某个不为人知的空间和野蛮的混乱中消失，而是在地球遥远的一边引起强烈的反响，其后果是世界上

① ［英］麦金德著，林尔蔚译：《历史的地理枢纽》，第39页。

② ［英］麦金德著，林尔蔚译：《历史的地理枢纽》，第39页。

政治和经济有机体中的薄弱部分，将被震得粉碎"[1]。

第四，世界边界的封闭导致了新的地理视野。旧世界的主要大陆欧洲、亚洲和非洲可以被看成是一个战略单位——世界岛。有一个覆盖全球9/12的海洋，剩下的是大陆——世界岛，还有很多小岛，南北美洲是其中极具作用的两个，它们覆盖全球所剩的1/12。

第五，由于陆地通讯革命的发生，旧世界之"世界岛"第一次被统一为一个战略单位。铁路的作用被公路机械运输和飞机空中运输进一步证实。同时，人口的激剧增加也是我们在分析陆权与海权之关系时不能忽视的重要内容之一。

第六，世界岛的核心是由主要大河流域所形成的广阔的低地，这些大河向北流入北冰洋，向南注入内陆咸海。这一地区包括亚洲的一半和欧洲的1/4，麦金德称之为"枢纽地区"或"心脏地带"，这里通过海洋是"不可到达的"。

第七，第一次世界大战中海上力量的胜利只是偶然的事件，它给人一种错觉，因为战争的政治战略在欧洲历史上是独一无二的。正是在第一次全面战争中，占优势的力量并未被大西洋一侧的海上力量联合的压力和大陆河流陆权的联合压力所击溃（两线作战）。

第八，第一次世界大战的真正教训恰恰相反：敲响了陆权拥有反对海权的不断增长的战略机遇的警钟。

第九，必须确立关于心脏地带的一个最终地理观点。

麦金德最主要的地缘政治言论是从《历史的地理枢纽》（*The Geographical Pivot of History*）一文开始的。这篇论文是他于1904年（42岁时）在皇家地理学会宣读的，当时听众似乎并不多，其中有人还为有些座位空着而感到遗憾。他在这篇迄今举世闻名的讲演中首次提出了"心脏地带"这一战略概念，成为"第一个以全球战

① ［英］麦金德著，林尔蔚译：《历史的地理枢纽》，第44～45页。

略观点来分析世界政治力量的人"[①]。尽管有人将此文列为"16本改变世界的巨著之一",但"当时稳固地控制着世界海洋的大不列颠帝国,对于他的关于陆权国家向海权国家挑战这一警告却置若罔闻"[②]。一般而言,这篇论文被看成是他对"心脏地带"理论的第一次论证,不过,当时他"只是作为一个描述术语而不是专门术语偶然提到的,代替使用的是'枢纽地区'和'枢纽国家'的表述"[③]。此后,麦金德又对他提出的这一概念及理论进行了两次论证。15年后,即第一次世界大战后的1919年,根据在"心脏地带"俄国发生的巨大社会变革,他将1904年的论文扩展为《民主的理想与现实》(*Democratic Ideals and Reality*)一书,正式阐述了其"心脏地带"理论。到1943年,第二次世界大战正酣之际,当时已82岁高龄的麦金德应美国《外交季刊》(*Foreign Affairs*)之约,撰写了一篇题为《全世界与赢得和平》(*The Round World And The Winning of The Peace*)的文章,于同年7月发表在《外交季刊》上。在此文中,麦金德对他一生中所提出的足以影响世界历史进程的"心脏地带"理论进行了某些重要修正,形成了其第三次论证。

麦金德一生从事教育和研究事业的最重要的目标之一,就是通过对国际和各国局势变化的历史观察和思考,寻找一种"至少能表明世界历史中某些地理因素的公式",而"这个公式应当具有透视国际政治中的一些对抗势力的实用价值"[④]。当然,这项工作也并不是麦金德的独创,前面所谈到的各国地理学家、历史学家、政治学家和军事学家们就是从生物学、经济学、地理学、人类学等不同领域

① [英]麦金德著,林尔蔚译:《历史的地理枢纽》,第1页。

② Preston E. James and Geoffrey J. Martin: *All Possible World, A History of Geographical Ideas*, P. 202.

③ *Foreign Affairs*, 1943, Vol—21, No. 4, P. 596.

④ [英]麦金德著,林尔蔚译:《历史的地理枢纽》,第45页。

寻找解释国际政治舞台变化延伸的因素的，他们共同的特点就在于把达尔文的生物进化论搬进对人类事务的分析之中。到麦金德那里，尽管他希望人类将摆脱认为只有那些“最好地适应环境”的国家才能生存的“唯宿命论”观点，但他似乎一开始就把政治地理学归于达尔文的体系之中了*。自马汉开创“地缘战略”(Geostrategy)之研究以后，人们似乎在他所倡导的“海权”理论以及从英国早期的海上霸权和以后美国对海洋的真正控制中找到了一种“公式”或“开启世界舞台魔箱的钥匙”，然而事实并非如此，麦金德也是否认这一点的。我们认为，这一工作是麦金德完成的。根据他自己的说法，“实际上，这一公式早在1904年就已经找到了”①。

通过对欧亚大陆争霸史的分析，麦金德首先基于俄国的自然地理来寻找他的公式。他指出，在非常真实的意义上而言，欧洲文明是反对亚洲人入侵的长期斗争的结果，欧洲之所以实现它的文明，正是源于外来野蛮人的压力，因而欧洲的历史应被看作是隶属于亚洲和亚洲的历史。同时，“在现代的欧洲政治地图中最明显的对比是：由俄国占据半个大陆的广阔地域和由一小群西欧国家占有较小领土所显示的情景……初看一下，在这些熟悉的事实中，似乎在自然环境与政治组织之间存在着一种如此明显的联系，以致不值得去加以说明，特别当我们注意到整个俄罗斯平原上一个寒冷的冬天对应着一个酷热的夏天，人们的生存条件因而更加一致时，更有这种感觉”②。然而，事实上，早年的俄国和波兰完全是在林中空地立国的。因此，麦金德所提出的主题思想是：“在从5世纪到16世纪的全部时期中，图兰语系的游牧民族——匈奴人、阿瓦尔人、保加利亚人、

* 这或许是地缘政治学者的本能，他们或多或少都持国家有机论的观点，将国际事务视为为生存而斗争，适者生存。

① *Foreign Affairs*, 1943, Vol－21, No. 4, P. 597.

② ［英］麦金德著，林尔蔚译：《历史的地理枢纽》，第46～47页。

马扎尔人、哈扎尔人、帕济纳克人、库曼人、蒙古人、卡尔梅克人从人们所不了解的亚洲内地，穿越草原，通过乌拉尔山与里海之间的隘口，令人惊异地接踵而至。在阿提拉领导下，匈奴人在草原带最远的多瑙河流域的外国普斯塔斯中部站稳了脚跟，并由此向北、向西、向南出击欧洲的各定居民族。近代史的一大部分，可以看成是对这些袭击所直接或间接引起的变化的注释。"[1] 欧亚大陆的边缘地带一边的欧洲长期夹在两种压力之间——从东方来的亚洲游牧民族和另外三个方面来的海盗，这两者都是欧洲文明的刺激力量；在欧亚大陆的另一边也是如此，"中国不止一次地屈从于从北方来的征服者，印度则多次被来自西北方的征服者征服"[2]。麦金德在研究中惊异地发现，在大西洋沿岸和印度洋及太平洋沿岸的印度和中国居住着世界 2/3 的人口，除此之外，旧大陆的两种自然现象给人们以深深的启迪。一是"一条由于实际上没有雨量而无人居住的辽阔地带"撒哈拉沙漠横穿整个北非，它使中非和南非在大部分时间里是与欧、亚两洲完全隔开的，"实际上，欧洲的南界过去和现在都是撒哈拉，而不是地中海"[3]；二是"欧亚大陆以十分引人注目的水系分布为特色"。在这里有至少六条世界上最大的河流，它们向北流入冰冻的海洋，向南流入盐湖，"从人们与外部世界的交通这种意义上看，实际上毫无用处"。"这样，欧亚大陆的核心虽然点缀着一块块沙漠，整个说来是一个草原地带，提供了一个广阔的即使通常并不丰美的牧场……在这片广大地区内，有着可以维持稀少的，但总计起来还是数量可观的骑马或骑骆驼的游牧民族的全部条件。"[4] 这块地带北界是广阔的亚极地森林和沼泽地带；东部森林带向南延伸直到阿穆

---

① ［英］麦金德著，林尔蔚译：《历史的地理枢纽》，第 50 页。
② ［英］麦金德著，林尔蔚译：《历史的地理枢纽》，第 52 页。
③ ［英］麦金德著，林尔蔚译：《历史的地理枢纽》，第 53 页。
④ ［英］麦金德著，林尔蔚译：《历史的地理枢纽》，第 53 页。

尔地和满洲的太平洋；西部情况类似。这里除西端外，没有可以接近海洋的河流穿过草原。从 14 世纪中叶蒙古高原集结了第一批部队开始，"旧大陆所有定居的边缘地带，或先或后都感觉到来自草原的机动力量的扩张势力"[1]。

麦金德在论文中所谈到的这样一块北部为冰雪覆盖、其他三面为水域包围的连续陆地最适合骑马和骑骆驼的民族的机动性，这块地带就是"心脏地带"，它的东面、南面和西面是呈巨大新月形的边缘地区，由海路可以到达。"海洋上的机动性，是大陆心脏地带的马和骆驼的机动性的天然敌手"[2]。因此，历史上，两种机动力量不断发生冲突，其结果是出现了河流阶段的文明，如长江流域的中国文明、恒河流域的印度文明、幼发拉底河流域的巴比伦文明、尼罗河流域的埃及文明。"由哥伦布一代的伟大航海家们开始的变革，赋予基督教世界以最广大的除飞翔以外的活动能力。这个单一、连续的包围分散的岛状陆地的海洋，当然是制海权最终统一的地理条件，也是马汉船长和斯潘塞·威尔金斯先生等这些作家们所阐述的当代海军战略及政策的全部理论的地理条件。"[3] 航海事业的迅猛发展，不仅把欧洲和亚洲的关系颠倒了过来，而且还使欧洲在向海外扩张中"创造了许多的新的欧洲"。与此同时，麦金德着重强调指出的是："陆上强国依然存在，而且最近的一些事件再次增加了它的重要性。当西欧的航海民族以他们的舰队控制海洋，在各大陆外缘定居，并在不同程度上把亚洲的海洋边缘区变成属地时，俄国组织起哥萨克人从北部森林地带出现了……哥萨克骑兵席卷亚洲，向东猛扑，差不多和绕道好望角一样孕育着巨大的政治后果。"[4] 尽管一个世代以

① ［英］麦金德著，林尔蔚译：《历史的地理枢纽》，第 55 页。

② ［英］麦金德著，林尔蔚译：《历史的地理枢纽》，第 57 页。

③ ［英］麦金德著，林尔蔚译：《历史的地理枢纽》，第 58 页。

④ ［英］麦金德著，林尔蔚译：《历史的地理枢纽》，第 58 页。

前，蒸汽机和苏伊士运河的出现，大大增强了海上强国相对于陆上强国的机动性，但是，现在横穿大陆的铁路则完全改变了陆上强国的状况，而且“铁路在任何地方都没有像在闭塞的欧亚心脏地带，像在没有木材或不能得到石块修筑公路的广大地区内所发挥的这种效果。铁路在草原上创造了更加伟大的奇迹，因为它直接代替了马和骆驼的机动性；发展公路的阶段在这里被省掉了”①。这样，俄国追随在哥萨克人之后，“从它以前隐居的北方森林中安全地走了出来”。借助从维尔巴伦到符拉迪沃斯托克长达6000英里的铁路，俄国证明它是机动的陆上强国。即使从商业利益而言，海上贸易的利润将大大低于陆上贸易。

至此，麦金德用了两个反问句阐明了他要得出的结论：“当我们考虑对这个广阔的历史潮流所作的迅速回顾时，不是觉得明显地存在着某种地理关系的持续性吗？欧亚大陆上那一片广大的、船舶不能到达、但在古代却任凭骑马牧民纵横驰骋，而今天又即将布满铁路* 的地区，不是世界政治的一个枢纽区域吗？”② 俄国人控制这一地区的地位已取代了草原人的向外出击，取代了原由俄国掌握的在欧洲的中心战略地位，“它能向各方面出击，也能受到来自各方的攻击”。俄国所拥有的空间十分辽阔，它的经济实力必将迅速增长，其“现代铁路机动性的充分发挥，只是一个时间问题而已”。

在枢纽地区以外，是巨大的内新月形地区，包括德国、奥地利、土耳其、印度和中国；再向外是外新月形地区，包括英国、南非、澳大利亚、美国、加拿大和日本。

可见，麦金德是基于俄国东西走向的两大森林带和草原带以及

① ［英］麦金德著，林尔蔚译：《历史的地理枢纽》，第59页。

* 麦金德认为，尽管横穿西伯利亚的铁路是一条单一的和不安全的交通线，但在本世纪结束以前，整个亚洲将会布满了铁路。

② ［英］麦金德著，林尔蔚译：《历史的地理枢纽》，第60页。

南北流向的河流这一地理特征而找到他所要确立的公式的关键的。他在 1904 年所确立的公式可表述为：谁控制了“枢纽地区”，谁将成为世界帝国。他指出：“枢纽国家向欧亚大陆边缘地区的扩张，使力量对比转过来对它有利，这将使它能够利用巨大的大陆资源来建立舰队，那时这个世界帝国也就在望了。如果德国与俄国结盟，这种情况就可能发生。”① 显然，麦金德并不是借助对马汉的“海权”理论的否定来论证自己的公式的，只不过当世界上大多数国家的统治者和英国人还沉溺于海上霸权时，他则看到了“枢纽地区”权力对世界权力分配的重要性，主张利用欧亚大陆丰富的自然资源来建立一支强有力的舰队。只要攫取了“枢纽地区”的陆权，进而就有可能成为世界帝国。也可以说，他把地缘战略的理论从“海权论”发展到了“陆权＋海权”论。基于上述公式，麦金德进行了两个“假设”或“推断”：一是“如果德国与俄国结盟”，那么这个世界帝国就有望了；二是“假如中国被日本组织起来，推翻俄罗斯帝国并征服其领土，那时就会因他们在广大的大陆资源之外又占据了控制海洋的地位——这种双重优势是俄国人还没有得到过的，那么他们必将成为威胁世界自由的黄祸”②。从欧亚大陆两个方向所作的这种推论证明了他的这样一个结论：“某一新的力量代替俄国对这片内陆地区的控制，将不会降低这一枢纽位置的意义。”③

第一次世界大战后，麦金德根据欧洲局势所发生的巨大变化，特别是俄国所出现的深刻社会变革，重新审查了他在 1904 年论文中所提出的理论，并将之扩充为《民主的理想与现实》一书，正式提出了“心脏地带”理论。关于此次论证，麦金德在 1919 年 2 月 1 日为他的书所作的引言中指出：“它不是由于战争时期狂热思想的冲动而

① ［英］麦金德著，林尔蔚译：《历史的地理枢纽》，第 61～62 页。
② ［英］麦金德著，林尔蔚译：《历史的地理枢纽》，第 63 页。
③ ［英］麦金德著，林尔蔚译：《历史的地理枢纽》，第 63 页。

写成的……我现在所以不揣冒昧,以较长的篇幅来阐述这些主题,是由于——我以为——战争证实了而不是动摇了我以前的观点。"[①] 爱德华·米德·欧尔于1942年5月为此书所作的绪言指出:"如果我们要实现民主理想,必须面对现实。""本书就是为凡是要懂得这些现实的人写的。负责进行战争的军人应该读,运筹帷幄、决定全面战略的政治家应该读,处理国际事务的外交家应该读,关心上次战争、上次和平以及目前斗争的基本事实的新闻记者应该读,当然,献身于胜利和仔细考虑处理战后事宜的必不可少的指导原则的公民们,也应该读。"[②] 这正如约翰·怀南特(John G. Winant)在授予麦金德以查尔斯·戴利(Charles P. Daly)奖章时说的一句话:"在这本书中,他更多地把自己当作一名政治家来论述这个心脏地带,并且谋求把'地理学作为能对治国和战略起帮助作用的东西'。"[③]

经历了第一次全球性的战争灾乱后,国际社会的主要理想包括:(1)建立一个足以制止未来战争的国际组织——国际联盟;(2)国家不分大小,应一律公平对待。麦金德认为,要想实现这些理想,决不能盲目追求时髦,而必须面对现实。国际社会的现实是,在近4个世纪的时间里,大规模的战争每隔约100年就降临人间一次,战争的主要根源在于各国的不平衡发展,"而这种不平衡的发展,并不是完全由于某些国家比另一些国家拥有更伟大的天才和更多的精力。在很大程度上,这是地球表面上富源和战略机会分配不匀的结果。换句话说,自然界中根本没有各国机会均等这回事"[④]。这种地理上的现实"事实上有助于各帝国的成长,并最终有助于单一的世界帝国

① [英]麦金德:《民主的理想与现实》,商务印书馆,1965年,第2页。
② [英]麦金德:《民主的理想与现实》,第9页。
③ [英]麦金德:《历史的地理枢纽》,第13页。
④ [英]麦金德:《民主的理想与现实》,第14页。

的成长"[①]。其次，国际权力的应用极易转变为残暴统治，如何在国际社会中确立一种强权[*]足以保持大小国之间相处的准则而不至于发展为世界残暴统治呢？这是我们协调好自由理想与地球上这许多持久的现实之间关系不可回避的主要现实问题。

麦金德一开始便以另一篇在 1905 年发表于《国家评论》(*National Review*) 杂志上的题为《衡量国家和帝国力量的人力》(Man—Power as a Measure of National and Imperiel Strength) 的文章中所提到的概念——"人力"来阐述他的观点。他指出，这一概念的含义不仅仅是指作战能力，还包括经济发展的焦点——生产力以及文明发展之根基的社会组织，人力是社会发展的"动量"。在它所包含的因素中，"生产力是一个比积累的财富重要得多的现实的因素"[②]，生产力的发展导致社会组织形式的不断变化。经历第一次全球动乱后，生产关系遭到了严重破坏，整个社会机器需要重新建构，从历史的事实来看，要想在这种环境中"建立一个崭新的纪律核心"，唯有依靠武力，这是克服理想主义最有效的途径，因为使用武力的组织者们必然是现实主义者。国际组织及其组织者们头等重要的目标就是：立足于现实的考虑，防止人力集中于一个有才能的残暴的组织者之手，尤其要防止集中于拥有铁路、汽车、飞机等先进技术设备的具有战略优势的"心脏地带"之手，否则，一种真正的威胁便形成了[③]。为此，麦金德以一个政治家的热情和优虑从地理的和经济的现实充分论证了这一点。

首先，海洋是一个整体，这是地理的第一个现实。从古至今的海上强国具有一个共同的特点：拥有物产丰富、安全的本土基地。这

---

① [英] 麦金德：《民主的理想与现实》，第 14 页。

* 麦金德当时所言的"强权"含义不同于现实流行的"强权"。

② [英] 麦金德：《民主的理想与现实》，第 19 页。

③ W. H. Parker：*Mackinder, Geography as an Aid to Statecraft*, P. 165.

是最主要的，其他因素只是这一条件的辅助设施。这一点在英国的海上霸权史中充分显现出来了。麦金德在考察海上强国盛衰的过程中，并不是重复马汉等人已经谈论过的旧主题——独霸海洋，而是关心“关于海上强国的基地及其和陆上强国的基地的关系”[①]。第一次世界大战的结果似乎并没有超出大多数英国人的预言：由于海洋的一体性，海上强国在与陆上强国所进行的倾注全力的决斗中，海上强国包围了陆上强国并取得了胜利。然而，我们更有意义的分析假设是：“如果是德国对外征服得胜，那它就会在比历史上任何时期都广阔的基地上，实际上在无可再广阔的基地上建立它的海上力量。现在，欧、亚、非三洲合一的大陆，不仅在理论上而且在实质上是个岛……我们……称之为‘世界岛’（World Island）。”[②]刚刚结束的那场战争“是岛国与大陆国间的一场战争”，其中参加国——英国、加拿大、美国、巴西、澳大利亚、新西兰和日本都是岛国，但是，“世界岛”上便利的交通和蕴藏的无可比拟的丰富资源使我们不得不撇开德国舰队在福思河口的投降这件让人兴奋不已的事情，从而冷静下来从长远思考问题，如果在将来某个时期，整个“大大陆”（Great Continent）或整个“世界岛”或它们中的一部分统一于一个单一势力之手，那将会出现什么情况呢？显而易见，这一势力不仅是一个陆上强国，而且也将建成一支无敌的海上力量。从战略上来讲，这种情况必然是对自由世界最重大的威胁，我们应充分认识到这一点并在当前的解决办法中“不留空隙”，在我们新的政治制度中设法加以防止。

其次，大陆的地理现实是，在“世界岛”上存在两个“心脏地

---

① ［英］麦金德：《民主的理想与现实》，第60～61页。

② J. Mackinder: *Democratic Ideals and Reality*, Henry Holtand Company, New York, 1942, P. 81.

带”——“北心脏地带”和“南心脏地带”*，前者“从西伯利亚冰冻的、平坦的海岸，一直伸展到俾路支斯坦（Baluchistan）和波斯的酷热的、陡立的海岸，从海上不能到达那里”①。如果从战略上考虑，它的范围更广泛些，“应包括波罗的海、多瑙河可以航行的中游和下游、黑海、小亚细亚、亚美尼亚、波斯、西藏和蒙古”②。“南心脏地带”指撒哈拉以南的非洲内陆，这里也是以“航海为业的人无法到达的”，两个心脏地带的共同自然特点就是广阔的草地和森林带。十分有趣的是，麦金德在界定这两个心脏地带时并不一样，他对“北心脏地带”所作的定义是很捉摸不定的——这正如美国的F. J. 蒂加特（Teggart）在《地理评论》（*The Geographical Review*）1919年第8期上评价麦金德的书时的抱怨。麦金德自己也承认“它的边界没有很清楚划定”，然而，在他看来，明确的边界并不重要，他所关心的是这样一片连接不断的平原地区的地理事实以及其潜在的巨大经济实力。“在现代条件下，‘心脏地带’仍是海上力量进不去的区域，虽然它的西部位于北冰洋和内陆流域之外。一个突出的自然现象生动地把这片地带连在一起：整个‘心脏地带’……冬季都覆盖在白雪之下”。而且“心脏地带”内的“俄罗斯、布兰登堡——普鲁士（Brandenberg—Prussia）和奥匈帝国三处合一的广大人力基地，是历史上骑马的人所没有过的”③。铁路、汽车和飞机为陆上强国提供了越来越多的对付海上强国的战略机会。因此，国际联盟单凭一纸空文（即使是成文法律）并不足以保证这个“心脏地带”将来不再成为世界战争的中心，而应趁国际格局转换之际，立足于地理和经济的现实，采取实际步骤防

* 麦金德将“世界岛”分为六个自然区域：欧洲沿海地区、撒哈拉、阿拉伯、沿海季风地区、北心脏地带、南心脏地带。

① ［英］麦金德：《民主的理想与现实》，第73页。

② ［英］麦金德：《民主的理想与现实》，第101页。

③ ［英］麦金德：《民主的理想与现实》，第101页。

止这一地区落人单一势力控制之下。

第三，欧洲的争霸史说明，欧洲实际上分成东欧和西欧，它们是对立的。麦金德经由德国所划分的“心脏地带”和沿海地区的那条线，亦即东欧和西欧之间的历史疆界线。西欧包括两大组成部分：罗曼斯语系和条顿语系，其中的主要国家是英、法两国，由于受英吉利海峡的地理条件制约，它们之间的战争主要是为了防止法兰西帝国独霸欧洲大陆，其他战争是在海外为争夺殖民地和经济利益而进行的；东欧也有两大组成部分：条顿语系和斯拉夫语系。“东欧整个局势的关键……在于日耳曼人硬要压倒斯拉夫人。”“因此东欧不像西欧那样，并不是由许多各自独立的民族组成的；也不像阿尔萨斯被普鲁士拿去以前的西欧那样，彼此并没有严重的疆界问题。东欧是日耳曼人对主要是斯拉夫语居民的大规模的三重组织……”[1]

19 世纪俄英争雄的战略格局实际反映了东西欧之间的争吵。俄国的陆基力量虽然未发展到威胁阿拉伯的程度，却也借助“心脏地带”的人力基础，通过哥萨克骑兵的运动，将扩张的势头延伸到了东印度的门前，此时的海上强国英国则将它对抗大陆强国的力量分布于“心脏地带”3/4 强的边缘上。麦金德从欧洲帝国间的相互争霸的格局分析中得出了这样的结论：“‘世界岛’和‘心脏地带’，对于海上强国和陆上强国，是终极的‘地理现实’；东欧基本上是‘心脏地带’的一部分。”[2]当然，除此之外“人力的经济现实”也至关重要，俄国是“心脏地带”具有真正可怕的人力的首要居住者；德国也在其皇帝的统治下采用了相应的经济政策措施来积蓄人力，试图建立一个世界帝国。

因此，麦金德用这样一个公式表述了他对“心脏地带”理论的重论：

---

① ［英］麦金德：《民主的理想与现实》，第 119 页。

② J. Mackinder: *Democratic Ideals and Reality*, P. 179.

谁统治了东欧，谁就能主宰心脏地带；

谁统治了心脏地带，谁就能主宰世界岛；

谁统治了世界岛，谁就能主宰全世界①。

我们同时也可把这一公式看成是麦金德对那次战争侥幸胜利者们的警告，在此基础上，他认为："集中力量，想出一个重新安排东欧和'心脏地带'事务的稳妥办法来。这是当务之急。"② 而且我们并不是为求得暂时的喘息而草率决策，想要解决日耳曼人和斯拉夫人之间的问题，"必须做得彻底"。如果把东欧和西欧一样分成若干独立的国家，不仅削弱了日耳曼人的世界地位，同时也为国际联盟创造了条件。

那么，如何重新安排东欧的领土问题呢？稳妥的办法是："把东欧分成三个而不是两个国家系统。极有必要在德国和俄国之间有一层独立的国家。"如果仅仅依靠俄国的力量来对付德国，"某种方式的专制统治几乎是不可避免的"③。值得我们注意的是，麦金德在这一问题上表现出了极大的摇摆性：一方面，他极力主张将德、俄隔开，防止它们结盟，而其中特别要预防来自德国的威胁；另一方面，随着俄国国内战争的发展，他更加认清了布尔什维克的性质、目标和作用，并因而对他的观点产生了怀疑，"俄国的崩溃澄清了我们对于现实的观点"④。显然，麦金德转而对发生了重大社会变革的苏俄产生了更大的恐惧。此后，他不仅在理论上为各国统治者出谋划策，而且还亲自行动，为在东欧实施"防疫线"（Cordon Sanitaire）计划游说有关各国或地区。1919 年英国政府中的邱吉尔集团的获胜——他们强烈要求英国支援俄国的邓尼金势力以防止布尔什维克控制俄

① J. Mackinder: *Democratic Ideals and Reality*, P. 62.

② ［英］麦金德：《民主的理想与现实》，第 137 页。

③ ［英］麦金德：《民主的理想与现实》，第 140 页。

④ ［英］麦金德：《民主的理想与现实》，第 68 页。

国，给麦金德在这一问题上起重大作用提供了极好的机会。英国政府认为，对邓尼金的援助不仅仅只是军事援助，而且还应为其指明政治方向。为此，英国政府于1919年7月29日决定向南俄派出一名代表，同年10月新出任的英国外交大臣推举麦金德担任驻南俄高级专员之职。麦金德很快接受了这一使命，并从12月4日开始了他的游说活动。12月13日，他到达华沙后会见了波兰总统和外交部长，要求波兰支持邓尼金；此后他又分别到布加勒斯特、索菲亚和君士坦丁堡开展积极的外交活动，直到1920年元旦才最后抵达南俄，在那里，他会见了邓尼金和英国军事顾问霍尔曼（Holman）将军。他极力说服邓尼金与波兰人合作并承认边界国家，但是，邓尼金集团拒绝采取这种有悖于俄国人民意志的事情。麦金德最终明白，有必要制定一项包括所有集团参加的反对布尔什维克的周密计划。1920年1月，他回国后向英国政府呈交了详细报告。鉴于麦金德的突出贡献，英国政府于同年授予他"爵士"称号。

1943年，麦金德为《外交季刊》撰写了一篇题为《全世界与赢得和平》的文章，对其"心脏地带"理论进行了某些重要修正。对于此次论证，研究麦金德生平及思想的著名学者W.H.帕克尔指出："它不是一篇自愿的论文，而是应别人的要求撰写的，当时他已82岁，又是在战乱期间。"[①]这一倾向代表了国外学术界普遍的观点。因此，他们往往更注重于他1904年的论文和1919年的扩充。然而，无论如何，我们不应忽视他一生中的最后一次具有相当重要意义的论证。

那么，到1943年，麦金德是如何再论"心脏地带"战略概念的呢？他的结论是："它现在要比20年或40年以前更确凿、更有用。"[②]第二次世界大战爆发后的欧洲局势和后果出现了两种前景：要么德

---

① W. H. Parker: *Mackinder, Geography as an Aid to Statecraft*, P. 174.

② *Foreign Affairs*, 1943, Vol—21, No. 4, P. 603.

国法西斯征服包括苏联在内的整个欧洲；要么苏联及其盟国成为反法西斯的胜利者。然而，这两者对于麦金德的公式来说并没有截然相反的意义。麦金德始终认为，他所找到的公式在很大程度上是从地理的因素而不是人文的因素来进行预测推断的，因而更趋于稳定不变，它“既可用于过去的历史，又可用于当前政策”，“任何可能的社会变革，似乎都不会改变它和它的生存的巨大地理界限之间的基本关系”[①]。各个时代的社会运动基本上都是围绕着相同的自然特征进行的。

麦金德1943年再论其“心脏地带”理论的主要目的就是“拟定‘心脏地带’战略概念对于即将到来的世界秩序的价值”[②]。他认为，将整个“北极河”和“大陆河”用制图的方式表现出来，那么，水域界限正好在地图上分割出一块“紧密相联的宽阔地带”，“这就是心脏地带”。而“就我们现实的论题而言，有充分理由说苏联的领土相当于心脏地带”[③]。同时，他又以叶尼塞河为界，把苏联分为“心脏地带”和“勒拿地带”，后者丰富的自然资源——森林、水力、矿藏还无人问津，这样，“心脏地带”除了其战略上的优越地理位置外又加进了“勒拿地带”丰富的自然资源。

为了分析“心脏地带”的战略价值，麦金德用了一种“最简单和可能最有效的方法”，即将苏联与法国相比，不过，他在“谈及苏联的历史背景是第二次世界大战时，法国的历史背景则是第一次世界大战”[④]。他认为，苏联不断再现法国在第一次世界大战时的特征，只不过其规模更大。苏联可借助其广袤的“心脏地带”平原进行纵深的防御和战略撤退。纵观历史，俄国军队就曾在这一自然堡垒中

① ［英］麦金德：《历史的地理枢纽》，第62～63页。

② *Foreign Affairs*, 1943, Vol—21, No. 4, P. 597.

③ *Foreign Affairs*, 1943, Vol—21, No. 4, P. 598.

④ *Foreign Affairs*, 1943, Vol—21, No. 4, P. 599.

成功地抵御了外来侵略者的入侵。所以,"心脏地带"西边敞开的通道的垂直宽度实际就变成了一种优势,因为"它为迫使敌人进行过宽的人力部署从而(为)击败敌人提供了机会"[①]。同时,"心脏地带"平原向东形成一道天然屏障,由"不可到达"的北极海岸、叶尼塞河背后的"勒拿地带"荒野和从阿尔泰到兴都库什的山脉构成,"这三大屏障具有比围绕法国的海岸和山脉更宽广、更有效和更优越的防御价值"[②]。

虽然北极海岸再也不是"不可到达"的了,借助强大的破冰船和飞机在前面侦察通过浮冰的航道,商船已将贸易扩展到了奥比和叶尼塞河,乃至于勒拿河;同时,现代战争手段的更新及战争空间的延伸也使他所言的天然屏障黯然失色。但是,他仍然坚持认为:"面对苏联的陆基空防力量,想要穿过极圈广阔的冰地、西伯利亚北部的寒泽及塔尔加森林从而进行一种敌对的入侵几乎是不可能的。"[③] 梦想一个世界空中强国将征服"海权"和"陆权"也毫无根据,他引用了一位老练飞行员的话:"空权完全依靠其地面组织的效率"[④],所以空战的发展仅仅显示了进攻和防御优势的微小转换,不可能偏离战争史的规律。

因此,他认为不可避免的结论是:"如果苏联在这次战争中以德国的战胜者出现,它必然会被列为地球上最大的陆上强国。而且它还将是处于战略上最强防御地位的强国。心脏地带是地球上最大的自然堡垒,在历史上它是第一次布置足够数量和质量的驻军。"[⑤] 多数学者认为,这是他 1943 年论文中最重要的结论,也是对"心脏地

① *Foreign Affairs*, 1943, Vol—21, No. 4, P. 603.
② *Foreign Affairs*, 1943, Vol—21, No. 4, P. 600.
③ *Foreign Affairs*, 1943, Vol—21, No. 4, P. 600.
④ *Foreign Affairs*, 1943, Vol—21, No. 4, P. 602.
⑤ *Foreign Affairs*, 1943, Vol—21, No. 4, P. 601.

带”理论所作的最重要的修正。有些研究战后美、苏“冷战”史的学者因此而认为“它奠定了美国战后的遏制政策的理论基石”[①]。尽管“冷战”政策的理论奠基人乔治·凯南否认其理论与麦金德1943年的结论或以前的推断有任何联系，但战后美国的政策已充分证明了其政策的制定者和执行者们都自觉或不自觉地受到了麦金德理论及其变种的启迪。

就历史学界和国际政治学界的“冷战”研究而言，多数学者的视野起点是凯南的理论，而未能与麦金德或其他地缘政治学论点联系起来。笔者认为，这应被看成是“冷战”研究的一大缺憾。麦金德的学说之所以“具有惊人的预见性”，并在第二次世界大战后为各国政治家、外交家们倍加推崇，就是因为他更多地从地理的因素出发来“制定一个能适应任何政治平衡的地理公式”。因此，战后的美国，不仅凯南等理论家受到了其学说的启示，而且那些“执行政策的人也熟知他的学说”[②]。

尽管麦金德声称他“无意预测人类的未来”，但他却对人类赢得和平的前景进行了分析。他认为，要彻底摧毁德国的战争哲学，唯有利用一种相悖哲学的净水来洗刷德国人的头脑，而这种净化的潮流“最好不是来自某些再生体和正在再生的德意志根源，而是我已经命名的权力堤坝之间，一个在心脏地带内；另一个位于双重权力的美国、英国和法国三国疆界内”[③]。也就是说，要使任何试图破坏和平的力量受控于两道强有力的权力堤坝之手——“位于东边心脏地带的‘陆权’和西边北大西洋地区的‘海权’”[④]。世界和平的前景在于，让破坏和平的国家或集团永远确信它们所发动的任何一场战

① W. H. Parker: *Mackinder, Geogrophy as an Aid to Statecraft*, preface.

② W. H. Parker: *Mackinder, Geogrophy as an Aid to Statecraft*, P. 193.

③ *Foreign Affairs*, 1943, Vol—21, No. 4, P. 604.

④ *Foreign Affairs*, 1943, Vol—21, No. 4, P. 601.

争都将面临两条"不可动摇"的战线。实际上，这就是"遏制"的思想。因此，他主张两种层次的国际合作。首先，美、英、法之间必须有效和长久地合作，即建立"大西洋联盟"，这是相同意识形态国家间的合作。一方面是为了空间上的纵深防御；另一方面是作为"海权"平衡"陆权"的保障。美、英、法等国要抗衡"心脏地带"，必须具有双重权力。麦金德所建议的"大西洋联盟"的地缘战略分析就是"法国的桥头堡、英国的壕沟飞机场和美国东部及加拿大丰富的人力、农业和工业资源"①。他把这种大国合作当成是建立世界"均势"的根本。其次，上述三方能和第四个征服者苏联保证共同合作，确保战争恶魔不再抬头，这是他主张的不同意识形态国家间的合作。只有如此，才能建立双重权力堤坝。

麦金德在论证这一点时同样也将注意力集中于全球的主要地理特征之上。"有一条犹如缠绕北极地区的带子，它起始于撒哈拉沙漠，向东是阿拉伯、伊朗、西藏和蒙古的沙漠，然后经由勒拿地带、阿拉斯加的荒野和加拿大的劳伦地盾，延伸到美国西部的亚干燥地带。"② 这条"荒漠带"是全球地理的最主要的特征，而它又包含两个几乎同等重要的相关特征："心脏地带"和包括四个子系——地中海、波罗的海、北极海和加勒比海的"陆地中心海洋地带"（北大西洋）。这条带子的外侧是大洋（太平洋、印度洋、南大西洋）和环绕大洋的陆地（亚洲季风大陆、澳大利亚、南美洲和撒哈拉以南非洲）。

那么，恢复世界秩序首先应关注的就是密苏里和叶尼塞河之间的地区，这里是"芝加哥——纽约和伦敦——莫斯科之间商业航行主干线的支点，它们全部的发展都必须依靠它"③。麦金德自以为他

① *Foreign Affairs*, 1943, Vol—21, No. 4, P. 604.

② *Foreign Affairs*, 1943, Vol—21, No. 4, P. 602.

③ *Foreign Affairs*, 1943, Vol—21, No. 4, P. 603.

找到了阿基米德试图要找到的撬动整个世界的“支点”。显然，麦金德试图从更大规模的地理因素来论证他的公式。他在1943年“第三次论证”时充分考虑到了“全球的完整性和平衡”，没有忽视作为世界因素的任何一个主要部分。

回顾麦金德的“心脏地带”理论，尽管他用了过于简单化的论点试图帮助人们去说明复杂的历史事态的进程，他所发明的公式选择了少数地理位置的事实和一些历史大事作为依据，而忽略了细节，但是，以此为前提得出的推论仍然是极为重要的。他的论点在第二次世界大战前并没有在英语国家引起很大的注意，但却在德国得到了认真的研究，在那里，它成了地缘政治学者们的基本指导思想。第二次世界大战后，英、美等国对麦金德的理论产生了极大的兴趣，他们全球战略的理论基石在很大程度上是受了麦金德理论的启迪。不管世界格局发生了什么变化，也不管人们如何评价麦金德的理论，麦金德在贬褒不一的纷纷议论中于1947年5月在多塞特郡的帕克斯通家中溘然长逝了。然而，世界的地理现实依旧：“陆权对抗海权、心脏地带对抗边缘地带、中心对抗边缘、个人主义的西方哲学对抗集体主义的东方学说……麦金德虽然去逝了，但他的思想永存！”①

## 2.5　吉里奥·杜黑将军的“空权论”

不言而喻，空军理论家们创立理论的历史相对海权论和陆权论而言要短一些。有三个人的名字与空军战略、学说和理论的创立关系密切，他们是：意大利的吉里奥·杜黑、英国的休·特伦查德和美国的比利·米切尔。其中杜黑将军被公认为是“空军的马汉”。

吉里奥·杜黑（Giulio Douhet，1869—1930）出生于意大利南部的城镇卡塞塔，他从都灵军事工程学校毕业后，又进入陆军大学

① W. H. Parker: *Mackinder, Geogrophy as an Aid to Statecraft*, P. 175.

学习。他对地缘政治学理论的重要贡献就在于他提出了"制空权"理论（尽管他从未使用过"空权"一词)。从1908年起，杜黑将军开始致力于对战略的研究，特别是航空学发展的军事运用研究。1909年，当时还仅仅是意大利陆军下级军官的杜黑就指出："天空即将成为战场。现在所有的人都认识到了制海权的重要性，但不久的将来，制空权的获得将是更为重要的，飞机在未来的战争中将起主宰作用。"[1]

他一直很希望其思想能影响到意大利军方，但直至他成为都灵空战的指挥官，他才有了机会。通过1911年—1912年的意土战争证明，飞机作为一种防御武器远比飞艇先进。但是，杜黑将军极力推崇的观点与意大利军事体制和总参谋部的旨意背道而驰，于是他被解除了职位，接受了一项与其专业特长毫不相干的委任，他甚至被迫去进行两项官方调查，这项工作对他很有好处，但他却倍感失望，很想退出现役，只是由于第一次世界大战的爆发他才收回了这一决定。

战争期间，他常常批评意大利高级指挥官和同盟国的命令，其异议主要是关于防御行为的价值。他继续倡导飞机的运用，认为西方联盟的战略根本上是错误的，以人和武器的高昂代价实施局部进攻不可能产生一种战略成功。在陆战中，防御一方因防御武器和陆基防御体系的先进而比进攻一方居于更有利的地位，因此，盟军必须以最少的人员伤亡进行一种防御战，在其先进的工业能力基础之上建立起绝对优势的武器力量后再实施攻击，而且这种攻击行为要由飞机来进行。杜黑一再倡导建立一支强大的运用自如的轰炸机群，这种空中力量的攻击目标不是敌方军队，而是供给中心和通讯线，以摧毁敌方的军事体系。

在意大利一内阁成员的要求下，他将对意大利高级指挥官的批

① 陈力：《战略地理论》，第45页。

评摘要写在一篇备忘录中，但是，这份材料后来被意大利军方发现，杜黑因此受到了军事审判并被判一年监禁。出狱后他被任命为国防航空署主任，在这一职位上他再次致力于其自己选择的领域，直至1920年他被替换，然而此时身心已完全恢复了的杜黑又渴望继续在空军中任职，即使是一个极低的职位。

杜黑将军的理论在一定程度上主要是基于其在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的经历，但实际上，那些论点在他战前的著作中就已初见端倪(如1910年)。起初，他坚持空军的独立作用，继而又把它看成是陆军和海军的强有力的助手。他所创立的制空权理论主要反映在他的四本著作中：《制空权》*（1921年）、《未来战争的可能面貌》(1928年)、《扼要的重述》(1929年)、《19××年的战争》(1930年)。其中《制空权》一书最具代表性，至今仍为各种人所引用。他的这本书不仅直接影响了意大利军事战略的制订与实施，而且还在德国引起了重视，后来只是由于德国人并未完全遵循杜黑将军的建议，才使英国人免于从空中被征服。

杜黑在《制空权》一书中全面阐述了他的基本理论观点，此后他又在另外三本书中从不同方面进行了论证和发挥。归结起来，其主要论点包括下列几个方面。

第一，"航空为人类开辟了一个新的活动领域——空中领域，结果就必然形成一个新的战场"[1]。在空中领域，飞机成为了人类战争的新的独特手段。空中力量的出现是伴随海战和陆战的规模不断扩大及作战手段的更新而产生的，显然，空战最初只不过是陆战、海战的延伸而已，陆、海军都可以借助空军的威力完成陆、海战任务。

---

* 国内由曹风毅、华杰译，1986年解放军出版社出版的《制空权》一书是根据 Dino Ferrai 的英译本 *The Command of The Air* 而翻译的，其中包括了杜黑的四本主要著作。

① ［意］杜黑：《制空权》，解放军出版社，1986年，第1页。

同时，空中力量与陆基力量、海上力量的联系恰如后两者的关系那样，极为可能且有现实必要的是:“空军能够单独用它自己的手段完成战争使命，完全不必有陆、海军参与。”① 这主要是因为，对未来战争的特性和式样的合乎逻辑的推理所得出的必然的结论是:“天空是一个同等重要的战场。”② 每个国家在安排它的未来防务时都必须记住这一点；尤其重要的是，空中力量具有比海上和陆基力量更为有利的机动性，“飞机在行动和方向上享有充分的自由。它可以用最短时间（沿直线）沿任何方向的路线向任何地点往返飞行。人们在地球表面上不能做任何事情来干扰在三度空间中自由飞行”③。由于这种独特武器的出现，未来战争的样式必然发生深刻的变化，战争的主要特性将与以往战争根本不同。空中力量的发展使陆权和海权受到了严重削弱。

第二，制空权的获得是取胜的关键。从战略态势上讲，“掌握制空权表示一种态势，能阻止敌人飞行，同时能保持自己飞行”④。夺取制空权一般通过两个途径：(1) 在空中与敌方空军交战而取胜。(2) 摧毁敌人的地面空军及其基地。为此，杜黑认为飞机应具备双重任务，即空战和轰炸，在空中作战的飞机其性能是一样的，只不过战斗机侧重于武器装备，而轰炸机的携弹量大。通过对未来战争可能发生的事情的合乎逻辑的推理而得出的公理是:“夺得制空权就是胜利;在空中被击败就是战败,并接受敌人愿意强加的任何条件。”同时，杜黑还以此为前提得出了两个推论：(1)“一旦发生战争，为了保证国防，必要和充足的条件是能夺得制空权”。(2)“为了保证国防，一个国家所做的一切都应为着一个目标，即在一旦发生战争

① [意] 杜黑：《制空权》，第3页。

② [意] 杜黑：《制空权》，第2页。

③ [意] 杜黑：《制空权》，第6页。

④ [意] 杜黑：《制空权》，第19页。

时掌握最有效的手段夺取制空权"[1]。显然，除了依靠一支强大的空军是无法夺取制空权的，也只有依靠这样一支能夺得制空权的空军，国防才能保证。因此，我们应给予空军以应得的重视，逐步削减陆海军部队，同时相应增强空军部队，直至空军增强到足以夺取制空权为止。只有这样，我们的战略才越来越接近于现实。同时，要想掌握制空权，有必要在能找到敌方航空器和生产它的一切地点上予以摧毁和破坏，但是，无论陆军或海军都无助于进行这种活动，所以，建立一支独立的空军绝对必要。

第三，空战中进攻作战是最重要的。飞机不受地面障碍约束的巨大机动性使它成为了一种最适于进攻的武器，它的这种巨大攻击力要求夺取制空权时采取积极行动，即攻击行动，而不是防守行动。未来空中进攻的巨大规模的必然结局是：进攻是唯一可行的防御。杜黑写道："真正有效的防空只能是间接的；这是因为摧毁了敌方基地的空中力量，从而削弱了敌方空中力量的进攻能力。为达到这个目的的最可靠最有效的方法就是摧毁敌方地面基地的空军。支配这种情况的原则：与打下空中飞行的鸟相比，用摧毁地面上的巢和蛋的方法摧毁敌方空中力量更容易奏效。任何时候违背这条原则都将犯错误。因此，一个国家即使除了自卫以外没有其他目的，也必须拥有一支能对陆地和海面发动强大攻击的独立空军。"[2]至于空中进攻的规模，他认为一支轰炸机群的攻击力是一个国家在战争中应有的强有力手段，要反击这样一支武装力量毫无作用，因此，建立一支轰炸机群为一国之上策。这支武装的首要目标是摧毁敌军的地面空军力量，首先取得制空权，然后，尽所有努力对敌人进行最大可能的攻击并最大限度地摧毁之。杜黑指出："空中进攻通常指向这类目标：和平时期的工商业设施、重要的公私建筑、运输干线和交通枢

① ［意］杜黑：《制空权》，第22～23页。
② ［意］杜黑：《制空权》，第41页。

纽，以及某些特定的居民区。摧毁这些目标需要用三种炸弹：爆炸弹、燃烧弹、毒气弹，其比例视情况而定。爆炸弹炸毁目标，燃烧弹使目标起火，毒气弹阻止消防人员灭火。"①

第四，攻击敌方的交通要道、供给和生产中心以及居民中心。杜黑认为，彻底摧毁这些目标具有精神上和物质上的双重效果，我们不难想象："一旦敌人宣布要对某些城市中心实施不分军民的毫不留情的轰炸，这些人口密集的城市的平民会有什么反应。""当人民今天和昨天一样遭受轰炸，并且知道明天还会挨炸，苦难看不到尽头时，最终就一定会要求和平。"②人民普遍的恐慌意味着民心的瓦解，他们必然要求尽早结束战争。显然，发动摧毁敌方的战争比力图使本国边界免遭蹂躏要重要得多③。

第五，即使是最富有的国家，它所能用于国防的资源也不是无限的，要想获得最有效的国防，必须正确安排陆、海、空军力量的比例。为此，需要一个权威机构成为三军指挥部并协调它们的活动，并由它来确定国家资源的分配比例。鉴于空军具有战略上的重要性，所有资源应分配给进攻性的空军，分配给陆军和海军水面部队及其组织部分的航空兵的资源只要能进行适当的防御就够了。

第六，杜黑认为，空中航行无疑是一种文明进步的手段，它为民用航空事业的发展开辟了广阔的前景。就维护国家安全利益而言，每个国家都应促进民航的发展，"有些民航与国防直接有关，有些则不是"④。建设强大的民用航空，就是使之能随时直接用于国防，即用于独立航空兵和配属航空兵的手段。同时，发展各种民间的航空活动也非常必要，这主要是为了增进人们对航空工业的兴趣，如举

① ［意］杜黑：《制空权》，第15页。

② ［意］杜黑：《制空权》，第218页。

③ *International Encyclopeclia of the Social Sciences* (3—4), P. 256.

④ ［意］杜黑：《制空权》，第65页。

办航空比赛、飞行表演、展览活动等，吸引广大民众尤其是青年关心国家的航空事业。

在此，我们并不想就杜黑将军广泛的论述而面面俱到地进行归纳，总的看来，他的论点主要是围绕“制空权”这个中心主题展开的，并在细节上涉及了与此相关的经济、战略、组织、战术、政治、工程和技术等方面。

杜黑将军所倡导的“制空权”理论的起源和产生与早先的战略概念毫无关系，但也正是因此而使他的理论极易被否认，他本人也不断遇到麻烦。毫无疑问，他对于空战理论的贡献是十分重大的。他的关于飞机是一种强有力的、独特的武器的第一个前提被世界各国普遍接受，他所得出的结论之一：“现今的社会组织形式已经使战争带有一种全民特性，即国家全体居民和全部资源都被吸入战争熔炉中。”[1] 这是符合国际关系现实的。他认为空战中进攻是最重要的论点，迄今也很少有人否认；他所提出的制空权理论及所阐述的各种原则极大地影响了二战期间意大利和德国的空战战略，如果德国人完全遵循杜黑将军的建议，英国人恐怕就在劫难逃了。其思想在美国的影响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中的米歇尔将军那里得到了证实。历史的事实证明，制空权的确是战争中一个非常有力的手段，特别是到了太空武器飞速发展的今天，杜黑的理论与核时代的战略在很多方面不谋而合：反击和反城市战略以及他在《制空权》一书中所提到的一个国际权威以这种强有力的空战手段监督现存条约遵守的可能性。

我们在阅读杜黑的著述时，明显地感觉到他很大程度上是在进行推断和预言，他的论点中的一个主要缺陷就在于：夸大了轰炸机的“决定性作用”，他关于连续的空袭会使民心和斗志迅速瓦解的看法至今并没被历史证明是正确的。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全世界的城

① ［意］杜黑：《制空权》，第 3 页。

市居民(包括交战双方)成功地经受了长期战略轰炸所造成的心理恐怖压力,即使是原子弹这样大规模的毁灭性武器似乎也并没有导致一个国家社会结构的彻底崩溃。

杜黑创立他的理论时,不仅没有估计到未来技术变革的速度,而且极大地受到了当时航空工程的技术状况的限制,加之他本人对于航空知识的一知半解,使他的许多论述(尤其是细节的分析)缺乏说服力,进而又影响了他的整个理论框架。如:他认为民航机可以很容易地改装为作战飞机、对作战飞机来说火力的考虑应先于速度的考虑等。同时,我们还必须指出,虽然他机智地预见到了应建立一个军事机构来协调陆、海、空三军的国家资源的适当分配比例,然而,他的推断显然过分夸大了独立空军的作用,在他看来,空中力量的机动性将取代陆地力量和水面力量的机动性。

当杜黑将军全面、系统地从理论上阐述空权理论时,还有两位与他同时代的著名空军将领对空军战略的发展起了巨大的影响作用,他们是英国皇家空军无可争辩的创建人休·特伦查德爵士和美国空军领袖威廉·米切尔准将。如果说杜黑所起的作用是有创见的思想家的作用,那么特伦查德和米切尔则是实践家的作用。杜黑的思想、观点大多为他们所赞同和支持,特别是关于现代战争中空中优势的获得是必不可少的观点,在早期空军理论者那里是一致的,所不同的是,杜黑的纯理论分析在两位实践家那里显得有些极端化,这是难免的,理论与实践之间有时相距甚远。关于部队的组织结构,早期空中力量的倡导者们也有共识,他们认为空军应独立于陆、海军,由空军指挥部指挥,空军是三军中最重要的军种,特伦查德成功地建立了英国独立的空军,米切尔极力争取发展拥有独立地位的美国空军,但没有成功。

早期空中力量的倡导者们不仅在各自的祖国找到了实践的肥沃土壤,而且还在密切的相互交往中吸取了营养。特伦查德对米切尔的思想影响极大,“米切尔和特伦查德之间建立了亲密关系,相互认

识到共同利益，建立了尊敬和爱慕之情。年长的特伦查德让米切尔赞同自己的观点，而这位年轻的美国少校欣然吸收这些知识"[1]。但是，关于战略空军的作用，米切尔的观点更接近于杜黑的论述，他们都认为，地（水）面部队在力量对比上次于战略空军，而特伦查德则反对把海军和地面部队降到次等和微不足道的地位上去。

在他们之后，各国政府的决策者们不再争论国家需不需要建立空军的问题，而是集中于辩论"需要建立什么样的空军，需要建立多大规模的空军，如何组织空军以及空军与海、陆军应该建立怎么样的关系等问题"[2]。由于各国的战略发展目标及地缘地位各异，因而所得出的结论也不尽相同。

① 《军事战略》，第 244 页。

② 《军事战略》，第 258 页。



# 第三帝国与地缘政治学的境遇

## 3.1 德国地缘政治学的先兆

把“地缘政治学”一词与法西斯主义联系在一起是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后的事。德、意、日法西斯轴心国借地缘政治学理论的宣传所发动的战争给世界各国人民造成了巨大的灾乱，为此，战后的政治学家、历史学家们对第二次世界大战的原因、进程等方面进行理论研究时的共同焦点之一就是：作为法西斯扩张政策理论依据的“地缘政治学说”。特别值得注意的是，在德国，地缘政治学者们在特定历史条件下的某些论述被广为宣传，并与德国法西斯现实的扩张计划和目标不谋而合，因此，战后的各国学者对“地缘政治学”一词极为反感，将之斥为法西斯学说而不屑一顾，在研究中更是不耻于使用这一词。我们查阅现代最新的权威性辞书时发现，对“地缘政治学”一词的解释包括两方面：(1) 地理学对国际政治的特征、历史、机构，尤其是与他国关系的影响，以及这种影响的研究本身；(2) 在民主社会主义德国发展起来的一门伪科学①。不言而喻，“地缘政治学”的伪科学性就在于其法西斯主义的内涵。然而，这一点似乎并不能被所有的学者所接受，其主要原因在于：对法西斯主义的研究本身还存在诸多的争论；把法西斯主义与地缘政治学完全联系在一起的结论并不能说服人。

对法西斯主义这一概念无边无际的滥用，乃至于使之有时蜕变

---

① *International Encyclopedia of Social Sciences* (5－6).

成了纯粹的漫骂的语言，此种研究倾向导致了对法西斯主义研究中的若干争论焦点。我们在分析法西斯主义与地缘政治学的关系时，同样也面临这样一个问题。毋庸赘言，阐述法西斯主义这一概念及其相关问题正是我们的论证前提。

首先，“法西斯主义的名字本身并不说明运动的精神和目的。法西斯是一个社团，一个联盟，法西斯分子是盟员，而法西斯主义可能是秘密结社”[①]。这一概念在内容上是空洞的。

其次，法西斯主义思想具有反社会主义和反资本主义、反现代主义的因素，具有极端民族主义和跨国霸权倾向。尽管在法西斯主义运动产生并兴盛的国家中，其经济和社会状况各不相同，但在政治领域却有着共同的特点。当然，这并不意味着法西斯主义的概念只能“表述国家政权实施恐怖行动”。

第三，法西斯主义分子和法西斯党都赞成和推崇按种族标准建立世界权力新秩序，作为极端民族主义者，它们大多以自己民族历史上的某些“辉煌”为寄托。由于第三帝国的民族社会主义大力强调的种族主义部分显示了某些超越国界的色彩，因而不少欧洲国家的法西斯主义也支持第三帝国的目标。

第四，几乎所有法西斯主义政党都显现出一种坚定不移的消灭政敌和少数民族的意志，犹太民族首当其冲，包括吉卜赛人和波兰人在内的其他少数民族也不例外。

法西斯主义的特征是多种多样的，除了共同的因素外，还有诸多的差异，对法西斯主义进行全方位的分析并不是本章的目的，在作了梗概的要点说明后，对德国的“激进法西斯主义”的剖析显得尤为重要。

不少人在对德国进行论述时认为，其历史上的种种表演是令人

① 转引自［德］沃尔夫冈·维佩曼著，宋钟璜、张载扬译：《欧洲法西斯主义比较（1922年—1982年）》，东方出版社，1992年，第6页。

费解和神秘莫测的，特别是对于第三帝国更是困惑不解，指出："富有才华、勤劳朴实、热爱自由的伟大德国人民为什么会被一位奥地利出身的下士弄得晕头转向，走上自我毁灭之路呢？"① 对此的回答除了教科书中的政治、经济和社会根源的角度外，金重远先生在其《炮火中的文化——文化和第二次世界大战》一书中的文化分析倒是独辟蹊径。

德国意欲控制欧洲（世界）及其扩张计划深深扎根于德意志中心欧洲的土壤之中，鼓吹"种族和领土"的扩张习性源于其中心的地理位置和东西缺乏边疆障碍的处境。德国最早出现在欧洲历史舞台上是在民族迁移的西进浪潮中，强大的罗马帝国暂时阻止了它，但很快它就渗入了意大利和高卢地区。尽管德意志几个世纪里坚持不懈地采取扩张政策，但由于其不同于其他大国的地理条件使它的边境地区动摇不定。它的西部是法国，这个国家在几个世纪的时间里都在努力将自己的力量推进到一个合适的边界地区，在这里建立统一的民族国家，抗御敌对国家的侵略，最后它在比利牛斯山停了下来，它的东面是俄国，让德意志民族感到失望的是，俄国同样也在借一切可能的机会四面出击。在欧洲这样一个国家拥挤的地区，还有哪一个国家为了生存和占据有利地位而不向外扩充势力范围的呢？经过长时期的争夺后，随着人口的增长和各种政治力量的消长趋于平衡，欧洲大部分地区的领土扩张浪潮暂时平静下来，唯独德意志人仍然缺乏平衡，他们无法满足。这一方面在于其领土范围内各单位之间还未形成与其民族性相统一的政治集团；另一方面还取决于其东部边界向外延伸的可能性依然存在，包括多瑙河流域和波罗的海的平原地带。德意志所处的这种地理位置使它成为欧洲动荡的最活跃因子，从中世纪直至当代，德国都在尝试武力政治，最终，

① 金重远：《炮火中的文化——文化和第二次世界大战》，浙江人民出版社，1991年，第28页。

它与欧洲其他国家普遍对立与不和，德意志成了好战的力量，与欧洲国家的不和导致了几次不同范围和不同程度的侵略战争。

如上所述，基于地理上的原因，德意志在好几百年的时间里一直把向东扩张作为首选目标，他们把自己的语言边界从易北河流域推广到了1919年和平条约所划定的界限内。当9世纪查理曼帝国衰亡后，中部欧洲战乱连绵，100多年的时间里力量趋势并不明显，从这时开始，德意志对其东部边界的斯拉夫人和其他民族不断施以武力，其征服线路很快集中在两处较少麻烦的低地——多瑙河谷和波罗的海的平原。在多瑙河谷的进攻同亚洲游牧部族的西进势力相冲撞，这使它并不顺利，而当17世纪德意志再度东进时，对人口的德意志化就不再那么容易了，东进运动包含了排他性的政治和经济意义。在波罗的海的平原地带进行的扩张起初是沿着从波罗的海至希波米亚山脉的宽阔地带展开的，在此过程中，一些不同的军事集团组成了政治实体，即我们所知晓的普鲁士，此后，普鲁士的东进从来都没有停止过，到12世纪中叶，这一运动被视为国家的不变政策，普鲁士成为欧洲极具军事色彩的国家，到17、18世纪时，普鲁士军队成为了人民及其统治者骄傲与荣耀的象征。

然而，其进一步的领土扩张被迅速的领土丧失所抵销，拿破仑军队将普鲁士势力压缩到了其东部核心地区，法国人席卷了大部分德意志，这段历史成了德国的耻辱和不堪回首的记忆。与此同时，法国革命的浪潮唤醒了中部欧洲所有国家的民族主义，霍亨索伦王朝(Hohenzollern Dynasty)统治下的普鲁士习性依旧，积蓄了新的力量继续他们传统的目标——领土扩张与渗透。更为甚者，在重新组成的普鲁士民族国家里，军国主义色彩一如既往，对王朝的忠心成为每一个普鲁士人的唯一信念，可以说，普鲁士的军事化进程较之其他任何一个欧洲民族国家都快。在19世纪的前十年里，为反对拿破仑的侵略，实行了全面征兵，从职业的士兵到全部年轻男子、军事生活方式都显而易见，后备役部队亦十分庞大。拿破仑衰败后，所

有自卫的欧洲大陆国家都改变了全面兵役制，唯独普鲁士仍旧保留着，无论是在战时还是在和平时期，军国主义都没有褪色。军事思想存在的最大特点在于：它将领土扩张视为当然，当1844年中欧国家还在忙于医治拿破仑侵略战争所带来的严重创伤时，普鲁士的军事指挥者们就又在期盼着改变其政治边界了。到19世纪中叶，普鲁士成了德国北部大部分地区的主宰，全德未来领袖的趋势日益明显。

18世纪所进行的赋税改革，尤其是自拿破仑侵略时期所兴起的改革导致了1818年普鲁士统一经济的确立，普鲁士与其他德意志地区间的经济联盟旋即建立。到1834年，并入德意志帝国的大多数地区都加入了这一联盟，自由贸易体制出现了。就在相同的地区内，1871年形成了一个统一的政治联盟——德意志帝国。经济联盟是政治统一的先兆，然而，没有战争和征服，政治统一是不可能的，因此，普鲁士军队总在不断地将经济联盟转换成政治联盟，这一公式推动下的普鲁士最终统一了除奥地利之外的所有德意志传统领土。

就形式上而言，1871年出现的德意志帝国是一个联邦，实质上，只不过是普鲁士的扩大而已，“普鲁士是支配因素。……帝国的意志不过是普鲁士国的意志”①。“帝国领土的大部分只不过是普鲁士方法和目标的延伸罢了，其首都和统治者都是普鲁士的。”② 随着普鲁士势力完全优势地位的确立和对德意志民族主义的操纵，领土扩张和政治统一的目标就昭然若揭了。在普鲁士的骨子里潜存的是赤裸裸的武力，德意志民族国家是靠赤裸裸的侵略来维持的。1871年至1939年的德国历史的行进轨迹是由普鲁士的习性所注定的。

① 引自《希特勒外传》，江西人民出版社，1985年，第77页。

② Derwent Whittlesey: *German Strategy of World Conquest*, Farrar & Rinehart, INC. Newyork, 1942, P. 17.

接着我们要分析一下法西斯主义兴起的哲学基石和科学基石。谈到哲学根基，特别要提到的是这样几个人及其思想。首先是康德，恩格斯在谈到康德的哲学地位时指出："在法国发生政治革命的同时，德国发生了哲学革命；这个革命是由康德开始的。"[①] 他在东普鲁士度过了一生，其著作是对这个国家的反映。他从未怀疑过他那个时代圣明的君主的统治，认为每一个统治者都是平民意志的化身，他所阐述的政治思想成为推动德国未来进程的重要源泉。我们尤其要注意他的这样几句话："战争、紧张而持续的武力准备以及每个国家因而受到的损害，都是每个国家、甚至在和平时期中都会感受到的。这些都是自然诱使各个民族进行各种努力的手段。它们的努力开始时是不完善的，但在经历许多摧残、动乱，直至把自己的实力耗尽之后，终于会采取理性原则向它们提示的步骤，扬弃无法无天的野蛮状态，进入每个国家（包括最小的国家）都可望得到安全与权利的各民族联邦的阶段。""所有的战争都相应地等于是形成国家间新关系的无数尝试（不是由于人的意向，而是由于自然的意向），通过旧实体的破坏或起码是解体而建立新的实体。"[②] "很快我们就会意识到对他人或超越自然的任何权力要求都会增加我们自身的生存机会。必然的趋向在于，所有存在物都要生长，获取有利地位和自我保护。因此，要继续生存就得战斗，或简言之，要生存就得征服。"[③] 由此，我们说康德为德国以后一直从事的军事扩张行为提供了最有说服力的哲学辩护并不过分，也许正是缘于此，处于政治上分裂的德意志人民不断滋长的对于欧洲其他进入了机器时代的大国的自卑感受到了越来越多的指责。

---

①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1965年，第588页。

② 陈乐民：《"欧洲观念"的历史哲学》，东方出版社，1988年，第69～70页。

③ Derwent Whittlesey：*German Strategy of World Conquest*，P. 19.

其次是黑格尔*，在他那里，国家（民族）显现出新的重要性，认为，国家是平民意志的体现，国家自行消亡。黑格尔同样期盼德国的政治统一，指出，这一事件从来都不是协商的结果，而通常是武力（强制力）的结果。宣称一个新的国家必须是一个以军队为后盾的政治统一体，他攻击奥地利是和德意志精神背道而驰的，因为在奥地利帝国内部是非德意志人。他写道："奥地利不是一个王国，而是一个帝国，亦即，一个包括多个政治组织的联合体。从祖源和特征上看，其主要省份的居民都不是德意志人。慑于帝国的威严，奥地利已屈从于和德意志保持更亲密的联系。"①

论及黑格尔对德国历史进程的影响，我们不应忽视的一个方面就是他关于地理环境的论述②。关于地理环境在社会发展中的作用和地位，黑格尔的视野远远超越了中欧地区，他意识到了海洋的力量，并分析了他那个时代鲜为人知的非洲的情形。指出，美洲分为两部分，由一条地峡联结起来，但它只不过是构成一个外在的实际联盟的纽带。相反，与美洲相对的，位于大西洋另一侧的旧大陆，其整体性则被一个深深的港湾——地中海所隔断。其独特的特征在于，三个大陆环绕着地中海，因此具有便利的联系方式，因为河流和海不能视为分离，而应看成联系。英格兰和不列颠、挪威和丹麦等都已结成联盟，同样，占据地球较大比例的地中海地区也应联合起来，否则，世界历史将是不可想象的。

在黑格尔的地图中，非洲应被分为三个部分，一部分位于撒哈拉沙漠以南，这里是一片沿海的狭长地带，鲜为人知；第二部分是

* 学术研究已无可置辩地证明，黑格尔的国家学说并非当时普鲁士国家的简单反映。有学者认为，黑格尔是一个行会主义者和种族主义者，法西斯和纳粹思想家们从他那里吸取了思想内容也完全是误会。

① Derwent Whittlesey: *German Strategy of World Conquest*, P. 21.

② 参见本书第1章。

撒哈拉沙漠以北地区；第三部分是尼罗河流域——非洲仅有的河谷地带，这里与亚洲联结起来。

再次是尼采*（Friedrich Wilhelm Nietzsche，1844－1900），他在费希特和黑格尔主张的基础上向前迈进了一大步，特别是关于德国相对于俄国的陆权和英国的海权的地位分析已接近当代的观点。他写道：

“我更倾向于对俄国威胁的恐惧态度的增强，欧洲将不得不处心积虑形成对等威慑——也就是说，去获取一种意志，利用新的手段统治大陆，其自身坚定不移的、令人敬畏的意志可以将其目标前移若干年。琐碎政治的时代已经过去，下个世纪将进入为夺取世界霸权而斗争的时代。

“作为源于最为复杂种族的人种，或许甚至带有前亚利安人的优势；作为在任何意义上而言都属于‘中心人种’的德意志人相比其他人种而言，更捉摸不定，更富足，更具有反抗精神，更鲜为人知，更不可预料，更不可思议，甚至更具威胁。

“英国人的狭隘气量是当今地球上的巨大危险。我发现更多的感情是倾向于俄国的民粹主义者，而非英国功利主义者。我们所要求的是德意志人和斯拉夫人的交互增长，同时，我们也需要聪明的金融家和犹太人帮助我们成为世界的主人。我们需要与俄国人无条件地结盟，共同制定一个不允许英国人企图在俄国获取任何优势的行动计划。”①

倘若纳粹需要一种哲学，他们会发现这已经藏在尼采的心里。他所发明的一些主要的领土政治观点在后来的纳粹政权中极为明显。

---

* 尼采所处的时期正是先辈的哲学思想被转化为强烈的政治行动的时期，伴随新的哲学思想不断产生，政治和军事著作中的新的历史概念也同时滋生出来。

① Derwent Whittlesey：*German Strategy of World Conquest*，PP. 23～24.

在19世纪，欧洲的每一个角落都未能逃避科学的影响，全德意志更是如此。达尔文及其他自然科学工作者们的新思想体系对于对哲学思想强烈渴求的德国而言尤为重要。这一时期德意志世界政治结构的不断变化也使国家不断尝试新的政府行动方略，并将之付诸自然资源的新开发。大规模物质资源的开发利用（当时主要是煤炭、钾碱和盐）在德国引起了三重意义上的革命：一是产品的大量生产增加了对劳动力的需求；二是在传统的自给自足的农业和手工业的基础上滋长出了工业城市和商业经济；三是生产规模的扩大必然导致原材料的短缺，这就迫使国家同外部世界发展贸易，以满足对长久的市场和原材料基地的渴求，相应地，商业扩张不可避免。

随着科技的兴起，德国形成了不同于西方世界其他地区的独特的经济理论和实践模式。战争是普鲁士领土扩张的有效手段，而胜利的果实是靠经济手段来巩固的，最早采用的是所谓的赋税同盟。

心理学和地理学的发展要晚一些，直到19世纪末才对德国的进程产生作用。对于德意志民族而言，心理学对国家事务的初始贡献主要在于，唤醒公众对于德国作为世界领袖的特殊使命的强烈意识，德国人认为，其先进的技术和优越的政治进程已使这一点不言而喻，紧接着，心理学适时担负起了震撼民众之责。

无独有偶，地理学在德国的发展也较世界其他地区早，但是一直到当代，它才成为国家政权的工具。探险活动或许是地理学的初始形式，不同于其他国家的是，德国的个人探险活动总是由政府资助的，带有明确的商业目的。德国人的探险活动不仅仅局限于新夺取的殖民地，他们的足迹几乎遍及地球的每一片土地，这里都将可能成为他们的原料产地、商品市场和军事征服的目标。更为重要的是，探险者们的主要工具就是地图。他们带回了关于全球资源分布的地图集，新一代德国人不仅仅被教会查阅地图，最重要的是"读懂"它们，这一方式训练了德国公众独特的空间思维方式。在德国的大学和军事教育中，地理学是必修的课程。在18世纪末期的300

多个德意志民族国家融合为19世纪的世界力量中心之时，德国的大学里同时建立了现代地理学。在此过程中有两个现象尤其值得注意，一是一些资深的地理学教授在政府部门中任职；二是随着工业体系的建立和迅速发展及相应的世界贸易的繁荣，经济地理学获取了它应有的位置；同时，以德国为中心的欧洲地理位置也导致了地理学研究中的政治价值和此种地位之不利分析的兴趣，到19世纪末，最早的系统政治地理理论产生了。

当世界历史还未进入20世纪时，德意志民族就发现他们已被其历史的进步、地理学理论、自然资源和科技水平所装备，普鲁士的扩张因其所取得的巨大成功为全体德意志人所认同，进一步扩张的机器全面运转起来。

德国的侵略扩张计划步骤是有目共睹的，我们不必再在这样一本书中对其侵略征服的具体行为目标加以陈述。在这一部分的最后，我们要提到的是地理学家拉策尔在其著作中对德国行为的预见。1911年，他在阐述德国当时所处的世界政治格局地位时写道：

"很多政治学者的观点未能超越中欧和西欧，他们把德法关系看成是欧洲政治的热点问题。另一方面，在政治地理学者看来，现实的政治形势基本上是由政治区域和相应空间的力量的不正常再分割所决定的。

"18世纪时普鲁士的问题是要在欧洲大陆力量之间获取一个大国力量地位，这一点和19世纪时德国是要维护其世界强国之地位的问题毫无差别，这一点在欧洲很快就解决了。作为世界强国，德国唯欲保护其赖以扩张的人民的土地。她无权像所有大陆正在发生或将要发生一样继续向外扩展和新的分割，否则，她就像16世纪一样再次冒被若干代人贬为对立面之险，这就是为何一只舰队的问题对德国来说都显得如此重要的原因。"[1]

---

① Derwent Whittlesey: *German Strategy of World Conquest*, PP. 54～55.

## 3. 2 德国地缘政治学的发端

正当德国在战略计划、心理条件等方面已作好准备，逐步实现其征服梦之时，1914 年—1918 年战争的结果使他们大失所望，所有海外殖民地的丧失把他们的帝国梦击得粉碎，其海军力量被消灭，商船被胜利者所瓜分，向海外的扩张成果前功尽弃。

对德国人震动最大的要算其东部领土被分割，不仅向东推进的部分恢复了原状，而且还有一些德语地区也归入了邻国控制之下，其大肆鼓吹的泛德意志浪潮因而跌入自 1870 年以来的最低点。德国人所鄙视的民族（如波兰）上升为主权国家的行列。在这次领土分割过程中，德国科技发展赖以依靠的重要矿藏基地也被强夺，其中法国和波兰是最大的受益者。第一次世界大战后，德国人尝到了失败的滋味，但是，这并没有改变这个民族的习性，恰恰相反的是，经历过失败之后的德国更为不安于现状。

首先，直至停战之后，德国的领土并未被敌方军队所占领，即使军事占领已触及莱茵地区，其东部——普鲁士的发源地仍远离战火，无论是在战争期间还是在战后，这里都未见到外国的一兵一卒，这似乎使德国人仍然坚信其军队是战无不胜的。

其次，总参谋部在 1917 年 8 月不得不接管政府的权力，这在历史上还是第一次。

其三，皇帝及其政权被条约所废黜，他流亡荷兰，政权由非政府成员所取代。新政权不得不为战争负责，接受战胜国提出的屈辱性条款。而且，它别无选择地要重建这个几乎被战争耗尽的国家，承受失败的痛苦。

简而言之，一战后的德国不管发生了何种持久变化，这都只是表面的，德意志的世界观从根本上而言并未易辙，多年宣传所灌注的人民的情感只不过被失败的现实所掩盖而已。残酷的现实与德意

志人美好的理想之间发生了严重的错位，德意志人承受着几乎不能忍受的压力。在这种情形下，他们渴望一个新的能够从心理和情感上把他们解救出来的领导人（集团）。

在战后的和会上，官方领导人和非官方的宣传者们极力推崇的“大德国”的领土从周边地带取消了，这些土地都是德国在18世纪—19世纪的扩张活动中攫取的，这里对德国而言在思想上、情感上都是陌生的，因为它们和其他国家有着长期的文化联系，有些地区对邻国来说是重要的资源宝库或具有战略价值。

在德俄两国间宽阔地带存留的民族，尽管几个世纪里在政治上屈服于奥匈、俄国或土耳其，但是战后却成了独立的主权国家。同时，德国的海外殖民地被国际联盟的成员国所瓜分。因此，德国又恢复了原样，它的扩张将是全新的。

从经济方面来看，其东部放弃的部分落入了位于德国西部的商业利益者之手，这里是德国矿藏资源的主要产地，其和平时期的贸易和战争机器就是建立在这里的农田和矿藏之上的。其政权被盟国改造为共和政体，其社会意识显得和位于大西洋岸边的邻国并不冲突；其政治中心由东部向西部的转移使法国等国家确信这个国家已加入民主的阵营。显然，当时的期望过于乐观。为了繁荣经济，以工业为中心的西部德国不得不发展对外贸易，但是，试图恢复其对外协定的努力遭到了以前经济敌手和竞争者的反对，想阻止邻国繁荣的打算也给它自己招惹了麻烦。中欧的每一个国家都在努力发展一种没有德国参加的贸易体系（实质上这些新国家都是在德国所发展的经济基础上发展自己）。被排斥的处境唤起了德国重新获取的欲望，包括在欧洲丧失的贸易、海外殖民地、商船、海军等。

经济上的困境削弱了民主思想的传播，当共和政权为独裁政权所取代的时候，这种思想没有在广大民众中产生任何作用。德国叫嚷要在欧洲将领土重新扩张到1914年的边境线和要求归还殖民地与其要求在全球范围内恢复商业活动是同步的。

德国地缘政治学说的发端还具有重要的思想文化根源。和约不可能改变德意志意识形态的传统轨迹，其中最重要的支流就是德国的政治哲学。由于它长期与军事事务融合在一起，因而它比其他任何地方都更深刻地影响了公众，更迎合公众的口味。虽说军国主义和普鲁士的思想是一致的，而且普鲁士人创作了诸多有关军事事务和哲学的著作，但这绝非全都是普鲁士人所为。19 世纪流行于德国的浪漫主义就和普鲁士关于德国政治生活的领导权的臆断不谋而合，并构成大普鲁士主义“德国文化”的一部分。

普鲁士将军卡尔·冯·克劳塞维茨（Karl Von Clausewitz，1780—1831）关于战争及战争行为的著作可谓是经典之作，他的思想影响了所有从事军事事务的后来者，其中最引人注目的是本哈蒂（Friedrich Von Bernhardi，1849—1930），他负责总参谋部军事历史的研究，1931 年，他写了《德国与下次战争》(*Germany and the Next War*）一书，在这本书里，他为公众描绘了未来战争的过程。

与战争的特别研究相距不远的是历史学界，他们大声呼吁普鲁士和德国的民族平等权，其中主要代表是特莱希克（Heinrich Von Treitschke，1834—1896），他不仅在柏林大学拥有参与管理国家事务的一席之地，而且也是国会成员之一。这一领域另一位具有影响的人物是拉戈德（Paul de Largarde，1827—1891），他是职业的东方学专家、业余的政治家，在德意志运动兴起之前他就倡导大德意志思想，鼓吹一种民族信仰，力促镇压犹太人，纳粹领袖将之誉为“一个第三帝国的先锋”。

无论是战争的还是民族主义的目标，缺乏地图都是难以理解的。当他国的广大民众还只是刚刚意识到地图的重要性时，德国人对地图的兴趣已广为传播。1900 年，德国有名的地图出版商出版了一本泛德意志地图集，这本册子的中心部分是一组欧洲国家分布图及其分解部分。这些看上去似乎是正常的研究成果，但从标题来看，它又具有明显的宣传色彩，全图被称为“欧洲和近东的德国民族”，包

括奥匈和毗邻的波兰、意大利的分区图则称为“东部德国”。其他地图将德国出生的人口分配到了并非悬挂德国国旗的外国，一幅世界民族分布百分比图被冠以“德国民族分布图”之标题，“海外德国民族主要分布区域图”呈现的是南澳大利亚、布尔人——大不列颠人的南非、南智利、南巴西和美国的东北部的分解图。通过着重号显示了德国出生的人口的数量，其密度也通过不同于其他民族的彩色予以标明。同时，地图集还依据人口列出了“德国的大城市”，其中前八名包括维也纳、纽约、阿姆斯特丹、布鲁塞尔、芝加哥，地图集中列举的 53 个城市中就有 23 个不在德国领土内。

与此相联系，地理学家们的著作中对国家与土地的关系进行了正式阐述。拉策尔在《政治地理学》中强调区域（空间）(Raum) 和位置 (Lage) 是建立国家的基本要素，这些概念因其提出了下列观点而倍受重视：国家是一个有机体，它受制于生长与死亡法则①。地理学家们的著述大多包括怎样去进行领土扩张的建议，一战前德国总参谋部所制定的周详的军事计划与此不无关系。当然，战争似乎已证明这些计划是白费心机，和约的签订使德国要在欧洲扩张并夺取海外殖民地的希望化为泡影，那之后的几年里，思想文化领域显得无声无息，然而，向外扩张的欲火很快再次被一些思想所点燃，它们集中于两个概念：“种族”(folk) 和“空间”或“区域”(area)，这些概念成为德国发动战争的宣传武器中重要的组成部分。

“种族”概念臆断“亚利安种族”是优等民族（实际上是指德意志人），这对于军事失败后普遍存在自卑感的德国而言极具吸引力，它唤醒了民众的爱国激情。但是，这种情感早在一战之前就使德国民众狂热万分，而且即使如此还是未能取胜战争。因此，需要一个更明确的目标。

战后，关于领土扩张的论点发生了新的转向，即对于每一个德

① 参见本书第 2 章。

国期望吞并的地区都基于其特殊的自然环境来加以考虑，认为，通过对不同政治区域的不同资源的夺取，将使未来的扩充了的国家实现经济上的自给，而且，这个国家将为统治着大量劣等民族人口的德意志人提供充足的定居空间。因而，德国人有权享受所有地区的科技产品。

种族与空间理论的早期代表是普鲁士作家布鲁克（Moeller Van Bruck，1876—1925），他于1922年出版了《第三帝国》（*Das Dritte Reich*）一书，这本书的书名在11年后即1933年成了新纳粹国家的国名。它被看成是由德国统治者统治近千年的罗马帝国的复活，显然，种族概念的弦外之音是鼓吹领土的扩张，即为优等民族获取相应的生存空间。

与此如出一辙的一本书是由另一个普鲁士人汉斯·格里姆（Hans Grimm）于1926年出版的《缺乏空间的民族》（*Volk ohne Raum*），"该书的内容描述德国人民缺乏生存空间，如不对外扩张，则将被活活饿死"[①]。蹩脚的格里姆之所以在1926年后走红，就是因为他在那本书中极力鼓吹向欧洲和海外扩张领土范围。

关于种族和空间理论的集大成者非希特勒莫属了，相关内容将在后面其他部分中论述。

## 3.3　豪斯霍费尔与德国的地缘政治学派

"地缘政治学"的基本轮廓形成于泛德意志运动全盛时期至一战后这段时期。受19世纪末20世纪初某些政治地理学者论述的启迪，一些地理学者和政治学者在1914年—1918年战争前及期间为地理学和政治权力之间架设了新的桥梁，政府也因此巧妙地运用这些观点为国家政策服务。对于德国而言，地缘政治学的观点正合口味，但

① 金重远：《炮火中的文化》，第34页。

是，直至军事失败使国家主义和军国主义某种程度上遭到损伤后才引起足够重视。战后的新一代领导人将之视为重新点燃德国民众政治热情的极具价值的工具。

不少人认为“地缘政治学”一词是豪斯霍费尔的发明，这实际是一个误解，从更坏的意义上说，这是一个危险的认识，因为，这必然导致将地缘政治理论本身归于法西斯的意识形态阵营。豪斯霍费尔本人不仅没有发明“地缘政治学”一词，而且也没有对基于此的研究作出任何贡献，他只不过是地缘政治学说的狂热追随者而已，只因为他此后在这一领域的巨大“成就”才使他的名字与地缘政治学紧紧连在了一起。

豪斯霍费尔及其创立的德国地缘政治学派与两个人的名字密不可分，一个是鲁道夫·契伦，他是“地缘政治学”一词的首创者，又是将之系统化的主要研究者。1916 年，他提出了地缘政治学这一名词，并将之作为其政治学说体系的五个部分之一。他写道：“现在很容易将我们学科的实质界限与其他知识领域区分开来。其左翼不是地理学，而是地缘政治学；它的主题不是纯粹的土地，而通常只指与政治组织联系在一起的土地，即国土。其右翼也不是宪法，而是主权政治。其理论中心是操纵国家行为的政治上有组织的人群，即民族。”[①] 契伦的著作在被译成德文之前鲜为人知，介绍到德国后立即拥有了众多的读者。另一个是 H. J. 麦金德，他提出的“心脏地带”理论在两次世界大战期间没有引起英语国家足够的注意，但是，他著作中关于“枢纽地区”、权力、范围及 20 世纪初迅速变化的军事和政治世界的影响的思想，却影响到了豪斯霍费尔（Karl Haushofer，1896—1946）及“德国的地缘政治学派”。豪斯霍费尔不止一次地承认他受益于麦金德，他至少有四次把麦金德的《力量的自然位置》的地图复制并刊印在《地缘政治学》期刊上，他把麦金

① Derwent Whittlesey：*German Strategy of World Conquest*，P. 71.

德 1904 年的论文描述为“所有地理学世界观中最伟大的”。至于麦金德的理论对豪斯霍费尔及德国政治的影响，麦金德本人是极力反对过于夸大的，他对于认为他的理论“帮助纳粹军国主义奠定基础”的说法极为不快，他争辩说：“……不管豪斯霍费尔从我的书中引用些什么，都是从我 40 年前在英国皇家地理学会的一次演讲中摘录下来的，远远在有任何纳粹政党问题之前（1944 年）。”[①]

豪斯霍费尔对地缘政治学的发展和“德国地缘政治学派”的创立，在地缘政治学的发展史上产生了划时代的影响，他继承了契伦的思想，热衷于地缘政治学的概念及其运用，并试图在拉策尔、契伦和麦金德理论的基础上寻求一种解释国家增长的理论。为了使地缘政治学在德国成为一门科学，他不得不寻找能解释和为一个国家的固有增长进行辩护的“法则”，他及其追随者们甚至还创造一些词汇来为其科学服务，如：一个有机体（即国家）需要生存空间（Lebensraum）、维护权力（Grossmachte）、划分军事边界（Wehrgrenze）、划分种族上同源的人口（Kultur）以及经济自给（Autarky）。豪斯霍费尔的弟子之一奥托·毛尔（Otto Maul）在 1936 年概括地道出了德国地缘政治学的概念：“地缘政治学将自身与国家紧紧联系在一起，它不是作为一个静态概念，而是作为一个动态概念。地缘政治学研究国家与环境的初始关系——其空间——以及试图解决源于空间关系的所有问题……当政治地理学仅仅考证一个国家的空间条件时，地缘政治学则探讨一个国家的空间需求。将地理学融于具有空间意识的政治学中后，地缘政治学致力于对未来问题的研究。一个国家有空间需求吗？如果没有，它如何适应地理条件而存在下去？会发生何种变化趋向呢？解决这些问题的程度将决定一个国家的民族、经济结构和影响对外关系……地缘政治学是估量

① ［英］麦金德：《历史的地理枢纽》，第 14～15 页。

和评价一种既定形势的原则，并试图借助其结论指导政治实践。"[①]

在豪斯霍费尔看来，"地缘政治学的目的是为军国主义的帝国提供系统的地理研究"[②]。他充分考证了日本是如何利用边界扩张来变成一个强国的，认为一个国家的空间扩张确实是必须的，也是合理的。而且，他还注意到英帝国的成功并不是在欧亚中心，而是在边缘地区。他对于德国在第一次世界大战中的失败大失所望，并将这种失败归咎于国家领导人和军界领袖缺乏战略及军事计划，在他看来，德国只要控制了欧亚大陆心脏并同俄国结盟，就会成为一个强国。这实际是受到了麦金德理论的启示。

为了服务于德国的扩张主义政策，豪斯霍费尔不仅采用了地缘政治学一词，而且还在德国的理论研究领域争得了合法的席位，他在慕尼黑创立了地缘政治研究所，在这里，地缘政治学成了一些著名地理学家全心研究的课题。他还于 1924 年创办了《地缘政治学杂志》(*Zeitschrift fiir Geopolitik*)（月刊）。此后，地缘政治研究所和《地缘政治学杂志》就成了纳粹德国扩张的首要支持者和倡导者，"把国家力量同各种地理因素联系起来，收集有关的地理资料为纳粹的扩张与侵略提供宣传的理论依据"[③] 也就成了豪斯霍费尔及其追随者们的主要目标。

概括起来，以豪斯霍费尔为代表的"德国地缘政治学派"主要包括这样几种论点：(1) 国家经济自给自足。这一点在希特勒对德国及未来世界秩序的设想中也有明确证实，尽管他从未使用过这一词。(2) 生存空间。指足以供养一国人口的土地面积和自然资源。生

① Michael Pacione (ed): *Progress In Political Geography*. P. 49.

② [美] 詹姆斯·多尔蒂、小罗伯特·普法尔茨格拉夫著，邵文光译：《争论中的国际关系理论》，第 75 页。

③ [美] 詹姆斯·多尔蒂、小罗伯特·普法尔茨格拉夫著，邵文光译：《争论中的国际关系理论》，第 75 页。

存空间在德国的解释是："一个国家为贸易和移民而必须进行的领土、尤其是额外领土的扩张。"[①] 希特勒用以鼓动德国人民追随他去征服生存空间的主要论据是：德国的人口过剩，必须依靠它国，如果满足于现状，那么人口过剩必将导致经济危机和饥荒。他在《我的奋斗》一书中这样写道："只有在这个地球上有足够大的空间，才能保证一个民族的生存自由……必须努力消灭我国人口与面积之间的不平衡状态……为德国人民取得他们有权享有的土地……"[②] (3) 泛地区。指替代狭隘的国家疆界的广阔地理区域，这实际上是对霸权主义的公开颂扬，而德国应该强大到接管泛美和泛亚地区。(4) 海权和陆权。他们提出了如下设想：欧亚——非洲大陆人口最多，拥有强大的陆地与海上力量，具有统治世界的潜力。豪斯霍费尔认为，相对于俄国而言，德国同样享有控制世界权力"枢纽"地区的有利条件，而且比俄国更易接近海洋，因此，德国应追求双重的世界权力，既控制心脏地带，又夺取海上霸权，前者需要的是与俄国的合作，因为德国要夺取的生存空间——额外的土地只能在欧洲而不可能在海外（自给自足的经济体制必须的），那么，俄国的土地自然就装在希特勒的脑子中了[③]；而后者则是豪斯霍费尔倡导的逐步扩充德国势力范围的第二步，由心脏地带的控制向外延伸，便是统治包括日、英等海权国家在内的"内新月地区"，尔后进一步夺取"外新月地区"，即全球霸权。

普遍观点倾向于把豪斯霍费尔的思想与希特勒的扩张主义政策紧紧联系在一起，认为（也许是错误的）是他对希特勒的征服战略

---

① Hans Staudinger: *The Inner Nazi*, Louisiana State University press, 1981, P. 31. Footnote.

② 转引自［美］威廉·夏伊勒：《第三帝国的兴亡》，世界知识出版社，1979，第121页。

③ Hans Staudinger: *The Inner Nazi*, P. 37.

作出了重要贡献，甚至臆断希特勒在写《我的奋斗》一书时，豪斯霍费尔参加了所谓的“智囊团”；加上法西斯德国正是利用“生存空间”概念和其他地缘政治学思想为其扩张政策服务的，所以，在很长一段时间里，美国及其他国家的不少人都曾得出这样的结论：“地理学与政治学的任何结合都必将导致战争和征服。”① 因之不耻于使用地缘政治学一词。但是，迄今为止人们对于豪斯霍费尔对希特勒和纳粹的战略究竟有多少直接影响仍存在不少争议，也没有证据能证实豪斯霍费尔的思想与《我的奋斗》一书存在直接联系。无疑，希特勒知道豪斯霍费尔的研究，但如果因此而相信希特勒的“生存空间”概念就是豪斯霍费尔的空间概念（Raum），那是错误的。地缘政治学派认为地理因素（地形、气候、原材料等）是一个国家兴衰的决定性因素，一个国家的地理因素，尤其是地理位置决定了其外交政策；但在希特勒那里，决定一个国家命运的不是自然环境，而是种族，“生存空间”概念与种族问题密切相关。豪斯霍费尔也经常运用“生存空间”一词，但它纯粹是一种地理概念，完全忽视了种族这一决定因素的影响。如果说希特勒的思想受到了豪斯霍费尔思想的影响的话，应该说是豪斯霍费尔对拉策尔理论的推崇启发了希特勒，“是拉策尔操纵了希特勒的笔”②，正是这个老地缘政治学者影响了希特勒的种族学说。有学者在评论拉策尔的早期论述时就曾这样写道：“拉策尔的论述离‘生存空间’的概念，即优等民族可以侵犯劣等民族来扩展它的生存空间的概念，只是一步之遥了”③。（不过，拉策尔自己从未阐述过优等民族与劣等民族的思想。）希特勒的确是很好地利用了地缘政治研究所，并将之当成是为国家征服战略

---

① *International Encyclopedia of Social Sciences*. (5—6), P. 121.

② Hans Staudinger: *The Inner Nazi*, P. 52.

③ Preston E. James and Geoffrey J. Martin: *All Possible World: A History of Geographical Ideas*. P. 170.

提供有价值资料的若干机构之一，但这也决不意味着其外交政策或战略就是基于豪斯霍费尔所创立的机构[1]。

总之，这些争论众说纷纭，莫衷一是。不过，有一点还是肯定的，即他的思想——关于宣传地图的运用以及新闻工作者和学者的训练无疑都对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德国的政治和军事战略作出了重大贡献。不少学者认为他对于“将一门伪科学合理运用于纳粹的扩张政策”负有主要责任[2]。哈林（Haring）和诺里斯（Noris）在评论“德国地缘政治学流派”时就曾经指出：“把国家和国际权力的地理基础分析变成了一门伪科学；早期理论操纵和助长了德国的民族主义，并使德国边界扩张合理化。”[3]格拉斯纳（Classner）和德伯里杰（De Blij）在探讨地缘政治学的起源时，又是这样概述豪斯霍费尔的观点的：“他及其追随者们都致力于拉策尔的有机国家理论，契伦的进一步研究及马汉和麦金德的地缘战略原则，再加进德国沙文主义故意的模棱两可和神秘主义的内容，就为德国扩张主义政策提供了理论依据……，”“正是因为这一学派和杂志在第一次世界大战中战败了的德国显得十分重要，所以，地缘政治学观点和思想才最终影响了决策。”[4]

第二次世界大战中德国的失败，也标志着“德国地缘政治学流派”所倡导的理论和战略的失败。地缘政治学思想和战略原则在德国的运用在地缘政治学的发展史上留下了极不光彩的一页，但是，这又并不是地缘政治学理论本身的错误，而是因为一个国家的决策者们利用了这些思想为其现实政策服务，所以，地缘政治学一词被其德国支持者们运用的终结，并不意味着关于军事战略思想方面地缘

① Hans Standinger：*The Inner Nazi*，PP. 51～52.

② Michael Pacione（ed）：*Progress In Political Geography*，P. 44.

③ Michael Pacione（ed）：*Progress In Political Geography*，P. 44.

④ Michael Pacione（ed）：*Progress In Political Geography*，P. 44.

政治学观点的终结。第二次世界大战后，这种思想重新在主要大国的外交战略制定中占据了十分重要的地位。

## 3.4 德国地缘政治学的理论核心

德国人的行为与他们的心理状态是密不可分的，历史上积淀而成的基于地理因素的特殊文化心态表现为，他们对现状不安，感到一种惶恐，平衡此种心态的重要手段就是不断向外侵略扩张，加上民族主义的特殊内涵，使这个民族显现出极度的狂热："德国、德国，统治世界"、"德国、德国，高于一切"的歌词和口号，成为德国人常用的狂言妄语[1]。第一次世界大战的失败虽暂时阻止了德国的扩张势头，但正是因为此次战争后强加于德国的屈辱性和约，使德国人的民族自尊心受到了严重伤害，民族主义情绪表露为对现实的愤懑，民族复仇心大大增强。可以说，第二次世界大战前，德国的地缘政治学说虽受契伦、拉策尔、麦金德等人论述的影响，却主要表现了德国自身的特色内容，对自己国家脆弱性的自卑认识和要求向外扩张的两面心理构成了德国地缘政治理论的相应内涵。

第一，国家是一个有机体。

地缘政治学说的基本假定就是认为国家是一个由一定土地和人口构成的有机体，这一概念在19世纪由生物学领域进入地理学领域还得归功于拉策尔，他的《政治地理学》一书的第一章就是"固定于土地的作为有机体的国家"。他写道：

"人类国家是一种极不完善的有机体，因为其成员保持着一种即使是在低等动、植物中也不会长久存在的独立性，我们称之为国家的由人组成的不完善的有机体之所以取得如此重大、举世无双的成

---

① 参见娄委辛编：《现代德国政治外交史》，中华书局印行，1935年，第2页。

就，就在于它是一种能动的和具有精神的有机体，思想上的观念联系在各个体之间架起了一座桥梁，这一过程确实是在生物学上无法比拟的，何以在精神上操纵和引导一个国家有机体与其有机体世界是截然不同的。

"将国家与其他高等有机体的对比毫无结果，诸多将国家视为有机体的科学尝试未取得任何成果，主要原因就在于在人的联合与一种生物有机体结构之间的分析是有限的，更准确地说，在人类国家和一种生物学有机体之间再三对比的结构状况截然不同。"①

拉策尔的观点为契伦所沿用，尽管他并不理解这一自然科学的公式，但他还是运用在他的理论观点中了。他指出：(国家）是一种生命形式，一种所有生命形式中最伟大的生命形式，因此，他们将成为生物政治学研究的主题，此种研究旨在揭示其发展的法则。"生长的意志、生活的意志、获取权力的意志，决定着国家的生命"②。

显而易见，是契伦的观点为德国人所广泛吸收，即国家是一种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的必然遵循某些法则的有机体。

第二，有机体必须进行扩张。

将国家视为一个有机体，必然的推理就是它需要生长，这为领土扩张者们提供了最合适的借口。在他们看来，"大国"不是一个数学概念，而是一个动力学概念，也不是一个文化概念，而是一个生理学概念。它拥有向外扩张的意志，没有一个大国真正处于"饱和"状态，大国即是"扩张的国家"。一位日本地缘政治学者概括了这一点：(1) 对领土的权利取决于拥有足以夺取和保持它的武力。(2) 一个国家的生存空间的绝对极限并不存在。(3) 出于其生命的本能追求，国家必须向其领土之外进行扩展，即扩张其生存空间。(4) 这种生存空间的扩张并非等同于通过武力政治夺取，它可以通

① 姜交辛编：《现代德国政治外交史》，第 90～91 页。

② 姜交辛编：《现代德国政治外交史》，第 91 页。

过不同区域之间的政治和经济同盟来实现。(5) 新的国际法应确认生存空间扩张的必要性，它包括各种不同的领土范围，使它们共存和共荣，因此而建立“新铁序”。

由此可见，一些人的扩张要以另一些人的丧失为代价，更准确的结论是，只有强权国家有权扩张，而小国注定是要消灭的。因为它的狭小的面积和脆弱正是衰落的标志。大国是所有国家中自然形成的“贵族”，它们通过自身的权力而崛起并将日益壮大，拥有“不言而喻的特权”，所有有生命力的大国都居于有限的主权区域内，它们受制于无上的命令。要通过殖民、同盟乃至征服来扩大自身的区域，历史上的英国是这样，接着就轮到德国和日本了。

除此以外，“空间法则”的运作还源于生活在领土之上的种族类型，有些种族满足于一定空间的生活，而另一些种族则不然。

在这一点上，拉策尔的论点影响了契伦，而契伦又操纵了豪斯霍费尔和德国的地缘政治学派。拉策尔只通过短短的一句话即道出了国家这一有机体最重要的法则：“国家的所有发展都遵循从较狭窄的空间到更宽广的空间这一法则。”即：国家具有生长和扩张的冲动。受他的影响，契伦直言不讳于殖民的意义。当德国的政治地理学让位于地缘政治学说时，下列论点是不容忽视的：一个伟大的民族必须冲破没有新鲜空气的人口拥挤的狭窄空间，如果全球的生存空间还没有向最优秀的民族开放的话，那么，他们就不得不打破狭窄的生存空间去占领那些还未开发的地区。而豪斯霍费尔及其追随者们则从这样几个方面阐发了自己的观点：(1) 现代“大国”的典型表现就是：祖国及其在其他大陆附属殖民国之间的联合体。(2) 地缘政治学有义务保护对于土地的权利，当然是最广泛意义上的土地，不仅局限于第三帝国疆域内的土地，而且还包括对更广阔的土地的权利。(3) 在争取公正合理的地球生活空间和呼吸空间的分配斗争中，地缘政治学是最有力的武器之一。

第三，战争是允许的。

紧接着的推论即是，要扩张，就有战争或至少是战争威胁。对于大国而言，战争是必需的手段。契伦断定争夺空间的战争是历史的主题。这一点绝对影响了包括德国地缘政治学者在内的大多数地缘政治学者，他们都念念不忘"为空间而战"。我们可概括出这样一些观点：(1) 国家有机体现象即表现为无休止的战争和厮杀。对其他空间的要求必须基于这一自然法则——拥有武器的基本权。(2)位于一定区域内的空间要添加到一个国家中去唯有以牺牲他国为前提。(3) 每一个国家在世界上拥有多少权利是它所具有的权力所赋予的。较强大的国家将在未来世界上占据统治地位，边界是战争的结果，而不是合法的分界线。

在德国，全体国民中军国主义思想都得到了灌输，尤其是在年轻人中，他们把战争的概念放在对青年人教育和训练的中心位置，在全体国民中唤醒和推崇英雄意识是首要的任务。同时，在德国人的字典里，世界时钟所摆动的不是享受生活的音律，而是为生活而战斗，没有一种哲学或社会主义思想可以改变自然界残酷无情的事实。

第四，以极权主义为后盾。

要想成功地进行战争，除了武装的先决条件外，经济上的自给自足也是必不可少的因素。每个国家都必须能依靠自身的资源生存下去，自给自足不是别的什么含义，只不过是"国家的独立存在性"，也就是说，为生存而进行的战斗要求经济的边界线不可超越防御的边界线，自给自足截然不同于基于全球贸易的世界组织，因为贸易容易导致单一经营，如果一个地区的要求，特别是其生存的大部分依靠于外部世界，那么，它将在战争中明显处于不利地位。

经济的运行必须是全局性的，国家应该对其控制之下的区域进行统筹安排，基于此种认识，法西斯德国建立了最高权威和绝对负责的机构来决定土地的使用，包括为公众服务、政治防御、定居和运输的目的。德国在未来将成为欧洲大陆地区最大的商业和运输国，出入欧洲东南部和中立的西部及斯堪的纳维亚地区国家的货物和旅

客运输大都要经由德国，德国必须寻求用自己的运输工具来解决这些问题。由此可见，德国的自给自足至少是想要兼并俄国以西的所有欧洲大陆地区。简言之，极权主义和较小空间里的自给自足，成为与现存的最强大和资源最丰富的国家进行争斗的最有力的手段之一。

第五，以轴心国同盟为手段。

从一定意义上讲，轴心国同盟只不过是连续了种族区域的范围而已。有些作者认为，日耳曼种族遍及北欧，并在大不列颠、西班牙、北非和诺曼底海岸地区建立了边缘王国，日耳曼居民的协约核心贯穿欧洲中心；而还有些作者把欧洲看成是沿东西轴心而建立的大厦。在德国的理论中，轴心包括两层含义：一是在欧亚两洲之间沿东西向而形成的一条文化、经济和人口轴心；二是南北轴心，它把中北欧与南部欧洲之间的人口密集区联系起来（即我们所熟知的罗马——柏林轴心）。在这种交叉轴心体系中，如果沿赫尔辛基——奥德塞线建立一条长久的分界线，那么东西轴心将失去其重要性，而欧洲的南北轴心因此将日益明显化。在当代世界，只有大国有能力改变轴心的方向。究竟如何改变呢？至今还没有人进行完整的回答。

综上所述，德国的地缘政治学说的核心内容都是特定历史条件下所提炼出来的某些特定的东西。关于任何一个政治单元的生存与特性都必然取决于位置与区域的论述并不能完全解释德国的失败这一事实；地缘政治学者们从生物学中援引出的某些原则与在自然环境中国家行为的事实也大相径庭，实质上，他们只不过是删除了生物政治学法则中某些与德国扩张愿望不相容的部分；他们虽宣称领土扩张是不可避免的，但并没有解释一个国家何以能无限期地扩张下去；他们认识到了自给自足对一个处于战争状态中的国家来说事关全局，但忽略了一个起码的事实：全球没有一个国家或地区能够拥有全部所需资源；他们鼓吹陆权反对海权，但同时又与一个正与陆权国家中国交战并在俄国这个陆权国家挑起战争的海权国家日本

结盟；实质上，他们只相信"邻国间相互仇视的法则"。

## 3.5 德国的地缘政治学说与第三帝国的外交政策

在前面的一些部分中已经谈到过与此相关的某些内容，在此，将作进一步的论述。论及德国的地缘政治学派与第三帝国现实的外交行为之间的关系，追溯一下纳粹党的领袖人物与豪斯霍费尔的关系是十分重要的，因为这一点关系到地缘政治学的声誉问题，在很大的程度上，正是由于在这一问题上存在的各种误解导致了对地缘政治学的不恰当的解释。"在纳粹党内所有领导成员中，鲁道夫·赫斯(Rudolph Hess)与卡尔·豪斯霍费尔关系最密切。"[①]早在纳粹党成立之前，赫斯与豪斯霍费尔之间的这种关系就已建立了[②]，直到第一次世界大战后，当豪斯霍费尔教授政治地理学和军事科学时，赫斯才受到契伦思想的熏陶，在这些思想中，首当其冲的当然是关于国家是生物有机体的解释，德国地缘政治学派的诸多观点都深深地影响了赫斯。1923年11月8日，赫斯卷入慕尼黑啤酒馆暴动后，在豪斯霍费尔的帮助下，他成功地逃到了奥地利，这段经历是赫斯终身难忘的。

在赫斯后来被捕与希特勒同被囚禁在兰支堡(Landsberg)监狱时，豪斯霍费尔是到监狱的常客，有人正是因为这段历史而断定希特勒被传输了地缘政治学的，指出："豪斯霍费尔和希特勒之间的关系是通过鲁道夫·赫斯开始的……赫斯狂热地追随希特勒之后以及当1923年啤酒馆暴动失败后，他及纳粹党档案都被豪斯霍费尔隐藏

① G. R. Sloan: *Geopolitics in United States Strategic Policy, 1890—1987*, P. 33. Wheatsheaf Books Ltd. 1988.

② 在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赫斯是豪斯霍费尔的幕僚。

在沿巴伐利亚山祖籍的家中，在随后的几个月中，豪斯霍费尔经常探访狱中的希特勒，此时，希特勒正向赫斯口授《我的奋斗》。"[①]不少研究希特勒和豪斯霍费尔的学者都断言，《我的奋斗》一书中包含了豪斯霍费尔的思想内容，特别是关于对外关系方面的内容，有人甚至认为《我的奋斗》一书的第14章就是豪斯霍费尔与希特勒在兰支堡会晤的直接结果，希特勒关于生存空间的理解也是源于豪斯霍费尔的，相当多的地缘政治学的观点融合到了希特勒的主要论点——民族主义中去了。

事实上，这些论断包含诸多的误解。赫斯的妻子谈到："豪斯霍费尔平生仅见过希特勒三次，当我丈夫和希特勒在兰支堡监狱时，豪斯霍费尔仅探视了我的丈夫。希特勒在《我的奋斗》一书中关于地缘政治的思想直接源于拉策尔。豪斯霍费尔教授从未影响他（希特勒——作者）。"[②]包括豪斯霍费尔的儿子在内的一些人更倾向于希特勒的地缘政治观点部分来自赫斯的影响，认为希特勒所利用的某些地缘政治思想源于希特勒同赫斯的多次会面[③]。简而言之，豪斯霍费尔主义与希特勒主义之间的不同点不是术语与措词的问题，而是将地缘政治学的一般概念运用于现实战略计划的问题。德国地缘政治学派的某些术语确实被用于纳粹党的政治目标与需求中了。豪斯霍费尔不可能去撰写、修改或评论《我的奋斗》一书，但正是他所发明的公式和巧妙的措词被希特勒所援用了，或在后来运用于纳粹政策之中了。

随着法西斯党的兴起，豪斯霍费尔本人及德国的地缘政治学说

---

① Derwent whittlesey: *German Strategy of World Conquest*, P. 76.

② G. R. Sloan: *Geopolitics in United States Strategic Policy*, 1890—1987, P. 53.

③ G. R. Sloan: *Geopolitics in United States Strategic Policy*, 1890—1987, P. 53.

的确得到了纳粹政权的特别恩惠[1]。但是，德国地缘政治学者与纳粹党之间的对抗也是不可否认的，尽管他们对国际政治的理解是相似的，他们之间的紧张关系却也毫不隐晦。这主要是源于法西斯党的领袖成员们对德国地缘政治学派所创立的政治分析体系缺乏理解。豪斯霍费尔在二战结束后对于此种关系作了如下解释："在第三帝国，执政党缺乏对地缘政治学说的任何官方接近和理解，因而，他们只不过选择和错误地解释了他们并不理解的时髦口号而已。只有鲁道夫·赫斯和外交事务部长对地缘政治学说有些微了解，但他们又未能成功地运用它。"[2]

我们似乎可以用这样几句话来概括一下德国的地缘政治学派与法西斯政权或希特勒之间的关系：一方面，豪斯霍费尔与纳粹党的主要成员之间关系甚密，1933 年纳粹党当权后，地缘政治学及其支流广为流传，豪斯霍费尔个人职务不断晋升；另一方面，地缘政治学思想在希特勒的理论中是有限的和通过精选的。

以此为前提，我们再来从不同侧面分析一下地缘政治学说与法西斯政权外交政策之间的关系。德国的地缘政治学说究竟在多大程度上充当了第三帝国外交政策指导原则的角色，存在诸多不同推测和解释。有人坚持认为在希特勒的背后站着一个出谋划策的豪斯霍费尔，亦即豪斯霍费尔是德国外交政策的幕后操纵者。不过，更多的人倾向于，第三帝国的外交政策的制定者们有选择地运用了德国地缘政治学说中的目标和思想。

豪斯霍费尔与希特勒之间最重要的相似点在于对"生存空间"

① 1933 年，豪斯霍费尔被聘为慕尼黑大学的科学院院长、地缘政治学教授、地理学名誉教授；1934 年，他当选德国中央研究院主席，1938 年又当选为专门负责德国海外定居者事务的人民组织的主席。

② G. R. Sloan：*Geopolitics in United States Strategic Policy*，1890—1987，PP. 34～35.

(Lebensraum)的论证。他们都认为德国是一个单一民族行为体，具有与其他欧洲国家不同的独特命运，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的天意决定它将吞并周边的弱小国家，"作为一个国家，德国政权将包括所有德意志人，其目标不仅是要把我们的人民最有价值的部分聚集在一起和扶植他们，而且要引导他们逐步和确实夺取世界的统治地位"①。

豪斯霍费尔与希特勒的另一个相似之处在于，他们对于天然边界与连续的地理扩张思想之间的关系有同样的解释，认为民族国家的外交政策必须捍卫融入国家的种族的生存，必须在民族的人口与增长、土地的质量与数量两方面的关系间确立一种健康的、有活力的、自然的关系。地球上只有一个足够大的空间能确保一个民族的自由生存。

他们都认为德国是一个具有自身生活范围和个性的国家，它不得不为生存而扩张其地理区域。双方都坚持，某一地理区域边界的变更和政治权限的变化构成了政治目标，国家边界是由人为形成的，其变更也是人为的，"在地球上，无论是哪一个国家，都不会凭藉于上帝的赐予而获得尺寸的领土的占领。一个国家的疆界的决定的变更，完全是由人力造成的"②。因此，德国要么成为一个世界强国，要么不复存在。

豪斯霍费尔与希特勒的不同之处是我们要研究的另一个重要方面。尽管他们对德国的地缘地位分析相同，即德国处在西欧海权国家和东欧陆权国家（主要是俄国）之间的缓冲地带，然而，他们以此为前提的结盟主张却大相径庭，这在对俄态度上表现得最为明显。从1913年起，豪斯霍费尔一直建议建立德、俄、日利益同盟，形成一条所谓"独立于盎格鲁—撒克逊之外的横跨大陆的战线"；与此相

① A. Hitler: *Mein Kampf*, London, Hurst and Blackett, 1939, P. 334.

② [德] 希特勒：《我的奋斗》，西藏文艺出版社，1994年，第258页。

反，希特勒把同俄国的任何结盟都视为权宜之计，他把同盟与战争紧紧联系在一起，认为如果不包含战争计划的任何结盟都是无意义和没有价值的。可见，豪斯霍费尔认为德国应同其他陆权国家建立同盟，并以此作为与占优势地位的海权国家英国对抗的主要途径；而希特勒则主张同英国、意大利结盟，在他眼里，法国是对德国构成直接威胁的国家，他指出："防止德国变成一个巩固的强国，去维持着德国内部各小邦的均势而没有统一的政府，这是法国的一种夙愿，他要把莱茵河的左岸占领，就是要保持欧洲霸权的一种铁证……我们必须要绝对地认清，法国和德国是有着不共戴天之仇的……法国绝对不愿意德国做一个强国，这是两国的根本不同点……照这样看起来，只有英国和意大利可以做我们的同盟国。"①

从理论上而言，豪斯霍费尔和希特勒都认为国家作为有机行为体，其生长取决于其吞并周边弱小有机体的能力，然而，在将地缘政治学的概念运用于现实的战略中时，分歧明显存在。30 年代中期德国地缘政治学说对纳粹政权的外交政策产生影响的最明显例证，要算德、意、日签订的《反共产国际协定》了，豪斯霍费尔对这一条约的签订起了重要作用②。但是，这绝非意味着纳粹的政策决策者们已向建立"独立于盎格鲁—撒克逊之外的横跨大陆的战线"迈出了第一步。除了希特勒在《我的奋斗》中对日本的批评态度外，当时的现实关系格局是令人困惑的，豪斯霍费尔地缘政治学说中主张的德、俄、日联盟无论如何不能等同于德、日、意同盟，德、日之间的同盟在这两种关系中也是截然相反的。更为甚者，日本对苏联的敌视态度使豪斯霍费尔无能为力，俄、日敌视关系与俄、德协定

---

① ［德］希特勒：《我的奋斗》，第 246 页。

② 豪斯霍费尔在其著作中和个人介入政府决策时，力主德、日结成同盟，他相信，德国向英国霸权挑战时，日本必是朋友，日、俄和中欧帝国联合起来的力量坚不可摧。

所确立的俄、德关系是难以调和的。事情很清楚，俄国要求德国不要继续与日为伍，德国应停止支持日本的侵略。

捷克斯洛伐克危机及由此而来的慕尼黑协定也是纳粹外交政策制定者们有选择地运用德国地缘政治学说中某些思想的又一例证，豪斯霍费尔及其长子奥尔布雷克特·豪斯霍费尔都参加了谈判，他们把慕尼黑协定看成是右翼反对纳粹的一次胜利，豪斯霍费尔对慕尼黑协定的贡献就在于他确定了一条分界线，表明了德国人在东欧这一部分定居的局限性。与此相反，纳粹党上层视协定为权宜之计，英、法谈判代表刚一离开会议室，希特勒就急不可待地表露了这一心态。

1939 年 8 月 23 日，苏、德条约签订，这一事件是德国地缘政治学说被解释为纳粹外交政策战略组成部分的最好证明，外界舆论普遍认为这是豪斯霍费尔影响纳粹决策的证据，因为这是他全部设想的第一步，首先建立陆权国家的同盟，再逐步确立"独立于盎格鲁—撒克逊之外的横跨大陆的战线"，苏德条约签订后，就使德国能够应付海权国家（包括英国）的挑战。豪斯霍费尔本人在《地缘政治学杂志》上也撰文指出，这是一次历史性的重大胜利，是朝其所设想的征服世界的蓝图迈进了一大步。

同时，在对日关系上，纳粹德国的政策中带有极其浓厚的豪斯霍费尔的地缘政治学说色彩，追求德、日、俄三者的同盟，即建立"核心阵线"是豪斯霍费尔及其地缘政治学派最重要的目标，"日本是在很多年里萦绕在脑海中的一个最为有趣的地理政治范例"[1]。在苏、德条约签订后，剩下的问题就是消除日本对俄国的敌视心理和俄国人对德、日同盟的恐惧心理，为此，豪斯霍费尔建议强调俄、日之间地缘政治因素的相似性，不要过多重视意识形态的差异，对于

① Geoffrey Parker: *Western Geopolitical Thought in the Twentieth Century*, P. 57.

日本在东亚的新地位和横跨欧亚的俄国的强硬政策都要持理解态度，轴心力量的存在是绝对必要的，而其中最关键的是多一点地缘政治的分析而少一点意识形态的思考。希特勒虽支持这一设想，但从其当时的目标——使正在进行的战争走向胜利这一点来看，他更赞成冯·里宾特洛甫(Von Ribbentrop)的思想，即建立一个从马德里到东京的大陆力量集团，以此迫使英国投降。这一设想在不短的时间里操纵了希特勒及其外交部的政策行为，1940年9月27日，德、意、日三国军事同盟协定的签订就是这种影响的结果。在这一点上，虽不能直接下结论说豪斯霍费尔的地缘政治学说影响了希特勒，但他们基于对德国命运的共同认识——它必须进行不断的地理扩张，看上去其相似性是不言自明的。其中的差异性源于对地缘政治学概念的运用。当日本还在积极促成大陆力量集团时，希特勒却在为进攻苏俄作准备。众所周知，1941年4月13日，豪斯霍费尔期盼已久的苏、日协定签订了[1]，但仅仅两个月后，希特勒就侵入了苏联。希特勒再次提供了其战略与地缘政治学之间的关系是有限的和模糊的证据。

德国入侵苏联事件在所有人看来都是希特勒的一次冒险行为，德国所处的地理位置决定了它不能与陆权国家苏联和海权国家英国同时对抗。面对如此局面，豪斯霍费尔父子忧心如焚，当时唯一补救的方法就是与英国修好。因此，他们父子双双卷入了为赫斯于1941年5月10日飞往英伦同英国谈判的准备活动中，当然，这并非就说明赫斯的行动就与地缘政治学说联系在一起，不管是在赫斯与豪斯霍费尔之间，还是在希特勒与豪斯霍费尔之间，理论与现实战略之间的鸿沟是永远无法弥合的。即使是在理论方面，希特勒虽借用了地缘政治学中的不少概念和思想，但在他的词典中，解释也是

① 豪斯霍费尔认为这将使日本放手在太平洋地区采取行动，这种地缘政治的可能性不仅对日、俄至关重要，对中欧国家而言也具有战略意义。

不尽相同的。

在希特勒的世界观中，种族理论和生存空间理论可谓是两大支柱。“种族理论是纳粹极端民族主义的重要思想根源和精神支柱，极端民族主义则是种族主义理论在政治上的具体体现”①。希特勒认为，决定一个国家命运的是种族，他在《我的奋斗》一书中专门在第 11 章中阐述了他的种族理论观，概括起来，主要包括这几个方面：

第一，亚利安人是地球上最高等的种族，应主宰世界，犹太人是劣等民族，应遭灭绝。“我们在世界上所赞美的一切——科学、艺术、工艺和发明——不过是少数民族的创造品，推究他的根源或许出之于某一种族。全部的文化，完全靠了这少数民族而存在的。……假如我们把人类分为文化的创造者、保持者和破坏者三种，那么，唯有亚利安人种方能够资格做第一种的代表”②。作为亚利安人后代的德意志人是高等人类，是上苍赋予“主宰权力”的种族，因而“应该主宰世界”。“犹太人正和亚利安人相反”，“犹太人的智力，发展已历几千年，到了现在犹太人才以狡黠著称……但是，他们的智力并不是他们自身肆达的结果，是由于外族教育的功效。犹太人本身，绝无什么文化可言，所以他们精神活动的基础，常常是受他族所供给的……犹太人现在所有的文化，大都是他民族的东西，而在犹太人手中败坏了”③。在这一点上，希特勒深受尼采的影响，尼采极其厌恶犹太人，他说：“犹太人是世上最劣民族，这与基督教关于人的全部罪恶和无耻的学说恰恰产生于犹太人之中这一史实完全吻合，与他们将此推卸给他人的史实完全吻合。”④希特勒不仅论述了犹太民族在文化上与其他民族的格

① 朱庭光主编：《法西斯新论》，重庆出版社，1991 年，第 266 页。
② ［德］希特勒：《我的奋斗》，第 118 页。
③ ［德］希特勒：《我的奋斗》，第 121～122 页。
④ ［德］桑德福斯著，周新建、黄敬甫译：《尼采与希特勒》，陕西人民出版社，1988 年，第 60 页。

格不人，而且还用相当篇幅对比了亚利安游牧民族与犹太人非游牧民族之间的差异，犹太人“是异族的寄生虫”，他们“对于他族，没有丝毫的贡献”，应该将其淘汰和灭绝。

第二，推行种族“培育”和“淘汰”，以保持种族的“纯度”与“优质”。希特勒认为：“亚利安人既放弃了他们纯粹的血统，那么所有的养尊处优的权利也就跟着消失了。亚利安人于是就一天一天地堕落，他们陷于种族的混杂之中，他们创造文化的能力也跟着慢慢地消失了……这就是各种文明和帝国所以崩溃的原因。”[①] 德意志民族为进行征服和扩张，必须保持自身的纯种力量，“须从日耳曼的民族之中，选择原有的优秀分子而加以维护，更须慢慢地使它取得统治的最高地位”。“如果文化较高的种族能够保留他们固有的品质的话，那么，那些杂种迟早必致衰亡。如果说文化比较高的种族，因为杂交而失去他们固有的品质，那么，那些杂种，必定不会有灭绝的忧虑”。“民族国家必须命名使种族成为全民族生活的中心，设法使它保持着种族的纯洁。”[②] 诸如此类的表述在《我的奋斗》中不胜枚举。

希特勒与卡尔、豪斯霍费尔的主要区别在于：“‘生存空间’对希特勒而言明显和种族问题密切相关，而在另一方面，豪斯霍费尔使用‘生存空间’一词纯粹是从地理学意义而言的，完全忽略了种族的影响及决定作用。”[③] 希特勒认为：“民族国家应该为了存在而奋斗”，为了生存下去，“我们需要疆域和土地，以养育我们的人民和使过剩的人口得到安置”[④]。“保证德国的生存空间是我们的最高原

① ［德］希特勒：《我的奋斗》，第120页。
② ［德］希特勒：《我的奋斗》，第151～153页。
③ Haus Staudinger：*The Inner Nazi*，PP. 51～52.
④ Haus Staudinger：*The Inner Nazi*，P. 32.

则"[①]。

希特勒"生存空间"理论的第二层含义是，获取非德意志的土地。起初，纳粹党的目标是建立大德意志帝国，把所有日耳曼人居住的地方都划归这个国家，日耳曼帝国的边界桩应打在最后一个德意志人的村落旁，之后，向东方夺取新的土地成了希特勒的"生存空间"新边界，"如果我们今天在欧洲谈到新的土地的话，我们首先考虑的只能是俄国以及属于它的边缘国家"[②]。德意志帝国必须包括这片古老而肥沃的土地，让德国农民去耕种东部无尽的土地，是命运之神指示的方向。

"生存空间"理论的第三层含义是，夺取"生存空间"的斗争不可能取决于和平手段，只有通过战争和流血冲突方可实现。"没有一国人民根据更高的愿望和更高的权利，在这个世界上能够让出占有即使只有1平方米的土地"。德国人民的土地占有权是自然赋予的，要"用德国的剑为德国的犁取得土地，为德国人民取得每天的面包"[③]。东方俄罗斯的土地一直装在希特勒的心中，而德国要占有这片生存空间，"唯有借助战争方能实现这一目标"[④]。

讨论希特勒的"生存空间"理论，決不可忽略"自给自足"(Autarky)这一问题。在希特勒的心目中，德国东部的土地是必须征服的，这里的疆域足够2.5亿德国人生存一个世纪，在这一新的"生存空间"里，德国要想获取相对于他国的权力地位，必须建立一种"自给自足"的社会经济结构体系。尽管希特勒从未使用过这一词，但用它来概括他所追求的新"生存空间"的社会经济秩序的特点是再恰

---

① 朱庭光主编：《法西斯新论》，第272页。

② 卡尔·迪特利希·埃尔德曼：《德意志史》第4卷，商务印书馆，1986年，第368页。

③ 朱庭光主编：《法西斯新论》，第273～274页。

④ Haus Staudinger：*The Inner Nazi*，P. 38.

当不过的。希特勒的"自给自足"结构体系包括三层意思：一是粮食自给，二是农业和工业平衡，三是财政独立。这些是一个健全的国家及其所征服的"生存空间"的基础，否则，社会危机就会爆发。

为了消除领土扩张后社会经济的不平衡状况，希特勒认为新夺取的土地应由德国农民来耕作，保证粮食的自足和健康的农民阶级是一个健全国家的标准。同时，工人和农民通过自己的产品相互保障；一个理想的德国就是，工人将生产出足够的产品满足日益增长的德国农民阶级的需要，反之，农民生产充裕的食品养活工人，这样，国家产品和消费将达到一种所谓动态平衡。显然，希特勒的"生存空间"首先是指农业上可资利用的土地而言的，生产食物供应生存在这片土地上的居民是一个大国、强国的根本要素。只有弱国、软弱的民族才会选择输入粮食，输入粮食即意味着对别国的依赖及该民族将变得更加软弱[1]。

希特勒之所以要坚持财政金融独立，据他说是对付所谓"国际资本主义和国际马克思主义的联盟"[2]，反对国际金融和借贷是德国争取独立与自由的最重要方面。

总而言之，地缘政治学说在二战后名声狼藉完全源于它在德国的境遇，不论各不同领域的学者们存在多少争议，我们把握下列几个方面是至关重要的：

第一，德国地缘政治思想来自过去。其中主要包括拉策尔的论述、契伦的概念与思想、麦金德的观点等，他们都毫不例外地被后来的研究者们在他们的论著中与豪斯霍费尔及纳粹的政策联系在一起，并因此而导致了种种误解。如果说拉策尔因把社会达尔文主义引入了政治地理学中，而将之视为地缘政治论的鼻祖并不为过，但

① ［美］格哈特·温伯格著，何江、张炳杰译：《希特勒德国的对外政策》上编，商务印书馆，1992年，第9～10页。

② Haus staudinger：*The Inner Nazi*，P. 46.

进而因此说他“离‘生存空间’的概念，即优等民族可以侵犯劣等民族来扩展它的生存空间的概念，只是一步之遥了”，或说“是拉策尔操纵了希特勒的笔”（指写《我的奋斗》一书），显然有些臆断或至少是猜测而已。在契伦那里，最核心的论述是政治分析中的有机体系论，他的初衷是“引起政治家们对已被忽略的地理因素的重视”[1]，但是，这些观点被德国的地缘政治学者们误解了。至于麦金德，“卡尔·豪斯霍费尔多次承认麦金德是少数几个他有所收益的地理学家之一”[2]。除了麦金德之外，德国地缘政治学家学习的另一个敌对国家的地理学家是英国的詹姆斯·费尔格里夫，虽然他的影响不如麦金德那么大，但豪斯霍费尔受益于费尔格里夫是事实，当时，只有两本政治地理学的英文著作由豪斯霍费尔译成了德文，费尔格里夫的《地理学与世界权力》（1915 年）就是其中一本。

第二，德国的地缘政治学者及其创立的德国地缘政治学流派的确对纳粹政权造成了不容置疑的影响。“不论德国地缘政治学者对他们的纳粹主子所采取的方法曾有何种保留，他们毕竟和纳粹走在了一起，并且不可避免地被种族和‘生存空间’的永久罪名所玷污。……他们都在卐字旗下谋求荣耀或苟且偷生。最终他们都投错靠山，所有这些人都被拖入了第三帝国的众神末日的深渊之中。”[3] “所不同的是，当诸如麦金德等西方地缘政治思考在第一次世界大战后摆脱帝国主义而转向更广泛的国际主义时，德国的地缘政治学者则走上了一个完全相反的方向。……德国的地缘政治学在很多方面变成了纳粹心智的滋补品。它充当了‘日耳曼精神’知识赞助人的角色以

① G. R. Sloan: *Geopolitics in United States Strategic Policy*, 1890—1987, P. 50.

② Derwent Whittlesey: *German Strategy of World Conquest*. P. 83.

③ Geoffrey Parker: *Western Geopolitical Thought in the Twentieth Century*. P. 82.

及其领土扩张的辩护者。”[1] 现实的战略与理论之间必然会存在分歧点，这也许正是后来研究者们关于地缘政治学理论与纳粹政策之间关系争论的真正源头。地缘政治学说对纳粹政策影响的主要表现是政治宣传，从1933年纳粹夺取德国统治权直至1945年灭亡，这一色彩都极为明显，概括而言，德国地缘政治学说在纳粹的政治宣传中起了两方面的作用：(1) 与纳粹党政治目标一致的某些词句被不断重复和广为利用，如："生存空间"、"种族和领土"、"区域和位置(空间)"、"权力与区域"等等，其不可替代的媒介作用可见一斑。(2) 绘制纳粹德国援以作为政治鼓惑的地图。从20年代起，德国的地缘政治学者们就开始致力于这一工作了，豪斯霍费尔早在1922年就撰写了一本名为《参考地图》(*Die Suggestive Karte*)的书。每一种政治地图都可利用为武器，德国地缘政治学者所绘制的地图中不仅标明了地理区域，而且还借助各种符号进行了政治陈述。

第三，德国地缘政治学说的许多特征与英、美等国的地缘政治学说截然相异，但是，这种差异并不为国际关系领域里的研究者们所广泛认同。1945年以后，不少作者笼统地把所有地缘政治学的理论等同于德国的地缘政治学流派，这在很大程度上缘于二战期间同盟国和轴心国都利用地缘政治学说作为政治宣传的工具(虽说它们在方法论上有本质差别)。下面这段话可能有助于我们的论点："地缘政治学是战争的牺牲品，它已被从马汉和西奥多·罗斯福开始至希特勒和东条英机的各类战略家和扩张主义分子所利用和误用。宣传家和反宣传家们也侵入了地缘政治学领域，试图为他们的偏见寻求一种科学的政策，地理学的无知在全社会所有阶层中泛滥开来。”[2]

---

[1] Geoffrey Parker: *Western Geopolitical Thought in the Twentieth Century*, PP. 83~84.

[2] G. R. Sloan: *Geopolitics in United States Strategic Policy*, 1890—1987, P. 51.

# 4 地缘政治学——美国战略与世界秩序

## 4.1 传统地缘政治学在战后的新趋向

当卡尔·豪斯霍费尔等人在德国国家社会主义的老巢慕尼黑对地缘政治学说进行加工、包装并向外大肆兜售时，传统地缘政治学的境况又如何呢？这将是本章要解决的主要问题。我们已经花了大量的篇幅来谈论德国的地缘政治学流派，从一定意义上而言，德国地缘政治学说与传统地缘政治学说的主要区别在于，前者把地理学置于所有政治理论因素的首位，而以麦金德、斯派克曼、马汉等人为代表的地缘政治理论则强调将地理学理论与政治理论联系起来的重要性，在他们看来，任何地缘政治学理论都是不完备的，只适应于某一特定的区域。

地缘政治学说正如一种初级产品，它被传播到世界各国后，出现了众多不同的理解和再论证，我们不可能去逐一进行考证，因而也就无法找到一个标准来衡量哪一种地缘政治学理论更有意义或无足轻重。能不能说在世界舞台上发挥重要影响的力量中心产生的地缘政治学说就最重要呢？诚然，地缘政治学说与这些国家的外交行为联系在一起，因而必然会产生较为广泛的影响。

另外，我们在论述战后地缘政治学的发展轨迹时，不能忽视的一个重要因素是科学技术的发展对它的冲击，这涉及一个关键问题：研究国际社会的国家间关系是否仍然侧重于外在的地理关系或因素？直至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地缘政治学总是被顺手拣来用于国家间关系的外在的地理方面，特别是国家影响全球事务的地理方面。

下面我们将分别就相关问题进行论述。

德国地缘政治学说同第三帝国的政治目标联系在一起这一事实对 1945 年前后地缘政治学理论的系统阐述和再评价产生了深刻的影响，国际政治领域的研究者们面临着无法克服的困境．如何区分德国特产的地缘政治学说同传统地缘政治理论的目标和方法论，他们感到无能为力，实际上，大多数人也不情愿因此而冒险。那么，他们的研究侧重点究竟发生了哪些明显变化？各种地缘政治理论的概念是否仍然运用于解释现实的或未来的政治关系呢？地缘政治理论家们仍然渴望将自己的理论变成为政治家和政策制定者们的实践指南吗？对“心脏地带”理论的修正恰好反映了他们的趋向。

1943 年，麦金德爵士第三次论证了他在 1904 年提出的“心脏地带”理论[①]。此时，虽然第二次世界大战还没有结束，但在力量对比，战略态势方面已经发生了根本转变，特别是斯大林格勒保卫战的胜利，不但是苏、德战争的转折点，而且也是世界反法西斯战争的转折点[②]。麦金德在 82 岁高龄时第三次论证他的理论具有明显的现实意图，其不外乎下列几方面：

第一，从更广的地理范围来证明其理论的正确性。苏联不仅控制着“心脏地带”，而且还将把东欧部分统一起来，最大的自然堡垒已经形成，欧亚大陆的“陆权”同“海权”的边缘地带帝国的对抗不可避免，这将是战后的新地理现实。

第二，“陆地中心海洋”* 成为美国与苏联之间建构均势的地理基石。但是，这一均势体系在功能上又不同于战前英国所推行的均

---

① 见本书第2部分和《华中师范大学学报》1993年专辑，第146～150页。

② 王绳祖（主编），《国际关系史》上册，武汉大学出版社，1983 年，第 542 页。

* 指北大西洋及隶属于它的内海和流域。

势"政策"。麦金德的均势体系中，法国充当欧亚大陆的桥头堡；英国发挥壕沟飞机场的角色作用；而美国和加拿大则提供训练有素的人力资源和丰富的工业、农业产品。显然，他建议一种边缘地带力量的结盟。

第三，新时期国际体系中任何国家在连续不断的权力斗争中的成败主要取决于两个因素：一是任何国家的权力与之包含的位置和自然特征存在不可分割的联系；二是运输手段和武器技术的变迁。十分有趣的是，麦金德在第三次论证中否认空间技术、武器技术（特别是核武器技术）对某些不变的战略条件的影响力，指出："只能说，还没有充足的证据证明空战将通过显示进攻和防御战术优势的转换，以及导致了战略条件的微小变化，从而偏离悠久的各种战争史的规律。"[①]

麦金德的论述与德国地缘政治学者的论述存在极大的相似性，他们都系统地表述了政治历史的地理特征，并由此推断国家未来的政治关系，特别是在德国问题上，他们的共识在于：如果德国同时卷入一场同"陆权"国家俄国和由美国领导的"海权"国家的军事冲突中，德国的生存将是极其危险的。他们都认识到了两个超级大国的出现——美国的苏联。

所不同的是，麦金德并不认为在国际体系中只有一个国家具有独一无二的不同于他国的命运，日耳曼民族作为一个国家并不能充当这一唯一角色。麦金德是基于三个自然地理特征所显现的足够条件来推断未来的战略关系的，首先，心脏地带在欧亚大陆占据了最广阔的低地平原；其次，流经这一平原的可航行河流没有入海口，有的流向北冰洋，有的流向里海；再次，这里有一片草原地带，在过

① H. J. Mackinder: *The Round World and The Winning of the Peace*, *Foreign Affairs*, Vol. 21, 1943, P. 602.

去的一个半世纪里，它一直为游牧民族的大迁移提供理想的条件[1]。他的这一分析似乎也产生了误导，即心脏地带地区拥有不同于欧洲地区的独特的命运。他意欲为政治家们提供实践指南也是不容置疑的。

这一时期另一个重要的地缘政治理论家尼古拉斯·斯皮克曼*（Nicholas Spykman，1895—1943）发展了与麦金德理论相对的某些方面，也可以说他对政治历史的分析基于了相异的地理特征。作为美国的著名的地缘政治学者，他的著述极多，其中1942年出版的《世界政治中的美国战略》（*America's Strategy in World Politics*）和1944年出版的《和平地理学》（*The Geography of the Peace*）是其代表作，其主要论点包括：

第一，推崇契伦等人，积极宣扬地缘政治学的重大作用。他在《和平地理学》中写道："有些学者歪曲了地缘政治学这个名词的含义，但不能以此作为否定地缘政治学方法和实质的正当理由。实际上地缘政治学是一种分析方法和一些论据的适当名称，这种分析方法和这些论据在外交政策某些方面进行明智决策的过程中是不可缺少的。过去我们受到对地缘政治学一无所知的危害，结果我们的安全遭到严重的危害，以致在1917年和1941年只好用战争来补救。"[2]

第二，修改了麦金德的"心脏地带"理论，提出了"边缘地

---

① H. J. Mackinder：*The Round World and The Winning of the Peace*，*Foreign Affairs*，Vol. 21，1943.

* 斯皮克曼，美国耶鲁大学教授，耶鲁大学国际研究所主持人，他的主要贡献在于为美国的霸权政策出谋划策，修改了麦金德的"心脏地带"理论，提出了"边缘地带"学说。

② [美]斯皮克曼著，刘愈之译：《和平地理学》，商务印书馆，1965年，第17页。

带”学说。斯皮克曼认为，世界性位置以气候带、海陆分布等条件作为划分标准，大致包括内陆、岛屿和边缘三种；区域性位置主要根据邻国间的相对关系和实力地位来划分，大致分为较强、较弱或相当三种。他在对各种不同的位置组合进行探讨后指出，最受重视的是那些处于边缘位置的国家[①]。在此基础上，他认为，并非是位于欧亚大陆的“心脏地带”造成了对海权国家的威胁，而是位于心脏地带和西方势力控制的沿海地带之间的缓冲地带。根据这一地理特征，他推断，缓冲地带在未来的政治格局中的地位将不断上升，并成为统治沿海地带的关键地区，这一地带由麦金德所言的世界岛的内新月地区构成。他指出：“欧亚大陆的边缘地区处在大陆心脏地带和边缘海之间，必须看作是一个中间区域，在海上势力和陆上势力冲突中，起着一个广大缓冲地带的作用。它面对两个方面，必须起海陆两面的作用……它的水陆两面的性质是它的安全问题的基础。”[②]因此，欧亚大陆的边缘地带是各强国占领和控制的核心地区。这一分析的必然结论是抛弃麦金德的口号。斯皮克曼提出的口号是：

谁控制了边缘地区，谁就能控制欧亚大陆；

谁支配着欧亚大陆，谁就能决定世界的命运[③]。

尽管如此，我们仍可断定斯皮克曼关于地缘政治学的论证和麦金德的论证前提是相同的，即：“陆权”和“海权”之间的对抗。俄国“陆权”占据着国际舞台的中心位置，其目标是要获取通向暖水的港口，“在过去的一个世纪的时间里，旧世界政治的一个基本特征是，控制着沿海地带的英国海权与试图撕开一条通过环形带的通道

① 陈力：《战略地理论》，第46～47页。

② ［美］斯皮克曼：《和平地理学》，第76页。

③ N. J. Spykman: *The Geography of the Peace*, Harcourt Brace & Co. NY, 1944, P. 43.

的俄国陆权之间的对抗"[1]。

第三，斯皮克曼企望他的理论成为政治行为的实践指南。在这一点上，他与麦金德相比有过之而无不及。他争辩说，美国任何战略的制定都必须基于这一认识——在无休止的权力斗争中，国家之间相互制约。因此，他认为正义、平等和宽容等价值观在政治家们身上已荡然无存。武力成为支配国家行为的主调。他写道："武力显然是国家生存和创造更美好的世界所不可缺少的工具。""没有武力支持的政治理想和远见似乎很少有存在的价值。我们西方的民主国家其所以能够继续存在和保持下来，确实应归功于我们自己或我们的盟国有效地使用武力的缘故。"[2] 以此为前提，他积极鼓吹美国建立强权政治，以武力征服世界。

在论述美国的外交政策时，斯皮克曼强调政策制定者们推行"均势"政策的重要性，美国要在均势体系中充当"平衡者"(Balancer)的角色。而要获取这一地位，美国唯有保持在欧亚大陆边缘地带的优势地位，因为这一地理区域的重要性就在于它包括苏联垂涎已久的某些通向沿海地带的地理屏障和通道。

正是由于斯皮克曼极其强调地理学与政治权力之间关系的重要性，因而赢得了"美国的豪斯霍费尔"的绰号[3]。从地理环境决定论和历史宿命论的角度看，斯皮克曼与德国的地缘政治学说确有许多相似之处，但是，两者之间的差异也是相当明显的：首先，斯皮克曼并没有把美国看成是一个其增长取决于吞并其周边弱小有机体的能力的生物有机体；其次，斯皮克曼虽渴望他的理论成为政治行动

---

① N. J. Spykman: *America's Strategy in World Politics*, Harcourt Brace & Co, NY, 1942, P. 182～183.

② [美] 斯皮克曼：《和平地理学》，第 84 页。

③ G. R. Sloan, *Geopolitics in United States Strategy Policy*, 1890—1987, Wheatsheaf Books, 1988, P. 64.

的实践指南，但他并不是强调经济方面，而是力图让美国公众了解一个事实，即当美国不由自主地卷入到世界性的战争中后，美国应持何种政治抉择。回到孤立主义是不可能的了，唯一的选择就是在欧亚大陆建构新的“均势”。

战后对地缘政治学理论进行修正的最好例证应是D. W. 梅尼格(D. W. Meinig)，他在1956年发表的《欧亚历史上的心脏地带和边缘地带》(*Heartland and Rimland in Eurasian History*)一文，集中反映了他的观点。在梅尼格的地缘政治学理论中，首要的一点就是对斯皮克曼的基本论点——地理学是任何国家外交政策的最重要的因素提出了挑战。为了系统阐明政治历史的地理特征，梅尼格提出了五个范畴，并基于这些范畴解释过去较长的一段历史时期里地理学的政治含义或关系：

A. 心脏地带。

B. 大陆边缘地带。

C. 近海边缘地带。

D. 外部岛屿。

E. 内部岛屿。

与麦金德和斯皮克曼的公式相比，梅尼格的这些范畴似乎并无多大差别，其特殊性在于它们包含了一定程度的灵活性，可根据特定历史阶段的政治和经济条件而变更。他对边缘地带所作的解释充分说明了战后地缘政治学理论者与传统地缘政治学理论者之间的差异。对于麦金德和斯皮克曼而言，边缘地带既不是陆权国家的领地，亦不是海权国家的势力范围，而是一种具有两栖特点的地理区域——海权与陆权进行对抗的地区。梅尼格认为这显然过于简单化，随着一定历史时代运输技术的进步和政治经济结构的变化，这一地区要么归属于陆权国家的统治，要么被海权国家所控制。

梅尼格以中国和印度的历史为例来说明位于边缘地带的国家由被陆权国家控制向被海权国家控制的转变。他指出，欧洲扩张主义

者最先侵入心脏地带外围的欧亚大陆的非欧洲部分，但是，欧洲海上强国最初只不过是取代了阿拉伯、德拉维*、马来西亚及南中国的商人的地位，并攫取了既已发现的近海地区。显而易见，这一论断是对麦金德的理论中两个重要方面的挑战。首先，麦金德仅仅考察了欧洲海盗和冒险家们进行地理大发现这一特定历史时期的政治关系，完全忽略了从西部欧洲到亚洲季风带所存在的某些关键陆地和海域；其次，麦金德所言的“哥伦布时代”的真正意义在于其运输技术水平的提高对地理学政治含义的影响。运输技术水平的提高必然导致西方列强对地理空间的需求增加，而地理区域和范围的增长又对政治控制产生了影响力。他写道：“伴随工业时代的是大宗贸易的各种需求，包括基本原材料和广阔的出口市场以及用于出口的自身特有的技术设备。现在，借助铁路和炮舰向内陆（边缘地带）的渗透进程极快，海权国家的浪潮已向内波及喜玛拉雅山和西藏的东部要塞。整个大陆边缘地带的内陆特征已被扭转，趋向于海洋。”①

让人耳目一新的是梅尼格介绍的最后两个范畴——外部岛屿和内部岛屿。实际上，他指的是包围欧亚边缘地带的近海岛屿。加上另外三个范畴，表明梅尼格论述的基础是对更长阶段的历史事件的考察。同时，他以英国和日本为例来佐证他的假设——任何一个国家都是“天生”的海权国家。

此后，对麦金德“心脏地带”理论的修正及对环境理论的批判构成了战后地缘政治学和政治地理学研究的总趋向。我们之所以仅说成是修正，根本原因就在于，尽管对心脏地带的地理范围作了大量修补，但“并未真正根本上改变其战略区域、自然条件、资源及

* 位于印度南部。

① D. W. Meinig: *Heartland and Rimland in Eurasian History*, *Western Political Quarterly*, Vol. 9, 1956, P. 563.

人口潜力这些属性。这个命题仍然幽灵般地保留在地缘政治学的羽翼之下，似乎期盼着某种最后的确认或否定"①。对麦金德、斯皮克曼等人的观点进行修正大致出现了下列几种情况：

第一，纯粹局限于心脏地带这一地理区域，将注意力放在苏联及其主要敌手的实力分析上。在梅尼格之后有：庞兹（Pounds）、胡森（Hooson）、德塞维尔斯基（de Seversky）、琼斯（Jones）等人。他们的分析受制于战后国际关系格局状况的影响，通过对自然资源、农业潜力、人口、城市化及工业增长等的考察，认为位于心脏地带的苏联已成为一种可怕的令人难以对付的世界大国。为了建立"均势"，他们充分利用了原子技术、军备技术的进步，藉此剔除了先前的某些地缘政治概念，提出了所谓"空中观念"（air view）②。有些人认为空权不过是一种与陆权和海权一样遵循着同样的战略规律并依托于海陆的新的支撑力量（这和麦金德一样），而另一些人则认为空权完全属于一种不同的实力组织，德塞维尔斯基是主要代表。他坚决主张美国应关注的不是海权或陆权，而是空权，因为整个世界只存在两大空中实力圈——分别集中于美国工业心脏和苏联工业心脏，北美和欧亚北部成为了"决定性地区"，美国的资源是极其有限的，不允许在其他方面建立庞大的军事力量，因此，夺取空权是美国霸权的关键，"美国的命运显然是在天空"③。

不论这些学者提出了何种新概念，他们的分析前提及目的都是一样的，第二次世界大战后的形势使心脏地带观念在西方人的意识中重获新生，人们完全可以以此为新的解释的基本准则，没有国际

① Geoffrey Parker: *Western Geopolitical Thought in the Twentieth Century*, P.P. 132～133.

② Geoffrey Parker: *Western Geopolitical Thought in the Twentieth Century*, P. 131.

③ ［美］柯林斯：《大战略》，军事科学出版社，1978年，第315页。

关系的现实感受，便不可能有“心脏地带”假说的持久活力。

第二，避开各种宏大体系的高谈阔论，倾向于一种由较小的地域单元所构成的世界。主要代表人物有索尔·科恩(Saul Cohen)、克龙（Crone)、德波利吉（de Blij)、坎特里（Cantori)、斯皮格尔(Spiegel)、哈斯（Haas)、多伊切（Deutsch)、埃齐尼（Etzioni）等。到了本世纪六七十年代，两大阵营内部出现了不同程度的裂痕，尤其是在欧亚大陆的政治地图中，将苏联和中国都涂上红色从而显现一个恐怖地理区的做法已经过时，世界舞台发生了众多重大变化，许多此间新独立的国家成为游弋的力量，国际关系体系需要一种新的稳定。索尔·科恩是这一时期分析地理因素的政治关系的主要代表，他以区域主义（Regionalism）作为理论框架来论证他的观点。

1964 年，科恩在其著作《分裂世界的地理和政治》(*Geography and Politics in a Divided World*) 中“讨论了战略地理分析的方法基础和世界权力核心以及主要权力的接触地带”[①]。他认为技术的进步、政治思想的改变、人口的再分布和新贸易形式的出现等是影响地理现实发生变化的重要因素，为了使研究与地理现实之间保持一种不脱节关系，必须以运动的观点来进行地理模型的研究，反对没有回旋余地的严密的世界体系。针对战后的现实国际关系格局，他倾向于一种更现实、更灵活的研究模式，对共产主义世界进行遏制的模式过于僵硬，而且事实上并未发挥所预料的作用，“心脏地带——边缘地带思想使西方世界成了在全球对抗苏联这种战略和战术神话的牺牲品”[②]。

因此，科恩提出的地理模型是两类区域、两个地带，以期设计出更灵活的战略和战术。

---

① 陈力：《战略地理论》，第 54 页。

② G. Parker：*Western Geopolitical Thought in the Twentieth Century*, P. 141.

地缘战略区（geostrategic regions）。它包括能施加全球性影响的海权世界（贸易依赖型）和欧亚大陆（心脏地带与东亚）。两大战略区都包括若干较小的地缘政治区域。

地缘政治区（geopolitical regions）。即属于地缘战略区的较小地区及其他地区。它们对国际关系的影响表现为区域性的。

中东“破碎地带”（Shatter-belts of the Middle East）。

东南亚“破碎地带”（Shatter-belts of the South－East Asia）

两个破碎地带源于殖民体系，由于长期受到连续不断的外部压力，因而内部缺乏地理政治核心。

第三，重视科学技术进步的作用，摈弃片面的地缘政治观点，赞成更加全面、整体地看待国际关系的“生态学观点”。70年代后，国际事务呈综合发展趋势，摆在地理学家及政治学家面前的突出问题有：核武器问题、世界贫困问题、地区冲突、日益严重的环境污染、交通拥挤和对资源的掠夺性开采等，人类所赖以生存的脆弱的生态系统正在遭受灾难性的破坏。科学技术进步对地理关系的变化产生了更为明显的作用，因此，对地理关系的政治分析也就出现了新的变化。更多的人宣称，技术进步、技术突破已使麦金德的心脏地带理论和斯皮克曼的边缘地带说过时。斯普劳特夫妇（Harold and Margaret Sprout）是这一时期的主要代表，他们承认每一个政治社区都有其地理基础，“每一政治社区都建立在具有特定的地点、面积、形状、气候和自然资源的领土之上。因此，各国之间的交往大都涉及重大的、甚至是决定性的地理考虑”[1]。但是，环境因素对国际关系的影响前提又必须是源于政治领导人对环境所作的假设，因而只有把环境看成是一个多维的系统，既研究环境条件本身，又分析政

① ［美］詹姆斯·多尔蒂、小罗伯特·普法尔茨格拉夫著，邵文光译：《争论中的国际关系理论》，第77页。

治领导人对于环境条件的感性认识，才是一种更全面的观点。

斯普劳特夫妇认为，过去地缘政治理论的论述存在一个严重的缺陷，即“地缘政治论者几乎普遍不能预测和估计技术和其他变革的速度”[1]。技术进步已使现代社会变得日趋复杂，人们越来越难以对人类的各种政治事件孤立地进行考虑，并将之归结为纯国内或对外事务，纯属政治学、社会学或经济学等方面的问题，这就要求用生态学的观点来建构分析模式，为此，斯普劳特夫妇提出了一条生态论原则：

环境的某一部分若发生重大变化，可对其他部分产生重要的、常常是干扰性的、有时则有十足破坏性的后果[2]。

这种侧重于“生态学观点”的倾向，不仅区别于“片面的地缘政治学观点”，而且也不同于“环境概念”。生态学思想既包含了“环境概念”和“环境关系概念”两个组成部分，同时又波及到了环境关系思想以外的许多内容。——斯普劳特夫妇并不否认有些环境思想和人——境关系理论对探讨人类事务的重要作用，如：“哲学家和历史学家把文化和文明的兴衰以及霸权主义和权力影响的其他形态归因于陆地和海洋的地理布局、气候的变化、沃土和矿藏的分布、周期性饥荒、流行病和其他的自然灾害、技术革新、人类贪心、腐败和失控及其他的周围条件与环境。”[3] 但是，他们认为这些并不是生态学观点的全部内容，生态学的认识和理解方法将国际政治看成

① ［美］詹姆斯·多尔蒂、小罗伯特·普法尔茨格拉夫著，邵文光译：《争论中的国际关系理论》，第 79 页。

② ［美］詹姆斯·多尔蒂、小罗伯特·普法尔茨格拉夫著，邵文光译：《争论中的国际关系理论》，第 79 页。

③ Charles. W. kegley, J. R. Eugene. R. Wittkopf. *The Global Agenda, Issues and Perspective*, Random House, New York, 1984. P. 322.

是“独立的地球相关群体间的一种关系体系”[1]。其主要出发点就是简单地认为一些有机体或群体为环境所包围，这种条件对于分析个体和群体的现在和未来都至关重要，为此，斯普劳特夫妇提出了三个中心概念：“有机体、环境和相互关系。”但是，其研究的焦点“既不是个体或群体本身的行为或状态，也不是环境本身的属性，而是个体或群体‘与环境的相互作用’，以及由此而形成的‘体系’，特别是一种‘生态系统’……”[2]

“生态政治学”(Ecopolitics)所强调的国际政治与生态问题之间的关系并不无限赞美人类科技进步、人类能力增长和人与自然关系日益紧密的进步意义，而是把认识方式的注意力直接指向“副作用、副产品和相互关系链”。“独立的相关群体”分享着“日渐拥挤”的行星，它为人类的福利和生存提供“有限的”和“可能耗尽的”基本生活必需品数量，目前，只有在少数国家表现为富裕，而大多数国家的食品和其他生活品长期短缺。地球作为一个整体被侵蚀、消耗和污染的程度正不断加深，如果这一点不得到控制和改观，那么就意味着人类的大多数将在未来不断退化，更令人忧郁的是，有最终陷人不可逆转的灾乱之中的可能性。因此，迫切需要修正我们关于人际关系和人与自然关系的思想，这也正是生态学观点给我们提出的任务。

斯普劳特夫妇认为，人与自然的关系层次可分为三个阶段：从适应到操纵开发再到危机[3]。人类的文明初期是“适应调节”，这是

---

① Charles. W. kegley. J. R. Eugene. R. Wittkopf. *The Global Agenda*, *Issues and Perspective*, Random House, New York, 1984. P. 323.

② Charles. W. kegley, J. R. Eugene. R. Wittkopf: *The Global Agenda*, *Issues and Perspective*. P. 232.

③ Charles. W. kegley. J. R. Eugene. R. Wittkopf: *The Global Agenda*, *Issues and Perspective*. P. 324.

人类对自身居住的周围环境产生“认知行为”的初级阶段；随着人类对自然条件认识的加深和他们掌握了更多的有效工具，便进入了“控制开发时期”，人类的发展与对地球的开发利用相辅相成；然而，仅仅如此并不重要，目前的趋势是，人口的指数增长、科技进步的副产品本身已使人类居住的地球不断扩大和恶化的侵蚀程度更严重、更紧迫。人口密度愈大、群体所掌握的工业技术水平越高的地区，环境的破坏程度越深、范围越广。就美国等一些富裕国家中的情形而言，可描述为“富裕肮脏危机”，这是一种范围极广的危机，尽管在一些第三世界国家中要好些，但随着世界政治、经济活动的日益国际化、全球化，全球都正在逐步陷入这场危机之中。

“就政治角度而言，这是一种观念危机。”它从根本上要求调整优先权和进行资源的大量再分配，以防止长久趋势的最后阶段的到来，即：“犹如使用最具毁灭性的武器所进行的一场全球战争一样，出现全球范围的、或许也是最后的灾乱。”[①]

斯普劳特夫妇还认为，我们这个时代的主要特征就是“对自然界不断控制的长久趋势导致了相应的‘相互联系增长’”[②]。同样，它也导致了各种难以预料和令人讨厌的副作用，尽管人类的活动显然并不是故意如此，但这种情况的确已在全世界不同程度地发生了，这就是生态学本身的原则——“生态系统的一个部分的任何实质性变化几乎都会对其他部分产生重要的、常常是混乱的、有时是极度破坏性的后果……”[③]因此，这就要求人类在价值、态度、经济实践及

① Charles. W. kegley, J. R. Eugene. R. Wittkopf: *The Global Agenda, Issues and Perspective*. P. 325.

② Charles. W. kegley, J. R. Eugene. R. Wittkopf: *The Global Agenda, Issues and Perspective*. P. 325.

③ Charles. W. kegley, J. R. Eugene. R. Wittkopf: *The Global Agenda, Issues and Perspective*. P. 325.

生活方式等方面的极大改变。在斯普劳特夫妇看来，“所有最基本的价值是那些与生物存在联系在一起的东西：健康水平与生存范围。基于更特别的生态学观点，亦即在一种世界群体或生态体系中，价值可概括为必须‘使地球成为一个合理安全和有益健康的生存场所，不仅仅是为我们自身，也是为了子孙后代；不仅仅是为了一个或几个国家，而是为了所有国家……’”[①]而大量事实证明，仍有千千万万的人听天由命地生活在有损健康和缩短寿命的环境之中，即使在环境恶化已引起极大重视的国家里，对环境的忽视仍十分严重，甚至包括生态学家和受过教育的自然环境保护论者也莫不如此。美国人中的绝大多数不再相信专家们的预言：目前趋势的延续将使地球在两三代之内无法居住。因而，政府和工业集团所采取的环境补救措施往往是软弱无效的，而且，在保护和恢复行为显现出明显利益之前，总是存在大量的时间延误。更值得注意的是，在有些国家的环境质量改善被看成是易于剥夺个人自由和取缔接触商品及服务的特权途径的行为。因此，所有国家的政府机构总是不断延缓最终将环境质量看成是一种绝对优先权价值。

总之，“怎样应付各种各样、日渐增大和正不断延伸的人类能力改变其所依赖的这个行星的生存条件问题，已成为国际政治的中心问题”[②]。显然，斯普劳特夫妇是想要弥补传统地缘政治分析的局限性，寻找新的途径来分析新的地缘政治关系或地缘战略关系。

---

① Charles. W. kegley, J. R. Eugene. R. Wittkopf: *The Global Agenda, Issues and Perspective*, P. 325.

② Charles. W. kegley, J. R. Eugene. R. Wittkopf: *The Global Agenda, Issues and Perspective*, P. 326.

## 4.2 地缘政治学说与遏制战略

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美国战略决策的地理范围迅速延展，这使战后的决策者们不得不思索这样几个问题：一是美国传统的学说似乎都已显得不合时宜，如“命定扩张论”(Manifest Destiny)、“孤立主义”(Isolationism)和“门罗主义”(Monroe Doctrine)等；二是欧洲大陆既已存在的均势遭到彻底损伤，而且，美国与欧洲之间的关系发生了有史以来最根本的变化，决策者们在战后必须寻找一种新的政治表达方式来显现欧亚大陆的战略态势。

重建欧洲均势是美国决策者们奋斗的首选目标，这是因为：一方面，昔日操纵欧洲政治舞台的位于欧洲的主要力量几乎全部萎缩，英国在其体系中充当“平衡者”的角色地位也已不复存在；另一方面，欧亚大陆“心脏地带”的苏联成为了战争的最大胜利者之一，它是世界上主要的陆权国家，同时，苏联借助其丰富的自然资源和人力资源，完全有能力攫取海权。政治局势的发展使美国决策上层的恐惧心理不断增强，他们担心如果美国置之度外，欧洲的秩序将混乱不堪。战后的时局不仅使根深蒂固的孤立主义影响降到了最低点，而且也使决策者们在面对极具诱惑力的现实利益时将华盛顿总统的遗训抛于脑后了①。

我们都已熟知马汉对美国的忠告、麦金德的论述尤其是第三次

① 华盛顿在其离职演说中对美国人民提出了这样的忠告：“欧洲必然会陷入经常发生的纠纷中……在他们变化浮沉的政治中，假如我们人为地和欧洲的国家联系在一起，使我们自己牵连到欧洲的日常变化着的政治中……那是不明智的……我国的地理位置远离欧洲，这就使我们也能够追求另一种途径……为什么把我们的命运同欧洲的任何一部分交织在一起，把我们的和平与繁荣同欧洲的野心、竞争、兴趣、兴致或轻浮的阴谋纠缠在一起呢？”

论证、斯皮克曼的修正等。下面我们再来分析美国战后的全球战略及其理论背景，通过此种对比分析，我们似乎可以从中体会到某些有益的内容。

面对心脏地带同东欧地区的结盟，美国认为只有它才能扮演“平衡者”的角色，其目标就是阻止苏联。虽然“在战后初期，美国政府内对苏联的认识与态度并不是十分一致的”[①]，有人主张改变战时的对苏友好、合作政策，采取一种强硬的敌对政策（如哈里曼、福莱斯特尔等人），也还有人主张继续执行与苏联友好的政策，把苏联看成是美国战后应与之合作的伙伴（如当时的副总统华莱士、陆军部长史汀生），然而，历史的安排似乎并不允许这两个世界权力的主要筹码加在一起，而是置于世界权力天平的两边。因此，战后初期，美国对外战略大调整的核心就是制定新的对苏战略。本章节不想对其他问题过多涉足，只想从美国战略与地缘政治理论之间的联系这个角度进行某些尝试性分析。论及这一问题，必须涉及几层关系：一是地缘政治学说与美国战略决策之间的关系；二是乔治·凯南(George Kennan，1904—)的理论与地缘政治学说之间的关系；三是美国的战略与乔治·凯南理论之间的关系。即有这样一条主线：地缘政治学说——乔治·凯南的理论——美国的现实战略。这其中包括几个重要问题：美国决策者究竟在多大程度上直接受制于地缘政治学者的影响？麦金德的分析和结论及其他地缘政治学者的论证是否直接为凯南提供了理论依据呢？凯南的理论与美国现实的战略又存在哪些差异呢？

国内外学者在分析战后美国的“遏制”政策时普遍认为，其理论依据是乔治·凯南的“8000字电报”和后来进一步阐述而发表在《外交季刊》上的署名为“X”的文章。战后初期，美国战略特别是

---

① 张小明：《乔治·凯南遏制思想研究》，北京语言学院出版社，1994年，第113页。

对苏战略处于大调整中，其决策上层人物日益感到需要有人对苏进行系统的理论分析，全面阐述美国的对苏战略，当时美国有一些人及机构［如美国史密斯学院教授爱德华·威利特（Edward F. Willett）、"苏联通"查尔斯·波伦（Charles Bohlen）、参谋长联席联合情报委员会等］都曾尝试分析"谜--般的俄国"，以期搞清苏联的行为动机，为美国的战略提供对策。但他们的努力都因理论分析不足而缺乏足够的权威性，难以满足美国决策者的要求，因而不可能引起足够注意。在这种情况下，美国头号"苏联通"乔治·F·凯南就被推上了历史舞台的重要位置。

早在二战之前，凯南通过在苏联的长期亲身体验及所见所闻就形成了对苏联的认识，总的来看，他对美苏关系的未来持悲观态度，并呼吁改变对苏政策，显然，这是与罗斯福的同苏联友好、合作政策不相符的，因此，凯南这位"苏联通"在二战前和二战期间的大部分时间里遭到冷落，无权过问对苏事务。但是，随着二战的结束，国际政治格局发生了根本性转变，尤其重要的是，1946 年 1 月，哈里曼辞去了驻苏大使的职务，凯南被委任为代办，"这为他经常地、直接地向国务院陈述自己的观点提供了机会"[①]。同年 2 月，他借给国务院回电之机，把自己长期以来形成的对苏认识和盘托出，即著名的"8000 字电报"。尽管他在此次电文中尚未使用"遏制"一词，但实际上已包含了他以后多次阐述的"遏制"思想的基本内容。此次机会完全改变了凯南的仕途命运，由于"8000 字电报"正中当权者下怀，他因此青云直上，被调回国后任国务院政策计划室（Policy Planning Staff，简称 PPS）主任，从此，凯南成了政府决策圈的一员。1947 年 7 月，凯南又借机在《外交》季刊 7 月号上发表了题为《苏联行为的根源》（*The Sources of Soviet Conduct*）的文章（因署名

① 张小明：《乔治·凯南遏制思想研究》，第 11 页。

"X"也称为"X文章"），对"遏制"思想进行了全面、系统的论述。其要点包括：

第一，指责苏联是热衷于搞扩张的国家。凯南认为，苏联官方对外部世界的认识及其行为，是俄国传统的不安全感的产物。他说："克里姆林宫对世界事务神经质的看法，根源于俄国传统的、本能的不安全感。最初是一个和平的农业民族在辽阔的、无屏障的平原上与凶悍的游牧民族为邻而具有的不安全感。随着俄国同经济上先进的西方进行接触，又增加了对西方更能干、更强大和组织得更好的社会的畏惧……他们总是担心外国的渗透，害怕西方世界同他们直接接触……为谋求安全，他们逐渐认为只有进行耐心的、殊死的斗争，彻底摧毁同它竞争的国家，而绝不向对手妥协退让。""整个苏联政府机构包括外交机关，就像上满发条的玩具汽车沿着既定的方向前进，直至遇到不可抗拒的力量才停下来。""苏联的政治行为就像一条不停流动的溪流，朝着一个既定的目标前进。它主要关心的是灌满世界权力盆地中可以达到的每一个角落和缝隙。如果在前进的道路上遇到不可逾越的障碍，它会达观地接受并适应这一现实。重要的是永远朝着一个最终的目标前进。"[①]

第二，美国对苏联的扩张能够采取的唯一合理的政策就是遏制。苏维埃政权既无系统的规划，也不从事冒险活动。"它对理智的逻辑无动于衷，但对武力的逻辑却十分敏感。正因为这个缘故，它在任何地方遇到强大的阻力时，可以轻易地退却，而且常常如此。因此，假如对方拥有足够的武力，并清楚地表明准备使用武力，这就几乎用不着真的动武。""美国对苏联政策最主要方面就是长期的、耐心但坚定和保持警惕的对俄国扩张倾向的遏制。"这一政策就是要"在俄国人露出侵害世界和平与稳定迹象的每一个点上，使用不可更改

① *Foreign Affairs*, July, 1947.

的反击力量"[1]。

那么，凯南的这些论述与麦金德、斯皮克曼等人的观点究竟有多少联系呢？关于这一点，凯南否认他的论述与麦金德有任何联系[2]。实际上，我们通过对麦金德、斯皮克曼等人的论述和凯南的理论的对比分析不难发现，凯南的理论在很大程度上相同于麦金德的"第三次论证"所得出的结论和斯皮克曼的"边缘地带"说。麦金德所得出的最后结论是："如果苏联在这次战争中以德国的战胜者出现，它必然会被列为地球上最大的陆权国家。而且，它还将是处于战略上最强防御地位的强国。心脏地带是地球上最大的自然堡垒，在历史上它是第一次布置足够数量和质量的驻军。"[3] 斯皮克曼在"边缘地带"假说中预言："如果在欧亚大陆的周围建立起新的工业力量及交通中心，那么欧亚大陆的'边缘地区'在战略上将比大陆心脏更为重要。"[4] 而作为职业外交家的凯南通过对苏联直接的考察将地缘政治学者的观点系统化、具体化了，并与一个大国的对外战略直接联系起来，他指出，苏联"在他们认为时机适合和有希望成功的一切地方作出努力来推进苏联政权的正式疆界。在目前，这种努力暂限于某些临近的，被认为战略上直接需要的地点，如伊朗北部、土耳其，也许还有波尔霍尔姆（丹麦的一个岛屿——作者）。但是，一旦潜在的苏联政治力量扩张到新的地区，其他地方随时都可能发生问题"[5]。"我们的目标就是防止整个欧亚大陆的军事——工业潜力

① *Foreign Affairs*, 1947, P. 575、P. 581.

② W. H. Parker: *Mackinder, Geogrophy as an Aid to Statecraft*, P.192.

③ *Foreign Affairs*, 1943, *Vol*-21, *No*. 4, P. 601.

④ [美] 詹姆斯·多尔蒂，小罗伯特·普法尔茨格拉夫著，邵文光译：《争论中的国际关系理论》，第72页。

⑤ W. H. Parker: *Mackinder, Geography as an Aid to Statecraft*, P. 192.

集中于一个对世界岛屿和大陆构成威胁的大国之手。”[①]有学者评论说，这一论述就是“直接出自麦金德的‘心脏地带’理论”[②]。

不管凯南如何否认其论述与地缘政治理论之间的渊源，两者之间的联系已昭然若揭，这正如费希尔（Fisher）所言：“每一个熟知麦金德或斯皮克曼著作的人都不可避免地要受到这些地缘政治概念的启示，即扩张主义的‘心脏地带’权力凯觎周围边缘地带的薄弱点。”[③]凯南本人早在大学时代“就深受地缘政治学的影响”[④]。果真他的论述与麦金德、斯皮克曼等人的地缘政治概念并无联系，那么，这倒成了这位头号“苏联通”的一大缺憾。我们无法考证凯南为何在这一点上遮掩自己，实际上，不少学者都已明确指出了地缘政治学说与凯南的论述以及与美国遏制政策之间的联系，英国著名学者W. H. 帕克尔指出：“麦金德的理论奠定了美国遏制政策的基石。”《争论中的国际关系理论》一书的作者也认为：“边缘地区假说构成了乔治·凯南在战后提出的下述著名论断的理论基础，这一论断是，要对苏联实行遏制政策。”[⑤]“凯南的战略是以斯皮克曼的观点为基础的，更确切地说，是直接以麦金德的思想为基础的。”[⑥]

无疑，凯南的论述直接影响了杜鲁门政府的对苏战略的确立与实施，但是，又不能过分夸大这种影响作用，否则就会引起种种误解。实际上，杜鲁门政府“遏制”战略的形成受制于多种因素。决策者们同样也熟知马汉、麦金德和斯皮克曼等人的观点，他们并未

① W. H. Parker：*Mackinder, Geography as an Aid to Statecraft*, P. 192.

② W. H. Parker：*Mackinder, Geography as an Aid to Statecraft*, P. 192.

③ W. H. Parker：*Mackinder, Geography as an Aid to Statecraft*, P. 192.

④ 张小明：《乔治·凯南遏制思想研究》，第133页。

⑤ ［美］詹姆斯·多尔蒂、小罗伯特·普法尔茨格拉夫著，邵文光译：《争论中的国际关系理论》，第72页。

⑥ Geoffrey Parker：*Western Geopolitical Thought in the Twentieth Century*, P. 137.

因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德国地缘政治学派的声名狼藉而抛弃地缘政治学理论，“杜鲁门主义”的确立和推行充分说明了美国战略决策与地缘政治学理论之间的关系实质。1947 年 2 月 21 日，英国政府照会美国政府，英国无法再给希腊和土耳其以财政和军事援助，希望美国挑起这负担子。在美国看来，希腊、土耳其是大陆边缘地带的主要“点”(Point) 之一，如果美国听任这一地区的共产党势力得到壮大，那么，边缘地带上众多的“点”将会连锁反应，夺取土耳其后，紧接着必然要波及希腊、伊朗等，共产主义的最大目标就是控制东地中海和中东。因此，1947 年 3 月 12 日，杜鲁门在国会参众两院联席会议上宣读咨文，要求国会在 1948 年 6 月 30 日以前向希、土提供 4 亿美元的援助，这是官方对边缘地带政治含义的一次公开表白。

除希、土之外，美国要在边缘地带的众多“点”上施加影响，防止这里政治边界的变更或位于欧亚大陆边缘地带的某些国家政权发生变化。在欧洲，美国通过“北大西洋公约” (North Atlantic Treaty)确立了与欧洲西部权力地带的政治和军事联系，这一条约决非一时冲动所致，而是对历史教训的总结，即要防止欧洲受近于单一权力之手，否则将危及美国的安全，显然，官方已认识到欧美之间的地理距离已不再是美国安全的最佳因素，在这一点上，麦金德的论述与美国政府的认识是相同的，尽管他们在用语上不同（麦氏称为“陆地中心海洋”，美国政府称为“大西洋共同体”），但其涵义是一致的，只有地理上位于欧亚大陆边缘地带欧洲西部的国家与美国结盟，才能平衡苏联与东欧的结盟威胁。

这一时期对美国政府震动最大的事件是中国政局的变化，1949 年 10 月，中国的政治地图变为了和苏联同样的红色，美国政府把这一事件看成它历史上最大的外交失败。对欧亚大陆边缘地带亚洲部分的遏制一时间在美国的全球战略中占据了极其重要的地位，它们把这一变化当成边缘地带政治边界变化和政权变更的典型，对这一“点”的遏制目标就是要阻止共产主义的威胁蔓延到新的地区，以免

发生“多米诺骨牌”式的连锁反应。

自此以后，美国政府决策者对“遏制”的含义进行了新的解释，1950年4月国家安全委员会的第68号文件（NSC68）指出，所谓“遏制”就是指：“除了战争以外的所有手段去围堵苏联权力的进一步扩张；揭露苏联的虚伪；诱发对苏联控制和影响的反叛；在苏维埃制度内部催发其毁灭的种子，使其行为达到能接受的国际标准。”[1] 同凯南的解释不同的是，NSC68特别强调利用军事力量进行遏制，除此之外，“NSC68对苏联的认识和所主张的美国的对策同凯南的遏制思想基本吻合”[2]。1950年6月，北朝鲜军队攻过“三八”线这一事件进一步加重了决策者们的担忧，要对付日益严峻的共产主义渗透的威胁，美国必须采取直接的军事介入，这是美国地缘政治安全的高度协调所必须的。1950年至1953年间的朝鲜半岛冲突从地缘政治上而言“可看成是一场典型的陆权与海权之间的斗争”[3]。其结局可谓是“双方满意”：一方面，“遏制”战略的支持者们庆幸“共产主义的渗透已受到联合国军事力量的有效阻止”；另一方面，大陆世界内部在经历过此次军事对抗后感到成功地打击了美国的侵略扩张气焰，其军事“遏制”的水平至此而止。然而，自50年代初后，军事对抗的气氛确实加重了，非共产主义世界的欧亚大陆边缘地带纷纷仿效“北约”(NATO) 建立了广泛的联盟体系，其中包括“巴格达条约”(CENTO) 和“东南亚条约组织”(SEATO)，这些都是在美国的直接授意下建立的。同时，美国还在欧亚大陆边缘地带的战略要点和薄弱点积极插手，拼凑军事同盟体系，这些“点”是朝鲜半岛、日本、菲律宾、台湾、澳大利亚、新西兰等，这些再加上

---

① NSC 68.

② 张小明：《乔治·凯南遏制思想研究》，第121～122页。

③ Geoffrey Parker: *Western Geopolitical Thought in the Twentieth Century*, P. 138.

上述两个条约组织与北大西洋公约组织连在一起，形成了在边缘地带对大陆“心脏地带”的遏制堤坝。边缘地带若干“点”连接为“线”的实现者是美国而不是苏联。这一时期的所有这些事实无不证明地缘政治学理论与美国现实战略决策之间的联系。

作为职业军人的艾森豪威尔于1952年执掌白宫政权后，对国家战略决策的地理范围进行了新的表述。他批评对苏联扩张的简单遏制是不道德的，也是消极的，“杜鲁门和艾奇逊所推行的线性遏制战略未能在任何地方得到加强，处处失败”[1]。为此，艾森豪威尔与他的搭档杜勒斯使用了“解放”(Liberation)一词来进行战略表述，即通过战争以外的手段，利用道德的宣传和心理上的进攻，使苏联的盟国和一些亚洲国家摆脱苏联的控制而得到解放，从而将苏联的势力范围推回去。

除了采用“点”和“线”来表现美国与位于欧亚大陆边缘地带的各个国家的政治和军事关系外，艾森豪威尔政府还发展了“多米诺骨牌”理论，以此作为其政治宣传的工具。在他们看来，一种防御政策永远无法取胜一种扩张政策，“多米诺骨牌”理论较之“点”或“线”更能从地缘意义上显示美苏势力的变化。亦即，假若你排好一排多米诺骨牌，只要击倒第一个，那么必然的后果就是迅速发生连锁倒塌现象，直至最后一个，因此，一旦发生，影响将是最为深刻的。涉及现实的事件，如若边缘地带上某个“点”被共产主义世界所夺取，那么其他“点”将在所难免，中国丢失后，接着就要轮到印度支那、缅甸、泰国、马来西亚和印度尼西亚，进而波及防御链上的日本、福摩萨、菲律宾以及南端的澳大利亚和新西兰。至此，美国不仅丧失了在这些区域的丰富的自然资源、人力资源等，而

① G. R. Sloan: *Geopolitics in United States Strategy Policy*, 1890—1987, P. 144.

且还将面临本土的安全，因为此后陆权对海权的挑战将最为现实。

正是受此种地缘政治理论的操纵，艾森豪威尔政府在军事上提出了“大规模报复战略”(Massive retaliation)和“战争边缘战略”，前者声称美国将“主要依靠一支庞大的报复力量，它能够用我们选择的武器和我们选择的地方马上进行报复”[①]。显然这是对苏联的行为进行恫吓，目的在于使苏联保持克制；后者则是一种冒险战略，旨在同苏进行一场战争游戏，是典型的心理战。50年代，遏制体系得到了全面巩固，除前面提到的军事同盟体系外，艾森豪威尔政府加强了直接军事介入，“苏伊士运河危机”[*]导致了艾森豪威尔主义的出笼，苏联插手这一地区是美国绝对不能容许的：一方面，这里蕴藏着丰富的石油资源，具有经济上的战略意义；另一方面，中东是欧亚大陆和非洲的门户，具备重要的政治和军事战略意义。印度支那是美国必须认真对待的另一个“点”，并将之与中国大陆和朝鲜半岛的局势联系在一起，艾森豪威尔政府不仅“承担了法国对印度支那战争的一半费用”[②]，而且还多次对中国进行威胁。

肯尼迪当选美国总统之时，美国的战略决策在下列两个方面已达到顶峰：一方面，这一时期美国混乱的全球干涉政策已至极点；另一方面，美国的全球观念基于这样一种假设，即涉及美国与位于周边国家间关系的所有政治变更都将受制于特殊的地缘政治理论——必须沿整个欧亚大陆边缘地带建立一条防“线”。肯尼迪入主白宫后，

① 陈峰君等：《世界政治经济和国际关系》，广东高等教育出版社，1986年，第41页。

* 1956年7月26日，埃及的纳赛尔政府宣布将苏伊士运河收归国有，准备将运河每年1亿美元的收入，移作修建阿斯旺水坝的资金。这一行动引发了一场中东危机。

② ［美］阿瑟·林克、威廉·卡顿著，刘绪贻等译：《1900年以来的美国史》（下），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3年，第87页。

提出了一个新的地理术语——“新边疆”(New Frontier)，一般意义上而言，这一术语甚至包含了国内问题的众多主题，诸如教育、自动化、闲暇时光等，但它更多地是与外交政策联系起来。和“多米诺骨牌理论”一样，“新边疆”是用于向公众解释发生于欧亚大陆边缘地带的政治事件及其对美国安全的直接影响的地理术语，这一新用语反映出肯尼迪政府意欲将“遏制”政策运用得更有效、更有力。要想在欧亚大陆的边缘地带保持优势并阻止苏联的进一步扩张，必须在边缘地带国家间确立一条线，否则遏制将是不成功的，不管付出多少政治代价，这一目标不能更改。在60年代，边缘地带的薄弱点位于东南亚地区，共产主义对这一地区的威胁最直接、最现实，而从地缘地位上而言，自由世界的根基处于劣势，如果美国不施加决定性影响，这里的岛屿前哨站也将丢失，包括菲律宾、日本、台湾（当时美国不承认中华人民共和国，更不承认台湾是中国的一部分，故将台湾与其他岛国并称为反共前哨站。——作者注）等，浩淼的太平洋将变成红色的海洋。这正是美国在越南大打出手的重要地缘政治考虑。

不仅如此，肯尼迪政府的决策者们很少注意到武器及运输、通讯技术的巨大进步，坚持19世纪就已形成的空间关系与历史原因间基本关系模式，认为国际权力争斗的焦点仍然是位于大陆边缘的海权国家与企图寻找突破包围圈的陆权国家的对抗。海权国家在60年代所面临的最大危险位于印度洋和太平洋的次大陆地区，美国的安全因此受到了严峻挑战，为此，美国遏制及扩张的主战场包括整个南半球——亚洲、拉丁美洲、非洲和中东，其防御政策明显改变。反映在军事战略上，肯尼迪政府改“大规模报复战略”为“灵活反应战略”(flexible response)，指出：“……我们的防御姿态是灵活而确定的，任何潜在的侵略者利用任何武器（常规的或核力量）对自由世界任何部分的攻击都必须考虑，我们的反应将是适当的，迅速的

和有效的。"[1]为了显示美国的决心，到1962年向越南派遣的军事人员由500人增加到了10000人[2]。美国坚定不移地接受了考验——防止边缘地带的任何一个国家落入共产党之手。

1962年10月的古巴导弹危机（The Cuban missile crisis）是对美国政治历史的地理模式最严重的挑战，苏联不仅要在欧亚大陆的边缘地带割断海权国家的防御链，而且还将扩张的地理范围延展到了西半球。苏联在它所支持的南美国家古巴部署的导弹攻击点从地理范围而言几乎覆盖了整个美国。赫鲁晓夫（Krushchev）掌握的苏联的这次冒险行为加剧了美国的不安心理。1963年林登·约翰逊（Lyndon Johnson）继任总统后，将"灵活反应"战略改为"逐步升级"战略，强调指出，南亚任何国家向美国提出的保卫其自由的要求都将得到满足，至此，美国的遏制思想达到了顶点。

## 4.3 地缘政治学说与尼克松—基辛格的总构想

尼克松入主白宫后，在对外关系上面临的主要政策难题是越南战争问题。美国军队在越南及印度支那地区的军事行动及其结果使政府既不可能继续将之视为取得遏制成果的关键地区，也不可能继续在广大民众中形成舆论共识。越战的失败一时间导致了公众对政府外交政策的普遍怀疑，同时也对其理论土壤中的地缘政治理论提出了批评。美国在印度支那的行为是地缘政治理论在美国的运用达到顶峰的标志，也是其失去信任、再次声名狼藉之缘由。可以说，越

---

① Documents on american foreign relations 1961. New York: Harper Bros, 1962, pp. 154～155. from *Geopolitics in United States Strategic Policy*, 1890—1987, P. 153.

② G. R. Sloan: *Geopolitics in United States Strategic Policy*, 1890—1987, P. 153.

战之后，美国政治地图中的地理结构发生了急剧变化，这一点充分表现在尼克松—基辛格政府的外交政策理论和目标中。

尼克松挑选了在外交理论上极具远见卓识的亨利·基辛格（Henry Kissinger）博士充当他的搭档，正是他俩的合作制定了美国在新时斯外交政策的目标，即在国际社会中建立"均势"（Balance of Power），这一目标同样也是出于地缘政治的思考。在基辛格看来，要在两个超级大国之间建立遏制均势，首要的原则是国家利益，基于此而确立的外交政策目标包括三个方面：

第一，成功利用桑斯科与国际共产主义运动间的分歧与对立，在进行世界力量的地理划分时，要考虑到共产主义世界的较大差异，它们并非坚如磐石。

第二，考虑到苏联关于国家间关系理论体系的变化，致力于在苏、美两国间就所有重大分歧问题达成解决协议，确立均衡状态，进而在国际社会中建立规范。越南问题不论在过去还是尼克松时代，都"是对美国的意志和信誉的重要考验"[①]。从地缘政治意义上而言，越南及其相邻地区在美国的政治地图中的地位没有改变，然而，在尼克松时代的做法是完全不同的，既然全面卷入无法达到预期目的，那么改变方式成为必由之路，尼克松—基辛格旨在"使越南战争能有某种令人满意的结局"[②]，也就是在这一地区确立持久的、稳定的和平结构。美国虽无法取胜，但也要防止越南落人共产党之手，否则"将使我们在寻求稳定、牢固和持久的和平努力中付出无法估量的代价"[③]。与共产党国家谈判，在印度支那建立双方都满意的和平，才可能保持整个边缘

① ［美］丹·考德威尔著，何立译：《论美苏关系》，世界知识出版社，1984年，第66页。

② ［美］阿瑟·林克、威廉·卡顿著，刘绪贻等译：《1900年以来的美国史》（下），第252页。

③ ［美］丹·考德威尔著，何立译：《论美苏关系》，第66页。

地带的稳定，世界其他地区的安全才能得到保障。美国要抽出身来充当均势体系中所谓“平衡者”(balancer)的角色，它要随时注意世界权力天平的变化，一旦相互对立的力量双方发生对比失衡状况，它将运用手中的筹码制造新的均衡。这和美国在19世纪所追求的角色地位相似。

第三，强调武力与外交同等的重要性，这样美国的安全将不会因地球上任何地区的混乱状况而受到威胁。为此，尼克松政府并未因地缘政治结构的变化而放弃用地缘政治学的方法来思考和谈论问题，尼克松在其《真正的战争》一书中仍然把俄国描绘成“心脏地带”，明确表示麦金德的学说在美国的全球战略决策中具有长盛不衰的力量[①]。所不同的是，尼克松政府舍弃了激烈冷战年代的地缘政治学术语“点”和“线”而代之以“地区权力结构”(regional power structures)和“地区霸权”(regional hegemens)，用它们来表现美国与欧亚大陆间的关系，显然，决策者们不再认为苏联攫取了欧亚大陆联系的内线并将扩张的矛头直指欧亚大陆一系列的“点”(它们在政治上和地理上都无力单独抗衡苏联，除非连成一条线)。

“地区权力结构”属于种族——地理概念，它在美国尼克松政府时期的作用和地位充分说明了美国政府的战略决策与地缘政治学说间的关系，它“假设各个特殊地区在政治、文化和地理上是同质的”[②]，因此，基辛格博士及其同僚赋予它们现实中并不具有的政治重要性或某种重要特性。在欧亚大陆边缘地带所确立的新的地区权力结构覆盖了所有在政治、文化和地理上不同的地区，决策者意欲将这些地区权力合而为一，使之发挥统一的影响力。这一概念作为外交政策行为中鲜明的地缘政治传统的一部分，隐含了必须完成的

---

① W. H. Parker: *Mackinder, Geography as an Aid to Statecraft*, P. 187.

② G. R. Sloan: *Geopolitics in United States Strategic Policy*, 1890—1987, P. 173

重要战略目标，其一是赋予尼克松政府所进行的外交行动以必要的权威，从而为美国政治、经济和军事上的衰落进行粉饰；其二是对美国与某些先前认为关系到美国政治及军事安全的地区之间的关系进行再解释，美国的外交政策目标中的地理范围在减少，在地区权力结构中追求政治稳定是第一位的。

接着我们要分析的是基辛格的外交政策理论与传统地缘政治学理论间的关系问题。关于这一点，基辛格从未将地缘政治理论界定为对外关系或影响全球事务的国家问题的地理方面，同时，他也并不认为地缘政治理论就能引起对政治历史的某些地理特征重要性的注意，相反，他将地缘政治学界定为一种导致建立均衡需求的观点，但均衡需求究竟意味着什么，基辛格从未进行过完满的回答，这只能说，基辛格的地缘政治理论与麦金德和斯皮克曼的传统地缘政治理论之间存在某种联系。麦金德在他的“心脏地带”理论中就曾强调有利于俄国的均势对海权国家而言是危险的，俄国在欧亚大陆边缘地带的扩张将使它能够利用额外的人力和自然资源来进行舰队建设[1]；斯皮克曼也指出了维持均势的重要性或在整个欧亚大陆边缘地带保持优势的深远意义。尽管我们不可能找到任何历史事件来证明基辛格的政策与某些地缘政治学者有直接瓜葛，也很难验证现实的外交政策与地缘政治理论间的联系，但确有一些方面能够说明这种关系的存在。

首先，在东北亚这个点上，1904年麦金德在进行他的公式论证时，将日、俄之间在满洲里的冲突看成是俄、中、英三个帝国之间为争夺政治统治权的争斗，同样，在尼克松的心目中，这一地区是“相互影响的地点”。所不同的是，麦金德和尼克松—基辛格的解释包含了不同的政治目标。他们是为美国的政治、军事和经济衰退进行掩饰，指出：“亚洲特别是东北亚是我们这个世界五大力量中心中

① ［英］麦金德：《历史的地理枢纽》，第61页。

的四个力量间的相互影响地区，中国是这一广阔地带的心脏地带。”[1] 除此之外，还有俄国、日本岛和美国。他们对于力量中心的分析反映出美国政府从明确的全球主义向混乱的全球主义的转变。地缘政治学因此被解释成了均衡的同义语，在这一均衡体系中，以前的政治地图已经改变，共产主义阵营的裂变使世界力量呈现多角关系，或更精确地说，呈现三角战略关系——中、美、苏。中、苏两大共产主义国家的分歧说明，单一的共产主义力量得到了增长，而全球范围的共产主义运动则遭到了损伤。

其次，基辛格的地缘政治学理论也显现了与传统地缘政治学的联系，他认为，政治控制或均衡不仅是拥有权力的问题，而且是权力是否在某一结构中发挥作用的问题，地区霸权者就是那些位于特殊结构中的国家，他们在这些地区的军事控制和权力优势争夺中扮演着特殊的角色。可见，基辛格的地缘政治学集中体现在军事均衡方面。一个明显的例证是，他把伊朗当成是阻止苏联南下和进入中东地区的最合适的屏障，要利用各种条约组织，充分发挥地区霸权者的作用，这样，在美国全球战略收缩之际，位于边缘地带的任何国家的政治边界的任何变更或政治管辖权的任何变化，将不会危及美国的安全。在所有这些变化中，美国充当着“平衡者”的角色，其目的在于保持苏联势力范围与周边地区的平稳，并防止周边地区因过于脆弱而落入欧亚大陆心脏地带之手。

1973 年的赎罪日战争（Yom Kippur War）则反映出了基辛格地缘政治理论的又一特点。一方面，将地缘政治学解释为均衡的同义语，实际上为决策者提供了判断事件进程的方法，据此，美国认为应及早干涉，防止苏联在地区权力结构中既成事实的政治边界变更，

---

① G. R. Sloan: *Geopolitics in United States Strategic Policy*, 1890—1987, P. 175.

同时，将这一事件所牵连的大国（特别是核大国）减少到最低限度。众所周知，中东地区的任何一场冲突都必然会迅速波及众多的力量；另一方面，如若地区权力结构中或全球大国将国内政治和意识形态同外交政策分割开来，区别对待，那么，秩序的变化和建立合理的国际秩序并非难事。从全球范围内而言，将国内的意识形态与对外政策分割开来的目的在于使苏联受制于与坚实的西方世界关系的羁绊，阻止它向第三世界的渗透。在美国统治集团看来，苏联不再试图获取在边缘地带的政治优势，冷战时期已经形成的地理划界在很大程度上为苏联所接受或承认，"权力真空地带"成为争夺的焦点。实际上，基辛格的地缘政治理论强调两个方面，一是仍然强调欧亚大陆边缘地带的有利于美国的"均势"，这里是美国安全之所在；二是在此基础上，美国以一个"平衡者"的姿态出现，全方位介入全球的任何地区，阻止苏联势力范围的延展。

要建立同苏联的"均衡"，基辛格必须克服传统地缘政治学者的一大缺陷，即麦金德等人在他们的地理公式中没有充分考虑工业能力增长的可能性。实际上，到了 20 世纪 70 年代，苏联在未攫取边缘地带的人力和自然资源的情况下，依靠自身工业能力的发展，生长为一个强大的海权国家，因此，在基辛格的地缘政治理论中其最终目的是要在全球确立与苏联的军事"平衡"。为了实现这一目标，尼克松—基辛格的构想中是一个稳定的三角关系。除了利用"地区霸权主义者"在地区权力结构中扮演重要角色外，基辛格尤其注重中国在遏制苏联方面的作用，中、苏争端和分歧为基辛格展示了一个绝好的历史机遇。这两个大国占据着欧亚大陆（心脏地带或世界岛）的大部分地区，而意识形态的面纱一旦被现实的国家利益（民族利益）所取代，所有的历史格局就水到渠成了。中苏分裂后，"美国是理解中国所处的困境的，它可以相隔二十年以后第一次向太平洋彼岸伸出友谊之手；而中国则在文化革命之余立足未稳，又惴惴

于苏联重兵压境，因而很可能欢迎美国的姿态"[1]。在三方都极为敏感的军事领域，基辛格认识到："俄国人进攻中国的可能性大大超过中国人进攻俄国人的可能性。"[2] 中国方面"言辞激烈，但行动沉着"[3]，因此，意识形态因素的退位和"缓和"的必然趋向使美国人从容实现了他们的目的，即利用共产主义世界出现的分裂，"遏制苏联和中国并抑制激进的革命而造成地缘政治方面的力量平衡，即'均势'"[4]。

从全球意义上而言，尼克松一基辛格的总构想的确取得了不小的外交成就，但是，在这些成就的背后却隐藏着不可避免的副产品：一方面，美国过高地估计了大国之间三角关系的重要性，特别是利用中国遏制苏联的作用；另一方面，他们错误地认为第三世界仍由大国来操纵，那里的局势稳定与否取决于大国介入的程度。实质上，美国（苏联亦如此）是打着"缓和"的旗帜在干着冷战时代延续下来的勾当（甚至有过之）。到了吉米·卡特年代，政府用"地区权力结构"和"地区霸权"来解释美国与边缘地带国家间关系的内涵发生了转变，转而强调外交政策传统中的"人权"问题，指出："因为我们是自由的，所以我们不能对其他地方自由的命运漠不关心"，"尊重和维护基本权利和自由将是本届政府的基本职责"。伊朗国内出现的政治危机成为卡特人权攻击的重要目标，认为，伊朗王国政府统治下的人民缺乏基本的权利和自由是美国政府所不能接受的。

---

① [美] 驭·卡尔布、伯纳德·卡尔布著，齐沛合译：《基辛格》，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75 年，第 349 页。

② [美] 驭·卡尔布、伯纳德·卡尔布著，齐沛合译：《基辛格》，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75 年，第 349～350 页。

③ [美] 驭·卡尔布、伯纳德·卡尔布著，齐沛合译：《基辛格》，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75 年，第 350 页。

④ [美] 托马斯·帕特森等著，李庆余译：《美国外交政策》（下），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9 年，第 776 页。

显然，美国政府给予这个国家足够的重视是源于19世纪的传统地缘政治学阴魂不散的必然，在尼克松—基辛格的“地区权力结构”中，伊朗是个关键地区，到卡特政府时期，他在强调人权时仍然把伊朗作为地区权力结构变化的最敏感地区之一，可见，在美国的外交决策中，这样一个信条是始终未变的：边缘地带的海权与欧亚大陆心脏地带的陆权相对抗，海权国家要阻止陆权国家在波斯湾地区夺取入海口。而一旦伊朗政府变成了对苏友好的政府，他们传统的信条将被击得粉碎。

正当卡特政府为美伊关系的恶化焦虑不安时，1979年12月27日，苏联直接出兵入侵一个不结盟国家阿富汗，卡特政府认为：这一事件是苏联利用自己的军队扩大势力范围的新步骤，“这在他们1948年2月推翻捷克斯洛伐克并在那里建立苏联的傀儡政府以来还是第一次”①。“苏联入侵阿富汗是实现它南下政策目标的第一步，第二步就是伊朗和巴基斯坦，控制波斯湾和印度洋，进而威逼中东。”② 对于这一“地理政治挑战”，美国朝野的反应都十分强烈，卡特在1980年1月23日的国情讲话中指出：波斯湾和印度洋地区是美国利益至关重要的地区，“外部力量企图控制波斯湾的任何尝试都将被视为是对美国切身利益的进攻。美国将使用一切必要的手段——包括军事力量在内——打退这种进攻”③。

罗纳德·里根执掌美国政权后，地缘政治学与美国现实外交战略间的关系实质虽再次发生了急剧转变，但下列几个方面却是得到了延续：一是要遏制苏联的扩张，美国必须保持在某些地区的政治

① [美]吉米·卡特著、卢君甫等译：《忠于信仰——一位美国总统的回忆录》，新华出版社，1985年，第551页。

② 刘竞、张士智、朱莉：《苏联中东关系史》，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7年，第265页。

③ K. Jadson Mitchell: *Ideology of a Superpower—Contemporary Soviet Doctrine On International Relations*, *Stanford University*, 1987, *P*. 37.

和军事优势；二是美国不得不随时准备保卫位于世界任何地区的某些国家的政治权力的变更或政治边界的更改；三是某些地区被视为具有政治上的延展性，其不稳定可以由一个地区迅速波及另一地区。总的看来，里根时期，苏美之间的地缘政治争斗再次达到了新的高峰。他认为，只要苏联还存在，对美国的安全威胁就不会消除；世界上没有一个地区是与美国的利益无关的，苏联或任何一个敌对国家对任何地区的控制或影响都是对美国安全的威胁，这一指导思想赋予了里根“新遏制”政策的更大灵活性。不过，里根政府不会重蹈越战的覆辙，介入一场旷日持久的地区冲突中去，这就要求其威慑力量的迅速增长和更具成效的外交。

我们可以从三个方面来分析里根时期的战略决策与地缘政治学之间的关系。

首先，20 世纪 40 年代形成的遏制理论重新在美国的全球战略中占据了主导地位。斯皮克曼关于边缘地带的理论和地缘政治学的术语“点”、“线”再度操纵了里根政府决策者们的言行。遏制理论的复活从根本上而言是要在欧亚大陆边缘地带重新获取政治和军事上的优势。十年缓和期间，苏联在中东、非洲及其他地区建立了一个又一个的军事前哨基地，他们在也门、埃塞俄比亚和阿富汗的军事存在严重危及中东地区和世界的和平，而且他们并没有停下来的意图。因此，里根政权所言的“点”不再仅仅是指欧亚大陆边缘地带，而是指全世界的所有利益“点”。由于以前美国所选择的伊朗发生了美国不能接受的革命，里根政权在中东地区重新进行了“点”的抉择，沙特阿拉伯成了美国在海湾地区实现政策目标的首要盟国。沙特阿拉伯的地缘政治重要性包含两层含义：一方面，它过去是，现在仍然是首要产油国；另一方面，它在阿拉伯世界中潜在的领袖地位。可见，里根政府不仅要借助沙特阿拉伯控制中东的主要石油出口，而且还要利用这一“点”，控制与之相连的阿拉伯世界，并进而全面掌管印度洋及波斯湾地区，因为这里是美国主权延伸的主要地

区和国家安全的关键。

同时，南部非洲（尤其是好望角）也在里根政府的地缘战略中重新得到了重视，这里是仅次于中东地区的西方经济生命线。

其次，同尼克松—基辛格的构想一样，地缘政治理论被解释为建立均衡需求的同义语，它要求美国尽早介入冲突和摩擦中去，维持现状（即已存在的均势）。自尼克松时代以来，美国统治阶级上层面临的困境在于：一方面他们要在全球维持均势（特别是防止苏联势力范围的扩张）；另一方面他们又要避免再次卷入一场类似越战的地区冲突中去。这就要求他们尽早介入，防止现状被打破或在事端的前期迅速恢复和平。为此，里根政权指出："总而言之，我们的地缘政治战略就是维持有效的遏制，支持我们的盟国，同重要的地区权力建立新的友谊，阻止威胁，与地区国家进行合作，缓和紧张局势，促进争端解决。"[①]

其三，地缘政治理论与美国外交战略间关系最重要的方面，也许是里根及其幕僚们在"宿命论"和太平洋对于美国安全的政治重要性之间所确立的联系。由此，我们可以明显地看到美国决策者们的政策抉择受到了地理划分和特殊地理区域的影响，对太平洋地区浓厚的兴趣自然也就溢于言表："我们并非是把太平洋看成'美国的内湖'，而是强调我们在那里的责任和合法的国家利益。我们有史以来就是一个太平洋地区的国家。我们为此而骄傲，为我们曾经对这一地区的发展与繁荣所作的贡献而骄傲。"[②]

---

① *Reflections on United States—Soviet Relations*, Department of State Bulletin, August 1985, P. 55. From *Geopolitics in United States Strategic Policy*, 1890—1987, P. 197.

② *The Strategic Importance of the Emerging Pacific*, Department of State Bulletin, December 1986, P. 75, From *Geopolitics in United States Strategic Policy*, 1890—1987, P. 199.

综上所述，尽管地缘政治理论在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臭名昭著，但在战后仍然长盛不衰，传统地缘政治学理论在主要大国中依然广为流行，并得到了与现实格局进程相适应的新发展，成为指导决策者言行的不容忽视的理论因素。地缘政治学理论在美国的发展是极为引人注目的，马汉的“海权论”和麦金德的“陆权论”融合在一起，构成了战后美国对外战略中的地理思考，其现实的战略虽几经变化和调整，但地缘政治的分析却没有发生根本转变，海权国家与陆权国家的全面对抗是这种分析的现实基础，在这一对抗中，美国取代了传统的英国海上地位，历史上的英俄对抗变为了美苏对峙。值得注意的是，科技的进步和交通运输工具、通讯手段的改进，的确已引起了传统地缘政治理论的重要变化，现实的世界政治地图也在发生变更，国家间关系的内容同时进行着日益明显的转换，这些因素将对地缘政治学理论的未来发展产生深刻影响。尤其重要的是，80年代末以来，世界政治地图发生了令人眩晕的重组，它对传统地缘政治公式提出了严峻挑战，也使美国的对外战略面临严峻考验。有关问题我们将在本书的最后一章中论述。



# 心脏地带与俄苏权力

“从根本上决定国家外交和军事事务模式的独特的政治文化源于独特的民族历史经验，而民族历史经验又是独特的民族地理条件的反映。”① 将这一公式应用于欧亚大陆那一片由俄国（苏联）控制的广袤空间是颇为恰当的。本书之所以将俄苏权力作为单独的一部分来论述，就是因为要在久远的国家发展史和“较广的地理概括”之间寻求某种联系，离开欧亚大陆这一块地区的发展史是不可能的，历史上的和当代的所有地缘政治学家毫无例外地都是以此为依据来论证他们的公式的。俄苏的兴衰充分反映了“陆权”与“海权”的对抗和力量对比。下面我们将就心脏地带与俄苏权力的发展进行论述。

## 5.1 西进：夺取入海口和消除不安全因素

从历史渊源看，俄国发端于内陆，麦金德在1904年的论文中指出：“早年的俄国和波兰完全是在林中空地立国的。”② 不仅如此，它在以后的征服活动中实际囊括了一望无际的平川地带，“没有自然障碍是俄罗斯周围环境的基本条件”③。这种自然环境条件形成了俄国

---

① Colins. Cray, *The Geopolitics of the Nuclear Era*, *Crane*, *Russak* & Company, Inc, New York, 1977, P. 33.

② ［英］麦金德：《历史的地理枢纽》，第50页。

③ 亨利·赫坦巴哈等：《俄罗斯帝国主义》，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78年，第3页。

特殊的政治性格：一方面，广阔的平原及其毫无防卫的边界使得它易受敌人的攻击；另一方面，平原地带不易划定边界，这里纵横交错的河流又助长了向海洋推进的强烈欲望，沿水路移动是任何一种社会结构或政府的必然选择。

从16世纪中叶到18世纪初，沙皇俄国发动了一系列的武装占领和蚕食活动，它由一个小小的公国生长为一个大国，领土面积达到1400多万平方公里，然而，那时它仍然是一个与海洋隔绝的内陆国家，这种状况对于一个力量激剧增长的国家来说是不合理的，这正如马克思所言："对于一种地域性蚕食体制来说，陆地是足够的；对于一种世界性侵略体制来说，水域就成为不可缺少的了。"① 尽管在它的北方是海洋，但在破冰船发明以前，那里是不可到达的，因为那片海洋一年中大部分时间是结冰的；而且，在那片海洋上航行对于俄国而言没有多少实际价值。因此，沙俄在当时的历史条件下选择了最近的波罗的海作为它夺取入海口的第一步。

波罗的海在地理上接近俄国的政治经济和文化中心，矿藏资源丰富，有天然的海港，部分港湾属不冻港，可常年通航。但是，这片"值得用黄金来衡量"的海域一直处在瑞典、丹麦、立陶宛、波兰等国的控制之下，为了夺取这一地区，从伊凡四世开始发动了一系列的侵略战争。1558年—1583年延续25年之久的战争反映了伊凡四世在位时期夺取通向波罗的海门户的坚定信念。彼得一世继位后，曾试图南下先夺取黑海的控制权，但未能成功，他转而向北再次以波罗的海为争夺目标。在他看来，瑞典是波罗的海的主要强国，只有打败瑞典，才能立足于这一地区。为了实现这一目标，彼得一世一方面采取外交手段，利用各利益国家间的矛盾，先后同波兰、丹麦、土耳其等国修好，签订停战和军事同盟条约，拼凑反瑞典的"北方同盟"（俄、波兰、丹麦）；另一方面，又积极备战，发动了

---

① 马克思：《十八世纪外交史内幕》，人民出版社，1979年，第80页。

"北方战争",战争进程虽几经周折,俄国最终还是占领了波罗的海沿海的大片土地。为巩固这一来之不易的成果,彼得一世还耗费大量人力物力修建了新都城圣彼得堡,将之作为俄国新的政治中心,从此,俄国由一个内陆国变成了濒海国。更为重要的是,彼得一世为完全控制波罗的海,不惜巨资来建立一支海军,认为:"只有陆军的君主是只有一只手的人,而同时也有海军才能成为两手俱全的人。"[1] 从1703年至1724年和短短21年的时间里,俄国不仅将瑞典赶出了东波罗的海,而且还建成了一支由几百艘战舰组成的海军[2],从一定意义上而言,俄国已是一个海军国家。

俄国的政治性格决定了它绝不会满足于仅仅夺取波罗的海东岸,这一胜利成为激发俄国进行新的征服的一种诱因,陆地上的不安全因素根本没有消除。文化上的孤立迫使俄国不断寻求同欧洲其他中心地区的交往,但是,这种试探带有极深的恐惧心理,同时,欧洲的众多国家对俄国的野心也是极为小心的。

夺取西线的入海口、建立海军和迁都圣彼得堡显示了俄国地缘政治扩张的新趋向。

首先,波罗的海和圣彼得堡成了"俄国得以俯瞰欧洲的窗户",它表明俄国不会在原有的内陆地位中生存,也不会听任自己的河流入海口控制在别人的手中。

其次,迁都至圣彼得堡的明显用意在于"有意给他的领土制造了一个外偏中心",从而使之"置于一个不能保证安全,甚至不能保证不受屈辱的地位"[3],这一行为一方面是对欧洲其他地区国家的直接挑衅,因为它标明,俄国的疆界没有划定;另一方面,这种冒险实质是激发俄国人进行新的更大规模的扩张。

---

① 《沙皇俄国的侵略扩张》,人民出版社,1978年,第51页。

② 各种史料的统计不一样。

③ 马克思:《十八世纪外交史内幕》,第81页。

其三，彼得大帝向俄罗斯种族传统的抗海本能提出了挑战，它斩断了“老莫斯科公国沙皇们的蚕食体制与大俄罗斯种族天赋的才能和抱负连接在一起的天然纽带”①，迁都以后，俄国在北方各邻国中的优势地位明显表现出来，而且也使俄国可以与欧洲所有国家保持经常接触，特别是与海上强国建立了相当程度的物质依赖关系。

俄国到达波罗的海后，那里传统的格局就被改变了，特别是海上的均势。同时，也形成了各有关国家共同抵御俄国的格局，它们要限制俄国在这一地区利益的进一步扩大，以此为核心的国际关系构成了欧洲国际关系史的重要阶段和组成部分。但值得注意的是：“19 世纪的轮船，以及 18 世纪晚期以来来自北美的海运物资方面的竞争，在某种程度上降低了俄罗斯帝国波罗的海部分的经济重要性。铁路的修建必然减少对通往波罗的海的河流和运河的依赖。”②（这并不否认其战略上的恒久意义。）

如何消除西部的不安全感是困绕俄国历代统治者的核心问题之一，除了夺取人海口对欧洲列强施加压力外，他们要在陆地上进行最大限度的蚕食活动，直到抵达不可逾越的天然疆界为此，然而，在向西的欧洲自然环境中，似乎没有俄国人较满意的这种障碍。积习已久的不安全感导致了它同它的邻国之间长期处于不能和解的紧张状态中。因为，“绝对安全的需求必然导致一个国家走上征服世界的道路”③（俄国是这类国家的典型），“俄国人的方式”就是领土扩张。在西进的过程中，波兰这个邻国成了俄国吞食的主要对象，历史上俄国伙同其他国家多次瓜分波兰，在这里建立一个缓冲地带是俄国与法国、德意志对抗的关键。众多历史事件证明，波兰是俄国受到攻击的前哨站，能否控制这一地区是俄国国家利益的根本。

---

① 马克思：《十八世纪外交史内幕》，第 81 页。

② 《俄罗斯帝国主义》，第 167～168 页。

③ Colins, Cray, *The Geopolitics of the Nuclear Era*, *P*. 35.

1772年—1795年，俄国正是通过伙同其他周边国家对波兰进行了三次瓜分而实现这一地区的均势的，俄国在这几次瓜分事件中“共鲸吞402 200平方公里的土地，占波兰全国领土的62%”[①]；而1812年开始的俄法战争是这两个陆权国家一次为夺取欧洲大陆控制权的厮杀。两国军队虽相差悬殊，但俄国借助广大的国土面积拖垮了拿破仑的军队。这次战争的结果对于俄国而言意义重大。一方面，俄国借此机会乘胜追击，联合周边国家打败了法国，从此，欧洲从法国的长期统治中解放出来，在大陆诸强中，俄国成了头号强国，它对欧洲事务的发言权达到了顶峰；另一方面，俄国利用分脏会议，重新确立了欧洲的领土划分，其中波兰的9/10被俄国兼并，从此，波兰被沙俄统治达一个多世纪，直到1917年十月革命后才获得独立。

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欧洲强国德国经由波兰等地对苏联的突然攻击再次极大地震动了苏联领导人。波苏接壤地区的平川地带为希特勒的进攻提供了天然的有利条件，因此，二战期间反法西斯同盟国美、苏之间在波兰问题上分歧颇大，特别是到了战争后期，在如何重建波兰问题上双方的意见大相径庭。哈里曼指出：波兰问题成为了美苏同盟关系的试金石。美国认为，应按民主的方式，让波兰人民自己解决自己的问题，苏联不应该分割波兰的土地，也不能将代理人强加给波兰。罗斯福总统建议：“成立一个由波兰的领袖们组成的总统委员会，该委员会可建立包括共产党人在内的五个政党为基础的政府。”[②] 然而，苏联的思维和行为与此是截然相反的，他们认为，波兰问题关系到苏联的安全。历史上侵略者对他们的两次

① 李明滨、郑刚主编：《苏联概况》，外语教学与研究出版社，1986年，第161页。

② 艾夫里尔·哈里曼、伊利·艾贝尔：《特使——与邱吉尔、斯大林周旋记》，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78年，第453页。

大规模的入侵都是经由波兰，这里是苏联政治中心的门户，因而“……我们拥护独立的波兰并愿意帮助它，但波兰必须有一个对苏联友好的政府”①。战争的进程使苏联完全可以按自己的意图行事，美国人对此却无能为力。这正如斯大林1945年与铁托的一席话所言：“不管谁都是将其自身的制度强加于他们所占领的土地之上的，任何人都是将其自身的制度强加于他的军队所能推进到的地方，绝无例外。”② 可见，苏联在波兰问题上的意图的行为具有双重意义：一方面，他们要把波兰地区变为苏联安全的防御屏障，因为，从沙俄至苏联政府和党的高级领导人“一辈子都生活在一种差不多是经常的恐惧和紧张状态中”③。波兰问题解决了，西部的不安全因素就在很大程度上得到了消除，既然无法找到一种天然的障碍，以一个邻国作缓冲地带是确保心脏地带免遭攻击的合理选择；另一方面，苏联借此向外扩张，扩大自己的势力范围。众所周知，战时同盟在一定意义上就是在波兰这块礁石上碰得粉碎。

除了波兰之外，西部相邻的芬兰、匈牙利和罗马尼亚等国或地区也是心脏地带有史以来蚕食和殖民的对象。在俄国人的头脑中，其边界永远是不安全的，邻国即敌国，俄国的西进历史也是一部完完全全的战争史，这一点我们可以用豪斯霍费尔的一句话来进行概括：“边界即战场”④。当俄国“陆权”占优势的情况下，其西部相邻诸国的命运取决于俄国；“海权”势力介入这一地区后，地缘政治的对抗完全操纵了这一地区的发展进程。

---

① ［苏］C. A. 戈尼昂斯基等：《外交史》第4卷，下册，第490页。

② 艾夫里尔·哈里曼、伊利·艾贝尔：《特使——与邱吉尔、斯大林周旋记》，第374页。

③ 艾夫里尔·哈里曼、伊利·艾贝尔：《特使——与邱吉尔、斯大林周旋记》，第579页。

④ Gerwent Whittlesey: *German Strategy of World Conquest*, P. 73.

## 5.2 南下：渗入地中海和印度洋

彼得大帝不仅在西进的过程中采取了不同于其祖先的政策，而且在南下行动中克服了老沙皇的偶然性和地域性，其领土兼并和蚕食的目的就是要把俄罗斯的军事力量伸展到黑海和地中海及阿拉伯海、印度洋地区，"俄国需要水域"的声明显示彼得已破除了斯拉夫族的所有传统，是它由地域性蚕食向世界性侵略体制转化的重要标志。

彼得在位时期为俄国设计的南下蓝图包括三条路线：一条是通过征服奥斯曼帝国控制黑海及黑海海峡，从而进入地中海；第二条是通过对南北高加索的占领，经波斯进入波斯湾和阿拉伯海；第三条是通过从中亚经阿富汗侵入印度，进而控制印度洋。

控制黑海和黑海海峡是沙俄南下的第一步目标，这里不仅具有重要的军事战略价值，而且还是俄国经济贸易的主要运输水域。但是，黑海当时是奥斯曼帝国的一个内海，因此，要夺取黑海地区的统治权，必须挫败奥斯曼帝国。只有控制了黑海海峡和黑海沿岸地区，才能进入地中海，并进而对欧洲形成钳夹之势，这必然会对整个欧洲地区造成巨大威胁，因为俄国控制了黑海沿岸，特别是土耳其后，"它的力量几乎会增加一倍，它就会比其他欧洲国家加在一起还要强大"[①]。

为此，彼得一世在位时期，先后对奥斯曼帝国发动了两次大规模的战争（1695年—1700年，1711年），但是，这一时期俄国的军队并未推进到黑海沿岸，彼得一世的南下目标受挫；叶卡捷琳娜二世继位后，在对外战略上继续推行南下政策，精心制订了征服奥斯曼帝国的计划，对奥斯曼发动了新的战争（1768年—1774年，1787

①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9卷，人民出版社，1961年，第18页。

年—1792年)，这一时期，俄国兼并了黑海沿岸大片土地；整个19世纪，俄国对奥斯曼帝国共进行了4次战争(1806年—1812年，1828年—1829年，1853年—1856年，1877年—1878年)，这一时期俄国的主要目标就是夺取君士坦丁堡*和黑海海峡，完全控制黑海地区，并进而肢解奥斯曼帝国。整个19世纪正是世界（尤其是欧洲）各列强从自由资本主义向垄断帝国主义阶段转变的时期，各列强之间利益冲突交织在一起，这给沙皇俄国的地缘政治扩张提供了各种机遇。俄国对黑海沿岸地区的扩张和英、法、德等欧洲强国在这一地区的利益是不相容的，这就构成了列强之间利益冲突的不同层次。

尽管从纯粹的军事意义上而言，俄国受到了不小的挫折和不如愿。但实际上，俄国人的胜利也是相当重大的，"罗马尼亚、塞尔维亚、门的内哥罗由于俄国的帮助而扩大了领土，得到了独立，因而它们都欠了俄国的债；多瑙河的巴尔干山脉之间的四边形要塞区，土耳其的这个强有力的碉堡被暂时破坏了；君士坦丁堡的最后掩蔽物，巴尔干山脉从土耳其人手中夺去了，并且被解除了武装；形式上是土耳其人的附庸的保加利亚和东鲁美利亚，实际上成了俄国的附庸……最后，土耳其由于领土丧失、国力空虚和过重的战争赔款而完全从属于俄国，并陷入这样一种境地：它只能是——按照俄国人的看法（而这种看法是完全正确的）——暂时为俄国守护着博斯普鲁斯海峡和达达尼尔海峡。因此，看来俄国只需要选择适当时机来实现它的伟大的最终目的，即攫取《La clef de notre maison》["我们房屋的钥匙"] 君士坦丁堡了"[1]。

然而，要达到这一步也并非易事，迫于海上强国英国的压力和欧洲大陆强国德国的插手，直到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后俄国才找到恰当的机会，1915年，俄国正式向英、法两国政府提出战后的领土

* 沙皇将此城称为"我们房屋的钥匙"。

①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2卷，人民出版社，1965年，第48～49页。

瓜分要求：君士坦丁堡、黑海海峡及其周围的岛屿。众所周知，由于十月社会主义革命的胜利，俄国退出了第一次世界大战，控制黑海及海峡的目标破灭。列宁领导的苏俄政权，为巩固新生的社会主义革命成果，一方面同西方干涉势力进行了针锋相对的斗争；另一方面通过支持黑海沿岸各国（尤其是土耳其）的民族独立运动，最大限度消除英、法、德等国在这一地区的影响，并在海峡问题上坚持由黑海沿岸各国共同管理，不允许外国在这一地区的军事存在。

在黑海及海峡问题上苏俄与土耳其之间也存在某些分歧，苏俄坚持这一水域是沿岸各国通往地中海和各大洋的通道，这些国家应享有特权，并有权保护这些国家不受外部海上力量的威胁；但是，土耳其认为它对黑海拥有主权，为防止苏联对这一地区最直接的威胁，土耳其则利用英国等力量来制约苏联，1936年的《蒙特勒公约》是这一分歧的明显例证。处在夹缝中求生存的土耳其也正是在这一时期形成了其特有的政治性格：即随时在各大国或力量之间制造平衡（或利用一个或几个外部力量来制衡北边的苏联），防止苏联完全控制黑海及海峡地区。随着国际反苏浪潮的加剧，土耳其政权也表现出了其民族文化中固有的更多提防一个与其最近的毗邻的陆权国家的实质。欧洲战争策源地形成及欧洲战争爆发后，土耳其一度完全倾心于德国，并试图借机“收复失地”，但迫于苏联强大的战争威慑力，一直未敢妄动。

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土耳其问题也是盟国之间（主要是英苏之间）分歧的焦点。对于临近苏联经济命脉的毗邻国家，苏联一贯的指导思想是：建立一个由孱弱而易于控制的邻国组成的地带，然而，除了土耳其本身骑墙居中外，英国的态度是苏联所不能接受的，这一点从第二战场的开辟问题上表现出来。英国不顾苏联的强烈反对，执意要在地中海地区开辟第二战场，并要土耳其参加。邱吉尔认为，在德国军队的正面直接开辟一条战线“对盟国的整个事业都没有好处”，而采取迂回包抄攻击法西斯的软腹部，对盟国的好处会

大得多。实质上，英国是想一石数鸟，特别是借战争之机夺回在黑海地区的传统利益，这是英国极力说服斯大林允许土耳其参加对德作战的根本所在。

在斯大林看来，土耳其政府在战前及战时始终态度暧昧，而且反苏倾向从来没有改变过，因此，苏联在当时采取的态度是，既然在那里不可能有一个对苏友好的政权，就只能将之视为敌国，认为土耳其"没有资格提出对特殊权利的要求"[1]。这实际意味着在黑海及其海峡问题上撇开土耳其。为防止战后土耳其成为苏联安全的隐患，苏联政府于1945年3月宣布废除了1925年苏土中立和互不侵犯条约，并提出了缔结新条约的要求：（1）把卡尔斯、阿尔达汉和阿尔特温归还给苏联；（2）允许苏联参加对海峡的监管，并允许苏联有在海峡建立军事基地的权利；（3）修改《蒙特勒公约》；（4）土耳其政府应调整与保加利亚的边界。显然，双方不可能达成一致。

正是由于双方长期的不愉快关系和土耳其固有的政治性格决定了土耳其战后的政策选择，即倒向西方，借海权国家制约苏联；同时，美国在取代海权国家英国的地位后，将土耳其视为遏制苏联南下的最敏感地区之一，两者的结合成为一种必然，1947年"杜鲁门主义"的出笼标志着土耳其成为美国全球遏制的第一块基石。此后，它名正言顺地以欧洲国家的身份参加了"马歇尔计划"和北大西洋公约组织，并对西方在中东地区拼凑军事集团积极响应，成为"巴格达条约组织"中的一员。

斯大林逝世后和十年缓和期间，由于全球冷战格局的改变，苏联对黑海地区采取了更为灵活的政策方式，出于经济和军事上的双重目的，双方的关系有所缓和，但在根本问题上双方没有也不可能达成实质性一致。此后，由于苏联忙于南下战略中的其他地区，在

① 《1941年—1945年苏联卫国伟大战争期间苏联部长会议主席同美国总统和英国首相通信集》第1卷，第239页。

黑海及海峡问题上没有更多的动作，双方关系基本稳定。

接着，我们来分析心脏地带南下的第二条路线。占领波斯的北部，夺取里海西岸高加索地区和南岸地带，从而打开进入波斯湾和阿拉伯海的通道，这是老沙皇为他的继承者们设计的第二个南下目标。1722 年，彼得一世将侵略矛头指向波斯，到 1724 年，俄奥共同瓜分波斯西北部。叶卡捷琳娜二世虽主要侧重于征服奥斯曼帝国，但她同样也未忽视向波斯扩张，1809 年，她发动对波斯的战争，夺取了格鲁吉亚、巴库、埃里温与南高加索的其他地区。自 19 世纪 20 年代后，俄国开始对波斯进行经济和政治上的渗透，尤其是到了 19 世纪 80 年代，俄国借助外里海铁路推行更加积极的渗透政策，其目的在于获取优势，将海权势力从波斯挤压出去。

传统的海权与陆权的对抗到 20 世纪初已十分激烈，英国对俄国得寸进尺的推进感到恐慌和不满，强烈要求通过谈判划分势力范围，然而，俄国的目的显然不只是要蚕食土地，而是要夺取整个波斯，从而进入波斯湾和阿拉伯海，其目标在于海洋霸权。20 世纪初波斯暂时出现的均势是日俄战争和波斯 1905 年革命的结果，至此，俄国吞并了里海西岸南高加索的广大地区，并将波斯北部置于直接控制之下。

1917 年十月革命后，苏维埃政权宣布废除沙皇强加给伊朗的一切不平等条约，并实施从伊朗领土上撤军。但是，在国际反共浪潮的影响下，伊朗作为欧亚大陆边缘地带或处于海权和陆权夹缝中生存的国家，其政治性格必然驱使它采取所有边缘地带国家必然的行为趋向，即亲海权而敌视陆权。因此，伊朗政权对列宁的和平谈判建议不予理睬，反而利用国标会议（1919 年的巴黎和会）要求苏维埃政府归还沙皇俄国夺去的“波斯帝国”的领土。苏维埃政府对伊朗的亲海权国家的行为感到极为不安，如果在伊朗不能有一个对苏友好的政权，社会主义的胜利果实将受到极大威胁，为此，苏联在反对国内外干涉和颠覆活动的斗争中，重新占领了伊朗北部的一些

地区或城市，并在这里扶持亲苏政权和组织。

自此，伊朗陷入进退维谷的窘境。面对迫在眉睫的北部威胁，伊朗被迫改变对苏态度。1921年政变后上台的新内阁很快就批准了苏伊友好条约，两国紧张关系明显缓和，但是值得引起我们注意的是该条约的第六条，其中规定："缔约双方同意如果任何第三国意图在波斯领土内推行一项侵略政策，或者使波斯领土成为在军事上攻击俄国的根据地，从而对苏维埃俄国或与其结成联盟的国家的边界有威胁的危险时，则苏维埃政府有权派军队进入波斯，以便采取为自卫所必要的军事步骤。苏维埃政府同意一俟此种危险消除后，立即将军队撤出波斯。"[①] 可见，苏联是要使伊朗成为阻止海权国家的屏障，并消除海权势力在这一地区的影响。此后，伊朗废除了英伊1919年条约，英军也陆续撤离了这里。但是，这绝不意味着伊朗完全转向了苏联，历史上沙俄对波斯的不断入侵在这两个国家之间已埋下了永久敌视的种子，伊朗对苏联的戒心或敌视心理不会消除。在苏联周边所确定的缓冲带上，波兰、土耳其、阿富汗等国与伊朗有着几乎同等的地缘地位，但伊朗的反大陆倾向是最强的，这一点使俄苏在伊朗问题上颇费周折。

随着欧洲战争策源地的形成和法西斯反苏反共宣传的日益猖獗，伊朗和土耳其一样，抱有一种收复历史失地的幻想，它们期盼德国能够打败苏联，为它们提供机会。不言而喻，伊朗亲德的行为是盟国所不愿看到的，如果听任德国在波斯湾地区为所欲为，长驱直入，不仅苏联的安全将遭受严重威胁，西方的经济生命线也将被掐断。因此，苏、英军队南北夹击，于1941年8月—9月间共同占领了伊朗。苏联指出这一行动是迫不得已根据1921年友好条约的第六条规定而采取的必要步骤，目的在于"自卫"，"当威胁苏联和伊

---

① 《国际条约集》(1917年—1923年)，世界知识出版社，1961年，第615页。

朗利益的这些危险一经消除，苏联政府将根据1921年苏伊条约规定的义务，立即从伊朗境内撤出它的军队"[1]。苏联的这一声明实际还包含另一层意思，即防止伊朗南部在战争结束后落入英国之手。

但是，由于战争的特殊历史条件，苏联在北部占领区筹建了红色政权，支持少数民族自治（阿塞拜疆人和库尔德人），这些行为削弱了伊朗中央政权的力量（甚至失去了控制），触及了上层统治集团和利益；加之在战后，苏联并不履行三国首脑在1943年德黑兰会议期间就伊朗问题达成的协议[2]，拒不撤军，而且还在北方石油开采特权问题上与伊朗斤斤计较。苏联在伊朗问题上的僵硬态度完全把它推到了亲西方一边。1945年和1946年美英从伊撤军后，苏联被迫在未达到任何目的反而增加了更多敌视的情况下撤出了自己的军队。伊朗成为遏制苏联的又一个重要的"点"。1947年美伊签订新的军事同盟条约；1954年，伊朗正式成为巴格达条约组织的一员。心脏地带传统的地缘战略目标在这条"线"上再次受挫。

斯大林以后年代，苏伊关系虽时有改善，但伊朗始终都是见风使舵，在海权国家和陆权国家之间制造均衡，从中渔利，即便是霍梅尼政权建立后，它虽反美，但依旧仇苏，它们的口号是"不要西方，也不要东方，只要伊斯兰"[3]。如若苏联想借机操纵伊朗是不可能的，他指出："我们赶走美国人，并不是为了让苏联人取代他们，如果苏联试图有一天向我们施加压力，我们将拿出能撵走美国的同样力量来对付它。"[4] 看来，苏联的任何举措都是毫无意义的了。

---

① ［英］乔治·柯克：《1939年—1946年战时中东》上册，上海译文出版社，1980年，第224～225页。

② 参见《国际条约集》（1934年—1944年），第409～410页。

③ 刘竞等：《苏联中东关系史》，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7年，第295页。

④ 刘竞等：《苏联中东关系史》，第298页。

苏俄虽在土耳其、伊朗等地南下受挫，但也有意外的收获。受苏联社会主义革命及其宣传的影响和出于对它在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为战胜法西斯作出的巨大贡献的崇敬，中东地区国家在摆脱殖民统治和取得政治独立后，纷纷亲近苏联，愿意与之建立政治和经济贸易联系，1943 年—1944 年间，苏先后同中东的埃及、叙利亚、黎巴嫩、伊拉克建立了外交关系，苏联近百年的进入阿拉伯世界的愿望在战时顺利实现了。从此，苏联成为中东这一地区此伏彼起的各类冲突和矛盾的操纵者之一。然而，经过实践的检验后，中东一些国家发现，苏联并不是他们所期望的那样，它同样在这里是为了争夺利益，获取能够控制的暖水港，为它进入海洋与帝国主义争夺霸权铺路搭桥。到 70 年代十年缓和时期，苏联虽在中东地区扩大了影响，但也遭到了越来越多的反对，最终导致几乎所有中东国家都排斥苏联，反对苏联涉足中东问题和波斯湾。

最后，我们还要论述俄苏南下的第三条线。征服中亚，经阿富汗和印度抵达印度洋，就俄国人南下而言，似乎是下策，因为从地理距离上看显得相当遥远，但是，俄国人自始至终都没放弃这一途径。彼得一世时期虽进行了试探性的进攻，但无功而返；到 19 世纪中叶，沙俄才开始大规模的入侵活动，它分兵两路向中亚草原推进：一路横跨里海到咸海的草原；一路经额尔齐斯河到斋桑泊、巴尔喀什湖和伊塞克湖，然后向西，两路会合。根据这一项计划，俄国很快吞并了哈萨克斯坦草原。之后又向阿富汗边界继续蚕食，将其周边的几个汗国和城市并入俄国版图，“在 50 年之内，俄国在中亚把它的边界向南推进了约 1300 公里，一直推进到阿富汗的东北部”[1]。

阿富汗尽管是个贫瘠山国，又是一个内陆国家，但在海权与陆权的对抗中它却成了双方的必争之地，对于俄国心脏地带不断地向前推进，英国感到极为担心，一旦俄国夺取阿富汗，英国与俄国间

① 刘竞等：《苏联中东关系史》，第 37 页。

的缓冲地带就不存在了，而且它还与伊朗毗邻，向南 500 公里即是阿拉伯海和印度洋。最令海权英国感到担忧的是英属印度的地位将面临威胁，俄国早就有征服印度的计划，这是众所周知的。因此，俄国将势力推进到阿富汗边界后，英国不惜武力夺取在阿的势力范围。领土的兼并和确定势力范围是早期海权与陆权争夺的主要方式。1907 年，俄、英划定在伊朗和阿富汗的势力范围，俄国放弃了在阿富汗的利益换取了对伊朗北部的控制，从此，阿富汗成了英国的保护国。

1917 年十月革命后，俄国社会制度剧变，阿富汗国内民族解放运动也导致了政权更迭。两个新政权很快走到了一起，阿富汗希望依靠苏俄来共同反对帝国主义和殖民主义，而苏俄也愿意看到在它的中亚边界地区有一个对苏友好的独立的国家，这对它的安全有利。1919 年 3 月，苏维埃政府在全世界第一个承认阿富汗的独立。对此，英国虽极力阻挠，但也无济于事，同年 5 月它也被迫承认阿独立。

英国势力被驱逐后，阿富汗全面修好苏联，1921 年 2 月两国签订友好条约，1926 年 8 月又签订了苏阿中立和互不侵犯条约（1931 年 6 月续约，有效期五年，1936 年又延长十年），因而在这段时期内，苏阿关系稳定。第二次世界大战爆发后，阿富汗考虑到它夹在苏联和英属印度之间的特殊地理位置，拒绝了轴心国的诱惑，宣布中立，这一举动实际对苏联和盟国有利。战后，美国也想利用这个地势险要的山国来遏制苏联，以经济和军事援助为诱饵，竭力使苏阿疏远，并采取迂回手段企图把阿纳入反苏军事同盟中去，但阿富汗政府和人民出于历史和地理的原因，拒绝参加任何军事同盟，坚持中立睦邻外交政策。阿富汗的这种实质上亲苏的做法令俄国人极为满意，它也因此得到了回报。苏联对它提供了各种大量援助，还在阿与周边国家的领土争端（如与巴基斯坦关于普什图尼斯坦）中支持它。因此，美国在实施遏制中，在中亚地区并不是得心应手。

但是，阿富汗也不是完全倾心苏联，它在修好苏联时，也是小

心翼翼的。它虽一直想与外界联系，但囿于地缘地位而无法实现。60年代后，国际局势发生了较大转变，阿政府首脑和国家元首先后出访欧美，其目的有两个：一是寻求西方的经济援助；二是向它们宣传阿的中立不结盟政策，消除误解。这些行动既可缓解国内的矛盾，也可在东西方对抗中搞均衡，可谓是处在夹缝中求生存国家的明智之举。

使阿富汗难以预料的是，由于阿事实上长期亲苏和从苏获取大量援助，使它在政治、经济、军事等各方面与苏紧紧连结在了一起，各种条约和协定为它们设置了千丝万缕的联系。这就导致下列结果不可避免：

第一，苏对阿的政治、经济和军事各部门进行了实际上的控制。

第二，阿向西方的靠拢是极其有限的。

十年缓和时期，苏不仅加速向世界各权力真空地带进行渗透，而且还加紧对阿富汗的军事控制，两国之间和阿富汗国内积淀下来的尖锐矛盾也全面爆发。1978年，阿富汗国内政局急剧动荡，特别是具有反苏倾向的民族主义分子夺取了政权，这使苏联感到非常恼火，考虑到政治、经济和军事及宗教上的多重原因，苏联自1979年9月就作好了武装人侵阿富汗的周密准备，到12月27日，它终于按捺不住对这个长期以来亲苏的中立不结盟国家实施全面的军事占领。

苏联的这一举动是否就是为实现老沙皇的地缘政治扩张目标呢？笔者认为似乎在很大的程度上并非如此。到了20世纪后半叶，地缘政治的扩张难道还取决于领土的兼并和资源的直接占有吗？苏联要渗透到波斯湾和中东地区无需像老沙皇设想的那样把边界推进到这里，这一点也为当代国际关系的现实所证明了。当然，苏联这种公然践踏国际法的行为如不加以遏制也是十分危险的，西方人十分熟知苏联的政治性格。除了来自西方的强烈谴责外，其他各种利益集团和组织的反应也是十分激烈的。可以说，苏联走出这一步后，即在国际社会中陷人了极端孤立的境地；同样，在战场上也陷入了

进退维谷的困境。九年的侵阿战争表明，这是苏联自二战以来最重大的军事失败。

综上所述，俄苏在几个世纪的时间里虽处心积虑实施南下政策，但收效甚微，特别是在处理同土耳其、伊朗和阿富汗等国的关系上，政策僵硬，过分强调自身利益的实现，而忽视别国的主权完整，最终导致在其边界出现了一条坚固的反内陆地带，使其南下印度洋受阻；同时，其本身的不安全感不仅没有消除反而加剧了。地缘政治的扩张过程及其结果造成了俄苏政治性格的恶性循环，即使心脏地带陷入了一种长期的不安和躁动之中。

## 5. 3 东扩：抵达太平洋

俄国越过乌拉尔山脉和西伯利亚寒泽直达太平洋的扩张，早在彼得大帝时代以前就完成了。它之所以取得这么大的进展，主要是因为当时没有任何国家的殖民者对这块广阔、荒凉、寒冷而又交通不便的土地感兴趣。即使在俄国也只有少数的个人、商贩、士兵和探险家对此情有独钟，自愿去开拓边疆。他们将那些荒无人烟或仅有极少原始部落居住的地方占领下来，并不断向前推进，他们甚至一直推进到了北美的阿拉斯加。

整个 18 世纪和 19 世纪，俄国在西伯利亚和北太平洋的活动主要受制于三个方面的因素：一是交通工具的缺乏；二是气候严寒；三是粮食供应困难。因此，它对被隔离于阿穆尔河流以外极为不满，要求在对华贸易中处于更有利的地位，1842 年鸦片战争后，俄国也加入了西方列强对中国的瓜分和蚕食活动，并于 1858 年强迫中国清政府地方官员与之签订了第一个不平等条约《瑷珲条约》，将阿穆尔河北岸地区据为已有，同时将乌苏里江以东的中国领土划为中俄“共管”。1860 年，俄国又乘中国之危，和清政府订立了对俄国十分有利的《北京条约》，根据这一条约，俄国获得了阿穆尔河、乌苏里江和

太平洋之间的一大片土地。这一占领的巨大意义在于，俄国可以在这里修建一个良港（符拉迪沃斯托克，一年中只有12月—3月结冰），为其在中国的殖民扩张和加速在太平洋的活动服务；另外，1869年苏伊士运河开放后，俄国从敖德萨至符拉迪沃斯托克的海上运输缩短至45天，这大大增强了它在远东与权国家争斗的实力。

但是，仅此并未根本上解决俄国东扩过程中的根本问题，从一定意义上而言，俄国对东扩的主要兴趣在于贸易而非领土征服。对西伯利亚及其以东的开发仍然困难重重，因为粮食和运输问题非短期内所能解决，俄国国内认为修筑一条直达太平洋沿岸的铁路极为必要，1891年，横贯西伯利亚的大铁路开始修建。然而，这条铁路并未伸向白令海峡，而是折向了满洲，可见，俄国在远东最关心的地区是满洲和朝鲜半岛。"十分明显，如有可能使这条铁路线笔直穿过满洲到达符拉迪沃斯托克而无须沿着俄国弯弯曲曲的边境线，俄国将要获得莫大的便利。朝鲜则以其不冻港吸引着俄国人的注意"[①]。

俄国在东扩中同样也面临来自海权的挑战，在中国的贸易特权远不如英、法等国。为了抗衡英国，俄国在太平洋地区修好美国，因为这一时期，美国对海权的追求正面对英国的威胁，为此，俄国还于1867年以720万美元的价格将寒冷而难于防守的阿拉斯加卖给了美国。不过，对俄国利益真正构成威胁的不是英国或法国，而是亚洲新兴的日本。作为一个岛国，它对与之地理上接近的满洲和朝鲜半岛有着特殊的兴趣，这是日本作为一个强国生长的必然扩张的空间（或称为第一步目标），因此，心脏地带的俄国成为了日本利益的天然敌手。

1895年4月中日双方缔结《马关条约》后，不仅对中国在朝鲜

---

① ［美］巴巴拉·杰拉维奇：《俄国外交政策的一世纪：1814年—1914年》，商务印书馆，1978年，第208页。

半岛的不完整控制权剥夺殆尽，而且也使俄国（或许此时还包括欧洲其他列强)完全失去了对自己所感兴趣的利益地区的瓜分机会。朝鲜被宣布为独立国家(实际是日本的保护地)；日本吞并了今澎湖列岛、台湾岛和包括旅顺在内的辽东半岛。这一条约在列强看来，破坏了远东的均势，产生了不利于欧洲诸强的后果。因此，德、法、俄等国强迫日本同意修改条约，将辽东半岛的管辖权归还中国。

在外交上取胜后，俄国即开始对清政府进行操纵，1896 年 5 月，李鸿章访俄斯间同俄国订立了一个针对日本的防御性联盟条约。作为对俄国提供保护的回报，中国允许修筑一条横贯满洲的铁路，称为“中东铁路”，由属于俄国的华俄道胜银行[1]进行控制，期限为 80 年。这一事件从表面上看仅仅是修筑铁路的问题，但实质上却蕴含了俄国在远东利益的实现。

首先，这条铁路通车后使俄国到达符拉迪沃斯托克港的路程缩短了约 450 英里。这是沙俄在远东的地缘政治扩张的夙愿。

其次，由于关于修筑铁路的协议附带种种条件，实际上建立了俄国人在满洲的支配地位。尤其是该铁路公司被准许维持一支警备部队，就使俄国士兵实际开进了满洲，拥有了管辖权，这为俄国吞并全满洲奠定了基础。

第三，从此俄国即形成了对日本的威慑，迫使日本在朝鲜半岛问题上与俄分享利益，两国于1896年建立了对朝鲜的共同管辖权。

帝国主义国家在远东的均势是暂时的，19 世纪末，各列强再次在中国掀起瓜分狂潮，俄国也于 1898 年从中国手中勒索到对辽东半岛为期 25 年的租借权以及在旅顺修建一个海军基地、在大连开辟一个商埠的权利。而且还被允许修筑一条从大连通往哈尔滨的铁路，即南满铁路。俄国在满洲所攫取的利益立即引起了海权国家的不满，日

---

[1] 其总裁乌赫托姆斯基以鼓吹俄国在亚洲的“命定论”而著名。

本更是切齿痛恨，因为过去日本未能得到的辽东半岛，现竟成了俄国的囊中物，其生存空间遭到严重削弱；更为甚者，俄国还对日本要求承认其在朝鲜半岛的特殊地位不予理睬，这使日本极难接受。同时，英国出于对陆权的本能反感，除了在土耳其、伊朗和阿富汗阻止俄国南下外，还对它在远东的扩张加以遏制，但是，在中国利益的分割者中，法德在一定程度上都是俄国的支持者，因为它们同属欧洲大陆国家。因此，英、日联盟就是必然的。

1904 年，心脏地带俄国与海权日本之间为争夺满洲和朝鲜半岛的战争爆发了，日本借助优势的兵力、有利的地理位置和英美的支持，战胜了俄国，使俄国不得不将自己多年在远东处心经营的利益拱手让给日本，俄国在这里几乎一无所有了，所剩就是对北满和外蒙古的支配权，这对于俄国的东扩而言是个巨大的损失。其国内也因此陷入了严重的危机之中。

十月革命后，苏俄政府一再宣称废除沙皇政府强加给中国的一切不平等条约，并愿与中国政府进行接触的联系。1919 年 7 月和 1920 年 9 月，苏俄政府发表两次对华宣言，重申废除沙皇时期两国签订的一切不平等条约；放弃在华一切特权和赔款；两国间应迅速建立起正常的经济贸易关系；另行签订使用中东铁路的条约；中国政府应禁止一切反苏俄势力在其境内活动等。1922 年 8 月，中苏双方开始谈判，但是在中东铁路和外蒙古问题上双方分岐严重。苏方认为中东铁路由俄国出资建造，又关系到苏俄的远东安全，因此要求中苏共管。在外蒙问题上，苏俄政府拒绝放弃支持蒙古独立的立场，也不从蒙古撤军。

30 年代，苏联面临欧亚两个战争策源地的双重威胁。但是，德国的威胁比起日本的威胁而言要严重得多，因此，苏联的战略重点在欧洲；对于亚洲的日本则采取改善关系，避免卷入武装冲突中去的态度，苏联也十分清楚，日本更感兴趣的是中国而不是苏联。于是，苏联对日本在中国的行为及对其利益挑衅采取了忍让立场，如

对日本在中国东北策划成立傀儡政权“伪满洲国”不加干涉；以14 000万日元将苏联在中东铁路的权益出售给伪满洲国；在库页岛石油开采和渔业协定方面作出让步等等。第二次世界大战全面爆发后，苏联的力量集中于欧洲战场，而日本的战略重点表现为南进，因此，双方的关系由紧张转为缓和。

苏联在远东所追求利益的有限性一直持续到战后初期，战时盟国间形成了默契，远东是美国的势力范围，苏联只是对传统利益兴趣依旧，如大连港、旅顺港、中东铁路和南满铁路等。至于对中国共产党所进行的革命斗争则持冷淡态度。它小心翼翼的缘故在于避免同美国发生冲突，这种态度延续到中国取得新民主主义革命胜利并宣布“向苏联一边倒”后方才有所改变。中国的胜利无疑是世界历史中海权与陆权力量对比变化中最重大的事件之一，世界上两个对国际事务具有巨大影响力的国家（一个位于心脏地带，一个位于边缘地带）结成了意识形态联盟，取代英国海权地位的美国被迫将防御线撤至太平洋地区的“外月形地带”（即由岛屿构成的环形地带）。

然而，苏联在对待东西方的社会主义国家问题上态度是一致的，社会主义阵营内部的运行机制一开始就被苏联的大党及大国沙文主义倾向所破坏。所不同的是，相对于东欧而言，苏联在控制中国方面一点也不顺利，两国经历了短暂的“蜜月”后即出现了裂痕，尤其是在斯大林逝世后，苏联新领导人追求新的霸权战略，而且在中国问题上忽视国家间关系的起码准则，露骨地伤害中国的民族感情，包括要求与中国建立联合舰队，在中国建长波电台，在中印冲突中公然偏袒印度，乘中国三年自然灾害之机撤走苏联专家和逼债，策动中国边境地区的颠覆活动等。此后，两国关系恶化到发生流血冲突的境地。苏联在远东问题上再次失策，边缘地带中国在70年代重新与美国改善关系。海权与陆权的远东对抗最终以陆权的回归而趋于均衡状态。

## 5.4 回归：心脏地带的破碎

契尔年科执政之时，苏联的最高领导层大部分都已是70岁以上的人，这就决定了在他之后必然出现新老领导人的更迭。1985年，54岁的米·谢·戈尔巴乔夫当选苏共中央总书记，这不仅意味着苏联的最高权力移交给了新一代，而且也把他推到了苏联长期以来积淀的各种矛盾和危机的最前列，如何解决这些矛盾和危机对他而言是个严峻的挑战。

戈尔巴乔夫上台伊始即给人一种全新的感觉，这既表现在国内的根本改革和加速发展战略的制定上，又反映在对外战略的全面调整上。1986年1月，他正式提出了"新的政治思维"，同时，他还花了几个月的时间在他的疗养地写了《改革与新思维》一书，全面阐述了他的"新思维"。下面我们将首先就其对外战略方面进行论述。

第一，其新思维是对苏联对外政策历史的反思的结果。他说："观念上的重大变化，是同1985年苏共中央四月全会和党的第二十七次代表大会密切相关的，这也是向新的政治思维、向关于当代世界的阶段原则和全人类原则相互关系的新概念的转变。""新思维不是即兴之作，也不是智力游戏。这是对当代世界的现实深刻思考的结果，是认识到对政策的负责态度要求政策要有科学根据的结果，也是摈弃以前某些看来是不可动摇的公理的结果。"[①]

第二，新思维是基于对当代世界局势的客观评价及思索的产物。戈尔巴乔夫在他的书中多处指出，人们面临共同的全球性问题，人类在自身的成果——核武器面前已束手无策，"一旦爆发核战争，一

① 米·谢·戈尔巴乔夫著，苏群译：《改革与新思维》，新华出版社，1987年，第183页。

切生灵都将从地球上消失"[1]。在这一点上，戈氏对战争与和平问题作了重大的再认识，他批评了历届领导人所奉行的原则：苏联可以在核大战中取胜。他把新思维归结为另一个简单的公理——"安全是不可分割的"之后，认为："在核战争结局只能是全部毁灭的情况下，我们已经作出了战争与革命之间不再存在因果关系的结论。"[2]他也主张"让和平竞赛来决定一切"，但他大大发展和修改了赫鲁晓夫及勃列日涅夫时代的这种思想，他的前提是在全球消灭核武器之后，再进行和平的竞赛。他在苏共二十七大的政治报告中说："我们的理想，是没有武器和暴力的世界，是每个国家的人民都能自由地选择发展道路和生活方式的世界。"[3]

第三，新思维表现为强烈的现实主义色彩。强调现实表明戈氏抛弃了以往对外政策分析中主观的或看法僵死的旧思维模式，指出："世界在自己的发展中正走向什么样的边缘？为此需要清醒而现实地纵观世界全貌，从旧框框中摆脱出来。"[4]"政策应该建立在现实在基础上"，"美国是一个强国，我们要同它一起生存，同它建立关系，这是现实"，"现实的对外政策有两个特征：考虑本国利益和尊重别国的利益"。"有现实，就必须尊重现实，否则，政策将变成心血来潮、鲁莽行动和缺乏预见性"[5]。

他的现实主义的分析方法还表现在对国际关系中意识形态作用的论述方面，他写道："再谈现实。争取国家间关系非意识形态化。""不要把意识形态分歧搬到国家关系中来"，"意识形态和社会差别、

① 米·谢·戈尔巴乔夫著，苏群译：《改革与新思维》，第173页。
② 米·谢·戈尔巴乔夫著，苏群译：《改革与新思维》，第186页。
③ 米·谢·戈尔巴乔夫著，苏群译：《改革与新思维》，第169页。
④ 《戈尔巴乔夫言论选集》（中译本），人民出版社，1987年，第339页。
⑤ 米·谢·戈尔巴乔夫著，苏群译：《改革与新思维》，第280、289、331页。

政治制度的差别，也是各国人民作出的选择的结果。可是这种选择不应成为在国际关系中发生事件或出现某种趋势并且可能会发展成为冲突或军事对抗的理由"①。

戈尔巴乔夫正是在"新思维"的指导下全面调整了苏联的对外战略，并采取了一系列的重大行动。

首先，全面缓和了同美国和西方的关系。戈氏在位期间与美国总统进行了九次首脑会晤，就地区冲突、人权、双边关系、核裁军等问题进行了广泛的谈判，其中最引人注目的是达成了苏美销毁中程导弹条约和削减战略核武器条约。同时，戈氏在战后东西方冷战极敏感的德国问题上向西方作出了重大让步，两德统一是冷战体制遭到破坏的根本，这也是苏联权力执掌者在同海权势力的争斗中首次作出如此大的让步。尽管戈氏坚持统一后的德国加入北约将破坏欧洲的均势，但他最终还是听任了这一局势的发展，德国问题可以说是这一时期陆权与海权力量对比变化的晴雨表。另外，对其在远东的主要敌手日本也采取了较为灵活的政策立场，两国虽在北方四岛问题上难趋一致，但戈氏作为苏联元首第一次出访日本表明其改善对日关系的坚定立场。

其次，在社会主义大家庭内部强调平等、独立。东欧地区是俄苏权力上层为解除其西部安全威胁而处心经营的防御缓冲带，在加强对这一地区控制的过程中，双方的矛盾与积怨也日益尖锐。戈氏上台后强调政治关系的自主性、经济关系的互利互助原则和军事方面的"足够防御原则"，全面调整与东欧各国的关系。但是，历史上由于控制而形成的均衡因此旋即失去了稳定，苏联在东欧问题上的政策急变使这里的危机全面爆发，东欧发生了连锁式剧变，各国纷纷离开苏联的怀抱。

再次，在热点问题上采取克制态度，寻求政治解决阿富汗和柬

---

① 米·谢·戈尔巴乔夫著，苏群译：《改革与新思维》，第180、227页。

埔寨问题。经过9年的征战，苏军在阿富汗并未取得军事胜利，相反付出了惨重的代价，这是俄国传统南下战略的最后一条线路，事实证明，通过领土兼并的方式已没有多少实际价值，1989年，苏联从阿全部撤军。支持越南地区霸权主义侵柬反华是苏联一石数鸟之策，在越南获取海军基地将使它在地缘战略上居于优势地位，然而，纯粹的军事控制和占领不仅不能实现控制目的，反而使之国际地位日趋孤立，最后以撤离金兰湾而告终。

从对外战略上而言，戈氏上台后实施了全面收缩与和解，解决了一些矛盾和积怨，在某种意义上而言他确实获得了不小的成功。然而，戈氏在权力上的做法在国内也引出了麻烦，除了在改革上步履艰难外，民族矛盾和危机的总爆发对他及其国家而言是灾难性的。剧烈的民族矛盾最早在南高加索的纳戈尔诺——戈拉巴赫州地区爆发，亚美尼亚人和阿塞拜疆人之间发生了流血冲突；与之同时，波罗的海三国——爱沙尼亚、拉脱维亚和立陶宛正酝酿一股要求民族独立的浪潮。1989年8月是《苏德互不侵犯条约》签订50周年，波罗的海三国借机举行了声势浩大的群众示威，表达他们对导致三国并入苏联的苏德条约的抗议和要求民族独立的愿望。1990年3月11日，立陶宛率先宣布独立，5月，拉脱维亚和爱沙尼亚也将加盟共和国更名为独立共和国，同时，三国还签订了在独立运动中相互支持和合作宣言。

这股民族独立浪潮迅速波及苏联全境，各加盟共和国纷纷发表主权宣言，到1990年底，俄罗斯、乌兹别克、摩尔多瓦、乌克兰、白俄罗斯、亚美尼亚、土库曼、塔吉克、哈萨克、吉尔吉斯都宣布了国家主权宣言。“八一九”事件后，各共和国的独立倾向更趋高涨，苏联最高权力之争为他们提供了可乘之机。1991年4月，格鲁吉亚宣布独立，8月20日、22日，爱沙尼亚、拉脱维亚正式宣布独立，脱离苏联，紧接着，乌克兰（8月24日）、白俄罗斯（8月25日）、摩尔多瓦（8月27日）、阿塞拜疆（8月30日）、乌兹别克和吉尔吉

斯（8月31日）、塔吉克（9月9日）、亚美尼亚（9月23日）、土库曼（10月27日）、哈萨克（12月16日）先后宣布独立。至此，除俄罗斯外，原苏联的14具加盟国均宣布独立。

戈尔巴乔夫曾试图在各加盟共和国之间订立新的盟约，但遭到一些国家的反对，1991年12月21日，俄罗斯联邦等11个独立国家首脑会议在哈萨克首都阿拉木图举行，会议通过了《阿拉木图宣言》和《关于武装力量的议定书》等文件，正式宣布建立"独立国家联合体"，并通知戈尔巴乔夫：苏联总统设置已停止存在。25日，戈氏宣布辞职。至此，存在了近70年的社会主义国家苏联宣告解体。

心脏地带又回到了俄国的状态。

那么，现在继承了前苏联最多遗产的俄罗斯的地缘地位又如何呢?其领土面积为1710万平方公里，是世界上领土面积最大的国家，人口为1.48亿，自然资源丰富，军事实力继承了前苏联的70%以上，可以说，俄罗斯仍然是当代世界强国之一，在国际事务中发挥着重要影响。然而，从目前来看，俄罗斯的地缘地位将取决于下列几个方面的关系的变化与发展。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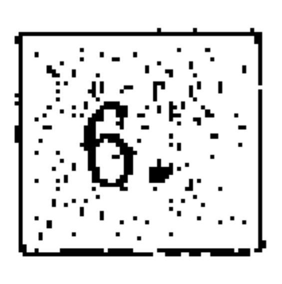
第一，与独联体其他各国的关系。前苏联解体后，俄罗期强调同独联体各国基于历史所形成的"特殊关系"，即拥有"开放的边界，紧密的经济文化关系，以及军事的政治领域的联盟关系"，因此俄罗斯十分重视与独联体各国的关系，而这些新独立的民族国家一方面离不开俄罗斯，另一方面又具有主权国家特有的政治独立性格，对大俄罗斯主义存有戒心。目前，俄罗斯最为担心的就是其周边各国完全倒向西方，这是其传统的不安全感所不能容忍的。

第二，与美欧等西方国家的关系。起初，俄罗斯表现出了明显的向西方靠拢的战略态势，明确宣布其战略目标就是"进入北半球文明大家庭"，"加入世界最发达国家俱乐部"。为此，叶利钦政府成员积极加强同欧美国家的往来，并派代表参加欧共体、欧安会、欧洲议会等组织的活动，甚至谋求同北约组织的对话。很显然，俄罗

斯同欧洲新独立的各国一样，希冀借西方的经济实力来帮助自己渡过激变后的难关，重返国际政治舞台的主角地位。但是，双方经过一段时间的“热恋”后发现，在根本问题上分歧难以弥合，特别是在东欧问题上，俄罗斯一方面强烈反对西方抢夺俄国在那里的传统利益，对北约的“东扩”持反对态度；另一方面对西方在解决地区冲突（特别是波黑危机）中忽视俄罗斯的地位而愤愤不平，显示了很强的大国意识。

第三，同亚太国家的关系。从地缘地位上而言，亚太国家既是政治上抗衡欧美的重要筹码，又是经济上蓬勃发展的地区，是俄国潜在的重要贸易伙伴。从其自身的战略发展考虑，俄罗斯重视发展同亚太国家的关系，特别是东北亚地区的中国、日本、韩国等国的关系。

20 世纪末的几年里，俄国仍然难以摆脱国内政治权力更迭的痛苦，这一变化究竟对其传统的政治性格产生多大影响，使其发生多少变化，都难以预料，这将取决于国际局势变化综合因素的影响力。



# 当代世界格局多极化趋势的地缘政治分析

## 6.1 “心脏地带”衰落与世界政治格局

本世纪80年代末和90年代初，是第二次世界大战以来世界舞台上演节目最为纷繁复杂的时期，此后的国际社会开始了大裂变、大分化、大整合、大改组的阶段。这一时期所发生的几次重大事件成为世纪之交国际政治体系变化的决定性因素，这些事件不仅决定了那个地区国家间关系的变化特点，而且波及了世界上所有国家，震撼了全球的每一个角落。

### 6.1.1 世界均势支柱断裂

苏联的衰落和解体可谓是这一时期最重大的事件了，从它所具备的大国地位和意识形态色彩而言，苏联的解体意味着国际政治体系的支柱之一崩溃了，这一事件对国际政治大厦的震撼力较之任何一个事件都更引人瞩目，它的影响是全方位的。以苏联的解体为起点，昔日的美苏关系全面变革，雅尔塔体系的根基消亡了，“由于苏联一极的坍塌，两极体制旋即消失”[①]。第二次世界大战后，美国和苏联成了最大的战胜国，历史的安排又恰恰是两个社会制度截然对

---

① 李义虎：《破灭的神话：世界的裂变与弥合》，湖南出版社，1992年，第2页。

立的国家，它们在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的境遇、在世界特殊的利益地位、对各自利益的不同追求和对对方行为的不信任，建构了雅尔塔体系的主要部分。苏联借帝国主义之间的矛盾，不仅巩固了社会主义政权，而且还在反法西斯的伟大战争中赢得了现实的大国地位和国际威望，在传统的安全因素和强烈的意识形态因素支配下，将它的势力推进到了东欧地区，在那里帮助建立了几个社会主义政权，由此确立了对付帝国主义威胁的阵地。战后的一极就是以苏联为核心，以东欧社会主义国家为卫星国而形成的。苏联的解体，意味着社会主义大家庭中盟主的消亡，"苏联"已经成为历史，"苏联回到俄国的状态。这是对世界局势影响最大的一个事实"[①]。从此，两极格局的政治基础遭到彻底损伤。

苏联的瓦解对于美国人来讲不一定就值得庆幸，"美苏的对抗，就像瓶子里的两只毒蝎子一样，每只毒蝎子都有能力用核子毒针刺死对方，但是代价却是自己也会随之死亡"[②]。苏联的衰亡是不是就说明美国长期以来任何时候都恋恋不忘的反共产主义政策的胜利呢？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后，美国对于苏联实力和野心的过高评估，不仅使美国决策层犯了错误，而且，以反共为包装的国际主义浪潮完全盖过了根深蒂固的孤立主义情绪。同样是因为战争改变了美国人的对外政策倾向和角色地位，"美国之所以成为世界强国，是因为美国在大约20年的期间内，被迫卷入两次欧战，战后又不得不接替已经精疲力尽的英国，扮演英国原来的角色"[③]。因此，美苏对抗在战后是不可避免的。原本都是孤立主义的大国被历史的潮流推到了

① 李义虎：《破灭的神话：世界的裂变与弥合》，第209页。

② ［美］大卫·霍伯斯丹著，黄志典译：《下世纪——谁主宰世界》，新华出版社，1993年，第48页。

③ ［美］大卫·霍伯斯丹著，黄志典译：《下世纪——谁主宰世界》，第50页。

浪尖上，战后的国际天平上需要它们站在两边，而不是站在一起，国际关系的规律似乎可以在这一点上得到印证。显然，苏联在90年代初的支离破碎是美国也不愿看到的，完全出乎它们的意料。从此以后，美国一方面不得不面对国人对于政府完善经济制度的强烈企望，它再没有什么借口不致力于国内事务了，美国似乎又一次沦为了地区大国，这对于新一届政府而言可谓苦不堪言，他们唯一能做的似乎就是对自身经济实力的检讨；另一方面，国际均势的破坏，又给美国提供了重新确立全球性大国地位的机遇，“国际警察”的作用很多美国人是直言不讳的。杜勒斯早就是“国际警察”的主张，美国参谋长联席会议主席鲍威尔直率地说：“世界需要警察的时候，谁会被召唤出来恢复和平呢？当然是我们。”① 出于国际和国内的双重原因，美国对90年代出现的一些地区冲突尤为卖力，1990年8月爆发的海湾危机和1991年爆发的海湾战争是对美国实力地位的一次真正考验，因为这一地区拥有太多的敏感性。最为重要的是，两极关系变迁的时期，新一代美国掌权者不能没有了其全球战略的基石，重新找到一个支点安慰国内的孤立主义情绪对美国的国际地位来说是至关重要的。

美苏这两个世界上的超级大国事实上已经发生了变化，一个分裂成了若干个小国，我们在最新的世界地图上似乎只有在俄罗斯还能看到前苏联的影子；而美国也已衰落了，这正如一场拳击赛，苏联被完全击倒在地后，美国在欢庆胜利的时候其实也精疲力竭了。由此，国际政治舞台的格局已面目全非。尽管两极政治格局在60年代就已宣布演变了，出现了多种力量中心，但实质上，“维系两极格局的两个关键因素，即苏美两个超级大国在全球的对抗与争夺，以及北约和华约两个军事集团在欧洲地区的军事对峙，并未因此而发生根本的改变。在世界范围内尚未出现一个国家可与苏、美或一个

① 转引自李义虎：《破灭的神话：世界的裂变与弥合》，第25页。

集团可与北约和华约相匹敌，以形成多极并存的局面”①。历史学家、政治学家或经济学家们说到的“多极”化，是指在两极结构中延伸出了众多能产生积极作用的游弋的力量因子，或者说某些力量正在不断整合，形成了某种潜能巨大的胚胎。即便现在苏联解体了，美国衰落了，但世界上又有哪个力量中心能在国际政治舞台上与美国匹敌抗衡呢？叶利钦的俄罗斯在经过几年的痛苦跋涉后，意欲取代昔日苏联的国际角色地位，显然，他们是力不从心的。叶利钦会利用前苏联的核遗产挑起新一轮军备竞赛吗？这意味着俄罗斯又回到了前苏联的老路上，对于刚刚喘过气来的俄罗斯人而言是不可想象的。

世界格局的支撑点是相互竞争和较量的各主要国家或集团的力量。“战后，由于军事力在国力诸要素中占主导地位，因此，两极体系实际上主要是由美苏两家的军事力来支撑的。”② 军事上的绝对两极化是战后世界局势未失去平衡的决定性因素。还在美苏大搞缓和的时候，美国就已明显感到不断升级的军备竞赛对其真正国力的影响，着手进行了调整，前苏联由于一意孤行，终于导致了经济危机的全面爆发。当前，美国借助武力或武力相威胁的姿态和做法是没有丝毫改变的，但是，它就再没必要神经质地进行所谓军事战略调整，实施某项耗资巨大的计划来建立攻击和防御体系了。它目前所具有的实力足够它在前苏联力量永远不会再出现的任何权力真空地带或热点地区或其他感兴趣的利益地区耀武扬威了。当然，保持和西欧盟国的一致是不能忘记的一条已经确立的规则，当欧洲战乱不断时，美国与欧洲的这一纽带就不会断了，欧洲的一些大国要想顺理成章地介入欧洲事务也需要传统的盟约和后盾支持，它们新时期

① 程毅、杨宏禹主编：《国际关系基础理论》，第 78 页。

② 丁德惠、赵一明：《理性的辉光：科学技术与世界新格局》，湖南出版社，1993 年，第 36 页。

的合作很容易找到理论依据。

### 6. 1. 2 东欧地区大裂变

东欧地区的剧烈变化和动荡是国际政治舞台上“多米诺骨牌效应”的一次真正应验。1989 年和 1990 年，东欧国家内部出现了战后 40 多年来最令人目眩的形势，这些变化较之社会主义阵营早些年出现的事件而言要剧烈得多。“总的说来，这些国家的激变已转向非社会主义化，即资本主义化的方向”。“东欧形势在变化形态上是一种激变，由波匈引发的变化迅速席卷到民主德国、保、捷、罗及南斯拉夫和阿尔巴尼亚，在东欧国家形成了爆炸式连锁反应，引起举世瞩目。在激变过程中，东欧国家普遍出现了社会动荡、经济危机和政治上的无政府状态”[①]。东欧剧变在更大的程度上反映了国际社会关系中的两制斗争和意识形态因素，这一点在东欧变化的几个阶段充分体现出来。第一阶段可谓“圆桌会议阶段”，通过圆桌会议的召开来实现地位合法化，实行政治多元化，这在共产党执政的国家政治生活中无疑是个奇特现象，持不同政见者显然是假此找到了突破口。东欧的波兰和匈牙利先后通过了实行政治多元化和多党制的决议，利用这一契机，东欧各国的反对派将长期独立执政的共产党、工人党推向了守势，进而使之处于失利地位。多元化为实现西方民主政治开辟了道路。第二个阶段称之为“共产党的社会党化，科学社会主义的民主社会主义化阶段”。东欧国家的共产党叫法颇多，在激变过程中，为适应和应付多元化格局，大部分共产党都变成了社会党、社会民主党或民主社会主义党。这种变化实际意味着东欧共产党已在指导思想、自身建设、组织原则、政治目标上放弃了马列主义的基本原则。第三阶段为“自由选举”阶段，实行政治多元化和多党制的直接后果是举行西方式的自由选举。从 1989 年波兰开始到

① 李义虎：《破灭的神话：世界的裂变与弥合》，第 35～36 页。

1990年上半年，东欧国家先后举行了大选，亲西方、受西方扶持的反对派获胜，共产党被迫和平式地交出了40多年来掌握的国家权力，东欧共产党政权全面崩塌。第四阶段是“西方民主政治的动作”阶段，不管东欧国家的命运如何，它们都转向了资本主义方向是毫无疑问的，而资本主义的哲学运作得怎样呢？一句话：不尽人意。除匈牙利国内经济形势稍好外，其他国家的经济低增长或负增长势头将持续相当长一段时期。这种局面对于新获得政权的人而言是严峻的挑战，历史已经证明，赢得了政权不见得使执政者进入了保险箱。

因此，东欧的激变至少说明了这样几方面的事实：(1)社会主义事业的确在全球范围内遇到了严重挑战，东欧的变化意味着社会主义事业遭受了严重挫折。(2)东欧的连锁剧变以及苏联的解体，并非说明了所谓“社会主义的破产”，　也并非像布热津斯基在《大失败——二十世纪共产主义的兴亡》一书中所言的那样：“到下个世纪，共产主义将不可逆转地在历史上衰亡，它的实践与信条将不再与人类的状况有什么关系”，共产主义现象是“一场历史悲剧”，是20世纪的历史插曲①。事实上，社会主义进程并未从世界上消失，不能用“失败”一词来描绘社会主义事业，顶多只是说苏联模式（或称斯大林模式）在这些国家走到了尽头。社会主义力量不仅在过去的地缘政治扩展中取得了巨大成果，今后它仍将是国际政治格局中的重要力量。(3)东欧剧变后，欧洲政治地图完全改变，动摇了人们所熟知的欧洲传统秩序，它打开了欧洲秩序的大缺口，从此，欧洲一场不可避免的大地震开始了，欧洲长期以来掩压的众多矛盾全面迸发，国际政治舞台的焦点再次移回到欧洲。(4)东欧剧变的重要结果之一就是华约的瓦解。东欧六国都是华沙条约组织的成员国，

① 参见［美］布热津斯基：《大失败》，军事科学出版社，1989年，第1、27页。

苏联在一些国家有驻军。1990 年 9 月 24 日，民主德国宣布退出华约，其他成员国也决定于 1991 年 4 月 1 日解散华约军事组织，1992 年春解散华约政治组织。苏驻军根据东欧国家要求先后撤离。战后两极结构的军事支点不复存在。

### 6. 1. 3 德国的统一及其影响

德国问题是二战以来的遗留问题，它的变迁成为国际政治格局中力量关系对比变化的一面镜子。德国统一已变成了活生生的现实，1990 年 10 月 3 日对于久被压抑的德意志民族来说是一个值得欣喜万分的日子，半个世纪的夙愿在短短一年的时间里就实现了。柏林墙的倒塌和铁丝网的拆除，不少德意志人又重温起"大德国"梦来了。作为东欧剧变的第一个"早产儿"，德国的统一发出了欧洲局势在较长一段时间里会变得扑朔迷离的第一道信号。

德国似乎历来都是欧洲乃至世界动荡的根源，因此，德国问题成为以欧洲为核心的世界政治舞台的格局转换的首要因素。"德国问题既是维也纳和凡尔赛秩序的历史遗留问题，也是二战后雅尔塔秩序中东西方冷战的产物和标志"[①]。二战结束后，以法国解决德国问题的办法最为明确，而且始终不变，但是，"三大国都不再认真考虑分割的事了。美国和英国有同感，担心肢解德国在经济上不利。俄国人也改变了主意"[②]。同时，它们在对德问题的盘算方面却又各自心怀鬼胎，英国虽"说不上它对德国问题有什么全面的解决办法"，但在与美国站在一起这点上倒是很明确的。美国的政策目标"除了要使德国人和德国非纳粹化、非军事化、非卡特尔化、民主化和重新认清形势以外，美国人也关心继续保障他们自身的安全，实现德

① 李义虎：《破灭的神话：世界的裂变与弥合》，第 65 页。

② [美] A. W. 德波特著，唐雪葆等译：《欧洲与超级大国》，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6 年，第 174 页。

国和欧洲的经济复兴和保证继续实行自由经营的方针。他们要挫败社会主义，防范共产主义……抵制法国肢解德国的计划，并在中欧遏制苏联"①。俄国人在德国似乎没有太大的野心，取得赔款和拥有某些发言权是最起码的要求。问题的关键在于战争时期苏联红军和英、美等国军队对德国的实际占领，双方在某些问题上（如赔款问题）无法达成一致以及针对意识形态因素而采取的让对方无法接受的敌对行为，最终在整个德国并入两个集团的某一方上得到检验，美苏冷战的加剧导致他们首先在德国划了一条"均衡线"，德国的分裂成了冷战较量的必然结果。

这一事实在一些政治家、外交家及各个相关学科的学者们看来，"假如说，没有把德国分裂成两个国家，没有分别把它们武装起来作为早就存在的军事——政治集团中的一员并使之一成不变，那样的体系又能像现在的体系一样稳定吗？""没有十分信服的理由可以认为，如果在 1946 年建立起一个三国占领区的行政当局或以后建立起一个统一的中立的德国，就会产生一个稳定的和平的欧洲，而且它比起促使德国分裂的冷战对抗所派生的那个非常稳定的欧洲来，更加稳定，更加太平"②。可见，有的人把欧洲的和平与安宁归结为德国的割据状态，而实际上，这种分裂的背景是东西方关系的僵持与对抗。种种因素的统一便在德国的历史和二战后的现实中反映了出来。

曾几何时，"德国统一是一个历史远景，而不是实际政策的可能性。即使存在这种可能性，它也必须让位于第一位的目标即欧洲的

---

① [美] A.W. 德波特著，唐雪葆等译：《欧洲与超级大国》，第 181～182 页。

② [美] A.W. 德波特著，唐雪葆等译：《欧洲与超级大国》，第 200 页，第 179 页。

和平与统一”[1]。在东西方冷战和局势缓和的背景下，德国的统一都是无法实现的，而且分裂的格局已逐渐事实化，德国分裂为了两个主权国家，大国的介入使德国人统一的梦想完全封冻。然而，德国人的探索却是早就开始了（60年代），当东西方关系不断变化时，被分裂的两个德国的关系却在悄悄改善，“德意志民族共同的经济和政治利益必然要推动该民族国家最终走向统一”[2]。1982年科尔上台后，很快举起统一大旗，给德国统一带来了希望，但是，前苏联和西方都不允许东西德的关系搞得太热乎。德国统一的转机发生在1989年10月，受波匈剧变的影响，东德社会剧烈动荡，经济滑坡，公民大量出走，政治危机日趋严重。1989年11月9日，东德政府开放柏林墙和两德边界，东德国内政治倾向明显西化。边界开放和拆除柏林墙拉开了德国统一的序幕。1990年10月3日，东德按西德基本法第23条，将1952年取消的各州重建后加入西德，这一天成了德国新的国庆节，“东德的政治、经济、社会制度均已遭到西德的和平整编”。

德国统一“三个月前还是一个乌托邦，两个月前还是一个朦胧的梦，一个月前是一种希望，而今则是肯定了”[3]。这一现实彻底打破了“德国统一是下个世纪的事”的预言，它完全改变了欧洲和世界变化的秩序。实际上，历史自身是先有了结论，然后才是现实变迁，即：战后时代已经终结，雅尔塔体系完结了（因为德国问题是雅尔塔体制的神经中枢和欧洲问题的前沿，它牵动全局）。

德国统一后所引起的普遍的必然疑虑包括两个方面：(1) 德国是否会像法国所担心的那样变成“第四帝国”，或像英国所担心的那

---

① ［德］彼得·本德尔著，马灿荣等译：《盘根错节的欧洲》，世界知识出版社，1984年，第192页。

② 叶卫平：《国际冲突纵横论》，北京工业大学出版社，1993年，第6页。

③ 转引自李义虎：《破灭的神话：世界的裂变与弥合》，第70页。

样“接管整个欧洲”?（2）德国是否会因为外部环境的变化而决定它的外交路线?

1990年10月后，不少德国人开始发泄他们在战后40多年来所受的委屈，出现了一些带刺激性的言论和举动，特别是在欧洲的诸多问题上锋芒毕露。加上新纳粹势力活动猖獗，使欧洲各国惊恐不已，密特朗总统曾指出：“历史发展得太快了，它可能变得不可控制，它有可能把我们拉回到19世纪，而不是把我们引向21世纪，应当赶快避免让自由的疯马脱缰和避免让马车倾覆在壕沟里。”[①] 的确，德国统一后，在欧洲心脏地带崛起了一个拥有巨大经济实力的地区性“超级大国”，其面积总和为35.7万平方公里，人口为7850万，国民生产总值为2.6万亿马克，相当于英、法的总和，其综合国力使欧洲任何一个国家都大为逊色。那么，“欧洲的德国”真的会变为“德国的欧洲”吗?德国所处的让欧洲几个大国忌恨的有利地缘位置和“大德国梦”意味着德意志民族会再次走向战争吗?德国的战争机器会不可避免地复燃吗?针对种种焦虑和疑惑，国际政治问题专家、德国的一些学者都对此作了解释。具体而言包括如下几种观点：

其一，德国目前还无力成为“世界大国”，它在战略上的重要地位和政治上的最软弱状态，使它还无力承担世界范围的责任，它只不过是横跨中欧的吝啬的贸易机器而已。这主要是因为，德国统一后国内问题成堆，包括改造产业结构、重建东部经济、治理环境污染、解决几百万人的失业问题，以及最后使东部的经济技术水平赶上西部，达到彻底融合，需要10年甚至更多的时间来应付，无暇顾及和考虑世界责任。经济巨人和政治侏儒的形象已在近些年的热点地区的解决上得到了证实。而且，德国还有一个“历史教训”的因素，德国所承担的条约义务使它在军事力量方面永远受到限制，“不

① 李义虎：《破灭的神话：世界的裂变与弥合》，第74页。

向任何国家提出领土要求”成为新时期的重要承诺。还应指出的是，华约解体后，北约控制德国的作用反而加强了，对手消失后必然会是内耗的发生。德国的缰绳掌握在太多力量的手中，它不可能走得太远。

其二，保持对外战略的连续性。欧洲政治地图发生根本变化，世界格局处于剧烈转换过程中，每个国家都不会让机遇失之交臂，那么，德国会重新进行外交定位吗？结论是：一方面，德国的位置仍在西方，它仍然需要北约。欧洲的民族矛盾、边界领土纠纷都威胁着德国的安宁和欧洲的稳定，通过北约这个“纽带”继续利用美国的“保护伞”，对德国的安宁和发展来说十分重要，因为短时期内美国在欧洲的军事存在及其对欧洲动荡的意义都不会改变；另一方面，德国的利益只有在欧洲才能实现，因而它对欧共体的发展一向相当积极，致力于欧洲的一体化事业将是德国对外政策的核心。

### 6.1.4 热点与规范

热点地区此伏彼起，地区霸权主义势力猖獗。国际格局的大转换时期，必然会出现一定范围、一定地区的失衡状态。一方面，由于苏美两个大国的收缩，一些热点地区迅速降温，地区冲突中昔日大国介入的景象有所改变；然而，另一方面，我们应当肯定，大国势力的消失实际意味着一种失衡状况，地区霸权主义势力迅速抬头。

海湾危机和战争是冷战后时代第一场重大的国际危机和战争，是国际新秩序口号的首次考验。伊拉克于1990年8月2日采取突然袭击的方式，公然侵吞了它的邻国科威特，地区霸权野心暴露无遗。伊拉克违背国际法和国际关系准则的行径，最终导致了海湾战争的爆发。这一地区特殊的地缘位置和丰富的石油资源使海湾危机的敏感程度迅速上升，由此引发的战争成为二战以来规模最大、参战国最多的一场高技术局部战争（有人称之为0.5次世界大战或第2.5次世界大战）。从政治、经济和战略意义上而言，它带有全局性。海

湾危机的爆发与平息说明了这样几个问题:

第一，地区主义始终是国际政治中的活跃因素。冷战体制下的怪胎之一就是地区主义的培育与生长，到了70年代和80年代，地区主义开始在国际舞台中大肆作祟。随着两极体系的瓦解、大国又失去了对原有地区性问题的影响力，萨达姆说:“过去有两个超级大国之间的平衡，今天出现了空缺，苏联不再有威信，本地区每个国家都可以根据实力自由行动。”[①]伊拉克在使用武力和外交讹诈方面之所以赤裸裸，实质就在于伊拉克的侵略行径既不受原国际体系的压抑，又不受正在形成的国际新体系的束缚，国际社会的无序状态导致了这场危机的出现，这正如萨达姆自己所言:“你们在联合国开了绿灯，才使这场战争得以发生。如果不开，就不会发生这场战争。”[②]因此，美国等大国在海湾危机期间极其卖力的原因之一在于，这是“建立世界新秩序的好机会”，美国前总统布什指出:“我们现在正处在独特的时刻，文明世界现在正处在制定将按什么样条例来掌管冷战后开始出现的新世界秩序的过程中。”[③]美国强调指出，“沙漠盾牌”和“沙漠风暴”行动的重要目标就是建立世界新秩序。

第二，美国的军事强国地位没有改变。对于美国而言，海湾危机和战争是它显示国家意志和力量的绝好机会。美国要向世界证明，国际新秩序中的领头羊还是美国，这一顺序不容改变。布什认为:只有美国才有能力在远离本土1万公里的地方迅速部署部队，只有美国才能肩负起组织联盟的职责，还没有一个力量中心或集团可以代替美国的领导地位。但同时也应看到，这也是一次再次显示美国力量正在衰退的机会，在这样一次冲突中大打出手，说明了美国在失去了苏联的合作后信心下降。虽然海湾战争中的军事对抗是一场实

---

① 转引自李义虎:《破灭的神话:世界的裂变与弥合》，第254页。

② 转引自李义虎:《破灭的神话:世界的裂变与弥合》，第254页。

③ 《新闻周刊》1990年11月26日。

力悬殊的较量，但美国已明显今不如昔。“美国已不是超级大国，这在于它不再是花钱自己办事”①。美国试图建立国际新秩序的初衷大打折扣，以及在战后中东地区安排上，美国被迫修改传统政策也充分证明美国衰落的态势。

第三，国际社会各国对和平的要求表现出了不同的姿态。西方国家为了保护自己赖以生存的经济命脉，纷纷作出了强烈反映，最引人注目的要算德、日了。德国虽谨小慎微，但从其他国家对它对待海湾危机的反映上已找到了一些进行外交定位的动力。日本虽持中立立场却也要向海湾派兵，借机寻求“国际突破”的意图昭然若揭。这些国家未来政治大国的走向成为定局。

中国的和平主张与努力得到了阿拉伯和第三世界国家的支持。中国政府同样认为伊拉克的侵吞行为是对国际关系准则的公然践踏，但又反对在未加充分考虑的情况下就使用武力。

总之，海湾危机和战争是冷战后时代的第一次公演，各种力量和角色纷纷粉墨登场，明显的趋向是，国际社会不再高度一致，此后，各个力量在国际体系坐标上的位置移动成为有目的性的运动。

第四，解决国际问题的种种手段得到了检验。解决某一次国际危机、冲突或战争的手段的运用完全反映了相关国际关系的格局状况，由于海湾危机和战争波及到了100多个国家，因而，解决这场危机手段的运用则体现了新旧格局转换时期国际事态的进程。首先，由美国挑头，以联合国为中心，国际社会掀起了一股不断升级的对伊全面经济制裁浪潮，这些国家希望借助经济制裁使伊拉克屈服，撤出占领区，但是，这一手段的运用对伊拉克没有丝毫作用。其次，国际社会对伊拉克施加了强大的外交压力。美国从总统到国务卿、国防部长等高级官员都亲自出马，四处奔走，穿梭外交，寻求各方支

① 《外交季刊》(*Foreign Affairs*) 1991年第1期。

持。英、法、日、阿拉伯中立国、中国等也都积极采取外交行动，提出自己的解决方案。联合国秘书长也亲自奔赴伊拉克会见伊拉克总统和外长，传达国际社会的意见和信息。很显然，海湾危机爆发后，和平解决、政治解决的主张占主导地位，但是，所有这些都成为徒劳，当时的联合国秘书长最后不得不宣布："通过外交途径解决海湾危机无望。"最后，美国为首的多国部队使用武力威胁和战争手段介入了这场冲突中，即使这样，军事威慑手段也未能阻止危机的进一步恶化，地区强国与全球强国的对抗达到顶峰，军事威慑手段的失败即意味着武力使用。战争的进程显示，这是一场力量相当悬殊的较量，伊拉克被迫撤出科威特。

从这次危机和战争的解决过程来看，国际危机或摩擦或冲突的解决顺序（或从上策至下策）是：经济制裁——外交压力——军事威胁——战争。这几个过程都不是孤立的，它们既互动又逆进。战争作为终极手段是可以使用的，但其前提是经济制裁、道义谴责、外交努力及军事威慑等手段都无效后。

此外，由于东欧剧变和苏联解体，民族、宗教矛盾全面爆发，民族主义势力抬头成为欧洲政治格局转换过程中的一个显著特点，前南斯拉夫内乱是当前最严重的国际事件，波黑危机已关系到欧洲的前途和未来，以欧洲为中心的国际政治舞台将走向何方，取决于这场旷日持久的冲突的最后解决结果。同时，苏联解体后暴露出的民族问题使我们完全相信"大国回归"纯属无稽之谈。这里成了新的热点地区。

总之，欧洲在变、亚洲在变、非洲和拉丁美洲也在变……世界正处在迅速的大变动中。世界政治格局的转换特点可归结为下列几点：

第一，它具有长期性。战后时代结束了，世界进入了一个既需要破又需要立的新时代，国际格局的变化表现在"质"的方面，它涉及国际社会的各种问题和各个层次，新时代体系的重建还看不到

什么比较清晰的走势，这比以往任何一个体系的确立都更模糊，更具游离性，也没有一个或几个力量可以操纵它的发展趋势。按传统的思维和设计来建构新体系是不可能的了。

第二，政治格局的多极化倾向将不断加强。两极体系瓦解的直接原因和结果之一就是多极化趋势的出现，国际社会的发言人不再只是少数几个大国，不管在理论上有多少说法，实际中的权力中心已越来越多。但是，“多极化不能直接生硬地理解为民主化……多极化只是一种结构上的均衡化，并不必然带有全面公正的民主内容和稳定状态”[①]。多极化趋势已与新秩序的建立紧紧连在了一起。

第三，国际合作一体化（有人称为“多圈化”）。这是经济区域化、集团化的必然现象。地缘上的邻近和文化形态上的相似，使国际合作逐步板块化，即以地缘为基点出现了欧洲板块、亚洲板块、北美洲板块等。

第四，全球一体化和民族主义势力抬头成为相互矛盾的两个方面。历史演进到20世纪最后十年，人类共同的利益越来越多，传统意义上的国家主权含义已大为改变，各个区域一体化及相互渗透已使世界主义潮流一浪高过一浪，各种国际组织迅速扩大，功能强化。国际关系所显现出来的是三个层次的能动因素：主权国家、区域联合和国际组织。至于民族主义，它是国际社会固有的传统表现，它也是地区主义存在的根本，主权和国家利益将永远是民族主义的核心内涵。那么，这一矛盾能否协调呢？东方文化、中国儒家世界观中的人道主义和儒教、佛教中的合理主义，真的意味着“对世界统一有意义”[②] 吗？

---

① 李义虎：《破灭的神话：世界的裂变与弥合》，第12页。

② 参见汤因比、池田大作：《展望二十一世纪》，国际文化出版公司，1985年，第288页。

## 6.2 经济实力与地缘地位

冷战结束了，由此而形成的所谓两种经济体系完全消亡了。冷战后时代的到来，在深刻地影响了政治格局的同时，也对经济造成了极大的冲击，"冷战综合症"和世界经济的周期性变化融汇在一起，使世界经济格局明显转向：一是世界范围内的军备竞赛减缓，各国开始将主要注意力转向经济发展，科技战略与军备发展的联系出现松动；二是世界范围内的经济繁荣与发展还没有马上出现，世界经济将处在一个长期的调整期，包括经济结构、经济关系、经济政策等方面。

### 6.2.1 艰难的转向

前苏联、东欧地区国家在艰难中求发展。苏联解体后，这些地区的国家所期盼的西方援助的及时雨并没有到来，由于前苏联所固有的经济弊端和矛盾，这些国家普遍面临国内危机。怎样运用经济政策的基本要素，诸如财政政策、货币信贷政策、价格政策、结构投资政策、收人政策等来稳定财政、发展经济、增强国力、提高人民的物质文化生活水平，以渡过难关，克服社会总危机，成为新政府必须面对和解决的焦点问题。以俄罗斯为例，盖达尔政府立即抛弃前苏联所具备的一整套经济政策及其运作方法，试图仿效西方资本主义的经营方式来复兴俄罗斯，该政府借鉴别国的经验，推行"休克疗法"，"制定出激进的经济纲领，治理俄罗斯的财政经济危机，并希望西方的货币主义理论能在俄罗斯这块土地上结出硕果、出现经济'奇迹'"[1]。但事与愿违，强行"休克疗法"引起了俄经济进一步恶化和社会危机大爆发，俄罗斯被迫进行经济转轨。从目前来看，

① 《世界经济》1993年第4期，第23页。

俄罗斯及独联体其他国家面临的困境与抉择主要有这样几方面：(1) 制止通货膨胀，加强政府的经济调节职能，采取合理的经济政策，稳定国内经济形势，渡过3年左右的经济滑坡时期，并积累经验，为90年代后半期或下个世纪的经济复兴作准备。(2) 加强独联体间的经济联系。西方国家出于政治的经济的双重目的对前苏联地区的国家作出了提供经济援助的"许诺"和有条件的有限资助，但从几年的实践来看，对西方的援助期望值不可太高，加强独联体国家间的经济联系，恢复它们固有的纽带关系成为它们共同走出困境的重要途径之一。(3) 积极改善周边国际环境，促进国内经济好转。前苏联地区各国虽与西方接近了，但利益冲突是必然的。尤其是俄罗斯，为了寻求在国际政治经济格局中的地位与利益，开始把视野转向亚太。加强同中国、日本、印度、南韩等国家或地区的关系，对于俄罗斯减少对西方的依赖，增强多边自主能力产生了重要影响。

东欧地区的国家在经历了剧变的阵痛后，经济形势出现了下列特点：

首先，经济形势严峻，各国差异扩大。东欧各国普遍向市场经济转轨，这一趋势已不可逆转，在这一过程中，它们连续几年面临同样的经济危机：通货膨胀、生产大幅度下降、失业增加、人民生活水平下降。但经过几年的经济发展，差异明显扩大，中欧的波兰、匈牙利和捷克斯洛伐克（1993年起分裂为两个国家）的情况相对好些，到1992年，波兰作为前东欧集团中率先剧变转轨的样板，终于走出衰退，开始爬坡，1992年国民生产总值增长2%。捷克斯洛伐克自分家后，捷克在1993年的头10个月里国民生产总值增长了0.5%，匈牙利、斯洛伐克两国的滑坡现象明显减缓；通货膨胀率在1993年的头9至10个月里已下降为两位数（波兰为34%、匈牙利21%、捷克20%）；由于价格放开、取消补贴、缩减开支，企业效益提高，财政状况好转，预算赤字下降。目前，中欧几国的对外贸易已明显增加，其中对欧共体的贸易比重达到60%—75%，出口超过

进口，外贸从逆差转为顺差；同时，私有经济迅速增长，所有制结构调整取得良性进展[①]。

巴尔干三国保加利亚、罗马利亚和阿尔巴尼亚的经济增长率继续下降，通货膨胀依然严重，但已较往年要好些。前南斯拉夫地区在经济转轨方面曾走在东欧各国前列，但1991年分裂并陷入旷日持久的战乱之中后，经济状况不断恶化，除斯洛文尼亚形势较稳定外，其他各国都不容乐观，经济在近期内好转无望。

其次，从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转轨呈现出长期性。从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过渡要求对整个社会经济结构及其运行机制进行彻底变革，90年代以来，东欧各国先后在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的帮助下制定和实施了经济改革纳领和稳定经济的政策措施，其内容概括为：自由化、稳定化和私有化，即："放开物价、取消补贴，放开外贸、取消国家干预；改革财政金融体制，实行紧缩政策，平衡收支，稳定货币，克服通货膨胀；发展私有部门，实行国营企业私有化，改变经济结构。"[②]寄希望于激进的经济政策使国家经济一跃而进入市场经济，使东欧各国付出了沉重的代价。实践证明，经济结构的转变需要资金和时间，同时还要具备良好的国际国内政治经济环境。因此，花大力气解决外贸转轨问题、国内国营大企业的问题、稳定国内政局从而稳定经济政策的问题，将是东欧各国长时间的共同课题。

其三，对外经济关系受挫之后逐渐调整。东欧各国在经济转轨时纷纷转向西方，特别是把希望寄托于与欧共体的贸易关系上，在它们看来，西欧的技术、资金会帮助它们马上渡过难关。的确，不少东欧国家已经成了欧共体的联系国，并享受某些出口优惠，但是，西欧地区的贸易保护主义使东欧国家在增加出口方面遇到了麻烦。而且，东欧国家抛弃传统市场的做法必然使之陷入两难的境地。目

---

① 参见《世界经济》1994年第3期，第31～32页。

② 《世界经济》1993年第4期，第29页。

前，这些国家不得不从西欧市场折转，寻找新的市场。波兰政府已提出，要加强同前“经互会”体系国家的经济联系，并不能忽视欧洲之外的国家，如日本、中国等对它们就具有特别意义。此外，这一地区的区域集团化也得到了发展。波、匈、捷、斯四国于 1993 年签订了中欧自由贸易区协定；波兰、乌克兰、斯洛伐克、匈牙利四国在其相邻的地区建立了欧洲东喀尔巴阡地区联合体。

### 6. 2. 2 医治“冷战后经济综合症”

西方经济普遍染上“冷战后经济综合症”，它们在调整中求发展。1990 年以来，西方国家先后陷入了经济危机，美、英、加等国率先开始衰退，紧接着是瑞典、澳大利亚、新西兰等国经济也开始走下坡路，此后又波及到日本、德国以及大多数欧共体国家。到 1993 年底，除少数国家外，大多数西方国家都没有逃脱这次危机的袭击。“西方国家的这次经济危机，从 1990 年下半年美国陷入衰退起，至今已有 4 个年头，时间之长已经超过 70 年代中期和 80 年代初期的两次危机。西方……工业生产指数已经连续 3 年没有增长，国内生产总值年增长率也已连续 4 年处在极低的水平上”[①]。进入 90 年代以来，西方经济中普遍存在的困境表现为：一是经济结构失调。由于冷战体系瓦解，原来庞大的军事工业面临结构性转变，而这又非一朝一夕之事，由此而诱发的经济结构调整势在必然。二是“消化不良”，前社会主义国家剧变后纷纷倒向西方，它们在欢庆意识形态胜利的同时，不得不强咽下这些带刺的果实，由此而造成了财政赤字、国债增加、物价上涨。最明显的症状就是欧洲货币体系的严重危机、混乱和倒退，欧共体大多数国家连续几年的停滞和负增长就是源于此。三是相互竞争加剧，政治上冷战的结束，意味着更多利益真空地带的出现，为了争夺新的市场和投资场所，西方国家都正

---

① 《世界经济》1994 年第 2 期，第 8 页。

把外交重点转向经济，为建立经济新秩序而进行的“经济大战”已全面展开。四是政策协调更加困难。冷战结束后，国家利益至上的观念明显抬头，近几年来，西方国家在经济领域的政策协调已失去了“共同对付苏联”这一根基，经济摩擦越来越多，争论和矛盾更难妥协。这必然影响到世界经济的繁荣。五是失业日益严重。军事工业转向和全球竞争加剧是西方国家失业日益严重的主要原因，再加上企业为增强竞争能力而导致的“机器排斥人”的现象，使西方社会普遍遭受了失业浪潮的袭击。

为了摆脱困境，西方各国政府或集团机构采取了种种调整措施。

美国的克林顿政府在经过几年的艰难摸索后，终于推出了“克林顿经济学”。与“里根经济学”不同的是：“克林顿经济学是由自由放任走向国家干预。”[1] 其经济计划包括下列内容：

第一，增加就业促进复苏的经济刺激计划。他提出这一计划目的有三：一是增加就业，刺激复苏；二是为经济、社会五年计划支付第一笔现款；三是设置一种保险机制，保证不因大幅度削减赤字导致经济再度滑坡。1993 年夏，克林顿提出以 162 亿美元经费刺激经济的方案，尽管这一数字远远不及日本每年的经济振兴费用，但还是在国会搁浅了。显然，人们对国家干预的不良后果的余悸和沉重的赤字包袱，已使克林顿政府推行的国家干预政策较以往任何时候都要困难。

第二，有目标地向人力资源、基础设施、高科技增加设入，制定为经济长期增长奠定基础的投资计划。它分五个部分：重建美国的计划、开发人力资源的终身学习计划、工作奖励计划、保健计划和激励私营部门的计划。在这一计划中最令人注目的是准备 1998 年实施的全民健康医疗计划，对于 3700 多万无力买保险的美国人来说无疑是个福音，但是，政府开支将因此每年增加几百亿美元，有人

① 《世界经济》1994 年第 6 期，第 13 页。

估计，克氏健康计划对美国长期经济增长会造成负面影响。

第三，削减联邦赤字的计划。这是整个克氏经济学计划中最重要的一环。庞大而失控的联邦赤字是美国宏观经济结构失调的集中反映，也是影响美国经济健康发展的重要因素。1993 年 9 月，克氏及其幕僚们在经过再三权衡后宣布，将裁减 25.2 万个联邦职位，5 年内节省 1080 亿美元。并在此基础上计划削减赤字 4930 亿美元，其中减少支出 2470 亿美元，增加收入 2460 亿美元。在减支中，国防费减 760 亿美元，酌情决定支出减 540 亿美元，权利项目减 910 亿美元。加税是克氏这一方案的重头戏，1994 年预算法的突出特点就是大量增税和改变分配格局。个人所得税的级差增加为 4 级，这条立法为政府增加了 1147 亿美元的收入。在分配格局方面，将税收增加额的 90%压在富人肩上，发挥了税收调节贫富悬殊的功能。实施这项计划后，预计到 1998 年联邦赤字将下降到 2022 亿美元。

同时，克林顿政府在对外经济战略方面也进行了调整，并取得了某些成效。这包括：

第一，签定了北美自由贸易协定，推动了拉美地区经济一体化进程的深人发展。1992 年 8 月签署达成的北美自由贸易协定包括减免关税、消除贸易壁垒、实施公开竞争、增加投资、开放金融市场、鼓励技术合作等内容。克林顿政府认为，建立北美自由贸易区的有利方面在于，为美国扩大投资和出口创造了有利的地缘条件，形成了对日、欧的竞争优势；资金的自由流动有利于美国将劳动密集型产业向墨西哥转移，实现产业结构调整；高举自由贸易的旗帜不仅有利于抗击日、欧的贸易保护主义势力，而且还将大力推动拉美地区的经济一体化进程。1993 年 11 月 17 日，美国国会终于通过了这一协定，这是克氏在经济战线取得的重大成就。

第二，全面调整对外贸易政策、国际投资和国际金融战略。克林顿领导班子把“促进美国的经济安全、赢得更大的国际市场”放在第一位、把贸易问题作为美安全的首要因素提出来，克林顿政府

尚属首次。因而，将国家利益明显向经济贸易利益倾斜成为美国新政府的一项战略性重大调整；其次，从国际多边主义立场转向地区多边主义、双边和单边主义，推行更加强硬的公平贸易和管理贸易政策，"公平贸易"和对等原则成为新政府的基调；另外，政府又积极制定产业政策，支持战略产业，提高国家总体竞争力。新政府最优先考虑的是光电子学、生物技术、环境技术以及高级材料等战略领域。

对国际投资和国际金融战略的调整早在布什政府时期就开始了，克服对外贸易中与日俱增的逆差和外国资本大量流入，以及美国际投资地位相对削弱的处境，是90年代后美国历届政府的一致目标，只有加快调整，才能继续维持美国在世界上的头号投资和金融大国的地位。它们的具体做法有：在国际投资方面，加强政府对国际投资领域的干预，推进直接投资在全球范围内自由流动；立足于与日、欧的竞争，加强美对外投资的全球性部署，突出对外投资战略重点；积极推进"开放投资政策"，遏止德、日等国在美投资的回流趋向。在国际金融方面，积极推进金融机构改革，强化金融创新；努力振兴跨国银行业，加强与日本、西欧的同行业竞争；保持美元汇率坚挺，维护美元在国际货币多元结构中的主导地位。

第三，提出了亚太新战略，美对外经贸关系重心明显东移。"欧洲的衰落"和"亚太的崛起"已不是一个梦，21世纪是亚洲和太平洋的世纪。从里根——布什政府到克林顿政府时期，美国的新亚太战略经历了从酝酿到正式提出并推进的过程。1993年7月7日，克林顿总统于七国首脑东京会议前在东京早稻田大学发表演说，正式提出了他关于"新太平洋共同体"的构想，指出："现在是美国同日本以及这个地区的其他国家一起创建新太平洋共同体的时候了。"[①]美国虽是冷战后唯一公认的超级大国，但它已清醒地感受到了格局

① 转引自《世界经济》1994年第12期，第2页。

转换阶段来自欧、日、中等力量的压力，与欧洲相比，美国与亚太地区无论就历史渊源还是地缘政治和地缘经济来说都占优势。在美国深感力不从心的时候，还有哪个地区在确保美国的实力地位，继续在世界事务中发挥领导作用方面比亚太地区更重要呢？亚太地区日益增大的贸易与投资规模以及太平洋两岸国家和地区之间贸易与投资的飞速发展，使美国将之看成是世界最有希望和最有活动的地区。当今世界，美、日之间的经济、科技竞争成为美国制定经济战略的首先考虑因素，这两个力量间的竞争与合作是国际经济发展的核心力量，“亚洲和太平洋如今正处在世界事务的中心”。最为重要的是，从贸易来说，从1970年—1990年的20年时间里，美国对太平洋地区的出口占美国总出口额的比重从45.2%上升为58.7%，进口从56.1%上升为62.5%。到1991年，美与亚太地区国家的贸易额为3160亿美元，而同西欧国家的贸易额为2210亿美元，前者较后者多1/3。就投资规模而言，1982年—1990年间，美国对太平洋国家的直接投资的累计总额从720亿美元上升到1420亿美元。与亚太地区日益紧密的经济联系使美国政府别无选择。当然，美国企望通过“新太平洋共同体”建立亚洲太平洋自由贸易区，并进而促进世界贸易自由化的打算也是众人皆知的，在亚太地区建立一种完全新型的地区经济合作模式，然后带动全球贸易自由化的进程。这是美国在全球促进民主、推进美国价值观的先行动作。

90年代以来，西欧经济停滞越来越呈现出长期化趋势，1991年以来，欧共体国内生产总值年平均增长率仅为0.6%。到1993年，除英国走出低谷，经济增长率为1.5%以外，只有四国（爱尔兰2.1%、卢森堡1.0%、希腊0.8%、葡萄牙0.5%）呈低速增长，另外六国呈负增长，意大利为零增长。90年代上半叶，西欧所面临的主要困难有：

第一，统一大市场虽于1993年建成，但离计划的目标还有一定差距。大市场的完善需要时间。

第二，《马约》最终在12国得到批准，但政治和经济货币联盟正经受严峻考验。欧洲货币体系连续几年的动荡使其运行受到怀疑。

第三，成员国向心力明显减弱，矛盾突出。欧洲大国对控制通货膨胀、农业政策、经费比例问题等方面态度不一，国家利益目标上升。

第四，"扩大"问题上进展缓慢。成员国之间固有的政治、经济、文化和社会政策方面的差异是一体化扩大的主要障碍。

为此，近几年来，欧洲联盟各国就集体自力更生的一系列问题进行了磋商、调整和改革，欧洲联盟在世界经济格局中的一极地位已成定势。

首先，加快共同农业政策改革。这一举措始于70年代，由于各国目标利益不一和欧洲农产品在国际贸易中的特殊地位，因而这一改革不仅对欧共体农业本身而且对国际贸易及世界经济的发展都有着极其深刻的意义。90年代以来，欧共体在这一改革中采取的新步骤包括：继续大幅度降低农产品的担保价格，目的在于减轻欧共体的财政负担，缓解在国际农产品贸易中与美、日等国的紧张关系局面；采取有条件的直接补贴方式，以稳定农业生产和增加生产者的收入；开辟农产品供给的新渠道，进一步优化农业生产结构；积极扶持落后地区，促进地区间农业的协调发展；加强农村环境保护，防止农业生态失衡；促进农业科技研究及成果的推广应用。

其次，在曲折和不利条件下推动欧洲经济货币联盟的发展。自1991年12国签署《经济与货币联盟条约》以来，欧共体在建立欧洲经济与货币联盟的进程中虽遇到了不少麻烦，但已取得了不小进展。1993年11月1日，《马约》被欧共体12国全部予以批准，欧共体改名为欧洲联盟。这表明，欧洲联盟各国虽存在利益冲突，但在维护一体化进程的总趋向上是一致的；1993年1月1日欧洲统一大市场建立，经过各国七年的努力，终于实现了欧共体内部各国商品、资本、人员和劳务的自由流通；1992年9月和1993年8月，欧洲货币

体系经历了两次大风波，欧洲货币联盟面临搁浅的危险，但是，两年的货币体制混乱并没有使欧洲货币一体化的进程夭折，各国在这一过程中受到的巨大利益及统一大市场的客观要求，使欧洲各国检验了他们在危机情况下协调行动的作用，建立货币一体化的信心反而加强了。1995 年，奥地利、瑞典、芬兰加入欧洲联盟。

日本自 1992 年起，经济衰退状态明显，这一年的实际增长率为 0.8%（其中二季度为零增长，三季度为－1.6%），远远低于 1991 年的 3.5%的水平；1993 年的增长率又降为 0.3%。日本经济的衰落除受国际格局大环境的影响外，主要受下列因素左右：一是“泡沫经济”后遗症；二是产业结构老化；三是劳动力不足以及由此引起的工资成本上升；四是国际经济环境更加恶化。

日本经济的关键就在于国际经济环境的好坏。90 所代以来，随着国际政治经济的变化，日本的国际经济环境也发生了逆转，长期以来依赖于出口贸易的日本经济为缓和国内危机，拼命向海外找出路，从而形成了低增长、高出口、高赤字的畸形局面，而这一状况又严重地冲击了美、欧等国，引起日元大幅度升值，同时，加剧了固有的日欧、日美经济摩擦。因此，日本的经济调整包括相互联系的几个方面：

第一，清除“泡沫经济”影响，采取紧缩财政政策，扩大内需，增加公共投资。

第二，进一步开放国内市场。有限的市场容量和保护性的体制和机制，使日本处于封闭状态，外国商品和资本很难进人，美国近几年来一直把打人日本市场作为对日外交重点，日本被迫采取措施，既满足美国的要求，又保护日本产业的发展。

第三，以日元升值为契机，调整产业结构，提高适应能力。

第四，实行“脱美人亚”政策（与 80 年代的“脱亚人美”政策正好相反）。日、美矛盾加剧，迫使日本政府实行贸易和投资多元化，出于地缘上的优势和亚洲地区的经济增长局势的考虑，日本近年来

开始增加对东亚国家的贸易和投资。

一个明显的事实是，日本也十分重视在亚太地区的经济合作，战后它曾提出"环太平洋联盟"、"环日本海经济圈"等主张。1987年底，竹下登政府上台伊始即提出了"东亚经济圈"的设想，主张由日本、"四小龙"以及东盟等10个国家和地区组成，通过在贸易、投资和货币上"三位一体"的合作，加强这一区域的经济实力，借以抗衡欧美。在日本的这些构想里有两个共同点：一是日本以"雁头"自居，二是中国被排斥在外。显而易见，日本是要借助其强大的经济实力，建立以日、美合作为基轴，以日本为支柱，以东盟和"四小龙"为基础，包括周边其他一些国家的经济合作圈，确保稳定的原料、能源来源和国际市场，保障日本的生存和发展，实现"政治大国"的地位。改变经济巨人、政治侏儒的地位是日本进行经济战略调整的归宿。

### 6. 2. 3 经济新秩序与新趋向

北南经济关系区域化成为世界"发展"问题的一个值得注意的新现象。目前，世界上已经建立和正在酝酿的区域性经济集团，其成员国不再是清一色的发达国家或发展中国家，在同一经济集团中包括了两种不同类型的国家，如：正在酝酿中的亚太经济合作组织、欧共体与东欧国家的联合体，法国、西班牙等欧洲国家与北非某些国家的合作体，以及北美自由贸易区等。这对于艰涩的南北对话和不断扩大的南北鸿沟来说或许是一个良性开端。这一趋向说明：

第一，意识形态的因素在两极格局转换过程中已从经济领域退位。对经济利益的纯粹追逐成为国家利益的主调。

第二，国际分工和世界经济一体化的进一步深化从根本上要求不同层次的国家加强合作，在资金、技术、商品和人员的交流方面形成"你中有我，我中有你"的新型经济关系。

第三，世界经济发展的不平衡使地缘合作倾向日盛。经济发展

不平衡所导致的多极化，使部分国家进入新兴工业化国家行列，缩小了与发达国家的差距。借助地缘优势加强区域合作是发达国家扩大影响、恢复经济、提高竞争能力的重要途径。

第四，全球性贸易调节机制乏力，使区域性北南经济关系出现了内在的合作要求。以关税壁垒为内容的贸易保护主义严重损害了自由贸易原则，北南方国家都迫切寻求在小范围内用具有法律效力的协议约束成员国的贸易和投资行为，稳定相互间的经济贸易关系。

第五，发展中国家的经济体制改革和宏观经济政策调整，促进了北南经济贸易体制的接轨。

当然，这些现象的出现并不是意味着北南经济的根本改善，相反，它将使发展中国家的经济发展不平衡现象进一步加剧，进而使发展中国家进一步分化，阻碍了世界范围内的经济合作，因为这些集团大都具有明显的地区保护主义色彩和排外倾向，这是问题的另一方面。

总之，冷战后时代世界经济关系和经济格局呈现了许多新的特点，归结起来大致有下列几个方面：

第一，世界主战场转向经济领域。经过战后40多年的较量和苏东的剧变说明，经济力量是一个国家综合实力的根本，经济实力决定一个国家的国际关系地位，因此，竞争经济优势，加速科技发展成为90年代国际社会各国的共识。以此为契机，世界各国纷纷调整对内对外经济战略，国际经济领域的贸易战、资源战和货币战将迈上一个新台阶。

第二，经济格局呈现多极化。冷战时期的经济竞争明显表现为美、日、欧三极。从世界经济的全局来分析，剧变后的前苏东国家及仍坚持社会主义制度的国家正抓住机遇，加速调整改革，参与国际竞争、加入世界经济大擂台是必然趋势。一批新兴工业化国家已经出现，它们已成为国际经济活动中一支不可忽视的力量。

第三，世界经济集团化、区域化趋势加强。目前世界上出现了

由 120 多个国家分别组成的 109 个区域性经济集团，还有不少正处于酝酿和筹建阶段。越来越多的国家卷入到区域性经济集团化浪潮之中，国家间的经济关系日益为经济集团间的经济关系所代替。特别是洲域集团化趋势明显，“占据全球支配层次的是三大经济圈：欧洲、亚太和北美。到 20 世纪末 21 世纪初，在经济上三足鼎立的格局已毫无疑问，三圈互动之势将影响全局”[①]。

## 6. 3 新科技革命与世界权力格局

### 6. 3. 1 新科技革命的特征

我们首先要分析一下新技术革命所显示的特点。关于科学技术的进步并无严格的阶段划分，因为这本身就是一个连续的过程。一般来说，国内学者将之分为三个时期：从 18 世纪 40 年代到 19 世纪初，由于纺织机械和蒸汽机的发明而导致的产业革命时期；从 19 世纪初开始的内燃机和电机的发明而引起的电力革命时期；本世纪 50 年代开始的信息革命时期。目前国内有些学者又认为，从 70 年代开始在新的技术开发和经济结构调整中逐步兴起了第四次科技革命[②]。70 年代以来兴起的新科学技术革命出现了与第三次科技革命不同的一些特征。

第一，科技革命的主动力由军事需要转为民用需要。第二次世界大战后爆发的第三次科技革命中所出现的三个具有历史意义的突破，可以说都是以军事技术的突破为先导的。一是原子能的利用。核能的大规模使用使人类实现了由化石能源转向核能为主的能源革命，人类将在相当长的时期里摆脱能源危机，它广泛用于发电、农

① 李义虎：《破灭的神话：世界的裂变与弥合》，第 14 页。

② 于德惠、赵一明：《理性的辉光：科学技术与世界新格局》，第 191 页。

业、医学、生物学及工业领域（作为示踪、防腐、探伤、治疗、科研测试的重要手段）。二是空间技术的突破。军用火箭技术敲开了空间时代的大门，人造天体的诞生，意味着科学技术进入了综合化发展的阶段；它涉及到自动化技术、计算机技术、推进技术、三遥（遥控、遥测、遥感）技术、光电技术、密封技术、精细加工技术、温控技术、通信技术、测试技术、材料技术等领域。三是电子计算机的发展。在军事需求的刺激下，计算机技术不断更新换代，到了70年代，它开始进入社会各个领域。

1973年的石油危机成为诱发新科技革命的催化剂，耗能、耗材型经济向节能、省材型经济转化，使发展和采用电子信息技术、新能源和新材料技术势在必行。在国际缓和的大局势下，科技革命深化不再单纯表现为军事需求的扩大，而是民用需求的牵引作用日益增大。扩大市场、取得经济竞争主动权成为科学技术进步的主要动力之一。军事需求的降低主要包括对电子信息技术等高技术的需求已经饱和、对电子信息产品的需求量越来越低于民用部门；在更新速度上，军事部门也不如民用部门。在供给方面，生产规模及产品更新换代的主要源头同样也不可能是军事部门。

因此，着力开发民用为主的通用技术成为新科技革命占主导地位的研究开发模式，与第三次技术革命中国防优先、军事技术领先发展的模式不同，新模式转变为首先从经济角度来考虑科技发展，注重整个国民经济的高技术化和信息化。在技术开发上，重点选择于经济发展和国防安全都有重要意义的通用技术。"日本是最先意识到高技术具有军民两用特性的国家"[①]。在应用程序方面，由民及军，由低到高逐级发展，高新技术首先应用于民用领域并在必要的时机和范围应用于军事领域。

第二，各种新学科、新工业层出不穷。进入70年代以来，科学

① 于德惠、赵一明：《理性的辉光：科技革命与世界新格局》，第87页。

技术领域出现了一个又一个新的范畴，其中有些是第三次技术革命的延续和拓展，但大多是新开拓的，它包括 6 个科学范畴、12 个技术领域和 9 个基础支撑科学*：

| 6 个科学范畴 | 12 个技术领域 | 9 个基础支撑科学 |
| --- | --- | --- |
| **信息科学**<br>通信科学<br>控制论科学<br>计算机科学<br>智能科学<br>**生命科学**<br>生物科学<br>医学科学<br>人体科学<br>思维科学<br>脑科学<br>**材料科学**<br>**能源科学**<br>核科学<br>**空间科学**<br>**海洋科学** | **信息技术**<br>微电子技术　半导体技术<br>光电子技术　激光技术<br>遥感技术　图像技术<br>计算机技术<br>软件技术　数据通信技术<br>数字电视技术　光纤通信技术<br>卫星通信技术<br>**自动化技术**<br>柔性生产技术　机器人技术<br>计算机集成制造技术<br>**检测技术**<br>传感技术<br>**生物技术**<br>基因工程技术　细胞工程技术<br>微生物技术　循环技术<br>生物桄技术　蛋白质工程<br>**知识工程技术**<br>核能技术　新能源技术<br>储能技术　节能技术<br>**新材料技术　超导技术　航天技术**<br>**极限技术　表面技术　海洋工程技术　纳米技术** | **数学科学**<br>**物理科学**<br>**化学科学**<br>**农业科学**<br>**社会科学**<br>**管理科学**<br>**行为科学**<br>**环境科学**<br>**系统科学** |

微电子技术的出现及取得的重大进展使电子信息技术成为新科技革命的核心和先导。电子信息技术创造的智能机器——计算机引发了一场深刻的智能革命。实质上，这也是一场信息革命．电子信息技术的产业化产生了一批称之为电子信息产业的工业部门，使整

* 附表见《理性的辉光：科技革命与世界新格局》，第 41 页。

个国民经济的各产业部门信息化，整个社会信息化，世界经济竞争全球化。微电子技术的进步，集成电路的存储容量逐渐提高，这一成就使计算机技术突飞猛进：一是计算机功能不断增强，向小型化、微型化发展；二是存储容量和性能价格比大幅度提高，使之迅速扩散和普及，成为全社会的信息工具，一场史无前例的智能革命开始了。

计算机技术的进步主要表现为四个方面：计算机硬件技术、计算机软件技术、计算机网络技术和人工智能。它们相互渗透、相互制约，在短短的不到20年的时间里已显示出了对新技术革命的重大影响力。首先，计算机技术成为电子信息技术向纵深发展不可或缺的手段，计算机技术的进步得益于电子信息技术的发展，反过来，电子信息技术要上新台阶没有计算机技术的参与也是不可想象的；其次，计算机技术广泛渗透和应用于其他高技术领域，包括航空航天、能源技术、生物技术、新材料技术等方面。"在当今世界，任何一位从事高技术研究的科技人员，都离不开实验室里、办公桌上甚至公事包里的计算机"[①]。

因此，新科学技术革命的首要特征就是以微电子技术为核心，以计算机为代表的电子信息技术在整个高技术群中占主导地位，它的发展制约着其他高技术的进程，也是衡量一个国家科技水平的标尺。

现代生物技术包括遗传工程和酶工程。遗传工程包括基因工程与细胞工程。基因工程除了基因拼接外，还有基因扩增技术；细胞工程包括细胞融合和细胞大量培育的技术。由于酶进行化学催化的效率极高，加之它选择性好，几乎不生成任何杂物，并且利于节能，保护环境，因而日益受到人们的重视。70年代兴起的现代生物技术已显示出了广阔的应用前景，基因工程在开创生物新品种上有独到之处，细胞融合技术在农牧业和医学方面的运用前景十分迷人；基

① 于德惠、赵一明：《理性的辉光：科技革命与世界格局》，第58页。

因工程和细胞融合技术的运用将使人类培育出越来越多的新型作物，人类改变生存方式和生活环境成为现实。最引人注目的现象就是生物技术迅速冲出研究中心和学院的大门，进入工业、能源、环境等领域。新兴的生物企业风靡欧美。

"新能源的开拓和新材料的诞生往往标志着新技术时代的到来，因为新能源为新技术发展提供动力，新材料则为新技术的产生提供条件。"[①]新材料是新技术、新产业赖以形成和发展的战略基石，新技术的进步又刺激新材料的发展，目前的新材料大致包括：工程塑料、复合材料、精密陶瓷、特种性能合金、非晶体材料、化合物半导体与光导纤维等。传统矿物能源的有限性及其对人类的灾害使人类寻找无污染、清洁无害、可再生的新能源成为必须，目前人类开发利用的新能源主要有：原子能、太阳能、水力、风能、海洋能、生物能等。

空间科学是一门集火箭、材料、电子、通信、自动化、计算机、动力工程等学科为一体的尖端科学，由于它涉及的领域广泛，协调要求高，投资规模大，因而空间技术的发展一般是国家战略发展的主要内容。70年代以来，人类的空间活动由单纯探索转向探索和开发利用同步发展。空间应用技术的主要标志表现为遥感技术的发展及可进行物资供给的航天站和可反复使用的空间运输系统——航天飞机的出现。在这一过程中，相比而言，利用空间技术进行空间探索方面不如空间实用技术发展快，在短短几十年的进间里，世界各国所发射的通信卫星、导航卫星、测地卫星、地球资源卫星、气象卫星等已达几千颗，全球用于空间活动的经费达几百亿美元。空间的开发和利用成为国际竞争的新领域。

海洋占据了人类生存的地球的大部分区域，发展海洋科学，开发和利用海洋资源是各国拓展生存空间的主要领域。迄今为止，各

---

① 杨沛霆等：《科学技术论》，浙江教育出版社，1985年，第308页

国的研究开发主要包括：海底矿物资源（海洋石油、天然气、锰结核团块、热水矿床）、海洋生物资源、海水资源等。

第三，科学技术成果向现实生产力的转化，科技成果转化为经济效益的周期越来越短：据调查和分析，18世纪为100年，19世纪为50年，第二次世界大战后为7年，目前一些发达国家更新产品、推出新品种只需3至5年或更短的时间。科技进步是经济发展的主要推动力。70年代后，科学技术的发展使国民经济正经历着一场极为深刻的变革，整个国民经济正向信息化、自动化、电子化、智能化方向发展。随着微电子技术的大规模渗透和计算机的广泛运用，制造的技术基础和技术体系发生了重大变化，它正由功能分化的单个部分之间的随机组合向由计算机集成的制造系统转变，因而微电子和计算机引起的企业革命的真正意义在于：人—机协调、实行自动化和智能化制造的时代已经来临；信息网络使企业竞争逐步向外延展，参与全球争夺；企业决策从纵向集中的垂直型向纵向集中与横向分散相结合的网络型转变赋予传统产业加速改造的良机。从此，企业成为了科技开发的主体，一方面，企业的科研开发投资逐年增加，并越来越多地参与专业技术人员的教育和培训；另一方面，企业成了技术发明、科技成果、应用开发的主要源头。

产业结构的大调整从根本上改造了国民经济，信息化时代大踏步向我们逼来。首先，带动国民经济发展的主导产业是电子信息产业，其增长速度居所有工业部门之先；其次，传统产业受到电子信息技术的强烈冲击，正向信息化、智能化方向质变；再次，各产业的相互渗透已衍生了一批“边缘产业”、“交叉产业”，如光学电子产业、医疗电子器械产业、航空电子产业、汽车电子产业等；最后，国民经济正由能源密集型和资金密集型向技术、知识和信息密集型转化。

这就是新技术革命的力量，从微观的企业到宏观的国民经济都正经历着电子化、信息化、智能化变革的改造，新技术革命的成果

迅速转化为生产力，“在新技术革命兴起后，科技开始变成生产力的指数。用公式表示就是……生产力＝（生产工具＋劳动对象＋劳动者）$^{科技}$”①。

第四，新技术革命的发展不仅改变了产业结构、企业面目，同时也渗透到了人们自身的生活空间。在微电子和计算机技术的带动下，各种民用产品也经历着自动化、电子化的改造，计算机向微型化、小型化方向的发展，使它进入了千家万户，在美国，一半的家庭至少拥有一台微机，同时，各种新型自动化、电子化家用电器正涌向市场，这一开发前景使各国经济走上了共同的发展模式。

尤为重要的是，技术革命的发展提高了人们对文化的需求，大批高新技术部门的涌现，使企业必须拥有实力雄厚的大型实验室和聘任庞大的研究队伍。世界著名的大企业，如 IBM、西门子、日本电气、富士通等等，都拥有少数专门研究机构才买得起的最现代化的研究设备。在它们那里聚集的研究人员都是在电子学、信息论、激光、通信、光电子学等高新学科领域取得重大突破的专门高级人才，有的还获得了诺贝尔奖。而且，世界发达国家的企业还在不断拓展新的研究手段和领域，主要从事定向研究。

新技术革命为企业提供的良好机遇在于，不仅要借此更新设备和技术，而且还要培训一批掌握高新技术的专业技术人员。“日本企业为适应电子信息时代的要求，组织青工和技术人员进修《计算机》、《系统工程》等课程；美国企业目前每年大约花费 800 亿美元用于职工培训，这个数额等于每年公立和私立大学及四年制院校经费开支总额！”② 在欧美国家，还利用现代通信和信息技术，以实况转播或录相等手段向在职人员和家庭妇女教授微电子、计算机软件、制造技术和技术管理等课程，称之为“继续教育项目（计划）”。

---

① 于德惠、赵一明：《理性的辉光：科技革命与世界新格局》，第 69 页。

② 于德惠、赵一明：《理性的辉光：科技革命与世界新格局》，第 95 页。

第五，新技术革命的冲击在高科技的发展上是有形的，但它所带来的无形变化却是潜在的，不为人们所共同熟知。它表现在这样几个方面：(1) 对国家战略的冲击，这是对发展方式的最重要的检验。科技发展的动力源头和开发模式的转变，对大国、强国的传统战略提出了严峻挑战，科技进步使它们别无选择，否则就会在历史的潮流中被淘汰。(2) 对经济体制的冲击，这是对发展方式另一方面的检验。经济体制对一国的科技发展和国力增长有至关重要的作用。新科技革命要求计划和市场相结合的体制，其中，既有市场导向的企业科技开发主体作用，也有计划的引导和协调。体制改革的目标就是建立计划与市场相结合的体制。(3) 对经济结构的冲击，这是对发展模式第三方面的检验。新科技革命使科技力和经济力在国际较量中的地位上升为第一位的因素，市场的全球化和竞争的国际化使各国唯有选择对外开放的模式才能真正参与国际竞争。

### 6.3.2 世界主要力量中心面向新科技革命的战略与策略

新科技革命的发展使国际关系中的许多内容发生了有意义的变化，如：国际竞争、扩张、霸权、领土主权、资源、战争、强权政治等等。国际关系的基石——综合国力的较量与竞争在内涵上不再是军事实力为主，而是科技领先，科技水平既反应在国力的软实力上（民族凝聚力、民众的文化普及程度、在国际事务中的形象地位等），也体现在硬实力上（经济实力、军事实力），“因此，综合国力的竞争实质上就是科技水平的竞争”[1]。

为迎接新技术革命的冲击，并抓住机遇使本民族、本国家或集团在国际舞台上立于不败之地，各国竞相采取措施，为加速科技发展铺路架桥。这种竞争与争夺在发达国家或地区间尤为突出，而日、美矛盾是核心。

① 《世界经济》1993年第7期，第5页。

关于美国的国力，评论甚多，有“正在衰落”说、“相对衰落”说、“绝对衰落”说、“加速衰落”说等等。不管何论，有一点是肯定的，美国已面临来自各方的挑战，特别是日、欧的挑战。第三次科技革命的序幕是由美国拉开的，源于战争和军事需求的刺激，在美国掀起了两次高潮，此后，美国在原子能、基本粒子、高能物理、计算数学、电子技术、空间技术、高分子化学、分子生物学等尖端科技领域都有大的突破，并在激光、遥感技术、生物工程、农业科学、医疗科学和新材料、新能源方面领先于别国。然而，从70年代开始，美国开始丧失它的一枚枚“金牌”，最令美国不安的是来自日本的挑战。在一些高技术领域，日本已赶上或超过美国。据日本通产省1989年列举的数字表明，在已经商品化的40多种高技术产品中，日本赶上或超过美国的已达36种之多；美国政府于1989年初估计，在26种半导体芯片生产技术中，美国已有14种落后于日本；1990年，美国商务部的一份报告指出，在12种有可能对美国经济产生巨大效益的“新兴技术”中，有5项已落在日本后面，有一项并驾齐驱。实际上，80年代以来，在日用电子产品、微电子元件、机器人、柔性自动化生产系统、数控机床等领域，美国已丧失对日本的领先地位；但在计算机软件、人工智能、生物工程、新材料、新能源、航天技术等领域仍保持明显优势。面对日本步步紧逼的势头，处于新科技革命前沿的一些美国企业和有识之士，不断对政府施加强大的舆论压力，促使政府在国家战略的调整中增添并突出“高技术日本”的目标。为再造科技优势，美国逐步采取了一些适应新科技革命发展需求的措施。

第一，加强对科技发展的宏观管理和协调。为完善国家科技决策部门的建设，面对高新技术产业日益激烈的国际竞争，加强了联邦政府的科技政策的指导作用。布什政府时期，通过提高美国政府负责科技政策的主要部门——总统科技政策办公室（OSTP）负责人的地位，将OSTP主任晋升为总统科技助理，成为政府的一名内阁

成员，同时创建了一个新的科技政策咨询机构——总统科技顾问委员会（PCAST），主席由OSTP主任担任。

第二，提出和实施规模宏大的科研项目。布什执政时期，OSTP提出了三项重大科研计划，即：1989年7月提出的美国全球变化研究计划，9月提出的联邦政府高性能计算机计划和12月提出的美国超导研究与开发行动计划。1991年初，国会委托国家半导体咨询委员会（NACS）拟定了“微电子2000”计划，提出要将2000年前美国生产厂家的半导体开发计划纳入NACS的长期战略计划，并由政府给予开发支持，这一计划被喻为新的“阿波罗登月计划”，目的在于确保美国2000年前在世界半导体市场占据主导地位。1991年4月，美国全国关键技术专门研究小组主席、白宫科学技术局副主任威廉·菲利普斯博士在给政府的报告中认为有22种技术“对于国家繁荣与国家安全至关重要”，如材料加工、电子和光学材料、陶瓷、复合材料、高性能金属和合金、灵活的计算机一体化制造、智能加工设备、微型和米诺制造、系统管理技术、软件、微电子和光电子学、高性能计算机联网、高清晰度成像和显示技术、传感器和信号处理技术、数据储存技术、计算机模拟、应用分子生物学、医学技术、航空学、能源技术等。美国政府决定要在90年代实施18项大型科研项目：如投资300亿美元于1999年完成的“自由”号太空站；投资170亿美元于2000年完成的地球观测卫星系统；投资60亿美元于1998年完成的超导超级对撞机；投资30亿美元于2005年完成的绘制人类基因结构图；投资16亿美元于1997年完成的高级X射线天体物理实验室；继续开发包括“星球大战”计划在内的军事高科技等。

第三，增加研究和开发投资。尽管美国政府连年巨额赤字，但研究和开发投资却在不断增加。据统计，1989年美国的研究和开发投资达1292亿美元，比英、德、法、日和加拿大用于研究和开发投资的总和还多。1990年美国的研究和开发投资达1500亿美元。但

是，值得注意的事实是，美国研究和开发的投资增长速度已低于日本和德国，1980年—1985年间为7.5%，而在1985年—1991年间降为0.4%。

第四，改革和振兴教育，加速人才培养。布什在竞选总统时宣称，他要以“教育总统”而载入史册，1991年4月白宫公布了布什的教育方略《2000年的美国》，其主要内容包括：“为今天的学生创建更好更负责的学校；为明天的学生创建新一代的美国学校；把美国改变成一个举国都是学生的国家；把全国的社区建成学习的场所。”[①] 美国的另一长远教育计划，即“2061工程”，它始于1985年从地球上看到哈雷彗星到2061年再次看到哈雷彗星，其目的在于提高全体国民的科学文化水平，设法抓住青年人的心和鼓励他们学习科技。为此，美国大幅度增加了教育经费，到1990年，美国教育经费达3530亿美元，比同一年度3030亿美元的国防预算开支高出500亿美元。

第五，继续争夺人才。人才是发展科技和提高国际竞争力之本，美国为解决人才短缺问题，除通过大学和企业培养本国人才外，继续把广揽国外人才视为传统“捷径”，在相当长的时间里，美国从世界各地争夺人才，特别是挖竞争对手的墙脚。其主要方式有：以高薪和优越的研究条件，吸引外国科学家到美国，既为他们出成果、成名提供便利，又从中获取科技和经济效益；以优惠的奖学金大量吸引外国留学生，从中选择优秀科技人才；重用有成就的外国科学家。美国不仅从日本的大公司、名牌大学和通产省办的实验室里高薪聘请第一流的科学家，近来又与发展中国家、前苏联和东欧国家争夺人才，这些地区流失的科学家和工程师大都去了美国。目前在美国的外国工程师和博士生中，亚洲人占了2/3，大都来自中国（包括台

---

① 现代国际关系研究所编：《国际政治新秩序问题》，时事出版社，1992年，第232页。

湾省、香港地区和大陆内地）、南朝鲜等地。可以说，从国外引进人才是科学中心从欧洲转移到美国的一个重要原因。

第六，建立高技术开发区。高技术开发区，又称科学园区、科学城或高技术中心。目前全世界已建立了400多个高技术开发区，其中美国已建立了140多个，波士顿高技术开发区是世界上最早的，50年代初以斯坦福大学为依托建成的“硅谷”高技术开发区，已成为美国九大制造业中心之一。

源于战后的国际格局和有利的地缘地位，日本大沾第三次技术革命之光，日本的特殊经历使它能在西方经济于70年代后普遍进入低速增长后依然保持良好发展势头，“日本经济增长的最大动力依然是科技进步，而从新的历史背景来看，更重要的原因在于日本在第四次科技革命中占据了有利地位。如果说，在第三次科技革命中日本总体上还是一个‘搭便车’的角色的话，那么，在第四次科技革命中日本扮演的则是‘弄潮儿’的角色”[①]。日本之所以能在新技术革命的浪潮中独占鳌头，与它不失时机的科技战略和政策调整是分不开的。

第一，根据自身特点、及时由“贸易立国”向“科技立国”战略转轨。“贸易立国”鼎盛时期的“引进技术——出口产品”模式必然导致贸易摩擦，日本对此极为敏感，他们已经认识到自主开发技术的必要性。在60年代采取了多项鼓励自主开发技术的优惠政策；到70年代，独自研制磁带录像机的成功，使日本坚定了独创技术的信心。为迎接新技术革命的挑战，日本自80年代以来采取了许多战略之举：1983年3月，在以首相挂帅的科学技术会议之下新设政策委员会，以制定新的科学技术发展政策；第二年，科学技术会议提出了“关于适应新形势和放眼未来的振兴科学技术综合基本政策”的第11号咨询报告；1986年3月，日本政府内阁会议审议通过了科学

① 于德惠、赵一明：《理性的辉光：科技革命与世界新格局》，第191页。

技术政策大纲。新的促进研究开发的政策措施包括：1981 年，通产省技术院创立“下一代产业基础技术研究开发委托制度”，以 90 年代为目标，进行企业、国立研究机关和大学的共同研究开发，同时还设立了“创造科学技术推进制度”，进行创新技术种子的研究开发；1985 年 4 月开始实行基础技术开发促进税制，6 月制定了基础技术研究完善化法；1983 年制定了技术城开发促进法，在全国具备条件的地区建设技术城。“技术立国”的战略调整使日本已完全变成了国际社会中的“技术大国”。从科技投人看，日本的科研经费以超过经济增长幅度一倍的速度增长，1991 年占国民生产总值的 3.1%，已超过美国的 2.8%。日本还把教育投人和培养科技人才作为它战略投资的一个重要方面来抓，日本的教育普及程度和对科研人员的培养都是居世界前列的；从科技产出看，到 80 年代末期，日本发明者申请的专利数量约 34 万件，居世界之首，同时，其技术贸易也由逆差转为顺差，日本技术出口以发展中国家为重点。它的高技术出口份额在 1989 年占世界主要国家出口比率的 37.5%，高于美国的 31.4%①。

第二，发挥优势，确立科技发展方向，重点突出开发战略。与欧、美相比，日本并非招招领先，关键在于日本在新技术革命的竞争中能瞄准决定胜负的一招，即把“含有技术浓度最高的产品作为主要研究开发对象和技术的发展方向”②。在日本，对技术的发展作了几个层次的划分：降低成本、提高质量、为尖端技术的发展提供元件和零件加工技术的上一代技术，包括应用技术、改良提高技术、生产管理技术；决定其国际竞争能力的关键技术（80 年代的技术），包括超大规模集成电路、微电脑、半导体激光器、电荷耦合器件、光

① 《世界经济》1993 年第 11 期，第 69 页。

② 武欣、朱荔：《三大计划与世界未来》，农村读物出版社，1988 年，第 9 页。

导纤维、人工智能机器人、非晶金属材料、新工业陶瓷、智能高分子技术等；90年代以后或21世纪显示作用的未来技术，包括约瑟夫森超导元件、立体集成电路、生物化学反应、基因重组、核聚变等。突出重点的战略，使日本在关键技术领域的研制方面走上世界先进行列，同时推动了相关领域的技术发展，以此带动了产业的高技术化和经济的持续增长。

第三，在科技发展体制上，发挥"民间企业主导型"机制的优势。日本科技发展体制的主要特点在于全国的科研经费大部分来自民间企业，其政府投资虽增加很快，但相对数要低于其他国家，到80年代末，美、英、德等国分别达到了50%、40%和33%，唯独日本仍保持在20%的水平上。日本的这一特点使它在新技术革命到来之际及时进行体制过渡，仅1983年—1985年两年间，日本企业建成的和正在建设的研究所就达100多所。日本约有350家大企业拥有600多个实力雄厚的研究机构，日本的最优秀的科技人才也都集中在民间大企业，企业间的竞争有效地促进了技术的发展，也使它的经济实力愈加坚实。

第四，政府发挥协调功能，实行"官、产、学"协作一致的科技开发体制。在发挥民间企业优势的前提下，政府机构也发挥了极强的组织、协调作用，各部门有完善的科技决策机构和明确分工，由政府科技决策机构出面组织官方、企业和大学的专家学者对科技发展趋势、市场前景及国际科技合作动向进行调查分析，确立战略目标和开发方向，并以此为前提，形成官、产、学开发合力。由于企业竞争激烈，所以由官方出面协调，加强中间环节，促进技术的转让，对民间企业自主开发的技术更是大力扶植。

与美、日相比，西欧除在航空航天技术领域* 拥有较强的实力

* 从70年代初由11国组成欧洲航天局，着手研制"阿丽亚娜"火箭，至今已研制了从1型到4型共4种。

外，只在中、低技术产品领域具备一定竞争力。但是，在决定国际竞争地位的制高点——微电子技术以及与此直接相关的高技术方面则处于落后状况，这一差距使西欧国家在第四次新技术革命的挑战面前显得步履维艰，与美、日差距渐远。造成这一格局的主要原因在于西欧国家对微电子技术的发展前景作出了错误的判断，担心“微电子化将对就业产生不良影响”。但恰恰是忽略了信息技术产业的建立，西欧在就业机会上损失惨重，西欧的市场也因此领域尽失，特别是日本的电子产品差不多充斥西欧市场，到1987年，西欧对日本的贸易逆差增加到242亿美元。

面对严峻的落后事实，西欧国家开始猛醒，分别在欧洲共同体、国家、企业等层次上采取了多种有力措施以迎接新技术革命深层次的挑战，奋起追赶日、美。

在欧共体的层次上，主要实施了“总体计划”和“尤里卡计划”。前者旨在加速欧洲技术一体化的进程，在有关研究开发领域统一技术标准，加强欧洲产业的科技基础和国际竞争力；后者对于西欧来讲更有意义，参加者多，研究开发领域不断拓展，到90年代初已达400个项目，参加机构约2000个，涉及19个欧洲国家，经费总额达1000亿欧洲货币单位。“尤里卡计划”主要包括五个部分：欧洲计算机计划（由13个项目组成）、欧洲机器人计划、欧洲通讯网计划、欧洲生物技术、欧洲材料计划[①]。1988年，欧共体委员会提出第一个关于欧洲科技状况的报告，在要求振兴以信息技术、生物技术、新材料为重点的科学技术的同时，提出了九项科技政策目标：促进全欧洲的基础研究与应用研究的平衡发展、加强产业界与大学合作、发展能吸引优秀研究人才的技术文化事业、改善公众对科学技术尤其是新技术的态度、扩大处于低水平的民间部门的研究开发投资、加速技术的应用和普及、为提高欧洲整体的科技水平而进行政

① 武欣、朱荔：《三大计划与世界未来》，第66～73页。

策协调与合作、加强对外科技合作并排除技术保护主义。

在国家层次上，主要国家德国、英国、法国等都及时采取了对策、调整了政策。法国为改变信息技术研究领域的落后状态，于1979年拟定了《科研10年规划——1981—1990》，确定信息与通信、空间技术、微生物工程、遗传工程、能源、材料等为优先开发领域；1983年由研究工业部提出了《人工智能计划》。英国也于1982年公布了《高级信息技术计划》，西德于1984年通过了《信息技术规划》。同时，这些国家在研究开发投入方面也有大幅度增加。特别是逐步向“企业主导型”方向的转变，使各国研究开发环境大为改善。

在企业层次上，西欧的企业通过自身改革、国内和跨国的联合，已在很大程度上改变了企业势单力薄的状况。

西欧在高新技术领域的前景和它的一体化进程是密不可分的，联合图强是它们的唯一出路。但还应看到，由于德国的统一，西欧乃至整个欧洲的联合调子已经发生变化，加之欧洲传统的政治、经济、文化意识方面的模式根深蒂固，使它们在新技术革命的竞争中处境艰难。

此外，受第四次科技革命浪潮的影响，其他国家和地区也都程度不一地采取了相应的措施。特别是广大发展中中小国家针对基础薄弱，科研力量和经费的不足、人才严重外流、教育落后等不利条件，抓住机遇进行改革调整，取得了一些成绩，但从总的趋势来看，在新一轮较量中，发展中中小国家同发达国家间的科技差距将进一步扩大。

对于中国而言，无疑是挑战与机遇并存，改革开放的格局已经使中国拥有了一个相对有利的国际国内环境，本世纪末和下世纪初的一段时间里，我们正好可以利用格局转换的有利时机，赶上或超过发达国家。而要实现这一目标，关键又在于在国际较量新的主战场占据有利地位。为此，中国必须充分利用自身的地缘优势，夺取21世纪的高科技制高点。

第一，利用发达国家间的矛盾，以我们庞大的市场潜力去吸引世界最尖端的技术，只有如此，才能尽快缩小我国同世界发达国家间的科技水平差距，并在高科技领域占居一席之地。

第二，同位于我国东部和南部边缘地带的一些国家或地区建构合理的经济关系模式。“四小龙”的经济增长主要是依靠技术进步的刺激，而在这一点上，中国远远低于这些国家和地区，甚至还低于东南亚国家。我们要把自家门口的这种压力变为强大的动力。

第三，重视同周边邻国的经济技术合作，特别是同俄罗斯等前苏联解体后独立的国家的合作，这些国家正经历转轨的阵痛，国内动荡不安，经济增长缓慢，但是，我们应该看到，这些国家一般都拥有雄厚的科技开发潜力，其科研人员素质和科研水平都是世界一流的，军转民的过渡可能会使之释放出惊人的潜能。欧亚大陆的这一片地带一旦连成一个大市场，其优势是可想而知的。

### 6. 3. 3 权力争夺新态势

高新技术的发展以及各国或集团面向21世纪的调整，充分显示了当代国际权力争夺主战场的转移，这实际也是权力纷争规律性的体现。科技革命的迅猛发展将使权力格局呈现出如下特点：

第一，世界各种力量都毫无例外地卷人了新一轮的全球利益争夺中。自古以来的利益争夺无非是某一地区或某些国家的区域纷争，即使是两次世界大战，直接卷进战场的国家和地区也只是一部分，而主要集中于欧亚大陆。但是，在技术革命的推动下，地球已变得越来越小，每一个热点，每一场冲突都牵动全球每个国家，全球一体化使世界编织为一张“网”，利益互动，功能急剧增强。

第二，参与全球技术战和经济战的国际关系主体多极化、多元化。历史的发展轨迹决定了资本主义国家间的技术战是国际技术争夺的主要中心，以此向外辐射，又形成了争夺的众多圈层，这主要是区域性的，而区域争夺又往往交错在一起。跨国公司的发展和不

平等的国际经济秩序决定了全球技术争夺的新模式。

第三，技术争夺使国家利益突出于新的方面。其一，国家安全利益的内涵发生了变化，领土完整、主权独立不能再仅仅理解为军事上免于侵略和不受他国强权控制等，没有硝烟的争夺已使各国充分认识到了国家利益的经济化和高新技术化；其二，国家利益的首要方面表现为高新技术主控权、国际贸易和国际金融主控权、信息主控权等，因为，在当今国际竞争中，哪个国家或集团只要夺取了上述几方面的主控权，其实力地位必然居于世界前列，军事主控权已降为一种必备“辅助因素”。

第四，技术争夺使利益角逐各方呈现出既对抗又合作的关系。强国之间，强国与弱国之间，弱国之间总体上表现为政治上的和平共处和经济上的相互竞争。在这种格局中，国际舞台并非阵线分明，而是互为敌手、互为朋友，没有永久的朋友或敌人，只有永久的国家利益。政治上的共处共存和经济上的竞争使国际关系既表现为合作，又表现为矛盾与摩擦，国家间的角逐是一场没有硝烟的战争，每个国家都必须保持高度紧张与清醒的头脑，都必须参与到其中去，不可能保持中立，因为中立意味着自甘沦为经济小国和政治弱国。而且，在这场无休止的激烈较量中，每个国家要面临各类经济冲突，包括：贸易战、金融战、资源战、广告战、情报战、间谍战、心理战等，这就使国家行为主体必须扮演多功能、多内涵的角色。

第五，世界权力争夺的关键因素是人才。因为人才的数量、质量及其结构直接影响了一国的科技水平、科技开发潜力及其良性循环机制，各国既要拥有一流的自然科学家，各类专门技术人员和庞大的科研队伍，又要笼络社会科学的各类专家及管理人才。忽视自身人才的培养，单纯依靠引进技术，只能永远跟在别国的后头，技术制胜在于夺得高新技术制控权。

第六，国家关系中的地缘意义发生明显转移。技术的进步已使自然屏障化为虚无，权力争夺不能再醉心于此类因素，世界的枢纽

地带是技术中心和经济强盛中心。但是，我们同时又看到，基于地缘因素而进行的合作正在加强，欧洲、亚太及北美等区域合作呈现不断加强的势头，区域的合作不仅有利于技术上的互补和建立集团优势，而且有利于各国政治上的共存共处。地缘优势一旦确立起来，技术实力必将大增，各国对利益的分享也会更多。

第七，技术制胜使国际关系的民主化进程进一步加快。"技术立国"、"科技兴国"世界性潮流使各国更注重合作、而不是追求对抗，只有选择合作才是明智之举，只有在合作中才能保存既已取得的利益，只有保证了他方的利益实现，才能使自身获得最大收益。经济技术合作的深化必然推动全面国际合作的展开，而且，这一领域合作的稳定性、互利性和长期性将成为国际矛盾与对抗的缓冲器和润滑剂，大大降低国际冲突与战争的可能性。当然，各国在新一轮较量中也要清醒地认识到：经济技术领域中的控制与反控制，不均等利益分配仍然很突出，霸权主义与强权政治正发生内涵上的转变，这就要求各国对主权问题、国家利益问题进行全新的分析，强调合作不是将国家经济技术大权拱手让于强国，也不是放弃对抗，合作与对抗是互动的，正常化的权力格局是既对抗又合作的格局。

# 后记

我将自己的研究方向确定在对地缘政治学的研究方面，得益于我到华中师范大学后结识的朋友们，他们是任定成、袁江洋、张祖林、桂质亮等。经过一段时间的资料收集和整理，我撰写了一篇题为《地缘政治学述略》的论文，寄往《中国社会科学》编辑部，本来，我十分清楚，这道“菜”是具有特别风味的“菜”，国内还没有哪家学术刊物肯为此专辟栏目，因此，对能在《中国社会科学》发表不抱多大希望。大概是月余后，我收到了从《中国社会科学》编辑部寄回的一封厚厚的信，我想这一定是修改稿，但我拆开后发现，除了我的稿件外，还附有编辑破例的退稿信（当时《中国社会科学》已废止了退稿制），他在信中建议我将全文改投其他刊物，并致力于这一领域的研究，撰写一本有关地缘政治学的专著。这对我来说是个意外收获，编辑热情的回信使我坚定了在这一领域耕耘的信心。

1993年，我经过认真设计申报了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项目，让我欣喜的是，这一次居然得到了批准，这无疑是个天大的喜讯。在此，我要感谢对我申报工作给予支持和帮助的易德伟和邹政华等科研处的工作人员。

此后，我全身心地投入到了课题的资料收集、整理和研究之中，在此过程中我得到了许多人的帮助，如我在北京大学求学时的好友张小明、罗艳华等，华中师范大学的杨宏禹教授、程毅教授、刘盛佳教授、张祖林副教授等。特别是，我在研究中经常与我的好友袁江洋先生进行探讨，我从他那里受益匪浅。在此，我向他们表示衷心的感谢。

这本专著也凝结了我的家人的心血，我的父母、岳父母和妻子朱静对我的研究给予了最直接的关怀，他们使我有良好的心境和充沛的精力去从事我所喜爱的学术研究。

我还要感谢华中师范大学出版社、科研处和政法学院的领导对我科研工作的支持和帮助。

这部专著是我的处女作，愿它能对国内地缘政治学的研究提供一些思路，同时恳请国内外同仁对本书的缺点和不足提出批评！

刘从德

1996年9月于桂子山